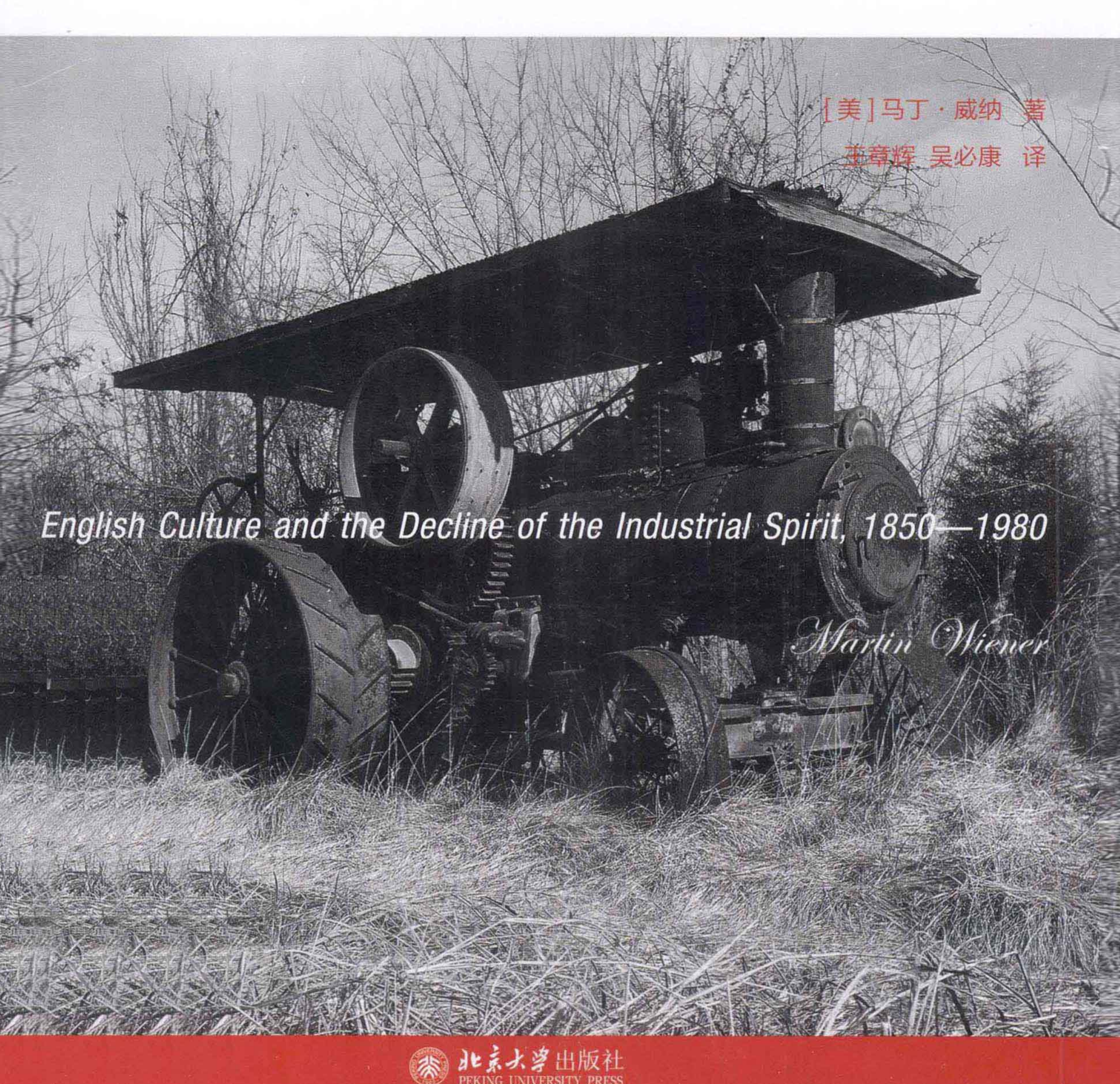
CAMBRIDGE

"英国病"：到底是英国病了还是我们疯了？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 1850-1980



[美]马丁·威纳 著

王章辉 吴必康 译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Martin Wien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 1850-1980

[美]马丁·威纳 著　王章辉 吴必康 译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Martin Wien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46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美）威纳（Wiener，M.）著；王章辉，吴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301－22857－9

Ⅰ．①英…　Ⅱ．①威…　②王…　③吴…　Ⅲ．①文化史－研究－英国－1850～1980　Ⅳ．①K56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2194号

书　　　名：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
著作责任者：［美］马丁·威纳　著　王章辉　吴必康　译
责 任 编 辑：张善鹏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22857－9/K·0971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 子 信 箱：zpup@pup.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0112
出版部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9印张　270千字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献给 Julie 和 Wendy

国家也像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想象之中。

——因诺克·鲍威尔（Enock Powell，1946）

译者序

我们将威纳的著作《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译成中文出版，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位美国史家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供研究大国兴衰问题的读者参考。

英国在19世纪曾经是世界工业霸主，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赶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后来又被法国、日本超过，还一度落到意大利后面。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12年1月发布的统计，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名降到第六位。学术界和政界对一个世界头等强国衰落的原因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多年以来，许多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和探讨。

英国的衰落既有相对的一面，也有绝对的一面。所谓相对衰落，是指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慢，相对实力减弱。绝对衰落主要表现为殖民帝国的土崩瓦解，世界霸权地位的丧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下降，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但经济上的衰落从总体上来说是相对的，因为在20世纪，英国的总体经济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居民的生活水平都超过了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从19世纪末期就开始了，两次世界大战加快了这一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英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失业率居

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这种情况被称为“英国病”。对“英国病”的起因，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研究著作大量涌现，从凯恩斯主义到自由市场理论都一一尝试过，用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三大经济要素来解释，也不能得出圆满的结论。马丁·威纳的这本专著独辟蹊径，力图从思想观念和文化形态学的角度对英国衰落的原因进行探讨。威纳的著作于198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和政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评论不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提出补充看法的。他的书被研究者广泛引用。

马丁·威纳当时是美国休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这本专著曾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罗伯特·利文斯顿·斯凯勒奖，先后翻译成意大利文和日文，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

威纳的书分四篇八章，作者在书中对英国现代文化的价值观、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上流社会的重组、乡绅价值观对工业价值观的改造、反工业主义倾向及其对政党、教会和劳工运动的影响、实业家的绅士化等问题分别作了阐述，并就英国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总的评价。

威纳指出，英国实业家在19世纪创造了世界第一流的物质文明，但并未使工业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反而屈从于绅士文化和土地贵族的价值观，工业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受到压抑，工业主义内含的进取精神被弱化，工商业者在社会上不受尊重。成功的工业家为了追求社会地位，花大量金钱到乡间购买地产，建造宅邸，甚至放弃工商业活动，去追求上流社会的时髦风尚，结果造成进取精神衰退。在乡绅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上的企业经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地位低下；银行界与工业界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关系，银行业宁愿把资本输出国外，也不愿向工业投资，以致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到来时，表现为工业投资不足，技术更新迟缓，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速缓慢，结果使工业吸引资本的能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也损害了银行业本身。这种情况使电子工业、汽车产业、合成化工等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为英国

的衰落埋下了种子。

英国教育也受绅士文化的影响，从课程设置到指导思想都渗透着对工商业的鄙视，学校忽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实用知识的教学，许多学生厌恶工商业，结果这个国家虽然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缺乏足够的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作者认为，在保守主义思维模式下，竞争受到遏制，创新精神受到压抑，变革受到怀疑，对经济效益的关注被斥为“保守主义”，人们习惯安于现状，这种保守主义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后果就是工业精神的衰落。所有这些都被威纳看做英国经济相对衰落的原因。

作者指出，公学和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对上流集团世界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这类学校教育有严重缺陷，从课程设置到指导思想都渗透着对工商业的鄙视。它们崇尚古典文学，忽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实用知识，视工程技术和工商业为低贱行业。经过这种教育的熏陶，不仅上流阶级的子弟看不起工商业，就是实业家的后代也接受了乡绅阶层的享乐文化，淡化了其父辈的价值观。

到 20 世纪，虽然“纯科学”在高等学府的课程设置中占了一定的地位，但应用科学仍被忽视。在美、德、法、日等国工业很容易招募到高质量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可是在英国，公学和大学的高材生很少人愿意去工商业部门工作。工业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威纳用很大的篇幅讲述乡绅文化观的影响。在英国文学上，以乡村田园风光为主题进行创作成为一种时尚。作家把工业城市描写成丑陋的怪物，尽情歌颂乡村静谧、安适、停滞不前的社会环境，以此反衬对城市工业文明的厌恶。作者引用英国一系列思想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述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约翰·穆勒对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理想持怀疑态度，查尔斯·狄更斯反对工业资本的价值观，安东尼·特罗洛普对商业的作用表示忧虑，马修·阿诺德辛辣地批判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约翰·罗斯金强烈地憎恨工业社会。

以上名人在英国文化史上固然多有建树，却也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时，不能洞察社会发展的前景、寻求克服社会弊端的途径，而是顾盼已经逝去的时代，企图回到古老英格兰的田园生活中去。

威纳指出，在英国政界，无论托利党（保守党）、自由党还是工党，都渗透了乡绅价值观的影响。许多政治家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绅士。保守党政治家斯坦利·鲍德温自喻为"农夫"，他坚持乡村"永恒的传统"和古老的价值观念，反对商业主义侵蚀。曾任工党首相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老式、好沉思的乡下人，英格兰古老传统的继承者。乡绅文化妨碍了政治家把主要精力用来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教会也加入了反对工业主义的大合唱。教会的高级教职人员也对工商业抱厌恶和非难态度。一些教会人士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不感兴趣，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在于将人的兴趣从物质方面转到精神方面，幻想建立一个生产问题不再起支配作用的社会。

在保守的思维模式下，竞争受到扼制，创新精神受到压抑，变革引起怀疑，对经济利益的关注被斥为"实利主义"，人们习惯安于现状。这种保守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后果就是工业精神的衰落。

威纳就英国乡绅文化对工业价值观的改造、地主乡绅对工业资产阶级的同化作用、保守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所作的分析，无疑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像许多西方学者一样，他在强调自己的观点时，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国经济衰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把经济缓慢发展和停滞不前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乡绅价值观的影响，也像单纯的经济解释一样，是片面的。作者过分夸大了反工业主义倾向，并把文学上对工业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与反工业主义混为一谈。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不能从社会发展不平衡方面去分析原因。

英国的相对衰落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威纳在书中提到的乡绅价值观、教育体制的弊端等以外，还有一些更重

要的原因。英国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曾在世界工业中占据垄断地位，它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无人可以与之匹敌，它的工业品行销全世界，在世界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别国发展工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钢材、铁路器材和船舶等都要从英国进口，英国可以获取大量超额利润。但好景不长，到 18 世纪，美、法、德、俄等国也先后开始和完成工业革命，这些国家所需的工业品可以自己生产了，而且还把多余的产品输出国外，走上了与英国竞争的道路。这些后起的国家还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用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使英国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遇到了日益激烈的竞争，产品出口困难增大。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技术设备相对陈旧，在 19 世纪下半叶发生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时候，虽然英国是许多新技术的发明者，但因受陈旧设备之累，资本家不愿意大量投资改造旧有的设备，以致科学技术成果不能及时地转化为生产力，而后发的美、德等国家还在工业革命进行中就赶上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它们在采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方面走到了英国的前面。美、德等国的钢铁工业、合成化工、电力和电子工业、内燃机和汽车工业等领域以飞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在经济效率和生产增长速度方面都快于英国，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世纪之交，在工业生产总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成为后者强有力的竞争者，使英国丧失了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在国际市场上的处境日益恶化。

英国没有对在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工业结构及时地进行调整，长期倚重纺织、钢铁、煤炭、造船等大宗产业，而这些传统产业部门因受到其他国家的强烈竞争，出口遇到困难，生产力严重过剩，而前景好的新兴产业又发展较慢，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殖民地和附属国是英国廉价原材料及食品的重要来源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这一市场的存在对减少英国的工业品销路的困难起了一定作用。但殖民地市场需要的多为中低端的产品，过分依赖殖民地市场妨碍了英国企业家去改造企业的设备和改进经营管理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当殖民帝国土

崩瓦解以后，尽管它在原有殖民地的经济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但它的垄断地位日益受到其他工业国家的挑战，影响力逐渐下降，这对英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英国在研究和开发（R&D）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力比其他工业国家少，而且投资不当，把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军工领域，致使在新技术开发方面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英国企业未及时进行体制上的创新，未及时吸纳法人公司的管理技术和组织形式，根深蒂固的制度结构像集体谈判工资的制度、教育与生产的脱节、银行与工业的松散联系、国际贸易的格局、国家—企业关系等都长期沿袭下来，体制上的弊端抑制了生产系统的改造。19 世纪英国公司内部结构简单，典型的商号是由所有者或有亲属关系的人管理，管理人员少，企业规模小，成本计算和生产控制粗放，生产技术的发展主要靠经验，而不是靠系统的研究。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前，企业财政主要靠个人家庭财产、利润再投资，只在有限的程度上依靠地方银行。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发展了有限责任制公司和地方股票市场。当然，英国并不是完全没有采取新的管理制度，只是在转变的速度和规模上比较缓慢。即使现在，英国企业在成本核算、营销手段、技术革新等方面也做得比它的竞争对手差。体制上的缺陷、管理制度的惰性，妨碍了对生产结构进行及时的调整。

英国企业没有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等，囿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劳资双方的利益经常发生尖锐对立，企业采用新技术经常都意味着部分工人失业，当企业准备搞技术革新时，常常遭到工人大众的反对，劳资矛盾阻碍了技术革新的顺利进行。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这里就不细讲了。

作者的观点是英美等国研究英国相对衰落原因的流行观点之一，将此书译成中文对我们了解西方学术研究的动向和研究英国相对衰落的原因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王章辉

2013 年 3 月于北京

新版导论

本书在酝酿时，正值英国“受过教育的舆论界”已经丧失了对民族、国家和其前进方向的信心，这是好多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同时发生的帝国的终结、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的再现、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让位于欧洲邻国，使那些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和形成英国舆论的人处于一种新的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带有像“英国向何处去？”之类标题的文章和书籍涌现出来，甚至有影响的月刊《冲突》(*Encounter*)发行了以《一个民族的自杀？》(*Suicide of a Nation?*)为题的专刊。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以复兴国家活力、“在技术革命的热潮中打造一个新英国”的口号作为1964年选战的主题，这次选举结束了保守党十三年的统治，尽管威尔逊的政府随后就陷进了迅速变化的当代世界的不利漩涡。六年以后，当工党再次投入选战时，民族复兴这一新的诺言主要被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领导的政敌加以利用。希思的保守党政府也未能履行诺言，他的政府在因矿工罢工而使英国雪上加霜的世界石油危机中垮台。十年政治上的承诺令人痛心地失望，结果国家的“复兴”成了比单纯政党变化更复杂、更捉摸不定的目标。到1974年，在对公共事务前所未有的忧郁气氛下，对现代英国史的严肃反思已经期待已久。

到此刻为止，对英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新的忧虑对专业史写作的影响甚微，当政治上更激进的新一代人也开始留下自己的印迹，他们仍停留

在对进步“宏大叙述”的辉格陈旧道路上。那时主要的创新是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汤普森（E. P. Thompson）为首的“从下到上历史”的奠基，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作为进步史中心人物的工人阶级和工会人士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塑造上，而不是把中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开明的辉格党人，甚或人道的帝国主义者当做“主角”。“劳工的挺进”，而不是自由民主抑或一般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成了写作前两个世纪历史的新中心议题。然而，60年代和70年代初历史学家中的激烈争论，的确注意到了那时公共事务讨论中盛行的对国家当前形势的强烈疑问。

当希思政府和这个国家经历1973—1974年那多灾之年的动荡时，我正在英国度假，利用这一机会研究20世纪关于国家“现代化”的思考。当前的麻烦和这一世纪的思考，似乎都需要相互联系起来考虑。我最初受过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训练，我发现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和停滞问题的用语过于狭隘。我坚定地相信，正如凯恩斯（J. M. Keynes）所指出的那样，当代“务实”的人都比此前更多地认同已经过世的那些人的思想。但是，我与我这一代许多其他思想文化史家一样，已经不满足于狭隘地、精英式地聚焦于少数特出的思想。我的视角在扩大，可以包容多数人所持有的远不那么缜密和严格的思想和情感，这些人构成了比一套特定想法更宽泛的思想架构——德国人将此叫做一个时期和地方的“时代思潮”（“Zeitgeist”）或“精神风气”。我开始相信，就像有争议的政治家因诺克·鲍威尔曾经说过的那样，“国家也像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想象之中”。

在20世纪70年代公共动乱的背后是否逐渐形成了这种“想象”呢？当我在写早先的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期的思想家和社会主义活动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书时，我才知道，19世纪“资产阶级”的特性已经改变了，它正在战胜（如传统历史所说）古老的贵族阶级：它接过了那个阶级的许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外部标志。他们刚刚获胜，商业、工业和城市生活似乎就因他们的许多失误而又受到指摘。与此同时，新近对民族特质的强烈关注出现了，其中过去的及其想象的美德

起了关键作用。这意味着什么呢？或它对英国当前的问题有什么重要东西可说吗？

在这当儿，我接触到了年青一代聚集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 周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像汤姆·奈恩 (Tom Nairn) 和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那样的作家被问道：为什么所期待的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未获得成功呢？在寻求对这一政治问题的答案时，他们提供了与我的观念发生共鸣的英国史的范例。他们争辩说，因为其工业革命发生的独特时间，英国从未发生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现存强有力的统治阶级已经能够容纳和吸收新的资产阶级。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没有其自称那么“现代”的独特国家。如果比单纯政治含义更宽泛地采用奈恩和安德森模式，那可以为当前的社会经济泥潭和过去一个世纪令人惊奇的中产阶级反现代文化的兴旺提供一种解释。

我的形成中的“工业精神”图景，归顺和包含在 19 世纪英国文化史中，我在 1974 年春天的两个报告中，就将它与那种含义的某些政治和经济后果提出来了，其中一次是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主持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另一次是在哈德逊欧洲研究所组织的阿斯里奇管理学院会议上对与会的实业和政治领袖听众提出的。在这两次报告中，特别是最后一次，我力图让历史学界和公共政策演讲进行卓有成效的结合，尝试提出最新历史发展的苗头和当前进退两难的历史根源，或许可以撒播某些思想种子，以期以后生根发芽。

此后我回美国执教，一些学术和个人事务使我放慢了写作进度，以致此书到 1981 年初才面世。那时另一届工党政府陷入社会困境，接替它的保守党政府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政府在日益增大的压力下，着手扭转其紧缩货币和放开市场的激进新政。这是重新评价现代英国历史基本路线的恰当时刻，本书得到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的大量评价以及预期中的专业历史学家的更多补充。正如理查德·英格里希 (Richard English) 和迈克尔·肯尼 (Michael Kenny)

所注意到的那样，这是“受到学术界和更广泛的读者重视的第一篇重要‘衰落论者’的文章”[1]，它既被政府成员当做对一个世纪之久的错误方向追根溯源并寻求加以改正的论著而加以引用，也被某些批评家当做他们控诉政府“出卖英国工业”（1982年电视节目特别根据本书而采用的标题）的依据。自然各方都从书中摘取对其直接工作有用的东西，但是双方对我在写这本书以使当前的困局更容易被理解方面所作的真诚努力都有回应。

我在书中提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文化界对工业革命的破坏性力量的反应，迅速地把阻碍经济创新和增长的价值观和态度灌输给中产阶级和上中产阶级。并非像19世纪中期可能出现的那样，得到全国性认同的不是工业制度、技术、资本主义或城市生活，而是植根于变化缓慢的“乡村”生活方式的价值观。这种反响受到像公学、牛津剑桥那样的机构以及可能过类似贵族生活方式的机会的滋养。其结果是，“工业价值观”的兴起受到抑制，工业和技术职业的地位明显地低于政府或专业人士。更显著的结果是，经济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具有活力，政治体制不那么支持经济的发展。

除了对现行政策含义的直接兴趣（并非没有关系）外，本书也激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与调查研究。事实上，本书的一个贡献无疑是加快了商业史、技术史以及英国历史上社会文化对经济行为影响之研究的发展。二十年来，评论家专注于经济行为的特殊问题及教育体制和贵族生活方式对之发生的想象的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可以显著快一些吗？公学和旧式大学真的阻碍了这样的发展吗？工业家和潜在的工业家在其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绅士化”了吗？就算是“绅士化”了，他们是否明显地阻碍了经济发展呢？

当然书中很多地方都可以批评。本书作为一位理智的历史学家的作品是可以争论的，在赋予其更有力的思想，而且在开辟一个新领域时，时常不得不在证据基础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工作。像公学毕业生未来的职业以及

---

[1] Richard English and Michael Kenny, eds., *Rethingking British Decline*, 2000, p.25.

工业家购买乡村地产倾向那样的问题尚需进行仔细的研究，在这类事情上，本书在阐释论题和挑选例证时，必定仅做了一些粗线条的勾画，而没有量化大量的证据。正如新近的评论家汤普森（F. M. L. Thompson）在2000年所注意到的那样，“文化是一种无常的向导，它是那样的灵活，那样急于讨人喜欢，那样易于塑造为适于任何一种偏见，所以对历史学家来说，超过来源于更客观证据的独立确证的范围去相信它，是不明智的。”[①] 除了别的事情以外，汤普森还对以下问题提出疑问：是否存在“企业文化”（书中并未出现这个词，它是被本书的保守赞赏者杜撰出来的）这样的东西，或者是绅士化过程（商人和工业家接受“乡绅”和“贵族”的生活方式）是否果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可以量度的有害后果。由于本书评论者和其他历史学家辛勤耕耘的结果，现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比70年代末这本书成书时所知道的多多了。无疑，如果今天来写这本书，情况会大不相同。但它还是表达了70年代和80年代有关英国思潮及英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些重要东西。一个多世纪以来，技术人员和商人们表达了他们相比于专业人士或政府人士受到排斥的感受。他们很多人在读了这本书后，在80年代写信给作者重复表达了这样的感受。在几代人中有这种感受的人是那样多，那样强烈，他们不能不说出一些重要的东西，尽管只是“文化方面的”。

此外，多数评论家对这本书的反应是太过热烈了，以致很快就与令人反感的撒切尔政府紧密联系起来，他们还容易误读本书的论据，把它们说得比实际内容更强烈，把对英国经济停滞的部分解释当做全面的解释。甚至在其选定的特定文化领域，也不是将其解读为对工业价值观的抑制或“驯化（domestication）”的描述，而是将其打败。加之，几乎所有评论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本书叙述中的一半内容上——实业阶级的经济行为，而

---

① *Gentrification and the Enterprise Culture:Britain 1780–1980* (2001), p.160. Besides Thompson's, the leading critical works are Bruce Collins and Keith Robbins ,eds., *British Culture and Economic Decline* (1990); W. B. Rubingstein, *Capitalism ,Culture and Decline in Britain,1750–1990* (1991), and Peter Clarke and Clive Trebilcock, eds., *Uderstanding Decline* (1997) .

忽视了其另一半内容，即反工业价值观和态度对政治论述及政策的影响（其中帝国持续的影响起了关键作用，书中对此讲得还很不够）[1]。本书在结论部分转向了政治，并提出，撒切尔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不是货币供应或工会（两者都是她的政府执政初期优先注意的对象），而是国家政治和经济领袖的主导想法。所以，正如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论证的那样，它证明，就布莱尔（Blair）的"新英国"不同于威尔逊和卡拉汉（Callaghan）的英国而言，它多亏了"文化"的议事日程以及其间"撒切尔时代"更具体的法律和财政政策。

因而，在吸收了本书评论者许多有根有据的反对意见后，本书仍然是现代英国史学中的一个界标，它作出了几个不同的贡献。第一，当然是因为它激发了对英国经济史，特别是对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经济行为文化"比迄今所知的更大的兴趣，甚至是对"现代化政治"的兴趣。但本书被证明是完全超出了"相对经济衰落辩论"的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作品。把经济学作为文化活动来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内外都迅速发展起来。在历史学以外，专业经济学对文化的、制度的和行为的审视角度变得容易接受多了。在历史学领域，商业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实质上获得了爆发式的发展，而特别是在可以称为18世纪"工业精神诞生"的研究领域，开始改变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理解，而工业革命正是像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是发明农业后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2]。事实上，现在你可以讲有一种新出现的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学术共识，这种共识前所未有地赋予18世纪英国许多科学家、工匠和商人之间特别密切的关系以更大的作用，后者被

---

① 实际上，此点评论家们从未指出过，但的确应当详加考察。在20世纪，占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帮助支撑了一大帮官僚职业阶级及其倾向于保留现状而不是创新的虚伪的绅士"看守文化"。

② See Margaret C. Jacob, *Scientific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West* (1997); Joel Mokyr, *The Gifts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g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02).

称作广泛传播的“工程文化”[①]。

此外，本书是英国精英阶层特有的混杂性、贵族的“衰落”过程比以前认为的到底长多少慢多少的第一本书，它也是引起对日益专注于20世纪英国民族特质的关注的第一本书。最早在本书中得到讨论的“民族特质文学”，自此变成大量研究的课题。2002年，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ls）评论道，“从大约二十年前开始，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开始再次提出民族问题”[②]。似乎今后这种状况也不会停止。

二十多年以后，本书仍然是对现代英国历史一种面貌的鲜活写照，是对关于英国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思考的促进剂，更广泛地讲，它奠定了研究英国民族特质的主题，并且是在其同时代的政治和公共生活中起了作用的一种历史著作的令人瞩目的范例。

马丁·威纳

2004年

① Jack Goldstone, “Effloren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 Rethingking the‘Rise of the West’”,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 (2002), p374. 这一论述的充分展开，见戈德斯通即将面世的著作：*The Happy Chance: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Persperctive of World History*。

② Robert Colls, *The Identity of England* (2002), p.4.

前 言

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曾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能只留给经济史学家去研究。"[1] 工业主义也是如此。我在写关于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英国社会思想的另一本内容很不同的书时，熟悉了"界线分明"的各阶级中的各种别具特色的社会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它们体现了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模糊看法。在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工业主义似乎并未扎下根。在一个使人类开始"飞速前进"的国家，人们常常以怀疑和鄙夷的态度来观察经济的增长。英国人首先开始了城市化的过程，但他们却忽视和贬抑城市。

这种不协调现象我发现得越多，它们就越显得重要。它们不是表面上令人好奇，而是接近于英国现代史的核心。总起来说，它们证明有一个环绕经济发展力量——技术、工业、贸易——的文化隔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变化（和静止不变）中，可以开始看到这种精神隔离的形成，从那时起，这种隔离赋予中上阶级的文化以一种特别温和的乡村的、怀旧的气质，并且最终可以看到，这种隔离与现代国家经济活力的衰退交织在一起。说明这些错综复杂的看法，是以一种新方式强调现代英国保守的思想架构的重要性。简言之，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上述不协调性，提供了一把重新解释过去一百三十年间英国国内历史的钥匙。

我在这里考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看法（如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并

非均衡地表现于整个英国社会，我也不是一般地把注意中心集中于统计概念上的“舆论”，那种舆论把每个居民都看得同等重要。本书将探索英国上流社会中的情感、看法和价值观，尽管这个上流集团是广义的。我确信，解开现代英国史谜团的最重要的钥匙就在这里。

文化价值观和看法，经常在富于想象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但我们考察这类文学作品的目的不是研究英语，说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文化史不同于文学史，企业活动与文学批评更是两码事。我们将（在其他许多非文学资料中）考察公众对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和想象，原则上我们不是去考察他们艺术上的细微末节，这些东西在许多读者那里将会失去意义。我们要涉及的恰好是作品中文学批评家最不注意的那些方面，即作家与最广大的读者共有的那些东西。

我们考察的所有看法和情感，以及我们把它们联系起来的社会发展，在以前也曾有学者零零星星地提到过。文学、艺术、建筑、社会、政治和经济学的史家们[2]，都研究过这一综合体的各个方面，但谁也没有把所有这些方面联系起来，看做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文化模式的组成部分。所以，我的研究方法是综合分析。我利用了各种各样的证据，以及许多专业领域的学术成果。历史研究各个专业领域的界定，基本上是出于方便起见而作的随意划分。这种界定在需要统观它们、把它们联系起来及揭示其亲缘关系时是重要的，否则这些联系和亲缘关系就容易被忽略过去。我同意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看法，他说：“任何有益的文化分析，都是从揭示出模式以及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开始的。这种关系有时可以显示出以前孤立地考察的那些活动的未曾预料到的一致性和相似性，有时又可以显示出出乎意料的不连贯性，这就是一般文化分析所涉及的问题。”[3]我想揭示某些这样的模式，并阐述它们之间的某些联系和后果。

威廉斯对文学（广义的）和社会的联系的兴趣，在英国学者中是不同凡响的。英国学者喜欢回避这种“模糊”领域，他们将思想情感（想象力

的王国）与“现实生活”断然分开[4]，这是不幸的。我写这本书的一个愿望是，希望它能突破这种人为的障碍，扩大历史编纂学的敏感性。思想观念的确是“现实的”，并产生了种种后果。

马丁・威纳

1980 年 10 月

目 录

第三篇　向实际行为演化

第四篇　工业主义与英国价值观

1

第一篇 <1>

背　景

第一章 <3>

英国现代文化两面观

我确信，布莱德索弗（Bladesover）是了解几乎一切英国独特的、令在英国的外国研究者困惑不解的东西的线索……要牢牢把握住以下几点：英国就是二百年前的整个布莱德索弗；它的确通过了几项改革法，并有诸如此类的常规变化，但自那以后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革命；所有现代的、与过去不同的东西，不管它是粗暴无礼的还是辩解式的……都是作为一种渗透进来的东西或是作为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俗套的虚饰而产生的。实际上，不在布莱德索弗阴影下的每一个人，总是在寻找失去的方向。我们从未与传统决裂，甚至从未像法国人在恐怖时期令人战栗的事实中所作的那样，象征性地打破传统。但一切组织意念都松弛了，旧习惯的束缚放松了，或者都一齐废弃了。

——威尔斯（H. G. Wells），

《托诺－班格》（*Tono-Bungay*，1908）

第一节　文化价值观与经济落后

英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经济衰退的解释。但过去并非总是如此。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以前，对 19 世纪英国历史的公认看法还是一系列成功的历史：不流血地奠定了民主制度，福利国家在演进，两次世界大战都取得胜利，并开明地放弃了帝国。然而，这样一种愉快的思维架构却越来越难以维持了，因为英国人在避开了政治动乱或军事失败的暗礁以后，却发现自己陷进了经济的泥潭之中，欲进不能。随着历届工党和托利党政府眼见它们把经济提高到英国邻国和竞争者的发展水平的各种万灵药方都遭到挫败（尽管有北海天然气和石油的意外收获），人们终于开始深深认识到，这个问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科雷利 · 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1975 年说："英国病不是过去十年二十年新出现的事物……而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有的现象。"[1] 此问题之难以解决，更加清楚地表明，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状态。愈是深入考察 20 世<4>纪英国经济的衰退，就愈加发现社会和心理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关联。伦敦经济学院的德籍校长拉尔夫 · 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对英国做了几年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经济运行与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对英国来说，有效的经济战略或许要从文化领域开始。"[2]

对英国经济衰退的种种历史解释都提出来了，从纯经济的解释到包括政治、社会和心理因素的解释，从马克思主义到凯恩斯主义的思想范畴再到自由市场观点，都一一尝试过了。这无疑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而没

有任何简单的或被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霍布斯鲍姆严肃地指出："要是对经济现象作经济解释行得通的话，我们当然愿意采用这种解释。"[3] 然而，这样的解释已经提出过，由于其本身的缺陷，仅仅使问题的性质变得更清楚一些而已。严格的经济解释不是以有争议的假设为依据，就是为"其余"因素留下很大余地，这些因素可能是社会性的和心理上的。[4]

从世界角度来看，把文化和经济截然分开看来是很困难的，而且是无益的。研究发展的经济学家一再反对局限于纯经济的分析。大多数研究发展的主要理论家都一致认为，仅仅经济动因，不管它是多么必要，是不足以重新指引社会发展的道路的。[5] 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被认为对发展过程至关重要。这种认识产生了一大批特别出自社会心理学家和发展专家之手的著作，详尽地塑造了一些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所经历过的社会心理变化模型。这些研究显示了社会经济转变中的性质、世界观、价值观和态度之类因素的重要性，尽管很难进行计量分析。[6] 这种方法并不仅限于社会心理学家或美国学者采用。瑞典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冈纳·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他的大部头著作《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中，详细地展现了发展必定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的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化。[7] 印度的例子实际上驳倒了任何狭隘地看待经济发展的人。自从独立以来，印度的经历对本国的经济计划者和来自西方的顾问来说都是一连串的挫败。财政和金融政策的方案、外国援助及工农业投资计划等，都因遇到无形的阻力而屡遭失败。这些阻力或许就在这个国家世界上最保守的文化中。[8]

<5>

另一个亚洲国家日本以它突出的成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活动并非发生在文化的真空。我们看到，日本惊人的快速发展既归因于这个国家特有的经济技术，至少同样也归因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突出特点，例如，工作关系和内部纪律的"宗族"特点使极好的适应性成为可能。如果不掌握日本文化的行事原则，谁也不能充分了解日本经济的奇迹。[9]

英国特有的文化要素是怎样影响经济生活的呢？尽管工会"有组织的妨碍活动"被大肆渲染，但这一问题主要还是在于对"资产阶级"或"上

流社会”文化，而不是英国的大众文化（尽管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分界线）的最后分析。上流集团对有效的舆论环境和处理事务的影响力超出了它们的人数比例。特别是像现代英国这样一个稳定的、有凝聚力的社会，领导阶层的价值观趋于渗透这个社会，并披上全民族价值观和普遍思想的色彩。在经济上，如人们所知，老板只喜欢雇用比较顺手的工人，工人的态度和行为受到雇主态度和行为的深刻影响，即便仅仅是一种反应。[10] 那么，英国中上等阶级的文化是怎样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呢？

第二节 进步及对进步的不满

很久以来，英国人对“进步”就已感到不自在了。就像一位社会分析家所领悟的那样，“进步”一词在英国已具有一种令人奇怪的模糊的感情力量。“它暗含我们接受甚至正式赞同某种东西，却又在私下对其持怀疑态度的倾向。”[11] 一个诞生工业革命并把它输出到全世界的国家，在衡量其所取得的成就时却变得困惑起来，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英吉利民族甚至对其丰富成果感到大为不安，以至于用实际上排除工业主义的英国特性（Englishness）概念，来否定工业革命的合法性。

在英国，这种对物质和技术发展的怀疑与对工业主义的象征性排除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就出现了，当新社会建立起来以后，它们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顽固地存在下来，实际上还有新发展和加强。在维多利亚朝晚期，它们形成一种弥漫“知识界”的根深蒂固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综合病。已经出现的对物质增长和技术创新的理想化受到阻碍，而且越来越被稳定、宁静、接近过去和“非实利主义”等相反的思想 <6> 排挤到后面。“英国生活方式”被加以界定并被广泛接受，它强调非工业、非革新和非实利的品质，极好地罩上了乡村的面貌——用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的话来说，“英格兰是乡村”（在他之前已经有这种陈词滥调了）。头脑中的这种乡村绝不是工业社会，它守旧、动作缓慢、稳定、安适和“超凡脱俗”。据称，英国人的天才（不管其外表如何）不是经济或技术方面的，而是社会和精神的。它不在于发明、生产或销售，而在

于保持、调和及道德感化。这种英国人的品质自然不是进步的，而是保守的，它的最大任务（和成就）在于驯服已经不明智地发动起来的危险的前进车头，并使之变得“规矩”起来。

过去许多年，这种看法都在现实工业中进行争论，有时这被称颂为骄傲的源泉。由此产生的社会价值观的冲突（进步与怀旧，物质增长与道德稳定）在工场与花园（或乡村）这两个广为传播和反差很大的文化象征中表现出来。英国是该成为一个世界工场呢，还是该成为一个绿色的、令人愉快的田园呢？这一问题以及被假定的工业和乡村价值观的不可比性，却一直被许多英国人抛到脑后。

乡村的神话不必非与工业主义对立起来。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人们怀念那些常被认为是比较朴素和愉快的时期，乡村生活被理想化了，常强调其道德上对国家的重要性。然而这样的情感极少像英国那样一窝蜂去批评进步本身或批评经济发展，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例外，他们那几乎是无政府个人主义的特殊倾向，反映出他们已知道自己处于文化主流之外。甚至乡村的赞颂者及那些怀念早期美国的人也极少轻视制造业和商业。美国自耕农场主的理想就是一个农技师和资本家的理想，是一个为市场而生产、随时准备投资、在技术上或商业上进行改进的实业家的理想。像杰斐逊那样的人虽然把“乡村共和国”理想化，但他也欢迎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把它们看成是文明的基本部分。工业要发展而且应该发展，美国工业同其他国家一样，散播在农村的大地上。[12] 甚至怀旧者在美国也有一种正在现代化的性质，就像亨利·福特（Henry Ford）及其在20世纪20年代恢复格林菲尔德村的旧貌所表明的那样。这一计划是对福特早年的更为纯朴的美国的多情善感的召唤，同时也是对技术进步的一次庆祝。[13] 美国人或许也把“花园”理想化了，但是它同英国的“花园”相反，<7> 它是经济上有活力的、技术上进步的花园。下面我们还要对英国花园进行研究。

在英国，机器与花园、工场与乡村这些象征处在更直接的对立中。这

些象征具体表现了至少在 19 世纪就已深深扎根中上阶级文化中的紧张状态。这一时期英国国内历史的许多独具的特点，都是一个国家或者至少是上流社会内部斗争的结果。

英国现代文化的这种内部紧张状态是一个难解之谜。为什么在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社会中，对工业进步的敌对态度能存在下来，甚至还加强了呢？为什么这种敌对态度经常采取编织乡村神话的形式呢？在 19 世纪英国社会史的特殊模式中，似可找到某些答案。

第三节　从来不是革命的革命

19 世纪的英国是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不过，它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完全是纯英国的。英国向现代化的过渡以令人赞佩的和平渐进主义而著称，因而也以某种不彻底性而著称，从这种不彻底性中进而又导源出持久的文化后果。

现代化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轻而易举的过程。不管它发生于何时何地，都会产生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压力和紧张感，尽管这种压力和紧张感并不总是像在德国那样采取激烈的形式，或者引起那么多的注意。[14] 在英国，这种紧张特别容易被忽视，因为这里向现代化的转变相对说来比较顺利，并没有引起政治上的动乱。但我认为，这种很温和的性质在英国的发展，产生了一种自我约制的因素。在其他国家，工业革命至少部分地是从外埠输入的，因而向传统的社会模式提出了挑战，并使其发生中断。另一方面，在英国，工业化是土生土长的，因此比较容易适应现存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不需要急剧变化。

从这种观点来看，经常受到称颂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成就具有两面性。如果对社会的改造尽少使用暴力，那么这种改造的深度比乍看起来要有限得多。新的经济力量并未破坏社会结构。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性质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新社会结构中存在下来。[15]19 世纪英国变革的最终结果的确是一种和平的适应，但它使现代化前的成分根深蒂固地存在下来，使反现代化的情感合法化。只是到了 20 世纪，这种文化上的和实际的后

果才明朗起来。

左右两翼的一些观察者都感觉到维多利亚时期成就的双重含义。保守党政治家基思·约瑟夫爵士①认为，英国当代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它从未有过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或一个稳定的、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这一事实。他说："结果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从未像在有些国家那样形成思想和体制。"[16] 这种解释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但采取了一种偏颇的、令人产生错觉的形式，它模糊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线。认识英国现代史特殊模式的关键在于，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这个国家有世界上第一个（也许荷兰除外）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18 世纪的土地贵族和乡绅。英国从未有过的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或工业阶级的上层。两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曾对这个重要的区别做了有益的分析。安德森和奈恩强调如下事实的重要性，即尽管在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占统治地位的工业贵族却变得更加富有，更加自信，甚至成为联结得更加紧密的寡头集团。然而贵族已不再是封建主义的，而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安德森说："一开始在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之间就不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17] 所以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适应取代了革命。可是，这两个阶级虽然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却并非都是一样的。贵族的资本主义尽管各人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靠地租和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的，而不是经营企业和从事生产。这样，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适应过程就意味着新生的中产阶级去适应一个比较冷漠、比较消极的经济角色。食利者贵族很大程度上在维持文化领导权方面取得了成功，并进而在按照自己面貌重新塑造工业资产阶级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就像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维多利亚时期贵族的撤退多为政治上的，而非心

<8>

① 基思·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1918—1994），英国律师、政治家、三任保守党内阁大臣。在撒切尔主义成型过程中，他被喻为"王权背后的力量"。1961—1962 年任贸易大臣，1962—1964 年任住房、地方政府和威尔士事务大臣，1970—1974 年任卫生和社会安全大臣，1979—1981 年任工业大臣，1981 年任科学和教育大臣。——译注

理上的。地主阶级的上流人物们仅仅缓慢地让位于工业家，以致如佩里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不久前所说：“政权的转移拖了一个多世纪，它活像一种合并而不是征服，一种婚配（在许多情况下是文明的婚配）而不是强奸。”用沃索恩的话来说，其结果是“资产阶级被教化”[18]。

事实上，在新出现于英国面前的竞争对手德国，贵族领导权也存在下来了，而且比英国还明显。[19] 因为两国的政治史反差极其巨大，所以长久以来，英国被错误地看成采取与德国相反的发展道路的国家，英国走的是资产阶级彻底胜利的道路，而德国则抓住“封建主义”不放。拿破仑曾嘲笑英国是原型的“店铺老板的国家”，但第一次这样说就是错误的，当德 <9> 国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重复这种说法时，也是错误的，即或错误性质没有那么明显。事实上，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都在强大的、有弹性的贵族社会中经历过强有力的工业革命。

工业和贵族这样搅在一起，在这两个国家导致了不同的经济（且不说政治）结果。这可以由很多因素加以解释，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变化的年代，贵族开放的程度，也许最主要的是各国贵族的性质。因为德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发生得晚，而且比较突然，德国工业资产阶级被接受和吸收进旧的上流社会的时间少。其次，特别是普鲁士的贵族不像英国贵族那样乐于把富有的实业家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去，不管这些实业家是多么急于按照容克地主的模子改造自己。[20] 由于这两个原因，帝国主义德国的新工业家和企业家与比他们较早地站稳脚跟的英国伙伴比较起来，更有可能专注于生产。

然而除此之外，两国贵族在以很突出的方式影响各自的中产阶级方面也大不相同。普鲁士贵族仍然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独裁主义的军事等级；英国的贵族和绅士因日益繁荣，早已失去了那种特性。此外，容克地主没有英国贵族那么富有，他们为了自己整个等级的骄傲，不得不继续无情地为保护和发展其经济和政治地位而斗争。如弗里茨·斯特恩所说，尽管容克有浪漫主义的虚饰，还是越来越变为“农业资本家”[21]。或者正是军国

主义和经济压力的这种结合，使俾斯麦政府重视经济发展的地缘政治价值，而以1878—1879年的历史安排为基础，在这种安排中，工业以政治支援换取关税保护的经济支持（而最终是世界政治）。[22]特别是1879年以后，德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朝着贵族模式的转变，不像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朝着“自由经营”或政治自由主义的转变那样心甘情愿，但更适于坚持向工业增长（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的猛烈冲击。[23]因此在德国，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比工业主义的价值低一些，而在英国则是工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发展受到抑制。这样，现代化与根深蒂固的贵族的结合，在德国造成了政治发展的障碍，而在英国则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 ✦ ✦

英国的适应形式是得失兼而有之。所谓得，是指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以及早期工业主义野蛮状态的“人情化”；所谓失，用奈恩的话来说就是“把资本主义牵制在贵族领导权之下”[24]，这种领导权在那时及那以后都没有热情支持工业主义的积极发展或社会朝着后来的价值观和利益的普遍转变。这样英国工业革命就遭到持续的社会和心理限制。就像科雷利·巴尼特在他的现代英国军事统帅史中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工业社会的社会和知识阶层的价值观从未压倒贵族的价值观”[25]。在这一顺利的贵族－绅士有控制力的行动之外，发展了一种英国特有的“包容文化”。社会冲突从未明确解决，而是在已出现的妥协中被淡化，一个新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带有旧贵族的烙印。这一妥协文化中的紧张状态，既反映在围绕物质进步思想的不安和不满情绪之中，也反映在英国以花园作文化象征所充满的感情之中。此外，这种紧张状态不仅形成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而且还通过文化形成了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曾用于使城市工业社会人性化的种种现代英国社会实践——新城镇和绿色地带的建设、对园艺的爱好、甚至是对最现代化的建筑艺术的谨慎态度——都得助于这种

<10>

社会妥协。吸引力较小的行为模式也显示出它们的烙印，其中主要的是经济的停滞不前。

“绅士化”的资产阶级文化的确立，特别是中上阶级知识界仿贵族立场和价值观的生根，形成了经济努力的不利环境。经济史学家、经济学家、文职官员，甚至就连政治领袖所持的感情和理想都抑制了经济发展，而不是促进了经济发展。甚至那些寻求发展的人同时也经常表现出受其文化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起了“压抑”或“驯服”这种增长的作用，严重地影响了工业家本身发展自己的世界观及认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他们过多地受到被他们视为贵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吸引，从而时常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效率。“头脑僵化”的人约束了他们的观念和行动，其结果是由这样的人领导的一种工业社会的奇观（不一定都是坏的）。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第二章 <11>

维多利亚朝的社会：适应与吸收

英国……并不把它的重大影响归因于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归因于它在工业和商业领域的主导地位。设若它忘记此点，就将遭到灭顶之灾。

——《每年纪事》(*Annual Register*, 1867)

有利于发财致富的六十四年缔造了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加强和锤炼了这个阶级，使它闪现出光辉，最终使它在行为道德、言谈举止和习惯品性方面几乎与贵族无异。

——约翰·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 1922)

斯诺（C. P. Snow）的一部小说中的一位老绅士说："英国传统十之八九都起源于 19 世纪下半叶。"[1] 这一时期重新铸造了英国的生活方式。现代英国政治、商业和社会体制大部分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改革和调整的产物。同样，20 世纪的社会价值观也带有维多利亚时代论争的烙印。例如，像穆勒、阿诺德、罗斯金和狄更斯等人对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许多批评被当时的社会潮流加强了，并有助于形成一代有文化教养者的观点。一种独特的英国世界观在维多利亚中期社会思潮翻腾的熔炉中形成。现在业已证明，它是完全适合于当时正在形成的上流阶层的。这个阶层是由实业界人士、迅速扩大的自由职业和官僚阶层及早先的乡绅和贵族聚集而成。起凝聚作用的中心机构，公学，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应有的成功。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旧学校得以复兴，新学校建立起来，而且一种共同的社会思潮开始形成。这是一种乐于汲取维多利亚中期社会思想的一个方面的思潮，它使其制度化并加以推广。在维多利亚女王逝世以前，她的国家已有一个成分极为相似而且又有内聚力的上流集团，这个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有共同的教育、共同的观念及价值体系。这种共有的观念体现了传统地主统 <12> 治阶级顺应潮流的变化（诚如当时广泛注意到的那样），但也标志着对工业化开始的社会革命的断然拒绝。

第一节　一个重新形成的上流集团

维多利亚朝早年，当时人们广泛认为中产阶级正在取得胜利。人们常说1832年的议会改革和1846年废除谷物法削弱着土地贵族政治经济统治的支柱。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1850年说，"唯一残留下来的贵族属资产阶级"[2]。作为统治阶级的英国贵族的丧钟真的敲响了吗？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在贵族得以延长其统治和以自己的世界观教育其继承者以前，丧钟尚未敲响。[3]权力是和平地让渡的，其回报是上流集团的新成员们在时间上给以宽限，并接受贵族的许多价值观念。双方的敌对情绪开始淡化。1846年以后，地主们的利益不再那么明显地与工业或资本的利益相对立。大地主们的收益越来越多地来自铁路、运河、矿山和在城市的财产。日益扩大的实业机构正在产生一个大实业家的新阶级，它们比那些尚较少地直接介入管理和经营企业的祖先们更富有。对这些集团的人来说，旧的阶级对抗越来越淡漠，而相互适应的过程很快就开始了。《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1850年还在批评那些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表示愿意购置土地以获取地位的资本家。而到1870年，它已改变调门评论说：

> 受到社会尊敬是一个重大而合理的向往目标，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对受到社会尊敬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可以使英格兰的一位百万富翁拿出其财富的一半去购买一万英亩土地，宁愿得到稀微的收益，然后靠其余财富生活，而不愿依靠无土地的全部财

富去生活。这样，在其他人眼里，他会成为一个更重要的人物。[4]

英国历史上乐于将新财富并入原有财富的模式，在18世纪晚期被地域上和宗教上孤立的工业财富的爆炸性增长破坏了，这时又完全恢复起来。在像“会社”、军队（特别是义勇军）、英国国教会、公学和大学这样的当权派活动的领域里，19世纪下半叶适应和吸收的过程加快了。如哈罗德·珀金（Harold Perkin）所指出：“在维多利亚朝晚期的英格兰，许多贵族经理的种子（1896年有一百六十七位贵族是公司董事，占贵族总数的四分之一）无疑已在维多利亚中期公学的活动场上播下了。”[5]

<13>

实业家的孩子允许成为上层阶级一分子的代价是放弃在相对孤立的一个世纪里形成的特出的、面向生产的文化。哈巴卡克（H. J. Habbakuk）评论说：“地主的要旨是（至少在英格兰是）：获取土地不是为了开发，而是为了享用。”[6]新地主和有抱负的地主们接受享乐文化意味着淡化他们父辈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曾将他们父辈作为一个阶级推向经济上的高峰，使其国家取得世界的统治权。这些地主放弃了父辈们的价值观，转而接受新的绅士理想。[7]这种新理想本质上是被19世纪的宗教复兴清除了较粗鄙成分的旧贵族的理想。实际上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他本人就是世袭贵族）后来就认定，“绅士观念是贵族发明出来让中产阶级循规蹈矩的”[8]。

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也是这样。通过这种社会吸收机制，资本家阶级中对工作、发明、物质生产和赚钱的热情让位给了对幽雅生活方式、追求享乐和在政界供职等更具贵族性质的兴趣。同样，只要财富尚存，他们就放弃现代工业城镇，宁可到乡村宅第，特别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乡村宅第居住。例如，大获成功的厂主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儿子们懈怠生意，而成为湖区（Lake District）①[9]的乡村绅士。F. M. L. 汤普森

① 位于英格兰北部坎布里亚郡的湖泊地区，为英国著名风景区。——译注

评论说，刚刚涉世的乡绅“可能在热切遵守乡村生活规矩方面比贵族更贵族化”[10]。伦敦的商业银行家冯·施罗德男爵（Baron von Schroeder）就是许许多多的例证之一，他大约于1868年在柴郡购置了一所乡村房屋，1876年成为一名法官，并且是高级郡守和1889年1月第一次郡议会选举时的选举监察人。他是有名的带柴郡猎犬狩猎的人。在柴郡，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越来越难以区别像“菲茨”·布罗克赫斯特（“Fitzg” Brocklehurst）这样的银行家同贵族之间的习惯。布罗克赫斯特是一个自由党人和功利主义者，他坚持每年在苏格兰住三个月打猎。几代人的时间将完成这一转变。李（J. M. Lee）在考察柴郡上流社会时，对1804年出生的詹姆斯·瓦茨（James Watts）和他的孙子、1878年出生的小詹姆斯·瓦茨的经历做了有益的比较：前者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商人，只受过极少的教育。他是公理会教徒和自由党政治的积极参加者，19世纪50年代成为曼彻斯特市长。他从大零售商店的奢侈品贸易所获取的巨额利润中拿出钱来，建了一所引人注目的乡间房屋阿布尼大厦。他的孙子被送入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新学院学习，在亨利代表他的学院参加划船比赛，模仿他那一代人的全部时尚，“甚至娶了一个美国老婆！”[11] <14>

英国贵族特有的灵活性把一个阶级从溃败的边缘很快地拯救出来，获得胜利，并帮助改变了国家发展的进程。企业主阶级在胜利时刻把精力用于按被其取而代之的面貌改造自己。资产阶级革命的自觉代言人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惊恐地注视到，他的队伍正在背离其事业：

> [他1863年向一位朋友抱怨]我们有与瓦特、阿克赖特和斯蒂芬逊时代背道而驰地蔓延和盛行的封建主义精神！而且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日益占上风。其势力和声望是如此之大，甚至把那些更新更好之文明的天然领袖吸引去支持和尊崇它。看来厂家和商人们照例只想获取财富，以便能够拜倒在封建

主义脚下。怎样才能结束这种情况啊？[12]

随着资本家变成拥有土地的绅士、治安法官和有教养人士，积极资本的激进理想沉沦于消极财产的保守理想，在崇尚稳定的影响之下，进取精神的驱动力消退了。

✦ ✦ ✦

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乡绅化也经历了该时期的另一种社会趋向：现代职业的兴起。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公务员、新闻记者、教授和文学家——在维多利亚朝时期兴旺起来。他们人数激增，并且相当特殊，可以视为一个阶级，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一个准阶级，它对英国舆论和文化的影响与其人数比较起来要大得多。到 19 世纪下半叶前，英国已有一个自由主义上层中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并存。

整个 19 世纪，像法学、医学等旧有职业重新组织起来，已强调其专业知识，它们人数增加，并取得较高地位。甚至神职人员也模仿类似方式。与此同时新职业大量增加。1800 年皇家外科学院成立，1856 年不列颠医学会成立，1825 年法学会成立，这些事件把世俗的传统职业建立在可靠声誉的新基础之上。[13] 新职业极大地受到旧职业模式的影响，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脱离商界，并自己组织起来——1818 年土木工程师组织成立，1834 年建筑师组织成立，1841 年药剂师组织成立，1848 年保险统计员组织成立，等等。所有这些组织都表现出利用这些职业对专业知识和正直的要求，已超脱于市场法则之上。1841—1881 年间，全国人口增长 60%，而十七种从事主要自由职业的人口增长了 150%，从而构成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14]

<15>

自由主义的发展助长了正在形成的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遏制。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阶级是以相对超脱于收入竞争为其特点的。职业声誉的

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远离臭名昭著地“捞取金钱”的情况决定的。埃斯科特（T. H. S. Escott）站在同时代人的角度上，写了一本概述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最有用的信息，他在书中解释说，全科开业医生和初级律师的职业地位之所以比有权出席高等法庭的律师和牧师低，部分原因就是前者不得不经过直接从顾客处收费这种“庸俗”的生意过程。[15] 自由主义的超然脱俗当然有些是一种神话。个人间经常竞相争取顾客，维持高职业水准也是为了限制他人插足，从而维持高收入。然而如哈罗德·珀金所说：“自由职业者一经站稳脚跟，一般即可依靠一种稳定的收入，而不致遭受像地租、利润和工资那样的相互竞争。于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就高居于经济战之上。”[16] 此外，自由职业者很看重服务和无形的商品，他们提供的这种商品要比物质商品的价值高，物质商品的生产是许多非自由职业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关注的对象。这种对服务的偏爱连同他们的地位对市场活动的超脱，使自由职业者与工业资本家的精神和感情世界分道扬镳。

当然，自由职业者也使其他价值观更适应于一种工业世界的观念：自由职业向天才、勤奋、专业化和效率敞开大门。但这些价值观在英国并非如像在美国那样受到鼓励。[17] 职业化并没有一种单一的、一般的含义：它的实际形式源于其多种趋势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英国环境扩大了职业化的旧绅士的面目，而损害了它的新生资产阶级的面目。[18] 一种职业典型地为自己圈定一个范围，这种方式本身就使其成员离开资本主义世界。一位历史学家做了这样的评论： <16>

> 组织社团、在伦敦中心区获得费用高的宫殿式总办公处、建立学徒制、限制外人涉足、制定收费表等过程，都显然意在使其职业“绅士化”，并使其能被社会接受。职业化的这一方面是深刻地反资本主义的，并从此与19世纪英国社会的其余大部分处于不协调状态。[19]

在英国，一个强大贵族阶层的存在，加强了职业化中反资本主义的趋向。所以，自由职业的发展把许多最能干的人同工商界分离开来的情况，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突出。一位有洞察力的同时代人指出了这一点，诗人和学校视察员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1868年观察到，自由职业者在被允许同贵族一起就读后，倾向于按贵族形象塑造自己。阿诺德说，因此“没有哪个国家……的自由职业者像在英格兰那样自然而普遍地接受贵族的思想倾向”。在英格兰，自由职业，其中包括正在形成的文官，是“独立于工商业阶级之外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欧洲大陆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因为它们的社会地位与工商业阶级本来处于同等水平”。其结果是很显然的：

> 中产阶级被一分为二，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均概无此种先例；自由职业阶层的人士被推向首要地位，他们具有良好的统治素质但却对科学没有什么感觉；而那个庞大的实业阶级则被推到次要地位，不仅与贵族和自由职业相隔离，而且缺乏统治素质。这个实业阶级在其他所有国家都正在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实力，国家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仰赖于它。[20]

第二节 绅士的塑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诺德的父亲所极力铸造的教育制度，在将这种分离及其与此相关的态度和价值观固定于英国社会之中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公学[①]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这种英国“特有的教育机构”至维多利亚朝末年已变成英国上流集团绝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发展经历。公学虽然有被过分吹嘘的独立性，但它通过像校长会议这样的机构趋同为一种共同模式。尽管没有国家的指导，它们也形成一种制度[21]，这种制度把上层阶级的下一代人同英国世界地位的基础——技术和商业——隔绝开来。

19 世纪 60 年代这十年，似乎注定要成为反对中等教育进行全面改革的时代。使不受监督的各种学校现代化的必要性已广为人知，这导致两个皇家委员会的建立。1861 年成立的克拉伦敦（公学）委员会，旨对九所最有声望的用捐款兴建的学校进行考察；而三年以后成立的汤顿（学校调查）委员会，则旨在视察所有其他由捐款兴建的学校。它们的报告确实导致议会立法，但根本改革的推动力偏离了方向。长期注意的主要作用在于将这九所古老公学建成对所有渴望在英国社会升迁的人进行中等教育的典范，这些学校或多或少的确是这样的典范。在详细考察了公学的缺陷以后，克

<17>

---

① 公学（public schools）起源于中世纪和都铎时代私人捐资兴建的文法学校，大部分为寄读学校。19 世纪为满足中产阶级子女受教育的需要，新建了一大批这类学校。英国最有名的公学为温彻斯特（1832 年建立）、伊顿（1840 年）、威斯敏斯特（1860 年）、哈罗（1871 年）等七所。联合王国现有公学约二百二十所。——译注

拉伦敦委员会转而列举了它们的主要长处。

> 这些学校曾是培育我国政治家的主要园地；在这里以及仿效它们成立起来的学校里，构成英国社会、命中注定要从事一切职业和事业的所有各个阶级的人都在社会平等的基础上被培养出来，并结成最持久的友谊及养成他们一生中某些主要习惯；而且它们也许在塑造英国绅士性格方面起了最主要的作用。[22]

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新学校出现了，设置了一些新课程，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学校教学程序有所创新——但这仅仅是维持和扩大公学模式的社会支配地位所必需的起码变化。这一目标达到了：19 世纪晚期，中产阶级的儿子们越来越多地涌进仿效“克拉伦敦九校”建立起来的学校。人们通常所希望的都表现在父母们对恢复了活力的施鲁斯伯里公学虚幻的热情中：“就在同样的地方：新建筑，旧传统，还有什么可能比这更好呢？”[23]

公学脱离现代世界最明显的例证是，它们的课程表中实际上缺乏任何自然科学课程。在讲授自然科学方面，公学大大落后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学校。自然科学课首先在 18 世纪的私立和非国教学府讲授，而到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自然科学在大多数这类学校及许多文法学校里已成为课程表的正常部分。[24] 但在这以后的一些年里，自然科学还没有渗透进上层阶级的学校，在那以后只有克服顽强的阻挠，才有可能进行自然科学教育。

在拉格比公学，公学中自然科学教育的先驱、第一批自然科学教员简直吃尽了苦头。1859 年以后，天文学家威尔逊（J. M. Wilson）被允许每周讲十四节“自然科学”，一直讲到与他提出的每周讲十四节算术、几何和三角发生冲突时为止。在拉格比公学的校园内找不到地方进行这一自然科学教育，“实验是背着进行的，在离校一百码以外的市镇厅钟楼进行，实验仪器锁在两个箱子里，以便市民们晚上可把该地改作他用。”[25] 这就是公学委员会在最具科学头脑的重点学校所发现的情况！甚至在委员会力主发展自然科学教育以后，变化仍然很慢。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18>

Wallas，1858—1932）在 1871 年至 1877 年之间就教于施鲁斯伯里公学，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没有任何实验室，在我那个时代从未听说过哪个施鲁斯伯里的学生听过自然科学课。"[26]

这种对自然科学的忽视，基于这样一种教育思想：其正面在于弘扬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语言，作为一切文科教育的基础；其反面是担心自然科学反对宗教，这种担心随着 19 世纪的推移而逐渐减弱，也担心自然科学同普通工业、工匠和商业效用的结合，这种担心却没有轻易减弱。校长们大体上把古典文学（当然同基督教教义一起）与文化和理想的智力训练等同看待，它们在捍卫纯古典课程的能言善辩，并得到最有教养的知名人士的支持。像格拉斯顿（Glaston）这样的大人物也附和着说："我觉得，纯科学、自然科学、现代语言、现代历史等同旧的古典文学训练的关系应建立在一种原则之上……我否认它们有权处于一种平行或平等的地位；它们的真正地位是辅助性的，而作为辅助课，就应毫不犹豫地加以限制和约束。"[27]

在公众的心目中，对将来最有意义的科学是与工业相联系的，而这在上层阶级的眼里却有失体面。工业意味着几乎等于要用自己的双手干活这种令人不舒服的事，且不说还要全力直接挣钱。自然科学教育问题陷入了一种等级制度：尽管有胡克①、波义耳②和他们在皇家学会伟大时代的同代人的传统，但直到 20 世纪，实验科学在英国才被当做是一种适合于绅士的职业而被完全接受下来。古典文学是社会等级的标志这一事实，阻止了父母们所要求进行"现代"教育的压力。1868 年汤顿委员会得出结论说：

> 他们 [绝大多数自由职业者和贫困的乡绅] 无疑在多数情况下都愿意获得比古典文学和数学更多的东西。但为了自己的缘

---

① 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英国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胡克定律的提出者。——译注

② 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发现气体定律。——译注

故，他们非常看重这些课程，甚或更看重现实分配给他们在英国社会中的价值。除了使他们的儿子保持较高社会地位的教育以外，他们并不注重别的事情。而且他们不希望得到有可能更容易变成金钱的东西，如果这种东西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孩子社会地位降低的话。[28]

<19> 虽然在考察国家对自然科学教育的需要时，争论较为激烈，但当事情涉及自己儿子这一关键问题时，现代派就很少把原则付诸实施了。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1806—1859）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工程师，他把两个儿子送入哈罗公学读书，他们在那里是极不可能步其父亲的后尘的；赫胥黎（T. H. Huxley，1825—1895）把一个儿子送入大学学院学校；莱昂·普莱费尔（Lyon Playfair，1818—1898）是过时的公学教学课程的另一主要批评家，他把一个儿子送进切尔滕的公学读书，等等。[29] 当自然科学教育终于进入公学的时候，已经来得太迟，且染上一种社会瑕疵，并以偏向于反对与工程学相关联的那些方面为特征。

同样，公学也抵制关于对孩子们进行特别训练、让他们准备投身于正在扩大的自由职业的呼吁。对法学、医学或任何新职业的职业准备都带有功利的污点。阿品厄姆的爱德华·思林（Edward Thring，1821—1887）是一位特别成功的校长，他发现“绝不可能把一所重点学校的学习过分地导向这一目的［职业教育］，而又不破坏一所重点学校的目标，即以最好的方式进行除直接获利以外的努力和体育训练。”[30] 思林是在陈述绅士们极难反对的一种陈词滥调。迪安·法拉尔（Dean Farrar，1831—1903）是一个例外，他评论说，科学教育将是有益的。

［法拉尔写道］当我说出“有益”一词时，我能立马想象出将会环绕着我的可怕喧闹，在喧嚣声中我无力区分粗鄙、功利主义和机械的词语……好，我在这一习惯和传统的喧嚣风暴面前低头，而当喧嚣结束以后，我又谦和地重复说，它会更有益——更

富于实际好处，更直接地有利于健康，有利于幸福，有利于在生活大搏斗中取得成功。我个人厌倦了这种“对无用之物的崇拜”。有人可能会真的认为以人类的物质幸福为目的是一种罪过。[31]

思林的观点仍是教育学的福音。偏见是非常反对文科教育（越来越成为绅士的象征）和效益相容共处的。尽管公学仅造就出极少的科学家以及甚至比科学家还要少的工程师，然而它们却为自由职业人士日益扩大的队伍输送了越来越多的新人。当地主社会走向衰落、公学扩大而且人数增加时，它们成了培养自由职业者的摇篮。它们轻视专业和实践学习，加强了职业理想的传统内容（模仿有闲的地主绅士），而损害了自由职业者作为专家的现代作用。

如果说专门职业所需的技巧在公学受到了妨碍，那么商业界则受到公开的蔑视。维多利亚时代前的公学，仅仅是地主绅士的公子们混同农场主儿子及一些城镇孩子的精修学校。贵族价值观未受到挑战，而商业则受到轻视。阿诺德改革保留、甚至加深了对商业的低下评价。在《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Tom Brown's Schooldays*）一书中，托马斯·修斯（Thomas Hughes）对阿诺德博士表示感谢，轻蔑地谈到英格兰以前“贱买贵卖的二十年”。当一个理想化的乡绅之子汤姆·布朗强烈希望离开拉格比公学“到世上工作，而不是在牛津虚掷三年光阴”之时，他被一位老师直接放走了。对阿诺德或修斯来说，没有什么比“虚掷光阴”更邪恶的了，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有的是工作、工作：

<20>

他说要“工作挣钱糊口”并同时“在世上也做一些真正的好事”。现在你可以在一种专门职业中挣到很好的生计，但绝没有同时在世上做好事，而是完全相反。如果你把做好事作为你今后唯一的目标，不管你是否以此为生，你都将是正确的；但如果你老想另一方面，你就很可能陷进单纯挣钱的泥坑。[32]

尽管托马斯·修斯主张“除衣服、职位、财富和一切外表以外”[33]的

个人性格的自主权，但在汤姆·布朗的拉格比公学却见不到商人子弟的踪影，而且同样没有什么人去考虑以经商为生。霍拉斯·维切尔（Horace Vachell）后来非常流行的关于哈罗公学的小说《山丘》（*The Hill*, 1905）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商人的孩子来到学校，但处于重重疑云之下。虽然他凭本事当上了该校板球队队长，但他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粗俗人，而且最终因不诚实而被赶走。另外一个小伙子作了典型的评论："有时一个人被提醒，他是利物浦商人的儿子，生在船坞或其附近。"[34] 被打上这种耻辱烙印以后，反对设置现代课程最成功的办法之一就是把它们同商界联系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汤顿委员会被伦敦学校视察员告知，"有几个商人向我保证说，没有什么事情比成功地抨击古典文学课程更使他们高兴的了"，这是交到反对改变课程者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35]

公学逐渐放松了入学障碍。然而工商业者家庭出身的孩子只有否定其家庭出身和自己的阶级才准入学。无论有多少实业家的儿子入学，却很少有未来的实业家出身于这些学校，而那些出身于这些学校的实业家，都变得"文雅"起来，即不再一门心思追求生产和利润。[36] 公学热心的创始 <21> 人纳撒尼尔·伍达德（Nathaniel Woodard，1811—1891）1871 年给曼彻斯特主教写信说："我们将设法把握住中产阶级……我们怎能通过公学把此事做好呢？"[37] 虽然伍达德建立庞大的住读学校网以接受整个中产阶级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未取得多大进展，但公学比较有限的和间接的成就，却使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有了富于希望的新生。它们的自然环境本身就使城市工业界保持一定距离，并唤醒了旧地主乡绅的活力。不管是新建的或古老的学校，都不同程度地远离城市的工业区。很大一部分最有名望的公学都在英格兰南方。[38] 只要有可能，新学校都建在很远的乡村。坐落在城市的一些比较老牌的学校都迁出城外，如查特豪斯公学迁到了萨里山。每所公学都获得了或寻求获得一块地产，以确保其乡村性质不受干扰。[39] 它们在这种努力中，土地贵族的经济困难帮了它们的忙，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乡村大宅都被新老公学买走了。[40]

在保持其环境的同时，学校的气氛加强了带有荣誉和公众领袖（军事、政治、行政机构和高级专门职业）的贵族理想为特征的事业。公学的男孩子们被造就成广大帝国的优秀行政官员，但如此令人赞叹地使公学适合于此种任务的训练，却使他们不适应于经济上的领导。[41] 公学培育出未来上流集团的政治才能，而不是经济才能，保持稳定和秩序的愿望，远远超过最大限度地增加工业和国家财富的愿望。

19 世纪下半叶期间，公学在英国上层阶级的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此外，虽然上述公学的人在英国男人中还不到二十分之一，但它们已成为一种原型的全国性学校。一位典型的辩护士在 1929 年指出：“我们在批评其产品时，不管是赞扬还是责备，它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我们所批评的英国特色。”[42] 罗伊·刘易斯（Roy Lewis）和安格斯·莫德（Angus Maude）迟至 1949 年还不无同情地评论说：公学在中产阶级中间仍享有“无形帝国”的地位，中产阶级贪婪地阅读新型的公学文献。[43] 能供得起钱的人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公学，付不起钱的人则寻求与公学范式最接近的文法学校。1902 年以后，后者的寻求变得容易起来，因为献身于公学理想的公学学人，发展出一种国家中等教育制度。教育部中学司于 1899 年成立后不久，便被置于校长会议的控制之下。[44] 公学水准成了该司及其官员的水准。多年以后，一位批评家在议会抱怨说，（为一位家有两位公学校长的首相）起草和执行 1902 年教育法的主要官员罗伯特·莫兰特爵士（Sir Robert Morant，1863—1920）“相信最好的教育形式就是他在温彻斯特公学受到的教育”，因此他寻求把这种教育当成甚至在国家制度的最大范围内均切实可行的教育加以模仿。[45] 在几乎所有有关的文官支持下，这一努力取得了成功，而新的中等学校根据培育乡绅的理想发展出它的课程、观念和组织形式。通过某种方式影响着每个英国居民的这一国家教育模式是一种遗产，它与公学对国家的大多数上流人物的继续直接教育有着同等的重要性。[46] 维多利亚晚期公学的观念，通过某种渠道，继续形成 20 世纪英国的看法和价值观。

<22>

✦ ✦ ✦

维多利亚晚期的老牌大学，多半呈现出与公学相同的图景。它们也经历了 19 世纪中期开始的一次“保守革命”，尽管其社会意义要小一些（多数公学的男生未继续上大学）。这一革命使它们恢复了活力，增加了它们对国家生活的贡献，同时保留了传统乡绅文化的基本内容。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中，简直看不见“现代”课程的踪迹。在两个皇家委员会力主改革十六年以后，赫胥黎（T. H. Huxley）给一个议会委员会讲述了一次在牛津午餐会上的下述经历：“我问道，一个可能在大学获得了最高荣誉的人，或许从未听说过地球在围绕太阳运转，难道这是合理的吗？出席的所有绅士 [‘很杰出的大学同仁’] 一致说，‘是的’。”[47] 就像公学一样，很少有大学生出身于商人家庭。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甚至比公学更是乡绅、牧师及更杰出职业的子弟们的保留地。[48] 在该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课程和入学条件都放宽了，但像在公学一样，在恢复了活力的自由教育理想及保持导师作用的范围以内，使许多过去的观念也保存下来。“新式”导师使人想起新公学的老师，即极力培养学生性格的“道德先生”。通过文科教育对一个实利主义社会进行道德和精神指导的新理想，是同杰出教长们的理想相一致的。维多利亚晚期牛津、剑桥 <23> 的社会风气，是贵族和自由职业价值观的融合物，它自觉地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商业和工业精神：它赞扬教养和服务的双重理想，反对庸俗的利润追求。[49] 商人是受蔑视和受道义谴责的对象，而工业则主要以乡村美景的破坏者著称。在牛津，只要在汤姆·布朗及其朋友哈迪之间出现商业课题，它就会受到公开指摘：哈迪轻视迦太基，因为后者是一个商业国家，并担心英格兰在走同一道路。[50] 直到进入 20 世纪，大学生们经常受到劝阻，要他们不要去经商，并发出警告说，这些高尚的地方正受着来自外埠的庸俗影响。1904 年和 1905 年在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取消希腊语必修课的建议遭到挫败，表明了压制对庸俗商业因素的向往之持续决心。对工商

业所代表的价值观的轻视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以致如谢尔顿·罗斯布莱特(Sheldon Rothblatt)的结论所说："许多导师和非住读文学硕士生都根据学科对工商业的效用来决定其价值。在他们看来，几乎没有一门能给商业带来利益的学科值得大学承认。"[51]

如同公学一样，维多利亚晚期的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为英国上流集团的许多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成长经历，同时代表了一种民族的生活方式。它们像公学一样，成了其他教育机构的范式。市民大学是这一原则的一种例外，因为它们企图提供一种更现代化、更实际的教育。它们取得了成就，但从未摆脱与其任务相同的低下地位，即便它们也经常仿效牛津剑桥的实践也罢。实际上，1960 年以后首次向牛津剑桥的社会统治发起严重挑战的"玻璃幕墙"大学①，在许多方面都要更接近于古代的、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根基。虽然它们具有主要表现为特别重视社会科学的自觉的现代性，但整个来讲，也像牛津剑桥一样缺乏对技术和商业的兴趣。意味深长的是，"玻璃幕墙"大学位于人口中心之外的大教堂城乡地产的环境之中，此点早已成为上流学校的特点。在这些例证中，外形服从了社会和心理的职能（与前工业、前城市化模式密切相联系的"文明"思想的体现），形成了一种理想化的中世纪教会和一个类似理想化的 18 世纪贵族的混合体。

牛津剑桥把维多利亚时代对新工业世界的抵制制度化了。就像罗斯布莱特所指摘的那样，"剑桥[和牛津]对国内经济的轻视总是太彻底了"[52]。牛津剑桥培养对工业世界只有极少兴趣或知识的政治领导人。多年以来，录用为高级文官的新人主要都是这两所大学的毕业生。奥利弗·麦克多纳(Oliver Macdonagh)得出结论说，这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缺乏自然科学、机械、技术或商业的训练或经验"[53]。牛津剑桥让旧的上流集团的公 <24>

---

① 指英国 1969 年以后建立的新式大学。新大学的校舍都有安装平板玻璃的大窗户，采光很好，与牛津、剑桥等老牌大学的红墙校舍形成鲜明对照。——译注

子们与工业脱离接触，它们也逐渐使工商业家庭的儿子们脱离其父辈所从事的职业，造成商业天才“失血”[54]。

走进商界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带来了反商业的价值观。由于商人力求像有教养的绅士那样行事，而且由于有教养的绅士（或未来的绅士）进入商界，经济行为发生了变化。献身工作、追求利润及为追求利润而准备探索新路的精神衰退了。[55]

这样，复兴了的公学和老牌大学，就赋予重组和具有凝聚力的英国上流集团一种生活方式和观念，对工业追求给予很少的注意或地位。这一发展使英国落后于新出现的竞争对手，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德国，教育制度都不鼓励类似这样的脱离工商业。[56]就像其上流集团的组成和性质一样，维多利亚晚期的英格兰，在教育方面也标明了自己的道路，预示了它在20世纪的成就和困难。



第二篇 <25>

一种世界观

第三章 <27>

价值观的一种逆反

整个岛屿……就像利物浦码头矗立的桅杆一样，到处烟囱林立；岛上将没有草地，没有树木，没有花园，只有在房顶上长着的小小麦苗在蒸气熏烤下成熟和脱落；你甚至没有地方修路，不得不越过你工厂的房顶沿着高架公路旅行，或者在工厂底下的隧道中旅行；烟雾遮天蔽日，你得总是在自己的汽灯光下工作；英国将没有一块土地没有竖井和引擎……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关于20世纪的噩梦，

《两条道路》（*The Two Path*，1859）

第一节 工业价值观的全盛时期

"有教养阶层"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的演变，遵循了与其社会史平行的发展过程。1851 年的大博览会，形成了这一过程的分水岭。在艾伯特亲王①的支持下，工程技术和装饰艺术的最新产品，从许多国家汇集到这里。博览会是英国进取心和技术的胜利。大部分奖章都授予了英国展品，而且建筑物本身很容易成为博览会给人最深刻印象的特征。展览大厅是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1801—1865）设计的，他并非专业建筑设计师。展览厅是第一座这样大规模地使用铁和玻璃的建筑物，也是第一座主要用预制件建成的如此规模的建筑物。展览厅在十七周内建成，全部是私人投资，占地面积相当于罗马圣彼得广场的四倍，在由三千三百根铁柱和两千三百根横梁组成的漂亮结构上，安装了八十万平方英尺的玻璃。这一成就开辟了建筑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水晶宫［《笨拙》（*Punch*）周刊首次贴切地这样称呼该建筑物］及其内部展品，不仅是英国实力、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进步"［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语[1]］的一块丰碑。《经济学家》杂志在评价这些令 <28> 人印象深刻的准备工作时，感动地说，它"完全相信速度日益加快的'无穷进步'，就像诗人所歌颂的那样，是人类注定的命运。"[2] 根据亨利·马修（Henry Mayhew）的说法，机械展览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它使以往

---

① 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译注

因其建筑物而感到敬畏的观众，看清了时代的新事物及实力："周围的展品一件比一件新奇，人们向前拥挤，脖子伸得老长，仔细观看开动着的机器运转。"[3] 十年以后，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工程师列传》（*Lives of the Engineers*）赞赏地把技术人员形容为人类福利的"一次巨大飞跃"的设计师和现代英国的缔造人。他问道，英国"如果没有它的工具、机器、蒸汽机、汽船和火车头"，会是什么样子呢？"创造国家的动力并极大地提高其生产力、首先是缔造了现今国家的不就是人吗？"[4]

同工程师一起走在进步前列的是商人。就像自由贸易的倡导人理查德·科布登所说：

> 商业是了不起的万灵药方，它像医学发现一样，向世界各民族灌输健康的、救助性的鉴赏文明的能力。没有一捆货物离开我国口岸时不给较不开化的社会成员带去智力和富有成果的思想种子；没有一个商人在访问我国的制造工业基地后回国不成为自由、和平和良政的传播人。与此同时，现在造访欧洲每个港口的我国汽船和已成为各国话题的我国神奇的铁路，都是我国开明制度之价值的广告或明证。[5]

大博览会向世界具体表现了似乎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国家理想的新理想。工业正开始呈现一种英雄气氛。甚至一位乡绅沃尔特·特里维廉爵士（Sir Walter Trevelyan，1797—1879）也在1856年委托一位纽卡斯尔的前拉斐尔派① 画家在为他的诺森伯兰乡村宅第画的系列历史壁画的最后一幅中，颂扬工业发达的太恩河畔。

---

① 前拉斐尔派系由D. G. 罗塞蒂、H. 亨特和J. E. 米莱等艺术家于1848年在英国组成的一个协会，其目的在于鼓励绘画忠于自然，效法拉斐尔（1483—1520）时代以前的意大利艺术家。——译注

然而大博览会的一代人是要标志一种结束而不是开始。他们将看到有教养的人士对工业资本主义所抱热情达到的顶点。大博览会本身播下的是由奥古斯塔斯·皮金①的中世纪宫殿所代表的文化反对派的核心。很难想象出比皮金的哥特式室内陈设和他们的铁与玻璃的外墙之间还要鲜明的反差了。然而，它们都是这一时期的一种表现。皮金把水晶宫想象成一个“玻璃的庞然大物”、一个无灵魂时代的产物。他的哥特派伙伴也持同样的 <29> 想法，虽然表达得要客气一些：有影响的剑桥卡姆登协会杂志《教堂建筑学家》(*The Ecclesiologist*) 把它称作“最杰出的工程……但不是建筑艺术”。罗斯金作出结论说：

> 水晶宫表现的有形产业的质量是非常之高的。迄今为止，它是很好的。我认为，它所代表的丰富思想是独特的、令人赞叹的思想……或许可以建造一幢空前大的温室。这一思想及一些非常普通的计算，都像那幢玻璃大厅一样，能够代表人类的智慧。[6]

哥特式建筑的复兴最明显地表现了对工业革命的一种更广泛的逆反，这可追溯到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7]布莱克、华兹华斯②和许多次要一些的天才们，担心城市化和工业主义没有人情味，以及这种环境所代表的功利主义和实利主义的思维习惯。这一逆反传统就整体而论是消极的，因为它把自己看成是在发动一场对一个持续向前推进的敌人的阻遏行动。

---

① 奥古斯塔斯·皮金 (Augustus Pugin, 1812—1852)，英国建筑师，主张回到中世纪，对19世纪前期哥特式复兴有重要大影响，代表设计作品有英国国会大楼、西敏寺、大笨钟等。

② 布莱克 (Blake, 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著有《诗的素描》、《天真之歌》等。华兹华斯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主张回到自然。——译注

这一情调渗透了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①和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②之间在1829—1830年文学上的著名对抗。骚塞搬来托马斯·莫尔的精神，公开指责现代：“像现在那样大规模地发展着的制造业制度的直接国内作用在于，它制造的财富成比例地造成物质和道义上的灾祸。”[8]麦考莱轻蔑地置骚塞的怀乡幻想于不顾，回答说，他相信物质进步的好处和不可避免性。[9]这一冲突的胜利，归于正在崛起的进步的年轻支持者，并且在以后几十年中，心理潮流继续沿着麦考莱的方向发展。然而，就社会和政治而言，适应还在准备之中。至1851年时，文化对抗的鲜明界线是模糊不清的，而极端立场正成为一种怪癖的标志。浪漫主义超凡脱俗的纯粹主义正受到抑制，但进步思想家近乎宗教般的骄傲和信心也同样受到抑制。由水晶宫与它的中世纪式展厅象征着的美学上的对抗，在英国将以相互适应而别具特色地给予解决。由于美学上中古风气的盛行，它与其许多观念形态的过时东西分道扬镳了；同时，英格兰建筑和技术中的现代主义也不再是主要的文化力量。1851年以后，英国未再举办过重大的技术或建筑革新的世界博览会。

英国工程学的三位大师——伊桑巴德·布鲁内尔（Isambard Brunel）、罗伯特·斯蒂芬逊（Robert Stephenson）和约瑟夫·洛克（Joseph Locke）——在1859—1860年的几个月中相继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说1851年的大博览会是英国技术领先的正午，那么这些大师之死则暗示了即将经历的漫漫黄昏。斯蒂芬逊于1859年10月去世时，举国哀悼，送灵队伍通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整个道路两旁都站满了肃穆的人群。在他的家乡郡，太恩河、韦尔河和蒂斯河上的所有船舶都停驶致哀，城镇的全部 <30>

① 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英国作家，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并称三大“湖畔派诗人”。中年后政治态度日趋保守，趋附权贵，获得“桂冠诗人”称号。——译注

②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青年时参加辉格党，1830年被选为议会议员，1839年任陆军大臣，力主侵华，1847年竞选失败退出政界。代表作《英国史》。——译注

工作都停了下来并下半旗致哀。罗尔特（L. T. C. Rolt）在他的工程学史中说："再也不会有一位英国工程师能享有如此多的尊敬和爱戴了；该职业再也不会有这样高的地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知识的增长，该职业越来越专门化，因此群体开始取代个人。但更多的原因不在这里，而在其本身。罗尔特论证说："公众开始失去对工程师的信赖，以致工程师自己也开始失去自信。"[10] 对物质技术的赞美，在 19 世纪 50 年代达到最高点。1851 年以后，特别是从 60 年代起，思潮和情感开始转到另一个方向——不是转向简单地否认英格兰少壮派作家或者皮金，而是转向对工业革命的驯化。[11]

第二节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乡绅价值观

赫伯特·萨斯曼(Herbert Sussman)评论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说，“大博览会的十年，标志着对机器赐福的希望破灭”[12]。这一变化实际上是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新的一代上层中产阶级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在绅士理想的熏陶下定型。正像马克·吉罗德（Mark Girouard）所描绘的那样，这一代人更松弛，更有教养，而且比其祖先更超然于经济斗争。“一生阅读圣经并以同样虔诚的热情赚钱的父辈们，很可能有信奉不可知论的子孙，他们怀疑金钱的作用和创造金钱的商品社会。”[13]这一代人的成员们为了他们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批评，求助于像马修·阿诺德那样的文人，这些人既是新派的自由职业者，也是社会思想家。

众所周知，在19世纪的英格兰，思想家和作家从未形成一个超然的知识阶层，但他们多数都在家庭、职业和愿望方面与实际和惯常生活有密切联系。[14]社会思想家也是自由职业者，具有这个阶级的偏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们，似乎至少可能是反贵族理想的一个源头，即使他们实际上多半也顺应了绅士化的潮流，而不是反对这一潮流。他们对维多利亚早期和中期英格兰的批判，比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类似批判影响更广泛，这种批判主要有助于遏制工业价值观及形成20世纪英国的一种新文化传统。 <31>

尽管维多利亚中期的社会思想家有着形形色色的个性，他们对发展

着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应还是日趋一致。以我们20世纪末的观点来看，持批判态度的作家和满足现状的作家相互间似乎比他们自己承认的要更接近一些。例如安东尼·特罗洛普①倾向于避免（只有一个例外）一般的社会批评。一套社会价值观依然是存在的，并且有时像在《索恩医生》（*Doctor Thorne*, 1858）里那样表达出来：

> 英国还不是一个本来意义上的商业国家；让我们仍然希望她不会很快就变成那样……
>
> 英格兰是个商业国家！是的，就像威尼斯曾经是一个商业国家一样。她可能在商业方面超过其他国家，但这还不是她最引以为骄傲、最为擅长的方面。商人本身还不是我们中的首要人物，尽管一个商人也许可以、完全可以成为首要人物之一。买卖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并且可能非常必要，非常好；但它不会是人的最高尚工作；并且让我们坚信它不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推崇为英国人最高尚的工作。[15]

实际上，特罗洛普在这部小说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商业价值观感染和腐蚀了一个半封建的旧社会。他的这种关注与日俱增，并使他写了一部进行严厉社会批评的著作《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 1875），该书讽刺这种价值观在靠不住的金融大亨梅尔莫特经历中的暂时胜利。直到他的帝国崩溃以前，几乎社会上所有的人好像都在大喊："世界仅仅只有一种善事——商业，梅尔莫特是其先知先觉者。"[16] 虽然特罗洛普因其小说的刻薄而受到指责，但他仅仅是用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了他随俗多年长期所抱的态度。这种态度与马修·阿诺德和约翰·罗斯金等伟大文学批评家的态度，或者狄更斯在其晚期小说中表现的态度，甚或自由

①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总称为《巴富特郡纪事》的六部长篇小说。——译注

思想的典范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态度，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四个人的政见形形色色，实际上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问题上，他们每个人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阿诺德既被称作自由派，也被称作保守派；穆勒除了兼有这两个美名外，还被叫做社会主义者；罗斯金和狄更斯有从反动派到社会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介于它们之间的一切美名。然而，尽管他们个人的观点错综复杂，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很大，但在这些现象之下，还有他们共有的以及帮助在现代英国生活中培植起来的观点的种种因素。

<32> 这四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保守派。然而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从那个时代兴起的工商业社会中退缩回来。即使那些参与自由进步进程最多、对过去和已建立的制度最持批评态度的人，在他们为未来的英国文化正统奠定基础的同时，也经历了这一反动。

甚至该世纪中叶最重要的“哲学激进主义者”穆勒，在维多利亚早期英格兰偏重物质财富的面前，也感受到一个绅士和自由职业者的疑惧。穆勒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对土地贵族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而且他的哲学是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这一切本应使他成为一个纯粹工商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当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但甚至穆勒在背离其从小所受教育的同时，也一再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失望。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都来赞许地指出：“他 [穆勒] 的朋友和曼彻斯特学派的追随者们，在阐明他们兴高采烈的否定态度时所持的盲目乐观主义，不是穆勒鼓吹起来的。甚至有一种困惑感缠绕着穆勒。他像商业中的绅士向女士们展示其工厂一样，非常不情愿地展出了他的铁制万能机的全部齿轮。”[17]

早在 1829 年，穆勒对向他介绍圣西门主义的一位法国熟人就抱怨过英国对“偶像制造”的崇拜，他说偶像制造是“我国一切最坏弊端的根源，它败坏了我国政治家的议案及我国哲学家的学说，并使我国人民的头脑僵

化起来，以致几乎没有希望激励他们提高智力或热情。”圣西门主义者希望扶上政权的工业家，在英格兰至少是“你所能找到的在对待他们的商业和家庭以外的所有事情的理解方面，最为褊狭固执、最为唯利是图、最为小气的那些人的阶级”。[18]

就像穆勒的朋友和良知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生产并非生活的主业；甚至职业道德也并非道德的核心。1850年以后，穆勒的异议变成对《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上卡莱尔的“工作福音”的公开攻击：

> 我认为工作本身并非好事。为工作而工作是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为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自觉自愿地工作才值得赞美。但什么是有价值的目标呢？在这方面，你的［《弗雷泽杂志》的］撰稿人是神谕的先知，这种神谕尚未被诱导去自我标榜。他在环绕工作想法的永恒圈里周而复始地旋转，好像翻地、掷梭或执笔本身就是目的和人类生存的目的似的。[19]

穆勒对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怀疑，渗透了他的经济杰作《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他关于将来可能出现“静止不变状态”的一章，把这种观念变成了社会哲学，这种概念对李嘉图（Ricardo）来说仅仅是一种分析概念。穆勒赞许地把“静止状态”（今天叫做“无增长社会”）同他那个时候的发展状态作比较，用以攻击“为奋斗而奋斗的经济行为”。他希望把他所认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偏向转向数量而不是质量，正像他企图对功利主义本身所作的那样。穆勒并非悲伤地看待经济增长的最终停止，他声称，这将是“我国现有条件下的一种极大改善”。

<33>

> 我承认，我不喜欢那些认为人生即斗争的人所抱的人生理想。他们认为，形成社会生活现存模式的相互蹂躏、相互欺压、

相互排挤或相互践踏，便是人类最值得追求的命运，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工业进步过程中令人愉快的象征。

穆勒仍然是十足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承认这是群众性贫困和野蛮的一个必要阶段——走向新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必要的、但仅仅是开始阶段，在新黄金时代，“人们的头脑不再充斥获取成功的诡计”[20]。

如果说穆勒是原型的“哲学”激进主义者，那么那个时代最主要的“感伤”激进主义者无疑就是查尔斯·狄更斯了。狄更斯在其早期经历中坚信进步和启蒙的有益发展。1843 年他在给一位朋友写信时抱怨说，如果“有一天我毁了自己，那将会发生在因听取那些对可憎可恶的很古老时代进行歌颂而陷进的痛苦之中。”[21] 启蒙发展的作用是工业进步。直到狄更斯写《艰难时世》(*Hard Times*) 时，他的杂志《家政寄语》(*Household Words*) 还充满了对现代制造业所创造之奇迹的热情报道；他通过朗斯维尔先生 [《荒凉山庄》(*Bleak House*, 1853)] 为北方工业家塑造了一个感人的典型。实际上罗斯金在他死后把他叫做“一个纯粹的现代派——优秀的汽笛派领导人”[22]。

然而，在这位进步的博兹①身上，具有强烈的双重矛盾感情和对进步自由发展不满的种子，因为进步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异化。狄更斯晚期的著作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阶级意识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并对环绕经济生活的舆论气候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从一个方面来说，狄更斯变得更加激进了：某些现代批评家说他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转向了一种原始社会主义，从对个别腐败现象的抨击转向对富人越来越强烈的谴责，他谴责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怀疑其自我改造的能力。[23] 从另一方面来说，狄更斯变得更反动了，在藐视议会制政府的同时，他越来越害怕发生群众性骚动。[24] 但狄更斯的变化主要是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政 <34>

① 博兹 (Boz) 是查尔斯·狄更斯的笔名。——译注

治上。他发现自己日益受到新的商业和生产社会的排斥，这种新社会正在取代“可憎的”过去。

在《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s*，1846—1848）一书中，这一变化着的心境，首次导致狄更斯去嘲笑那个时代的勃勃雄心的傲慢自大，而艾伯特亲王不久后便称此勃勃雄心旨在“征服自然为人所用”：

> 地球之形成是供董贝父子经营的，太阳和月亮是给他们光亮的。河流和海洋之形成是为供他们的船只航行的；彩虹给了他们好天气的预兆；刮风是支持或反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星球在其轨道上运行，旨在维持以他们为中心的那个不可侵犯的体系。

《董贝父子》中对建设横亘斯泰格公园铁路的描写，隐隐渗透着关于技术冲击的骄傲与担忧的混杂感情。铁路代表了令人敬畏的新生力量，它令人惊奇而又可怕，因为它可以无所顾忌地扫荡人类一切其余意图和愿望。全面改进的承担者也是“一种力量，一种强加于它自己钢铁道路上的力量，向道路和公路提出挑战，冲破一切障碍的核心，从而把各阶级、年龄和职位的活生生的人都拖曳在后面。”[25]

随着狄更斯对技术进步忧虑的增加，他发现自己无法响应1851年（博览会）的种种激情。他对自己的助手威尔斯承认道：“我对1851年博览会总是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一种令人眩晕的、不可名状的感情。”[26]在《艰难时世》(1854）一书中，狄更斯把他最痛恨的一切东西都与工业制度联系起来。以后一提起工业城镇就很可能回想起他笔下所描绘的那丑陋的科克镇及其使人丧失人性的工作的可怕图景。

狄更斯反复强调，创造财富的代价太高了。实际上，创造财富（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社会目标，在他看来越来越成为一种道义上的癌症，它既要求又引诱更多的人为之付出性命，毒化人类天生的基本价值观。潘克斯(Pancks）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1855—1857）中把赚钱的信条概括为：“总是让我专注于此，而我也将总是让你专注于此，让别人也专

注于此。在一个商业国家，你和人的全部义务均在于此。”[27]1864 年以前，狄更斯对经济上成功信条的厌恶，在《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 一书里对整个上层商业阶级的痛苦描绘中达到了顶点。所有那些取得成功或希望获得成功的人——波德斯赖普、兰姆利一家、维尼伦一家及其圈子里的人——都是极不讨人喜欢、虚情假意的人。追求财富受到了谴责。

狄更斯对争夺财富的厌恶加深以后，他转向了别的什么替代理想呢？一位批评家发现，狄更斯社会思想的重要发展在于“摒弃靠自己力量成功 <35> 的人，转而肯定乡绅理想，这种乡绅理想则剔除了阶级和社会的野心。”[28] 这位批评家指出，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靠自己力量成功的人和乡绅被对立起来，而且与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不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乡绅一边。布雷德利·赫德斯通的强烈愿望，他的野心和精力都被谴责为病态，与维尼伦、波德斯赖普的非人世界没什么两样。在狄更斯反对金钱价值观的斗争中，传统的乡绅成了一个同盟者。在公学受过教育的尤金·雷本可以承认缺乏目的性，他嘲笑诚挚并对精力的价值提出疑问：“字典上从头至尾我最痛恨的一个词就是活力 (energy)。”[29] 狄更斯还要使这一信念变化进一步发展。关于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埃德温·德鲁德秘事》(*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安格斯·威尔逊 (Angus Wilson) 指出：“英格兰缩微成一个像大教堂似的城镇，而它的阶级则缩微为 (在公学受过教育的) 上层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阶层。”威尔逊论证说，狄更斯在这里把他认为“英国社会可信赖的、善良的、强壮的、首先是健康的部分”调动起来对付罪恶之徒维兰贾斯珀。[30] 最后狄更斯背弃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但没有去采取某种原始社会主义的立场，而是参与旧乡绅价值观的改头换面。他那虚构的世界，从约翰牛 ① 和驿车的老英格兰，经过狂热的新城市和工业社会，最终通向了公学学人心目中的理想之城。

---

① John Bull，英国人的绰号。——译注

穆勒和狄更斯对商业社会的摒弃，被年青一代的作家阿诺德和罗斯金更为明确、热情地接受下来，他们循着原路回到前一代人的浪漫主义思想。阿诺德的一贯性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他主张更“现代的”教育制度，他警告自己的同胞说，要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就要求培养聪明才智；主要教授“板球和绅士风度”的公学，没有满足19世纪下半叶的需要。[31]另一方面，他传播对以其活力推动现代社会（他力主英格兰要与其并驾齐驱）的主要工业资本家阶级的传统偏见。学校的现存规定把中产阶级分成上层自由职业阶层和下层商业阶层；阿诺德希望利用国家向下发展公学类型的教育来对此进行补救。不应该拒绝工商业中产阶级享受精英教育的熏陶之益。他当然不想让公学的智力缺陷受到忽视，但阿诺德的如下原则能否使英格兰的国民教育更接近于该时代的技术和经济生活，尚属可疑。阿诺德对现存中产阶级私立学校在现代化方面所作努力的敌视，压倒了他对上层阶级学校教育的温和抱怨。他塑造的典型的曼彻斯特工业家“博特尔斯先生”受教育的“来库古学堂”（Lycurgus House Academy），被以冷酷的轻蔑描写如下：

<36>

> 你不要根据“来库古”① 这一名字就认定该校在教什么拉丁语和希腊语；该名称只表明那里传授的道德课及勤奋真诚的性格。就其教育来说，来库古学堂的校长、颇有见地的教育家——阿基米德斯·西尔弗庞普博士，你必定在德国听到过他吧？——有时髦的观点。他常说：“我们应当是能跟上我们时代的人。有用的知识，活的语言，通过观察和体验而形成思想，这些就是我的教育信条之基本点。”或者如我所听到的他的学生博特尔斯在饭后空余时间所说的那样：“…… 西尔弗庞普是个见解独特者！奇妙的思想！奇妙的制度！别提你的陈词滥调——一切都是实

---

① 来库古（Lycurgus），传说是古斯巴达法律（大约公元前9世纪末）的起草人，斯巴达古制和传统的开创者。——译注

际工作——最新的科学发现——脑子经常处于兴奋之中——许许多多的有趣实验——灯红酒绿——嘶！嘶！砰！砰！这就是我所叫做的正在造就一个人的那些东西。”[32]

阿诺德的社会批判主要是针对中产阶级的——他冷眼盯着他的“敌人”，与此比较起来，他对“蛮人”和“普通老百姓”仅仅一掠而过。他承认，他的著作之“主导思想”是“英国中产阶级的不良教养”。[33]随着这个阶级重要性的提高，它的不良教养（狭隘及实利主义）毒化了国民生活。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中猛烈抨击“对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崇拜是……迷信”。手段——而且是成问题的手段——变成了目的。就像他在几年以前所抱怨、现在常被引用的一段评论中所说：

> 你们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当他的信件每天在伊斯林顿和坎伯韦尔之间往返传递十二次，而且如果是靠火车在此两地传递，则每一刻钟往返一次，这就是发展和文明的最高点。他认为，火车仅仅把他从伊斯林顿的一种鄙俗的、郁郁寡欢的生活带到坎伯韦尔同样的生活中去，那是算不得什么的；而那些信件仅仅告诉他，那里的生活不过就是如此。

阿诺德相信，英格兰没有有助于自由和工作的目的及理想以外的民族目的或理想：“自由犹如职业，是一匹供骑用的良马，但只能在某些地方骑。你似乎认为你必须骑上自由之马，骑上工业之马，尽力奔驰而去，并确信是在奔向一个正确的目的地。”

阿诺德提醒他的读者说，多一点和大一点并不意味着好一点，实际上这对他来说，还多半意味着更坏。他抱怨说，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列举“建造的城市、修筑的铁路、制造的产品”作为国家进步的证据。但 <37> 更多的城市也意味着更多的贫民窟和过剩人口，更多的铁路带来了更多的

忙乱，更多的制成品造成了更多的丑恶和实利主义。

阿诺德对成功的商业阶级生活的描写变得愈来愈尖酸刻薄。他在1866年评论说："一个人精神的高雅和力量是由他的享乐表现出来的。我们承认，你们中产阶级在商业中获得享受，生意兴旺，财源滚滚，但除此之外呢？你们中产阶级沉醉于商业，其思想似乎对外界的一切刺激都迟钝了。"两年以后，到他写《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时，他对商业阶级的厌恶已不可遏制：

> [想想]他们过的日子、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做派、他们说话的腔调；好好瞧瞧他们；看看他们读些什么书，让他们开心的是什么东西，听听他们说的话，想想他们脑子里转的念头；如果拥有财富的条件就是必须变成他们那样的人，还值得去占有任何财富吗？[34]

阿诺德对贵族的批评却没有这样的辛辣味，这种批评多带有对"自己人"进行劝说的性质。如他曾经承认过的那样，他及其他自由职业阶层觉得缺乏其精神独立的理想。他们因为是在贵族中接受教育，又渴求被社会充分接受，因此倾向于作理智的顺民。他们对贵族理想和价值观的批评，要比对英国社会其他阶层的理想和价值观的批评为少。这样，尽管他注意采取超然态度，并作不偏不倚的批评，但如亨利·西奇维克（Henry Sidgwick）所指出，阿诺德的影响加强了上层阶级的情趣和偏见，并使其永恒化。[35] 他对中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的辛辣批评深入人心，而对贵族的温和抱怨却被人遗忘了。他曾希望减少不平等，提高各社会阶层的才智及达到效率更高的状态，但正是这样一个消极目标"为使未来免遭庸俗化"[36]，唤起了他的最大热情并与他长久地联系在一起。

阿诺德和罗斯金虽然在许多方面各不相同，但那位有名的批判者约翰·罗斯金同阿诺德一样，也蔑视工业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并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罗斯金作为一个不能从道德范畴以外来观察世界的"犹太

教信徒”（阿诺德意义上的），在他关于艺术和社会的说教中，灌输了对资本主义、技术和工业社会的强烈憎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大博览会于海德公园开幕的当天，他开始写《威尼斯的石头》（*The Stones of Venice*）第二卷，这是他对现代技术和工业的第一次强烈的公开谴责。几年以后，罗斯金在对第一次建筑学家会议发表演讲时，警告与会者注意现代主义的谬误： <38>

> 也许一个年轻建筑师容易受到迷惑的第一个念头，作为这种实验时期的首要问题，是他负有一种与一般现代文明，特别是英国现代文明相匹配的“新风格”，一种与文明的引擎和电极相匹配的、像蒸汽一样膨胀、像电一样闪光的风格。

他脑子里可能想着水晶宫，他继续说道，假如果真如此：

> 你得拉制出玻璃板并锻打出铁条，直到你用一望无际的黑色钢架和令人目眩的建筑物把我们大家都包围起来时为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将把整个伦敦置于一个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圆顶之下，它将以其闪光照亮周围的云，直至大海。然而我还是要问你，以后会怎样呢？

罗斯金说，除了喧嚣声、空虚和愚蠢行为以外，什么也不会有。[37]

罗斯金把“财神的福音”与对技术的虚假尊崇摆在一起，他支持卡莱尔对“这一宇宙的秘密是否……毕竟在于赚钱”的提法所提出的挑战。他不赞成那种提法，他宣布，“除了生活以外没有财富”，而“生活”是同追求物质财富不相容的。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是一个堕落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成就沾染上了罪孽。罗斯金认为，不经过“巧取豪夺”，即不“牺牲周围的人或生活可能性”，就无法聚敛巨额财富。为了纠正商业的掠夺性质，罗斯金号召商人们以自由职业作为自己职业的典范。对他来说，自

由职业是以把服务理想置于个人获取目的之上而著称的。商业界人士“应当发现一种并非绝对自私的商业”。他声称，商人和制造业主的恰当职能，实际上是与上述其他职业的职能相似的，即“向国家提供”。

> 他在这种提供中为自己获取利润的职能，就像教士为之获得俸禄的职能一样。这种俸禄是一种应有而且必须的副产品，但不是他生活的目标。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教士，任何比他的收费（或酬金）多的钱都是一个地道医生的生活目标。

此外，在罗斯金看来，“供给”具有与教士和医生相联系的精神和物质服务的神圣含义。他对布拉德福德的商人们说：“你们商业要建立与供给能力相当的市场。”这样，如果商业和工业界人士把传统职业作为自己的榜样，他们的工作将符合道德，因而他们也可以在现在遭到正当拒绝的社会阶梯中获得体面的地位。[38]

<39> 在获得这种地位以后，商人们将不得不放弃对物质积蓄的不适当的依附性，不仅是个人放弃，而且是集体放弃。罗斯金一次又一次地公开谴责发财、流动和升迁的愿望。他像否定“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都要到别的地方去”的信条一样，也狂热地否定“无论我们已获得什么，都要获取更多”的信条。他力劝各阶级的人们停止其无休止的繁忙，而满足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不要寻求更多的财富，而要寻求简朴的乐趣；不要寻求更多的产业，而要寻求更深沉的幸福”。他相信，特别是富人应当“在狂放中遏制聚敛欲望的翅膀”[39]，从而为穷人树立一种榜样。罗斯金的理想商人不是贪得无厌的，他献身于高尚行为的原则，而不是算计获得好处，他把提高生活质量而不是数量作为自己的义务。

生活的质量——罗斯金劝诫的主旨——怎样才能提高呢？罗斯金想象的美好生活恰恰是“进步”破坏着的东西：秩序、平静与和谐。人类生活的真正满足并没有发生变化：“观察粮食的生长和果树的开花结果；气喘吁吁地扶犁和挥动铁锹；阅读、思考、感受、希望、祈祷…… 世界的繁

荣或灾难仰赖于我们对这少数几种东西的了解和讲授，但绝不是依赖铁或玻璃，电或蒸汽。”[40] 然而，英格兰却把自己的灵魂都出卖给铁和蒸汽了，并有可能成为“世界高炉”。罗斯金在这里把他的两种选择鲜明地提供给了他的同胞，或是稳定和满足或是无休止的变化，或是田园生活的期待或是工业地狱。他对未来的希望是，“英国可以把占有财富的全部念头都抛回到这些念头最初产生的野蛮民族中去”，并转而培养高贵的人。[41]

就像扬（G. M. Young）指出的：“罗斯金推论出一套作为英国一切未来社会思想基础的新原则，并强使他的社会接受这套原则。”[42] 他因使竞争变得声名狼藉而广为人知。他也使生产失去了内在的道德价值，虽然这方面较少为人所知。对罗斯金的信徒来说，物质生产本身并非善行，而全神贯注于物质生产显然是一种罪过。他帮助把注意力从商品生产本身转到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投入使用的方法。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 1885 年致罗斯金的一封信，对他的如下教导大加称赞：“财富的明智利用在于发展完善的人类生活，它对人和行为的重要性都要比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大得无可比拟，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后者具有某种重要意义。”[43]

狄更斯的小说加强了这些更明确的论据，且为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接受这些论据铺平了道路。他的著作的一个遗产是，对维多利亚早期城市化和工业化可怕情形的鲜明意识。习艺所、贫民窟和科克镇在狄更斯笔下栩栩如生，成了向城市和工厂生活过渡的“凄凉时代”的象征。两次大战之间一本供孩子们用的最流行的历史教科书，用了整整一章关于 19 世纪的序论来讲狄更斯，引用他的小说来描述该世纪上半叶的几乎每个方面，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抗议”帮助清除的“弊端”。[44] 此外，狄更斯所描述的尘世生活，便是对物质企求的贫乏和非人性的一种控诉。这种控诉隐藏在小说里而不是正式议论中，因而变得更加强有力。他的迫切恳求，强使读者以人性的价值标准，去调和个人及国家的这种物质企求。 <40>

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影响了知识界的舆论气候，部分原因是使他们的启示得以接受的制度发展日趋完备。这些批评家和知识界的思想都

已形成，而且其本身都是维多利亚中后期一次保守革命的一部分，它包含着工业革命的社会和理智后果。一个传统的上流集团充分适应了该时代的新环境要求，以避免一次真正的全面动乱的压力。随着 19 世纪临近结束，一种文化在迅速发展着的上层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阶层（旧上流土地集团的继承人）中扎下了根，这使经济发展和物质进步的理想“各得其所”，这是一种比理查德·科布登或艾伯特亲王世界观中受限制得多的地位。这一阶层在使过去和现在相适应时，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很舒适的地位，它的世界观越来越表现为仅对现代事物的一种表面接受，却没有发自内心的深刻信念。也许是宁愿新瓶装旧酒。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变化已经走得够远的了，进一步变化的前景至多也是令人不安而不是喜悦。他们现在好像经常都在随声附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留下吧，你是这样的美好！”

第四章

“英国生活方式”吗？

我对某些陈腐的旧价值观进行过可恶的追求。

——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

《华丽之夜》（*Gaudy Night*，1936）中的彼得·温姆西勋爵

四月的和煦阳光透过新绿的栗子树洒落下来，在栗子树树干之间显露出公园的绿茵草地和远处闪烁的湖光。保罗想，“梦幻中的英格兰春天是英格兰乡村世世代代的美景”。他想，沐浴在晨曦中的这些大栗子树，无疑代表了一个失去其理智的世界的某种持久力和宁静状态，可是在混乱不安被人遗忘的时候，它们还会这样吗？这一定是威廉·莫里斯的精灵在马戈特·贝斯特·切特温德的汽车里悄悄地告诉他下种和收获的时间，告诉他四季的美妙更替，告诉他富人和穷人、高贵、率直和传统的和谐依存关系吧？

——伊夫林·沃（Everlyn Waugh），

《衰亡》（*Decline and Fall*，1928）

凡有一条乡村小路
就总有一个英格兰，
哪里有一所小茅屋
屋旁就有一块粮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民谣

第一节　北方和南方

重新形成的上流集团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其“什么构成英国特点”的观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像在第三章中见到的其世界观的其他方面一样，新的国家自我形象披挂上了一种古老传统的饰物。英国现代化中固有的自我限制的一种特定标记便是，逐渐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形象否定其主要特点（工业的兴起）的程度。

这一发展并非不可避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还有另一种自我形象可供选择，即以工业化经历为主的形象。我们或许可以追随唐纳德·霍恩（Donald Horne）谈谈关于国家的两个相对立的隐喻“北方”和“南方”：

> 在“北方”隐喻中，英国讲实用主义，凭经验办事，有算计，信仰清教，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有进取心，富有冒险精神，讲科学，严肃认真并相信斗争。它过分的罪过是无情的贪婪，它相信所有人的原始冲动是一种合理的、精于计算的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并以此进行辩解。
>
> 在“南方”隐喻中，英国充满浪漫主义，不合逻辑，乱七八糟，非常幸运，信奉国教，贵族占主导地位，讲传统，轻浮，并相信秩序和传统。它过分的罪过是无情的骄傲，相信人们生来就是服务，并以此作为辩解。

<42>

在这两种隐喻中，都当真认为“英国是最好的”，但在英国好在什么地方

的争论中，南方隐喻获胜了。在19世纪末，胜利的南方隐喻使许多英国人相信，他们的成功主要不是因为持续努力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有独特的文化遗产。“不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命运对他们的慷慨赐予。”[1]

南方隐喻的胜利，是与工业革命场所及其创造的质量贬值一起发生的。[2] 这样的地方及这样的特点，变得“偏僻土气”。20世纪英国的偏僻土气并非像法国那样，单纯是一个离都城远近的问题，它主要是一个离一种受到赞许的生活方式太远的问题。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郊区可能是偏僻土气的，而许多乡村却并非如此。有些恰巧离伦敦很远的乡下村庄和古老的有大教堂的城镇并不偏僻土气。如霍恩评论说：“乡村的或古老的东西都是英格兰南方媚上傲下的人内心深处最为看重的，即或它们是发生在北方也罢。偏僻土气就是生活在工业革命赋予其重要现代形式的工业城镇之中或其附近。”[3]

这种看法并不总是单纯上层社会（名流）的看法，它有相当的广泛性。左翼知识分子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看法，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把“英国梦”描绘为：一种与“富裕而且过分自信的个人主义”的美国梦成鲜明对照的、“一个集体的、未曾异化的民间社会”的理想，它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以传统和稳定的地方纽带维系在一起，并以乡村为象征。[4] 这一左翼的神话虽然称为激进主义，其实，在精神上更接近于英格兰南方而不是北方的形象。它在南方传统中形成了可以接受的群众性抗议，它攻击等级制度的价值，而接受其其余方面。

第二节 “它是一个古老的乡村”

南方隐喻或英国梦的核心部分一直是对昔日的依恋，并被认为是传统。亨利·费尔利 [Henry Fairlie，前《星期日泰晤士报》(*Times*，伦敦) <43> 驻华盛顿记者，现居美国] 在 1976 年对其同胞的一次警告中，对一个太安适的过去的这种吸引力的渗透力表示了愤怒。他评论说，英格兰变得太像一个家庭，一个安逸而有保障、但也“令人窒息”的家庭：“每人都在他（或她）自己的位置上；每人都在做他（或她）自己的事，说他（或她）过去总是说的话，并保持过去的样子。”这个“家庭”在衰落中却总有数不清的办法来维持其家庭意识：“它可伸手去取家庭纪念簿，搬出家谱，退回到自己丰富多彩的历史中去。”他警告说，这个国家靠极力复兴其过去是不能繁荣起来的。“从这一远景看，英国人今天对其过去的兴趣看来不仅古怪，而且是发了疯。”[5]

即使最乐观的预想也不能持久。塞缪尔·斯迈尔斯 1861 年说：“英格兰的一切都是年轻的。我们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但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们的贸易年轻；我们的工程技术年轻；而我们成为‘民众’的文明才刚刚开始。”[6] 然而随着 19 世纪慢慢消逝，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舆论的制造者们对持续的变革感到失望了，他们越来越转向过去，转向现在依然存在的过去的一些因素，将其作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价值观的源泉。人们发现，英格兰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其宝贵遗产正处于被消灭的危险中。人们愈来愈关注于保护并再造与这种遗产的联系。

一个把自己与现存社会的活力源泉隔绝开来并极力使自己依附于旧生活方式的上流集团，推动集体的自我形象从一个还年轻而有革新精神的民族形象，变成一个古老而特别稳定的民族形象。老古董，无论真假，都是公学和名牌大学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之一，而且这不仅扩及到课程（如在第三章所见），而且扩及到建筑物本身。古老建筑物作为同过去联系的纽带，新近格外受到珍惜。1871 年建立的多佛尔学院非常典型地鼓吹它的古老建筑，它们“形成了古老的圣马丁修道院的一部分，并且从一开始就赋予该学院一种古老学校的外表和情调。”[7]

最初，古老的外表或许主要在于使革新体面一些；英国那些主张改变内容而不改变形式、在保持连续性的外表下革新的天才们曾经备受赞扬，但随着时间向前推移，越来越注重的却是形式的古气，而不是内容的新颖。外壳及对外壳的迷恋成了对生活内部日益紧密的束缚。

从利用过去进行令人满意的革新转到为过去而专注于过去，这在 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就开始看得清楚了。这些年经历了维多利亚中期繁荣景象的终结及颇有争论的商业和农业萧条的开始。<44> 新的上流集团对这种经济发展迟缓的新问题尚不能很好对付。经济的重建是建筑在认为新的经济总是充满活力，因此需要加以抑制而不是重新给予刺激的假定基础上的。刚刚开始形成的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在于“使大事化小，使令人激动的事变得枯燥无味，使新生事物变为熟视无睹”[8]。它很好地适应了缓和社会紧张气氛及减少变革的破坏性后果的需要。它给社会降了温。然而在这样做时，因从革新转到保守，从新奇转到古旧，从变化转到连续性，从而也使自己的声望丧失殆尽。

✦ ✦ ✦

地方史、全国史和古迹著作的经常出版和流行，证明了公众对往昔日益增长的兴趣。19 世纪新的城市生活因置身于漫长的历史环境而开始与

传统协调起来。同时，随着这种新生活的种种问题产生，市民中的优秀人物发现，一种高贵的或令人神往的过去是一个避风港。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他对维多利亚城市的研究中指出，当19世纪临近结束时，除了最新城镇以外，所有城市“都是因为它们有悠久的过去而不是因为在当代的重要性，吸引了作家们最大的注意力。”甚至某些较新的城市也特别强调其远在中世纪的起源，而不是强调其新近取得的重大经济进展。布里格斯发现，怀古者们“像他们为暴发户发掘或杜撰家谱一样，热心地为新城市发掘和杜撰其历史起源。”詹姆斯·泰特（James Tait）教授1904年正确地、但也许有些令人迷惑地强调说：“曼彻斯特是一个很古老的地方。”对1893年的怀利（W. H. Wylie）来说，“诺丁汉不是现代的创造物，它是世世代代发展的创造物”。那些较古老的、工业较不发达的城镇，其古老的历史轻而易见，无需特别加以强调，因而开始引起读者们的极大注意。弗里曼（E. A. Freeman）和亨特（W. Hunting）主编的、1889年船坞工人大罢工那年首次出版的题为《历史名城》（*Historical Towns*）的十一卷系列丛书，就是这种兴趣的明证。布里格斯得出结论说：“过去要使现代恢复活力。”[9] 它也是要找一个与现在相抗衡的东西，甚至是一个避免被现代吞噬的避难所。那些宁静的、没有大教堂的城市被描绘为比其活力强的邻近城市更为友好宜人。例如基钦（G. W. Kitchin）牧师对温彻斯特做了如下的典型描写：

> 当其他中心城市以狂热的速度向前跃进，并因此而践踏其古老地方的所有古迹的时候，温彻斯特却置身于英国工业和生活的主流之外，几乎静止未动……它的古老建筑物、它过去的许多风俗习惯、它的宁静美和令人愉快的邻里关系，使这座古老城市有权对所有有幸踏进这个如此令人愉快的地方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没有一座英国城市在过去有如此宝贵的记录，或者在我们这个匆忙急迫时代有如此平静的生活。这里仍使那些有

<45>

了解此点之才智的人生活在平静之中，而且让我们希望，或许还可以确凿地说："它们也为那些仅停滞等待的人效劳。"[10]

怀利在写诺丁汉时，也企图赋予这个工业中心某些这样的气氛："在我们的现代机器无休止的转动和今天商业的嘈杂声中，我们只要专注去听，或许可以听到一种古老过去的声音。"[11] 新怀古派中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迪奇菲尔德（P. H. Ditchfield）牧师，同样于 1897 年力劝他的读者"去发现英格兰的城镇是多么富于历史的联系……让我们重新生活到过去去吧。"[12] 最新的城市爆炸把注意力吸引到现在和将来，而到 19 世纪末时，旧世界又呼吁纠正新事物的不平衡——使旧东西合法化，复活起来，并对当代的重负提供一种解脱。

探寻过去的"朝圣活动"成了著述文化的一个特点。维多利亚晚期的桂冠诗人艾尔弗雷德·奥斯汀（Alfred Austin，1835—1913）最热衷的题目就是"我国民族生活在尚未被呆板而又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条件取代威胁时的古老简朴的方式"[13]，他于 1901 年遍游英格兰，做了一次这样的旅行，并出版了一部销路颇好的游记，题为《古代安宁常在的地方》（*Haunts of Ancient Peace*）。如他所说：

古老的英格兰或如它所留存下来的样子……我承认我渴望了解过去的城市特点……渴望了解洗涤日、家制果酱、薰衣草袋，吟诵葛雷的《墓畔哀歌》，聆听晨祷和晚祷。但你实际领略到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粗俗慌乱而令人焦虑的、没完没了的邮差敲门声、断断续续送来的大量电报。

这位桂冠诗人在旅行中愉快地发现"还有大量的……古迹"，他在书的结尾再次向他的读者保证，古老的英格兰依然存在。这个国家总的来说依然是"古代安宁常在之地。但愿永远如此！"他这样狂热地说道。[14] 由于汽车使城市居民很容易到达乡村，在奥斯汀旅行之后，类似旅行愈来愈多。

然而即使规模发生了变化，感觉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到19世纪末，像奥斯汀这样的作家已帮助国内旅游者确立了一种心理架构——对“古老英格兰”的探寻。

形形色色的作家坚持说，英格兰当前特点的根子在于国家的过去；在变化无常的现代事物面前，是该重新发现这些根源的时候了。犹如萨宾·巴林–古尔德（Sabine Baring-Gould）牧师［他因写作《前进，基督士兵们》（“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而大为出名］论证说，自宗教改革以来，国人愈来愈漠视自己的祖先。然而“我们从这些老祖宗那里受到的恩惠要比预想的多……如果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长处，如果说我们谨慎小心、诚实、真诚、善于自我控制，那么这些品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随着诚实祖先的纯净血液遗传给我们的。”[15]

<46>

犹如在托利党人和自由党人中间一样，这种情感在激进派中也表现出来，有时甚至更为狂热。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觉得“我一生最强烈的感情”在于“对现代文明的憎恨”。莫里斯早期的浪漫主义和晚期的社会主义都深刻地经历了突变。他的名诗《地上的天堂》（“The Earthy Paradise”，1870）以这样的诗句开始：

忘却六郡天空上弥漫着的黑烟，
忘却蒸汽机的喧嚣和活塞的撞击声，
忘却那丑陋城市的延伸；
我宁愿怀念原野上的驮马，
在梦幻中去追忆那小小的伦敦，
　　那白色而清洁的伦敦。[16]

早期和晚期的莫里斯都回头顾盼中世纪的英格兰，以求发现对一个美好社会的最正确了解。在他的社会主义小说《约翰·保尔的梦想》（*A Dream of John Ball*，1887）中，他的叙述者遗弃莫里斯时代“聪明而不满足的人性”，而转向14世纪缓慢的、小规模的、美好而高尚的生活。

莫里斯以一种公开宣布的“对…… 过去的热情”，重视与先辈保持连续性的意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承认客观上讲英国历史并不比别国历史重要，“但对我们这些正在成为本国历史的缔造者、并生活在本国历史演进舞台上的人来说，对尊崇本国历史有一种特殊的兴趣”。这种过去生活的产物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他在附和丁尼生①时断言，“人的住房没有比古老的英格兰房屋更使人感到亲切或更令人愉快的”。而且不仅是房屋，莫里斯在那位于泰晤士河上游流域克尔姆斯科特的乡村住宅附近，在五英里远近以内发现约半打乡村小教堂，“每座教堂都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创造，都有其独特之处”。[17] 早期英格兰的这些残存物，似乎证明有一种当今英格兰无可比拟的、生气勃勃的大众文化。就像对托利党作家一样，对莫里斯来说，这些历史遗迹是保留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①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82），英国诗人，1850 年被封为桂冠诗人，主要诗作有《悼念》和《国王之死》等。——译注

上流地主集团，管理着日益衰微的农村经济。这个上流集团非常强大和富有，以致并没有因农业的衰退而感受到严重威胁。英国贵族已在城市里站稳脚跟，他们来自城市、矿山和工业用地所有权的收益比例愈来愈大。[24]他们可以让农业在世界市场上自谋生路（即使境况并不太好），当其他欧洲国家都筑起关税壁垒时，他们仍然这样做。此外，英格兰的乡村社会（虽然还不是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早已纳入国民生活之中。乡村土地连成一片的规模、它较早的政治统一及市场经济向农村的早期渗透，连同圈地造成的农民阶级的解体和土地持有权的集中都表明，到 19 世纪中期，乡村社会与基于城市的“国民”社会并没有明显的区别。[25]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和大陆欧洲的农业家较好地保持了他们的数量，因此也保留了他们的许多社会和政治分量。地主与佃户之间、银行家与农场主之间的冲突，就像乡村与城市间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一样，仍然是眼下人们关切的问题。这样，乡村就“混杂”了真正的农民和农场主及真正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有时会血染田园风光，并且有时会威胁城镇利益。法国的农民、德国的农业家和美国的农场主，都是应当认真考虑的重要政治势力，这种势力对以城市为基础的“先进”上流文化并非总是友好的。[26] 此外，在欧洲大陆，乡村现在才被纳入国民生活中去。结束中世纪、“教化”乡村及统一乡村和城市文化的长期运动刚要接近尾声。[27] 农村社会此时仅接近于放弃其作为对“文明”的一种障碍和威胁的历史作用。大陆的乡村因此以英国所没有的方式受到“野蛮习气”和“愚昧”（马克思语）的感染。英格兰 19 世纪晚期的乡村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空虚”，并可用作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象征。英格兰乡村的实际重要性变得越小，就越容易纯粹代表一种可供选择和补充的价值体系，一种精神上的平衡物。[28] 如《乡村生活》（*Country Life*）的编者 1924 年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日子里，农村为我们争得了‘快乐英格兰’的称号。现在城镇使我们成了‘富裕的英格兰’，但设若没有农村，它们会使我们在富裕中窒息。”[29] 巴黎人鄙夷乡村地区和农民，德国人把农村神话用作政治反动

<49>

但到18世纪末以前，英国上层阶级变得空前“城市化”，他们在伦敦和主要地方城镇度过的时间愈来愈多。[21] 然后出现了工业化和城市的爆炸性发展，后者似乎注定要把乡村传统一扫而光。到1851年，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重要城市国家。随着“大城市时代”[如罗伯特·沃恩（Robert Vaughan）1842年所说]的开始，国民历史中漫长的一章就接近了最后的尾声。沃恩和其他人急急忙忙地宣布“封建主义”和“田园生活”即将结束。然而，在文化观念的王国中，这种情况还不会出现；都市生活的胜利至少是不彻底的。在新的城市社会中心之外，“田园风尚”获得再生。

一般认为，英国彰明昭著的反城市倾向，是对迅速发展的城市化的暂时反动，随着对城市生活的最终适应，将会逐渐消退下去。虽然这种观点有许多道理，但它容易令人产生误解。区分维多利亚时期的两种反城市倾向是重要的。一方面，存在一股强有力的厌恶城市的潮流及乡村居民、特别是较低层次的土地利益集团对城市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支配地位的强烈抵制。从最直接意义上来说，这反映了不同经济利益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土地利益和工业利益之间，食品生产者和食品消费者之间的冲突。这种乡村风尚在捍卫物质利益中萌发出来，并使后者合理化，它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而衰退。[22] <48>

然而，维多利亚时期的反城市倾向还有第二种形式：那些实质上过着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对城市生活的批判。这种现象很少归因于经济利益。对其原因的解释必须从不那么明显的社会及心理方面去寻找。这类反城市倾向并未因城市化在国民生活中支配地位的确立而削弱；实际上可以找到刚好朝相反方向发展的明证。雷蒙德·威廉斯曾深刻地评论说：“在20世纪生产性乡村经济的重要性和乡村观念的文化重要性之间，几乎是一种反比例关系。”[23]

强调日益增长的乡村文化的重要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情势。19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提供了这样一幅引人注目的图景，即一个无限强大富有的

第三节 “我们的英格兰是一座花园”

就像新的上流集团采纳了过去的许多排场一样，它也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农村外表。E. J. 霍布斯鲍姆指出，就在经济丧失其活力的年代，关于“英国人实质上是茅屋人或乡绅的广为流传的说法”[18]扎下了根子。如果说英格兰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它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乡村。看起来愈来<47>愈富有吸引力的传统实质上是乡村传统，而且大部分纯粹是在乡村幸存下来。如迪奇菲尔德1889年所指出：

> 在我国多数大城市里，古老的特征正在迅速消失；历史悠久的房屋被推倒作为更适应现代需要的建筑基地，一切都在现代化；但在乡村，一切依旧，因此，不难使一个人的想象遨游于过去。[19]

把乡村理想化，这在英国有漫长的历史。直到19世纪，英国仍然是一种乡村文明，其统治者以乡村地产为自己的基础。城镇在英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比较小，仅伦敦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都铎王朝时期，来访的意大利人对在首都以外缺乏他们所熟悉的城市型生活留下了深刻印象。[20]在英国上层阶级比较开放的条件下，这种乡村的主导地位是有自我维持力的。自中世纪以来，乡村对有成就的市民的吸引力是强烈而稳定的：对一个发财致富的商人来说，渴望获取一份乡村地产，是一种通常而又切实可行的愿望。一旦掌握了地产，过一个时期他们的家庭就会与地方乡绅联姻。

的工具，英国人却没有明显类似于巴黎人或德国人的情况。英格兰的乡村在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精神经济”中起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和较小的分裂作用。

✦ ✦ ✦

在19世纪，城镇里乡村幻想的社会位置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工人阶级中最常见的态度最近在乡村消失了，却在中产阶级中日益显露出来。当工人阶级适应他们的新生活时，乡村神话正在另觅新听众。小说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于1906年写道，他看到“回到土地上去”的新兴趣主要限于“比较富裕的人中。城里的穷人和工人阶级从未真正回去。五百分之一的人或许受到‘好工作’的吸引，但也许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无论怎样不自觉地）去寻求一种乡村精神。”[30]是比较富裕的人组成了郊区化和“郊外化”的先驱。一种文学提供了排遣现代生活所造成之精神紧张的方法，那些比较富裕的人也形成了愿意对这种文学作出响应的新读者群。[31]

“乡村作品”有悠久而不同的渊源，浪漫作家使它得到很大发展。在维多利亚中期的桂冠诗人丁尼生的手中，乡村作品作为城市居民暂避现实的一种恰当形式和作为重新界定“英国特点”的方式而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丁尼生称为《英格兰田园诗》（*English Idylls*）的诗篇，回忆起无变化的乡村迷人景色，沉浸在传奇故事和历史之中，是他的读者最喜爱读的诗篇之一。

从丁尼生起，乡村作品的吸引力不断加强，直至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1902年前《每日新闻》（*Daily News*）用下列正成为陈词滥调的词句欢呼奥斯汀的书《古代安宁常在的地方》（书名取自丁尼生的一句诗）：“在它的魅力影响下，我们一时失去了似乎曾无所不在的城市文明，并与作者一起高兴地飞向……我们牢狱以外的绿色小径和田野。”[32]诗人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承认，“乡村文学”迅速发展的市场是在城 <50>

市居民中，他们寻求对周围生活的排遣，即或仅仅只在想象之中。他评论说，“城市成了我们的替罪羊”[33]。这同样也适用于许多乡村文学的作者。乔治时期的诗人爱德华·尚克斯（Edward Shanks）后来回忆说，他的同伴是些“主要生活在大城市而又不喜欢它的人”[34]。

就像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所注意到的那样，“怀乡病的深沉气质”贯穿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艺术和情感。[35]文学史家一致认为，在19世纪最后一些年里，乡村题材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在数量和流行度上都有明显增长。[36]乡村著作的新潮，通常声称揭示了“真正的”英格兰。一种流行的英格兰文学形象形成了，它赋予乡村一个中心地位。但也并非对所有英国乡村都给予同等的地位：通常认为真正典型的英格兰存在于南部历史悠久的、令人怡然自得的田园风光中。如约翰·戴维森（John Davidson）的诗《罗姆尼的沼泽》（“Romney Marsh”）（它成了诗歌选集的最爱）开始时所吟颂的那样：

> 我听见南方的歌声在大地上回响，
> 我看见黄色的霞光落在
> 　　那矗立着诺曼教堂的山岗。[37]

有适应政治倾向的各种田园风尚。最常见的是，英格兰乡村中上阶级居民的生活得到最大的注意。特别是乡绅，人们喜欢把他们描绘为乡村生活的中心人物。事实上，他们不仅是乡村生活的中心人物，还是英国生活的中心人物：他们的阶级在所有其他阶级之上，是使英国具有特点的阶级。[38]就像乡绅被看做乡村和国民生活中人的焦点一样，他们的庄园宅第也被描绘为物的焦点及“最令人愉快的居住地”[39]。像《乡村生活》上一周又一周地看到的房屋那样，20世纪的通俗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地描绘的乡村宅第“协调，高雅，墙上覆盖着蔓生植物，周围是整修过的草地，并沐浴在四季的阳光之下。”[40]

乡村神话的另一种形式是那些较多民主倾向的人可以利用的：农民取

代了乡绅，可以把古时的农民理想化；代替了乡村宅第的是农村社区及农舍。虽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很现实地意识到工人阶级正日益彻底地城市化，但他还是把英国的特点追溯到乡村。而且对霍奇（Hodge）来说，在乡村范围内“（英格兰）真正的心脏是农舍”。查尔斯·马斯特曼（Charles <51> Masterman）1904 年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声称：“古老英格兰的生活是乡村生活。”希莱尔·贝洛克①1913 年说：“英格兰农村是英格兰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传统的农村社区被看成是英国社会所由建立起来的细胞，在其衰落过程中仍然是国民生活的“动轮”。[41] 在维多利亚晚期，这种流行的乡村风尚是封建回潮的一个小小衬托物，但 1900 年以后，由于民主使得乡绅阶级的浪漫精神不再那么站得住脚，对乡村的理想化盛行起来。

① Hilaire Belloc，1870—1953，英国作家，1906—1910 年在议会任职。——译注

第四节　乡村在沉睡中

对城市和乡村的态度，经常是了解对其他许多事情的看法的一把钥匙。在美国，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莫顿和露西亚·怀特(Morton and Lucia White)、利奥·马克思(Leo Marx)、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及唐纳德·弗莱明(Donald Fleming)，都曾说明这种态度是如何反映一般价值观的。[42] 在英格兰也是这样：阿萨·布里格斯评论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关于城市的话，"说明了他们对别的许多事情的想法和感觉"[43]。城市经常作为现代事物的象征，并因这一联系而引起赞扬和责备。[44] 乡村也是作为一种象征，虽然其新献身者所发现的东西与其过去的统治者所看重的东西是不完全一样的。英国乡村已不再是第一次资本主义革命时的景象；甚至约翰牛的旧象征——倔强、粗犷、善于决断——现在听起来也太刺耳了，因此都已磨去棱角，缓和下来。乡村幻景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稳定、宁静，强调爱德华·托马斯在一首诗中带着忧思情调所表达的一种存在状态："我们大家都处于变化范围之外。"[45] 恰如城市体现着变化一样，乡村似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从时代运动的暴虐下解脱出来的去处。小说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1906 年写道，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像在英格兰这样多地

> 发现古代安宁之地的精神；你在西方世界的任何地方也找不到那样诱使你躺下沉思冥想的草地、那样温柔的阳光、那样浓密的绿荫或叫声那样平静的乌鸦。你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像英国

> 玫瑰园中那样令人联想到古老而持久的舞台场面，这种玫瑰园如果不在大教堂圈内，四周就会筑有围墙，并铺有石板路。[46]

就像一个社会主义好斗分子所说，一个人可以仰卧在乡村，置身于“英格兰永恒美景”的氛围之中，而听凭“现代文明的流逝”。[47]

19 世纪末期的英格兰乡村，当然已经在发生变化，是现代社会的组成部分。然而人们几乎不是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去看待。相反，雷蒙德·威廉斯有另一种说法：“一个胜利的城市和工业经济…… 按其补救想象改造了乡村。”[48] 乡村应与现代生活决然不同，是一种心理平衡和避风港。

这种对能唤起想象力的休息地的需求，常被一种突变论① 把它与现代变化的事实调和起来：一种不变的乡村秩序只是到近来才受到来自外部的破坏力量的侵扰。因此，牧歌式的隐退还混杂着引起乡愁的哀歌。这种杂拌中的主要成分取自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著作。不管哈代的意图如何，其作品中的乡村方面从一开始就受到过分的注意。关于他的第一部小说《无望的补救》（*Desperate Remedies*，1871），哈代向他的出版商指出：“乡村特点和乡村景色在书中只有很少的分量，但令我吃惊的是，书评对这些却大肆鼓吹。”[49] 哈代最纯粹的“乡村”题材著作《远离尘嚣》（*From the Madding Crowd*，1879）成了他最流行的小说。[50]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对一个朋友说，虽然“这是一部不可思议的小说（我曾试图根据书名去理解它），但 [它] 包含某种美好的乡村生活”。在一篇副标题为“威塞克斯的历史学家”（许多当代批评所持有的名字）的长文中，巴里（J. M. Barrie）评价了哈代 1889 年的著作，并与其他读者和评论家一起劝他放弃把笔触扩大到伦敦“社会”的企图，仍然继续写他的乡村背景。[51]

<52>

“威塞克斯”在公众心目中被当成一处逃避当代生活的乡村避难所。

---

① catastrophism，宗教观念中认为太平盛世须经过一次大灾难后方能实现的理论。——译注

爱德华·莱特（Edward Wright）1904年指出："许多人对哈代手中的英国小说是否变成了编排很好的戏剧而不是以前那样的一系列情节，是无所谓的，他们很重视他的乡村题材小说的其他优点……他向他们揭示了乡村生活中真正梦寐以求的事物。"[52]这种反映看重乡村自身的生活，避免了哈代的控制。"威塞克斯"的各种团体、导游书籍和"朝圣活动"都说明了一种实质上是普遍崇拜的力量。哈代自己顺从了公众的愿望，修改了他的小说并加了一个新的前言，使他以前创作的"威塞克斯"在故事中变得更加突出，更容易被朝圣者寻找其位置。[53]

"威塞克斯"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的田园风光是与国家的过去相系的一部分。哈代的乡村人物踏上了历代祖先的足迹，形成一条追溯几个世纪的长链。他把乡下人看做与一个几乎消失了的时代相联系的最后一环——"在许多情况下，我国的农民是中世纪英格兰的唯一遗存者。"[54]乡村的隔离状态保持了过去时代的稳定文化，但随着现代流动性的到来，这种隔离状态即将结束。他指出，他还在孩提时代参加过的收割时节的晚餐，是"吟唱古代传统的最后场合，就在铁路延伸到多切斯特的时候，世代口头流传的民间小曲一受到引进的伦敦滑稽歌曲的打击就消亡了。"[55]
<53> 哈代对这些变化的态度，如现代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是矛盾的。[56]他承认生活的物质条件已经改善，他也深切地同情自己书中起而反对传统的裘德·福利那样的人物。然而他也像巴林－古尔德一样，为降临大地的"不安分精神"而感到悲伤。[57]

哈代著作中历史连续性与现代的不安定性之间的紧张状态，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一想到乡村老百姓的面孔本身就像他们居住的古建筑物一样，也许能证明古老英格兰的遗风犹存，就是一种安慰。同时，他们离乡进城引起了对国民特点即将衰落的担忧。此外，这种迁移是农业机械化发展刺激的结果，这使人回想起失掉人性的可怕形象——如像苔丝沦为新打谷机"红色暴君"的奴仆一样。这种复杂形象在巴林－古尔德这样的怀乡散文家的哀叹声中简单化了："唉！播种者、刈草者、收割者和打谷者都不见踪

影了。”[58] 这样，“威塞克斯”的崇拜者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威塞克斯”，并把它变成了英格兰本身的神话形象。

一位批评家断定，哈代的作品是伟大的，因为它是以珍惜这个发狂的现代世界中遗留下来的一切美好东西的两个阶级之一农民阶级（另一阶级是旧式贵族）为基础的。经过几个世纪的剥夺，农民学会了“藐视富人”。真正的贵族上升到了富人之上；这样两者都避免了受“现代对财富的渴求”的“传染”，并且因为这保留了挣钱的资产阶级放弃的“精神”。

> 资产阶级思虑明天，而且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他们谴责不道德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很费钱或者可能造成丑闻，他们像签订商业中的合同一样缔结婚约，他们的理想是受人尊重和物质生产的效益，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他们用这个星球上的泥土在自己身上裹上一层坚硬的外壳。[59]

这样，哈代错综复杂而又现实主义的小说就被简化成了对在重围之下一种有吸引力的没有时间性和非物质生活方式的单一的、重复的纪事。发生在哈代身上的事情是颇具代表性的：到 19 世纪末，空前多的乡村题材作品既充满了对田园生活的描写，又沉浸于对变化的忧虑之中。

田园风物和担忧的这种混杂，是维多利亚晚期最有名的乡村作家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1848—1887）著作的显著特点。像哈代是最有名的乡村题材小说家一样，杰弗里斯是最有名的乡村题材的非小说性散文作家。他创造的英格兰形象是如此令人感兴趣，以致在公众心目中出现了一个关于杰弗里斯自己的同样令人感兴趣的神话。他被看成是一个原型的乡下人，沉湎于“强调永恒农业模式的重要性”[60]。但他的生活是较为错综复杂的乡村生活和城镇生活的结合。他的祖父是一个伦敦的印刷业者，先迁居到威尔特郡北部的发展中城市斯文顿作磨坊主和面包商，而他父亲则忙于家务，甚至在他搬到城外的农舍居住后也是如此。理查德 1848 年出生在那里，但他四岁时被送到伦敦与一个姑姑住在一起。 <54>

他每年到农场度一个月的假期。他九岁时回到父母身边，并被送到斯文顿（那时正发展成为英格兰南部的大铁路中心）的小私立学校念书，在那里他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像哈代的多塞特郡一样，杰弗里斯的北威尔特郡和南格洛斯特郡似乎在表面上是古老英格兰本身——一块福斯特（E. M. Forster）狂热地歌颂为“英格兰力量联合起来”[61] 的土地。但到杰弗里斯成熟时，这片乡村正受到斯文顿迅速发展的影响。

杰弗里斯的背景很可能引起新近被乡村生活吸引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趣。他的著作标志着旧的乡村现状合理化和新出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田园风尚之间的一个分水岭。田园风尚受到市民在乡下感受到的古老而奇怪的文化及有机社会的诱惑。杰弗里斯是为城市读者而写作的。他最近的传记作家说：“在乡村题材作品中，人们第一次经常意识到将受到引导甚至被哄诱到乡村去的读者。”[62]

杰弗里斯描写乡村，也描写英格兰。他对乡村社会最充分的写照《霍奇和他的主人们》(*Hodge and His Masters*, 1880) 最初的标题是《英格兰的心脏》(*The Heart of England*)[63]。那里存在一个真正的英格兰；对杰弗里斯来说，乡村未堕落的生活对国家的健康（精神和身体）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他个人非常乐于接受变化，但他禁不住坚持生活内在的不变性。甚至在变化已经侵扰的地方，也未能及于核心。他在《霍奇和他的主人们》中指出：“这些现代发明、蒸汽机、电报，甚至印刷机，仅仅掠过农村生活的表面而已。一旦消除这些东西，一旦停止来自外部和周围世界的压力，要不了几年，大大小小的村庄就会回复到原来状态！”[64]

在这部小说中，杰弗里斯把一个典型的农村地区“弗利斯巴勒”（以富伦切斯特附近地区为基础）描绘为抒情诗般的社会和谐景色——心满意足的村民与自然处于和谐状态，并受到具有“真正慷慨精神”的当地地主的慈善条例的照顾。村庄的社区及乡绅的家长统治，可以一直追溯到没有时间记载的过去。杰弗里斯仿效哈代，喜欢查访教堂墓地和各种登记簿，以证实乡村生活的连续性。

<55>

弗利斯巴勒具有“固定不变的特点”，这首先便富有趣味。但现在这一切都受到威胁。杰弗里斯警告说：“经常竭力打乱村庄平衡的势力在起作用。”这种势力来自城市，即他的大部分读者的来源，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杰弗里斯担心“城里的一个党派”会被“积怨”驱使去反对地主。这些城里的激进派曾把劳工们煽动起来，结果“劳工对几乎乡村生活的每个方面都造成压力。这种压力尚不足以粉碎已确立的事物秩序，但却足以造成令人不愉快的紧张状态。如果任其发展，乡村生活的许多特出吸引力将被破坏。”杰弗里斯曾当做一个普遍受尊敬的元老介绍过的一个人，竟然是一个“受到周围人系统全面斥责的人”。[65]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农夫们在观念上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和“城市化”。他在写《霍奇和他的主人们》时指出，“真正的古老英格兰的农夫和雇主正在消失之中”[66]。弗利斯巴勒改变了它的外貌：它不是以准确报道描述的一个典型农村地区，而是变成了一种理想。不管是杰弗里斯还是他的仿效者，都没有使这两种形象完全重合起来。就像美国国内战争前“南方生活方式”的捍卫者一样，既把阿卡迪亚①标榜为现实，又要为受到围攻的制度辩解，这两者要共存是不容易的。

✦ ✦ ✦

一个本质上属乡村性质而且基本上停滞不变的英格兰的神话，不分政治态度，既吸引了保守党人和帝国主义者，又吸引了反帝国主义者、自由党人和激进派。帝国主义者和“爱国”的作家，很少把工业进步看做一种鼓舞人心的适当源泉。帝国主义者一想到英格兰，看到的就是充满乡村房舍和培养官员及绅士的公学的、有悠久历史的乡村。[67]保守党人从乡村

① 阿卡迪亚（Arcadia）意为乡村乐园，它是乡村自满自足的田园生活的理想地区，而被围攻的制度则是残酷的奴隶制种植园制，两者本质不同，故难以共存。——译注

静止不变的英格兰图景中获得快慰。这种图景与越来越多的社会骚乱和外国威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到 19 世纪末，一批自觉的托利党诗人出现了，他们以这种情调进行写作。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艾尔弗雷德·诺伊斯（Alfred Noyes）、亨利·纽博尔特（Henry Newbolt）和桂冠诗人艾尔弗雷德·奥斯汀都把同一个田园式的古老英格兰理想化了。奥斯汀的诗《回到英格兰时》（“On Returning to England”）在这批人中是很典型的，它描写的完全是乡村的灌木树篱、农舍和村庄房屋的尖顶等。[68]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位桂冠诗人于 1901 年从农村出发，去英格兰乡村寻找“古代安宁常在之地”。好像他在每个地方都能发现“乡村酒店、牧师住<56>宅、济贫院、诚实而又薪金不差的雇工、看起来令人愉快的农舍及善良而又满足的人们。”[69] 在农村，茅舍农和乡绅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偎依在历史和自然的轻柔怀抱之中。他要读者恢复信心，相信在将来也是这样。犹如他在几年以前所写的那样，“在我国海岸泛起的外来泡沫”将枉然地拍击，而坐落在乡村的真正英格兰会继续存在。村庄会继续响起“悦耳安宁的钟声”。所以他最后说：

> 让猎犬和号角在寒冬的树林和幽谷
>   奏起欢乐的歌曲，
>   尽管树枝光秃；
> 在和善领主的宅旁，
>   农夫吹着口哨，
>   艰难地赶牛扶犁。
> 当权者呀！高坐在每座山岗，
>   而在每个山谷受到爱戴；
> 高尚的意愿导致卑微的勇气，
>   古老的传统不会在这种故事中忘怀；
> 尽管嫉妒的愤怒和嘲骂声嘶力竭，

美好骄傲的英格兰呀，
骄傲美好的英格兰
依然挺立。[70]

这里过分的自信疏于谋略：乡村变化遭到否定，或更常见的是，用滔滔不绝的华美辞藻使其幻灭，这显然是十分重要的。正因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维多利亚晚期帝国主义的重大自卫成分或反动成分[71]，所以我们应当警惕在文学及“写实性”作品中为帝国主义旋律谱写的管弦乐曲中的这些音符。帝国主义扩张给人的希望是逃避国内不受欢迎的社会变革压力，并在海外重建“传统”的英格兰生活。人们经常对英格兰的乡村生活和海外属地的野外生活进行类比，它们都与现代城市的衰败生活形成鲜明对照。[72] 乡村生活是民族道德特点的保留地。乡村生活不能变化，否则英格兰本身将陷入致命的危险之中。

19 世纪末以后，帝国的烦恼促成了对民族特点的这一保留地的研究。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担心英格兰占支配地位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他从自己写的帝国小说和诗歌的海外背景转到研讨英格兰自己过去的乡村，以恢复信心。1902 年吉卜林购买了 17 世纪早期苏塞克斯的一幢庄园宅第，并在那里居住下来。他把这个地方看成是草原牧羊人、一个愉快的“原始农民阶级”和老式地主乡绅的英格兰。[73] 他写给一个美国朋友时说：“我们发现了英格兰……并搬进去居住下来。英格兰是一处绝妙的田园。这是我所到过的所有乡村中最好的地方。它由树木、绿色的田园、泥土和乡绅组成，而我也终于成了乡绅之一。”[74]

终于成了一个老式的英格兰乡绅以后，吉卜林完全倾倒于过去的精神。一位爱慕他的人于 1925 年指出：“在支持现代进步的表面后面”， <57>

他喜欢苏塞克斯人身上不变的、未被触动的一些东西。他拒绝在“贝特曼”安装电话，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苏塞克斯的中古风格，尽可能保持农场上的古老习惯和传统。因此，直到今天，“贝

特曼”的所有大门都是“沉重的上下开合门”，就像撒克逊时代的门一样……吉卜林先生特别喜欢烧柴的火炉……他在自己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客厅里，坐在敞开的烧柴大火炉旁，嘴里噙着烟斗，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已有数个世纪的时光都与该房间高屋顶中的雾气相融合而消失了。[75]

吉卜林文学中的苏塞克斯，使人联想起哈代的威塞克斯。但在哈代那里还模糊不清，而其他人也仅在思想上勾画出轮廓的东西，现在吉卜林那里已是清晰可见。吉卜林是他自己的理论家，他的苏塞克斯则是他自觉探寻民族特性的产物。导致某些人制造威塞克斯崇拜的那些愿望，也导致吉卜林去塑造对苏塞克斯的类似幻影。他从这些年开始写的是《苏塞克斯》（“Sussex”）和两部小说——《一所强加的住所》（“An Habitation Enforced”）和《我的儿媳》（“My Son's Wife”），具体表现这位四海为家的知识分子在古风犹存之英格兰的一部分找到了根。[76] 吉卜林自己在早已有人居住的英格兰土地上安居下来后，把他个人与英格兰过去的认同，在显然是为孩子们（但“对成年人也有意义”）[77] 写的两本书中介绍出来。《普克丘陵的精灵》（*Puck of Pook's Hill*, 1906）及其续集《酬金与小仙子》（*Rewards and Fairies*, 1910）是英国史中不同时期通常在苏塞克斯流传的彼此没有紧密联系的故事集，孩子和成人都非常爱读。它们的主题是讲英格兰和英格兰特点的起源。最后，它们的主人公是培植树篱的人老霍布登，他是在骨髓和精神中载有英格兰种族全部历史的农民。

他有三十代先辈长眠在教堂墓地。
还在“末日审判书”① 产生时，他们的名字已载入史册；
在法律称作富源的土地上，
他那个家族的爱恋、虔敬和勇武精神

① 1086 年英王威廉一世下令编制的全国土地调查清册。——译注

已下种、生根和开花结果。

吉卜林写《精灵》一书时，另一位主要的托利党诗人已着手从事非常类似的事情。亨利·纽博尔特（1862—1938）以“克利弗顿·查佩尔”的名字而广为人知，他转为创作有关英格兰的历史小说。《古老的乡村》（*The Old Country*）与《精灵》一书同年发表，也广为流行，该书计划写成一部“为两种东西寻找例证的小说，一是英格兰风光的魅力；其次是英格兰特点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多次对国家同样的困难和危险作出反应的方式的相似性。”[78] 布尔战争时期缓慢而令人屈辱的努力，耗尽了帝国丰盈的财富，而使像吉卜林、纽博尔特这样的人在怀乡的冥思中，从帝国动乱的边疆回到了宁静的英格兰乡村。

<58>

然而，受英格兰乡村不变性吸引的，绝不局限于帝国主义者或托利党人。例如，社会批判小说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在英格兰乡村找到了他对现代生活中一切令人担心和憎恶的东西的消解剂。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屡次把城里的实利主义与乡村对精神生活的专注对照起来。他的主人公们或迟或早都试图躲避到乡村去，有时取得成功，如像《庶民》（*Demos*，1886）中的主人公，有时遭到失败，如像《阴曹地府》（*The Nether World*，1889）中的主人公。他的最后一部、也是最流行的一部书，是一种愿望的实现：《亨利·赖克罗夫特的私人文件》（*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1903），记录一个作家退隐乡村茅舍及其对现代生活的沉思。他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科学和赚钱的世纪是否已明显地影响到国民特性呢？”为放心起见，他的目光转向乡村。他问自己，“什么是英格兰最值得注意的事呢？”“是那些米德兰或西部的村庄，它们远离铁路车站，且在外貌上仍未被当时更恶劣的倾向所触动。”这样的村庄是英格兰的最大成就和最宝贵的财富。在那里，英格兰仍是一个真实的村庄。吉辛的自传性人物赖克罗夫特得出结论说：“我脑子里的最后一个想法，我临死时的强烈愿望是，希望阳光永远照耀英格兰草地。”[79]

把乡村当做风云变幻的避风港，这种对乡村的幻想，经常出现在 19 和 20 世纪左翼观点的表述中。在革新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中，乡村神话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适应式"和乌托邦式。第一种形式在于削弱名义上由演讲人提出的激进主义：例如约翰·戴维森（John Davidson）可以在《一周三十先令》（"Thirty Bob a Week"）中深情地描写穷人的苦难，他可以写另一部社会现实主义的诗歌《圣乔治日》（"St. George's Day"），并在其中宣称"不再抑郁，让我们歌唱英格兰春天的赞美诗"，而随后便"在婉转的鸟鸣声中……淹没了他的社会现实主义"[80]。这样，"歌声缭绕"的南方乡村可以避开社会批判的锋芒，并缓和潜在的政治冲突。这种缓和的、爱国的怀乡风尚，对占压倒多数的城市选民的政治吸引力，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被斯坦利·鲍德温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加以利用。

有时静止不变的乡村神话支撑了一种狂热的、乌托邦式的激进主义。吉卜林的现实（"我们的英格兰是一座花园"）是威廉·莫里斯的希望（再 <59> 成为"北欧美好的绿色园地"）。一种牧歌般宁静的理想，可用来反对可憎的现代。这样一种理想可以产生于现在或将来，或者既产生于过去，也产生于将来。两个相关的信息可以转达：第一，现代社会代表了从早期半伊甸园状态的没落；第二，未来美好社会将避开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事物的压力——单纯将代替复杂；同大自然协调，而不是离异；合作将代替竞争；而宁静、安适和稳定将代替纷扰和永无休止的变化。如像普卢姆（J. H. Plumb）所理解的那样，自从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猛烈抨击圈地运动和城市化以来，"梦想天堂般的（乡村）英格兰……就困扰着英格兰的激进主义"[81]。乌托邦式的田园传统在威廉·莫里斯身上找到了它的最主要的预言家。莫里斯是英国左派造就出来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莫里斯既是期待新社会诞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又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种寻求复兴传统的英国乡村生活方式的怀旧浪漫主义者。他把对革命的热情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而乡村则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必要场所。他那典型的乌托邦《乌有乡消息》（*Mews from Nowhere*），意味深长地用了

一个副标题“安息的时代”(Epoch of Rest)。在这个乌托邦里，维多利亚晚期英格兰“忙碌而又不满足的人”与将来革命后田园世界的轻松、平静的居民并存。[82] 他的乌托邦是一个没有城市和没有变化的世界。莫里斯相信革命——一个发生激进变革的短暂而可辨的时间——是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搅扰他的无休无止的、令人不安的变革。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但当我们重视逃避变化这种愿望的力量，以及“安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对中产阶级中那么多人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时，不管他们声称信奉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就不再自相矛盾了。

反保守派和反帝国主义者也在争取古老的乡村英格兰遗产的所有权。在爱德华时期以前，许多自由党和激进派争论说，事实上帝国主义出卖了“真正”的英格兰。如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所说，布尔战争提供了“两种文明相冲突”——一种没有国界的工业社会与传统的、乡村“民俗”社会相冲突的景象。[83] 哪一种社会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古老的英格兰呢？

布尔战争刚结束不久，年轻的文学和社会批评家马斯特曼(C. F. G. Masterman，1873—1927，1906 年起为自由党议员，1914 年任阿斯奎斯内阁成员)便抱怨，帝国主义的文学“忽视和轻视了旧时对古老英格兰、银色海洋上的小小群岛的虔敬”。伟大变成与庞大相提并论。作为一种鲜明的对照，马斯特曼看到一种新文学的出现，它是反对帝国、而又不超越国界的文学，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学。他说，这种发展开始于 90 年代，但在帝国主义的全盛期，其代表人物如诗人威廉·沃森和叶芝(W. B. Yeats)，仅仅是荒野中的一些声音。这种平衡状态因南非战争而发生了变化。马斯特曼看到其他作家现在附和了这一新精神，他们是内文森(H. W. Nevinson)、切斯特顿和贝洛克。马斯特曼把这种新文学看做是一种路标，预见到未来时代精神的性质：“它将始终表明对英格兰和英国人民福祉的特别关注；对其古老历史、古老传统、形容其灰色天空和岩石海岸的语言本身的骄傲”；它将是民主的；而且它将是社会的、关注于恢复英国社会的道德和物质健康，这种社会健康被 19 世纪新出现的涣散剂——都市生活、

<60>

工业主义和世界主义——给破坏了。[84]

这种关于英格兰的复杂态度，由马斯特曼等人在一部论丛中提了出来，这部论丛于 1904 年以《英格兰：一个国家》(*England: A Nation*) 为题出版。它由卢西恩·奥尔德肖 (Lucien Oldershaw) 主编，副标题是《爱国者俱乐部论文集》(*The Papers of the Patriots' Club*,"爱国者俱乐部"系布尔战争时期形成的一个集团)。[85] 该书撰稿人除马斯特曼以外，还包括其他许多重要的青年自由党人：G. K. 切斯特顿、恩索尔 (R. C. K. Ensor)、内文森、哈蒙德 (J. L. Hammond) 和雷金纳德·布雷 (Reginald Bray)。他们联合提出"爱国主义"作为取代帝国主义的真正自由民主的选择。切斯特顿问道："今天还有谁有理由怀疑，导致我们最近在南非政治中犯错误的刚好是我们的帝国主义，而不是我们的民族主义呢？——恰好不是我们自古以来对英格兰的兴趣，而是我们在别的任何地方的相当摩登、相当琐屑的兴趣呢？"[86]

《英格兰：一个国家》的撰稿人和其他具有类似倾向的人在战前年代企图详细说明他们所效忠的"小英格兰"的特点。英格兰有古老的历史，专注国内事务，并以乡村为特色。奥尔德肖卷首页呈现了乔治·巴特拉姆 (George Bartram) 的一首诗，诗曰：

> 古老的英格兰呀，
> 牧歌美景的庄严守护者，
> 绿野殿堂的仁厚美侍卫，
> 身披乡野金辉的优雅女神，
> 啊，作为你的子孙，不胜荣光。
>
> 牧歌迷醉飞魂，却是悄然飘散，
> 郎君卑劣负情，原系孔方铜臭。
> 见你更显崇高，断然超越他们——

英国人，虽是如此称唤，
心灵与形体，终究两离散。

绿色英格兰，请留下，
有农夫的刚毅充实你的身躯，
有坚韧的豪气为你播种天下，
永远做你激情的赞美者，
歌颂无边的绿色林野，微风吹拂的草地！

正如吉卜林和纽博尔特发现的那样，英格兰可以在各郡深切地感觉到。历史学家恩索尔解释道："在人口稠密的乡村，各阶级世世代代生活在及可以生活在安宁之中，这些乡村的人类财富，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成就，我国其他伟大事物的源泉、存在条件和基础，在'虽已坍塌的宏伟建筑'的废墟上，我们仍能发现即使不是名噪一时，至少也是我们最理所当然的声誉。"[87] <61>

就像这些新自由党人之一弗雷德里克·肖（Frederick Shaw）后来所强调的那样，英格兰天生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而不是一个地域的特征。我们建立了一个比多数国家强大的资本主义及一个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广阔的帝国，这一事实至少该归因于我们的岛国地位，同样也归因于特别的民族本能。"他发现一种真正的民族本能在于"热爱旷野及其所包含的一切，这要比我们的一切工业和广大的帝国古老得多。"[88]

古老的乡村生活是英格兰的实际基础，爱德华时期的另一个自由主义者乔治·斯泰特（George Sturt，1863—1927）对其作了最好的研究。斯泰特关于乡村生活的书《村庄的变化》（*Change in the Village*，1912）和《车匠铺》（*The Wheelwright's Shop*，1923），由于利维斯（F. R. Leavis）的赞扬，而在后来重新流传开来。斯泰特鄙弃现代生活的许多方面；他1911

年给一位朋友写信解释说："我不喜欢现在的英格兰，即工业化和过度资本化的英格兰，这里生存斗争非常悲惨，而成就则意味着汽车和目空一切。"[89] 斯泰特继承了萨里郡范汉的一家车轮修造铺后，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自己着手去记载"英格兰乡村土生土长的文明"，这种文明似乎正在他眼前消逝。就像其他爱德华时代的人一样，他也在探索英格兰。斯泰特在听他的园艺工（另一个霍奇或霍布登）谈话时，感觉到"在他（园艺工）平静的声音中，我有幸听到自然的、流畅的、下意识的谈话，好像它从乡村的表面、从英格兰民族的面上掠过。"[90] 英格兰的这些声音向他展示出一个有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稳定的价值观，并与大自然亲切相处。虽然同许多描写英格兰古老乡村生活的作家比较起来，斯泰特还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知道传统的乡村生活远非那么美妙，但当他把现在同对过去的想象比较起来时，对现在评价极低，他把变化看做是人类方面的损失。

自由党的小说家福斯特的感觉也大体相同。对他来说，帝国主义者是"破坏者"。他为世界大同主义扫清了道路，尽管他的野心可能会实现，"但他继承下来的地球将会暗淡起来"。福斯特在自己的小说《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1910）中，庆祝了其核心在乡村的小英格兰。霍华德庄园古老的乡村房屋，表现了英格兰的历史连续性，但它受到"随着商业 <62> 时代而来的高级部门内部黑暗的威胁"。威尔科克斯这个帝国主义商业家族就是商业时代的体现。主人公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在参观该房屋时深受感动："这里曾居住过一个较古老的家族，我们不安地回顾起它。我们在周末参观的这个乡村真正是它的一个家……在这些英格兰农场里，你如果在什么地方看到生活稳定不变，那么你就看到了它的全部。"[91]

甚至情绪高昂的劳伦斯（D. H. Lawrence），也感受到神话的牵动：他1915年写信给一位朋友，谈到莫雷尔的乡下宅第加辛顿庄园："你在这里痛切地感到真正的英格兰——这所古老的宅第，这个乡村……它本身是如此美好，你会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并在那里停留下来，倒退到其过去

事物的宁静美之中，在纯粹的回忆中度日，回首完美的过去。但你的灵魂不从。”[92]

其他人也极少能顶住这种诱惑。甚至像《跨大西洋评论》(*Transatlantic Review*) 编辑福特·马多克斯·福特那样一个世界主义的作家，就像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也抗不住要认同和重视可在过去和乡村中找到的英格兰的本质精神。在其探索当代英格兰特点的三卷本著作之一部分《国家的心脏》(*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1906) 中，福特很像那时斯泰特所作的那样，令人怀念地把旧农民意识与排除它的城市工商业意识相对照。

亨利·纽博尔特的一个乡下邻居朋友莫里斯·休利特 (Maurice Hewlett, 1861—1923) 因其历史小说而引起极大关注，其中最有名的是《森林爱恋者》(*The Forest Lovers*, 1898)。休利特也把他的著作看做是对英格兰内涵的一种探索，他在农民生活的传统中找到了这种内涵。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以《犁之歌》(*Song of the Plow*, 1916)（他称为“英格兰编年史”）为题的叙事诗有一个主人公霍奇，是一个典型的英格兰人，他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流传了几个世纪。休利特对英国史的观点很接近于切斯特顿：反重商主义，也反贵族，“激进而又偏爱乡村习俗，平等而又保守”[93]。

与休利特的看法相似的有马什 (Edward Marsh) 编的诗歌选集《乔治时代的诗》(*Georgian Poetry*) 中所呈现的诗人，这本诗选对新诗来说销量非同寻常，共售出一万到两万册之间，这还不是最终印数。这些乔治时代的人一般都是政治上的左翼，实际上大部分是社会主义者。[94] 他们的左翼观点对物质进步不太支持。鲁珀特·布鲁克 (Rupert Brooke) 1914 年对斐济的反应就很典型：他哀叹道，那些幸福的土著很快就会按西方人的面貌加以改造。一想到整个世界都正在变成“丹佛、伯明翰和斯图加特的复制品”[95]，该是多么令人沮丧啊！大部分乔治时代人的社会主义就像布鲁克对自己的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描述那样，是“一种威廉·莫里斯式”[96] 的社会主义。乔治时代诗人的标志是田园风格和对英格兰乡村的专注。但他们不是真正的自然风光诗人；他们在乡村发现了有重大价值的东西：一个 <63>

人或许可以在那里“躺下……直到几个世纪相互交融模糊”[97]。戴维·戴希斯（David Daiches）把他们大家全神贯注的事，说成是“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上寻求确定无疑的事情，他们都相信，确定应从过去抢救出来，而不是在将来再产生”。布鲁克有一首题为“古老的牧师住宅格兰切斯特”的诗被戴希斯称作“乔治时代诗人的座右铭”[98]，在这首诗的最后几行，对上述共有的看法做了这样的总结：

> 唉！还可以找到美妙景色吗？
> 还有确定无疑、宁静安适的东西吗？
> 是否还有辽阔的草地
> 　　可以使你忘却谎言、真理和痛苦？
> 啊！教堂的大钟是否还停在两点五十分？
> 是否还有蜜糖可以冲茶？

布鲁克提的问题是：“英格兰是否还停留在原地”？乔治时代的人回答说“是”，假如你离开城市和郊区到尚未发生变化的腹地去的话。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集中在乡村之上的怀旧幻觉和乌托邦式的梦想，已融合到文学之中，甚至超出文学范围，还融合到中产阶级的文化之中。战争恐怖使这种乡村神话产生了空前的吸引力。如一位作家于1915年指出：“英格兰的灵魂不应当在城里去寻找，而应到乡村去寻找。”[99]战争期间，人人书库的编辑欧内斯特·里斯（Ernest Rhys）应基督教青年会的请求，把有关英格兰的文集以《古老的国度》（*The Old Country*）为题出版，供战士们读用。在基督教青年会广为散发的这部书中，就像战前的诗歌一样，从对“家园”的精选写照中汲取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为这场冲突提供人力和物资的城市和工业的英格兰几乎没有被注意到；在它的位置上唤起了艾尔弗雷德·奥斯汀和鲁珀特·布鲁克的英格兰——卢卡斯（E. V. Lucas）诗集（*O England*）的同名诗感伤地说：“啊，英格兰，我心中向往的乡村，散布着树篱和村庄尖顶的土地。”基督教青年会的阿瑟·亚普

爵士（Sir Arthur Yapp）在介绍那些在法国的普通战士时说："他在想象中可以看到自己农村的家园。"[100] 当然，伦敦东区、利兹、伍尔弗汉普顿及其类似地方更是这些战士共有的"家园"，但在亚普对英格兰的想象中没有它们的地位，虽然他的组织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这些地方做的。逃避现实的情调有时是很明显的。爱德华·赫顿（Edward Hutton）在这本文集中写道："在我心中的英格兰里，没有侵扰、毁坏和糟蹋其他土地的工业城市。"[101] 一首非常类似的诗刚好出现在《乔治时代的诗歌》第二集上。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James Elroy Flecker）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在《临终的爱国者》（"The Dying Patriot"）中写到一位战士，他在临死时回想起纯粹田园风光的、有悠久历史的英格兰。[102] 大钟时针停在午茶时分的格兰切斯特，比起永不安宁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来，似乎更是地道的英格兰。 <64>

第五节　建筑：神话变成了现实

19 世纪下半叶，精英文化的保守运动也扩及到建筑观念和建筑成果上。从哥特式建筑的复兴，经过旧式英格兰风格的传播及保护旧建筑之风的同时兴起，建筑学家们赋予了变化着的文化价值观以物质形态。

哥特式建筑的复兴已奠定基础。皮金和其他复兴哥特式建筑之父们是偏激的托利党人，而他们的运动则是敌视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他们求助于中世纪而拒绝 19 世纪的现代社会。这是旧上流集团对新势力和新人的文化反攻。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女婿、教堂建筑学会主席和复兴哥特式建筑的主要赞助人亚历山大·贝雷斯福德－霍普（Alexander Beresford-Hope），梦想让教堂建筑高耸于傲慢而新教化的“商人统治”[103] 之上。复兴取得了成功，哥特式建筑成了维多利亚极盛时期最典型的建筑风格。但它的胜利并不针对新的“商人统治”，而是与其合作，如像曼彻斯特市政厅和布拉德福德羊毛交易所这样的建筑所展示的那样。这种胜利绝不是彻底的：人们通常放弃纯粹的哥特风格而采用更为适应“当代”需要的改进型。[104] 然而中产阶级在 19 世纪 50 年代接受哥特式建筑，标志着一个分水岭——工业革命的新文化达到顶点及其新人开始屈服于旧贵族的文化统治。对于一个最新、最敏感的解释者来说，维多利亚极盛时期的设计，揭示了这样一种分水岭之后立即可以看到的两重性——“经常同时是物质上的乐观主义和精神上不安的表现”[105]。它展示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这种平衡在 60 和 70 年代就开始倾斜。

那时新的一代建筑师开始重新发现英格兰乡村，并与乡村、与英格兰的过去结合起来。激发他们这样做的（如马克·吉罗德所指出）是不满："对现在的厌恶把他们引向了过去；对城市的厌恶把他们引向了乡村。他们重建过去这种工业化前曾经是朴实无华和田园牧歌式的简朴理想世界，作为现代的解毒剂。'古雅'和'老式'之类形容词向他们集中表现了这一世界，因而他们以……热烈赞同的态度加以使用。"[106]19世纪下半叶，有许多密切相关的建筑倾向和风格繁荣起来——"古老英格兰式"、"安妮女王式"、"乡土风格的复活"——所有这些从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建筑发展而来，全都表现着哥特式建筑复兴所开始的工业文化内涵的连续性和强化。但如果它们是哥特风格的延伸，那为什么认为是必要的呢？为什么不简单地坚持皮金所曾见到过的那种非工业时代、非资本主义风格的哥特式建筑呢？直到60年代前，哥特式建筑对年青一代建筑师和唯美主义者来说，已显露出几种弊端。一是它过分强烈的宗教色彩；二是它在成为现代乡土风格方面太顺利了，以致在这一过程中变成了彻底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建筑，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这一代人正在寻求前工业化的和"民族的"风格，但要与日益世俗化的观点相协调；哥特式建筑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也在寻求一种未被城市工业资本主义败坏的风格，一种能表现其他价值的风格。哥特式建筑在这方面曾经是很杰出的，但现在在"每一个角落他们都能看到哥特式商业、哥特式仓库，甚至哥特式客栈"。哥特式建筑在曼彻斯特和布拉德福德这样的城市与工业主义一起繁荣起来。商用哥特式建筑似乎同化了当代社会中他们所厌恶的一切。[107]例如莫里斯一开始是一个热情的哥特式建筑崇拜者，但渐渐失去了对在堕落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复活中世纪风格的希望。哥特风格正变成纯粹另一种商品，变成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现实而粉饰门面。风格无补于实质：他后来对格拉斯哥的一些社会主义者说："我怀疑你们古老的凯尔特风格，能否适用于股份公司搜刮金钱的愉快环境。"[108]

<65>

莫里斯时代的一代建筑师所寻求的东西，在中世纪晚期和汉诺威朝之

间英格兰家用建筑风格的适应性变化中找到了，特别像在乡村所见到的那样。它们的样式变成了乡村农场房屋或农舍。新风格的实质是一种全国性的自我偏见［如费班克（P. N. Furbank）所说，安妮女王时代的变化“首先是…… 英国特点的理想化”[109]］及一种推广开来的历史风格和乡村特点，其目的在于传达对古老乡村英格兰的感受，而不是坚持任何特别的、始终一贯的风格。这是托马斯·哈代和理查德·杰弗里斯的建筑风格，是田园风光和怀旧的建筑风格。如像吉罗德所描述的那样，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整个英格兰乡村传统开始显得日渐宝贵并受到威胁，而且可以看到这一传统不仅包括中世纪的教堂和谷仓，也包括 16、17 世纪的农场房屋、乡间城镇市场和背街乔治时代晚期的红砖房，简而言之，包括整个英格兰的乡土传统。”

新的建筑运动是随着理查德·诺曼·肖（Richard Norman Shaw，1831—1912）的房屋“雷依斯·伍兹（Reys Woods）”一起出现的，它建成于 1868 <66> 年，供拥有一条航运线的董事长用。肖 1870 年在皇家学院展示出这所房屋的一幅草图时，引起了一阵轰动。“雷依斯·伍兹”立即被看成“典雅”建筑，如吉罗德所指出：“那些寻求一个安静的角落以改变环境的城市商人，和那些急于掩饰他们的学苑收入的走红艺术家，突然明白过来：典雅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110] 在“英格兰风格”的外衣下，这种设计容纳了各个时期和各种类型的因素。而且该计划从整体来看既新颖又非常具有吸引力。古英格兰风格被画进了图纸；而且古英格兰风格并不意味着模仿一种格式，而是创造一种气氛。

这种气氛是田园式的，富有历史感而又朴实无华——“温暖舒适”、小巧玲珑、简单平凡，能唤起对民间生活的怀念。赶时髦，现在即意味着看起来要尽可能古老；不仅仅是古式，而且是逐渐的、不规则的老式。甚至在贵族中间也是这样，虽然在他们那里“谦卑”并没有吸引力。保罗·汤普森指出，农业萧条后为地主建造的（为数不多的）新房屋，“不用像维多利亚中期他们祖先的房屋那样炫耀其新奇。它们经过精心设计，形状不

规则，使新房子看起来尽可能显得古老”。土地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乡村宅第形状主要被看成是名门世家的象征，而不是经济实力的表现。“所以旧墙比新墙更时髦。”[111] 现在乡村宅第力求与风景融合，而不是驾驭风景 [这在沃伊奇（C. F. A. Voysey，1857—1941）影响很大的设计中表现得很清楚，特别是 1898 年建造的布罗德利的宅第和 1900 年为他自己建造的奥查德这样的房屋更是如此]。[112] 硕大的规模和宏伟的外表被当做外国的东西加以避免：新建筑风格的开创人之一沃林顿・泰勒（Warrington Taylor），坚持要“一切都是英国的，除了经营证券批发的伦敦和棉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外，基本上是小巧的、富有诗意的简朴农舍性质的。”[113] 郊区小屋竭力模仿上流阶级口味的这一变化，仿效着农场房屋及约曼农的茅舍。新计划的花园式郊区（从贝德福德公园到汉普斯特德及更远的地方）、小旅馆房地产（如伦敦的比肯特里）及私人投机的都市郊区，都反映着稀奇古老的乡村特点这一理想。像雷蒙德・昂文（Raymond Unwin，1863—1940）和巴里・帕克（Barry Parker，1867—1947）这样的花园城市的先驱者们的理想，包括再度注意重视传统、对中世纪的怀念及对农村的热爱，农村是他们企图恢复的“自然”生活的象征。[114]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古老的英格兰风格脱离上流社会而成为一种大众风格，因为大规模的私人发展家以最低廉的形式接手过去，而“对都铎风格的仿效”及其“对寻根的渴求”，随着郊区的扩展而迅速增加起来。[115] 这种建筑时尚传播到了其他地方，最明显的是传到了美国，但在传播中失去了活力。它主宰住宅建筑的程度，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它的精神故乡英格兰。

在古英格兰风格兴起的同时，保护旧建筑运动也产生了。后一运动的许多领导人也是古老英格兰风格的倡导人，保护旧建筑的主张和古英格兰图样吸收了田园风格和怀旧价值观共同蕴藏的财富。两者都是明显的美学动态，但更是真实的历史建筑风格的重现，因为它们企图坚持或恢复早期英格兰的精神。由于古英格兰风格并不是一直确定的风格，而是讲求一种气氛的创造；因而，保护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对美的追求，而是对年代的根 <67>

本崇拜。

保护旧建筑的观点，在哥特运动本身范围以内开始形成。当新的哥特式建筑变得商业化，同时开始变得单调起来时，主张复兴哥特建筑的人开始担忧当代哥特建筑会改变旧式建筑。甚至修复派的老前辈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1811—1878），也开始警告不要过分地修复。1864 年他哀叹“一个粗野的建筑业者、一个工程办事员或者一个过分热情的教士”会变得昏头昏脑，并“瞎弄”古教堂的一切，最后使“整个事情从头到脚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人们会非常怀念未被触动的教堂。”斯科特论证说，修缮应当是以“一种尝试和渐进的方式；首先是更换完全风化的石头，且宁可摸索前进并尽量少动，不要采取任何鲁莽的方法。”斯科特承认自己的过错。“我不希望或指望使自己逃脱我应得的同类谴责。我们大家在这件事上都犯了过错。”该是“作出某种公开抗议的时候了”，并且他呼吁地方保护委员会起来防止进行过分的修复。[116]他的建议未被采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三年以后，正是他自己修复条克斯伯里修道院的计划引起强烈反应，导致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保护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则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主张。

威廉·莫里斯于 1877 年参观条克斯伯里以后，向伦敦文学艺术家俱乐部写了一封愤怒的信，呼吁成立一个联合会来反对这种对古物的践踏。他声称：“我们的古代建筑不是简单的教会玩物，而是国家的成长和希望的神圣纪念碑。”[117] 这封信导致成立“保护古建筑协会”，这是第一个保护古建筑压力集团。

莫里斯的呼吁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建筑师、艺术家、自由职业者和许多政治信念各异的贵族，都联合到保护古建筑协会的事业上来了。头几年莫里斯是该协会书记，以后仍然是该委员会的精神支柱，但该协会是完全超党派的。它的影响不断增大，在五年中每年有一百多起事件得到处理。而到 1889 年，该委员会能够满意地指出，有教养的公众对古迹修复的态度已发生变化。[118] 到 19 世纪末，社会上的官员们通常都能发现公众舆论

<68>

气候的变化。他们现在已经一帆风顺了。保护古建筑协会最后得到了全国性机构的地位。撒克里·特纳（Thackeray Turner）做了几十年书记，他于1920年退休时可以如此评说："我们现在实际上已没有反对派了。"[119]

保护古建筑协会成立以后，产生了其他一些保护古建筑的团体，有些是其直接的分支机构，不久以后颁布了保护古建筑的法律。保护古迹成了英国公众生活中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广泛的推动力。这种动向最初被看成是唯美主义的，特别是哥特式的；实际上，如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它的决定性标准很少是美的本身，而是古老性。用莫里斯的话来说，离现代相当远的"所有时代和风格"的建筑物，都是争取保护的对象。[120]该运动的精神教父约翰·罗斯金有一句名言，他说："一座建筑物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石头，也不在于它的黄金，而在于它的年代。"罗斯金像伯克那样尊崇历史的连续性，在地方上，作为该运动基础的保守冲动表现得明明白白。他在1856年承认："我的性情和本能是保守的，我喜欢古老的东西就是因为它们古老，而我讨厌新东西就是因为它们是新的。"对他来说，"我们是否要保存过去的建筑物，并非权宜之计或感情问题。我们没有任何权利碰它们。它们不是我们的。它们部分属于其建造者，而部分属于我们所有的后代。"[121]莫里斯把这些话重新登载在保护古建筑协会的创始宣言上，而这些话则成了激励无数保护主义者的源泉，不论他们各自政见如何。斯特普福德·布鲁克牧师（Reverend Stepford Brooke）1879年告诉保护古建筑协会说："我们最大的财产是这种对先人作品和精神的尊崇和关注感情。"[122]

最初，哥特式建筑受到偏爱，大部分保护力量都用于保护中世纪的、特别是哥特式的建筑物。罗斯金和莫里斯都狂热地歌颂哥特建筑，而轻视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或文艺复兴后的建筑风格。然而，甚至在早年，历史性常常压倒爱好，以后这种倾向更是日甚一日。保护古建筑协会表面上似乎热衷于哥特风格，但正如建筑学家罗伯特·克尔（Robert Kerr）1884年所指出：

> 经深入了解，这种印象未得到证实。因为它断然拒绝被当做是哥特式一种建筑风格，或者纯粹哥特建筑的代表。它的目标甚至不是艺术方面的，而是历史性的；是完全不加区别地保存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不管其是好或是坏，是旧还是新，把它们全部保存下来，以便旅行者的幻想不仅是有根有据的，而且讲述起来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即使当生命之光已经全然熄灭也罢，或许这种生命之光从未太明亮过。无需重复，这不是热衷于艺术，实际上也未必是热衷于考古，它之所以被认为是建筑学，仅仅因为建筑物对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尊崇形式来说是最直观的遗迹。[123]

<69>

由于兴趣发生了变化，最初同过去特种建筑风格的联系削弱了，而年代标准则变得空前明确。在保护古建筑协会之外成立了一个乔治时代建筑团体，并且从这个团体分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建筑协会，保护主义的情趣最终延续到爱德华时期。早期的保护主义者通常轻视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物，但当时间车轮转动一整圈以后，维多利亚时代保护主义者轻视的对象在他们后继者的眼里变得宝贵起来。兴趣的变化，或许更重要的是时间的推移，把历史性的魔力赋予了曾几何时的当代建筑物。甚至早期的保护主义者曾墨守陈规地加以嘲笑的铁路和工厂，当时光使它们丧失其功能时，也成为保护主义者热衷保护的对象。

保护主义兼有两种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态度，使该运动与维多利亚晚期文化和社会中更广阔的潮流联系起来。第一是丧失了对同时代人创造力的信心，并把过去置于现在之上；第二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实利主义”风气持极端批评的态度。激起保护主义者愤怒的许多活动，实际上并非是修复活动，而是现代化活动。这种活动几乎与所有早期建筑师的活动有关，后者深信自己的工作在于恢复以前已经消失的一切建筑方面的价值。罗伯特·麦克劳德（Robert Macleod）曾指出，是“保护主义者采取了崭新的看法，……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于历史上过去的一切时代，不能对建筑

发展史作出贡献。”[124] 保护古建筑协会因其深刻的文化消极主义，声称不可能把教堂当成“像建造它们的艺术还有活力并具进步性的时候那样有生命力、可以改变、扩大和改建的东西”。这些建筑现在仅仅是“文献，对其进行改变和更正，实际上是伪造，将毫无价值”[125]。

力主保护是与轻视现代的可能性携手并进的。如诺伍德（T. W. Norwood）在保护古建筑协会第一次会议上所说：“我们没有建筑风格，也很少有自己的建筑艺术，因此，一想到我们将因此而破坏我们祖先有独特生气和蓬勃发展着的艺术建造起来的无限宝贵的遗迹，真是令人不寒而栗。”[126] 对发展一种令人满意的新风格也不抱多大希望。如果保护主义者对修复工作惊骇不已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反对大胆的现代努力。莫里斯厌恶大部分预示 20 世纪建筑艺术的革新式建筑物。他 1851 年参观水晶宫时，坐了下来，并拒绝继续参观，他声称该建筑“出奇的难看”。他的 <70> 态度从未改变。三十年以后，他把现代工程学描绘为一种“可怕的、没完没了的梦魇”，而且他也不喜欢厚玻璃板的窗户，因为这种窗户采光太多。他在晚年把福斯湾桥连同其（在现代人眼里）强大壮观的结构说成是“一切丑陋之集大成者”[127]。莫里斯代表多数保护主义者，在他们的词汇中，“新”和“现代”成了“坏”的同义语。他们祖先文化上的最大雄心被放弃了；现代最好的愿望只能是不触动古建筑物，并且在建造新建筑物时尽可能地简单，尽可能不炫耀外表，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遗产的损毁。莫里斯周围的建筑师们认为谦卑是最大的美德，并转向本国缺少美学追求的古老建筑传统。菲利普·韦伯（Philip Webb）强调说：“在我的作品显得平平和和以前，我是不会满足的。”[128]

保护主义是一种职业的、高雅的活动，其气质反映了这一事实。因为它牵涉到私有财产权，所以是有争议的，并招致许多从政的保守党人的反对。[129] 然而它的激进态度从根本上说是托利党的，因为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历史连续性这一更高的利益而企图侵犯个人对财产的控制权。曾经创造过 1851 年伦敦大博览会的物质进步，似乎除了造成随之而来的不安、缺

乏修养及华而不实的实利主义以外，不会再产生更多的东西了。过去所代表的价值内容正在空虚起来。P. H. 迪奇菲尔德抱怨说，每天都看到先辈一个又一个的物质遗产在受到破坏。有时是一幢建筑物，有时是一处风景区，它们让位给了工厂、铁路或没有“纪念意义的”、“机械的”现代房屋，这就是“我们为商业、进步和追逐财富而支付的罚金”。[130]

几乎没有一次保护古建筑协会的会议没有鄙视“把金钱作为价值标志的时代”[131]和鄙视那些孜孜追求这样一种平庸标准的人。剑桥大学美术教授西德尼·科尔文（Sidney Colvin）让该学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古建筑物修复工作的粗陋化问题。他指出，修复者喜欢把他们做的事弄得光亮而新颖。

> 干的活儿愈是崭新，参加修复工作的全体人马就愈是高兴。这就像商人们对他们店铺橱窗前展示的新铜牌[大笑，说得对！说得对！]及其全部刻得清晰可见的字感到满意一样。而对我们来说，每一件崭新的项目都是……要求谢罪的罪过[说得对！说得对！]。[132]

不能把关心国家历史连续性的事托付给实业家。迪奇菲尔德谴责“近代文明的商业精神和功利主义”，他对那些通常选进市议会的人感到惋惜：

<71>

> 他们无疑是可敬的人和能干的商人，他们能够料理和管理城市的财政事务，照料其煤气和水的供应，照料其排水和电车轨道；但他们全然不知其历史，不知其社团，不知其建筑美，对任何非现代、非实用的东西都一无所知。不幸的是，保护历史性建筑和无价之宝的事常常都交给了这样一些人。[133]

物质繁荣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议员、托利党乡绅斯坦利·莱顿（Stanley Leighton）说：“是国家的财富而不是贫困”使人们得以毁坏旧建筑而代

之以索然无味的新建筑物。保护古建筑协会1809年指出了“造成损害和进行伪造的金钱力量，因缺少办法而未能加以破坏，现正日益发展和增长”[134]。

追溯到阿诺德和罗斯金的上层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是保护古建筑协会和保护主义的一般特征。无论其中坚来自左翼或右翼，它的攻击目标都是由工商业所主宰的那种低微的生活目的。杰出的自由党人布赖斯勋爵解释说，公众对古建筑的“尊崇感情在增长”，正是这种尊崇之情鼓励着他。他在代表该协会讲话时断言，这种情感“把人们从产生于单纯的物质繁荣与发财致富的那种世俗之中拯救出来。人并非仅靠面包而生活”，还需要那些“把现在同过去联系起来的一切微妙而强有力的纽带”。[135]

这种情感受到参加该运动的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一所公学校长勒克斯莫尔（H. E. Luxmoore）为保护主义提出了一种帝国主义者的理论基础：

> 人们知道，人类社会的较低形式只有简陋低下的效能和功用；但对一个降生于伟大历史的遗产并无愧于这种遗产的民族，则有更多的要求。他们的生活不限于为更多的物质需要而斗争，他们并非仅仅靠面包过活。[136]

社会主义的插图画家沃尔特·克兰（Walter Crane，1845—1915）动情地抱怨：

> 我们有些人似乎企图把英格兰变成另一个美国——他们老是计划在不需要铁路的地方修建铁路，砍断树木，夷平旧住宅，甚至用广告去玷污绿地。任何多余的干涉都是破坏这种平衡的垃圾。

商业化已经侵蚀了古老英格兰的许多东西，他声称：

> 如果没有商业旋风般的发展和时尚的风云变幻，我们也许还

很幸运。幸好它们还留下了一些未被扫荡的安静角落……不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祖先居住过的房子是什么样子。在那些充满旧时引起哀婉情调的可爱地方，每一件用木头、铁或铜制的东西，每一片褪色的壁挂，似乎都在默默地诉说着传奇故事，但英格兰还保留着多少这样可爱的地方呢？[137]

<72>

当需要建造某种新建筑时，大部分保护主义者所青睐的建筑风格，通常都是古英格兰建筑的某种变异。这样，变化就可适应旧的模式，从而尽可能减少破坏。南方的隐喻，像在无形王国取得胜利一样，在有形王国也取得了胜利。

第六节　南方隐喻的持久力

对旧时乡村生活的迷恋，无论它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渗透了整个中产阶级。很少有哪个胜利的阶级会更乐意地采纳它所取代的那个阶级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更缺乏自信去接受其遗产。福斯特在1939年说的一段话抓住了他那个阶级的真谛，他说，中产阶级在19世纪“绞杀了贵族”以后，在20世纪仍“受到其牺牲者幽灵的烦扰”：

> 中产阶级从未能为自己建造一种合适的住房，当它断言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的时候，便揭示了其失败的确切性质。从属于中产阶级的我们仍在模仿过去。城堡和大厦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得不住进半独立的城郊小屋，我们能够住得上的就是这样的房屋，但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保留一个商人的门厅吧……我们曾谴责封建堡垒不宜居住，但我们的思想仍渴望着这种封建堡垒。[138]

这种渴望的证据可以在乡村房屋日益流行方面找到。报纸上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愈来愈多地讨论到乡村居住的问题。[139]模仿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如果支付得起，就模仿乡绅的生活方式；如果支付不起，或者如果他的政见不容许他混同于上层地主阶级的话，就模仿农民的生活方式，只是抹去其粗陋的棱角罢了。假乡下人增加了。战前像吉

卜林和赖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那样的作家自己变成假乡绅，树立了一种模式，而像夏洛特·威尔逊太太（Mrs. Charlotte Wilson，她最初是费边分子，后来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的富裕激进分子也开始寓居乡村农舍。威尔逊太太是一位激进时尚潮流的开拓人：在她的坚持下，她的丈夫（一位股票经纪人）放弃了在伦敦的舒适房屋而买了一所农舍。另一位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在1885年造访他们的农舍后写道："这是一所迷人而颇具田园风光的小农庄"。

> 他们有两间屋子，一间书房，一间厨房。厨房是理想化的农庄厨房，当然没有用作做饭，而是配有一张带坐垫的靠背长椅，<73> 敞开的壁炉底，锃亮的柜橱和长凳，所有家用的玻璃和陶瓷器皿同雅致的盒、盘、窗帘、椅子和桌子交错地摆放着，营造出一种巧妙的错落有致、总体上令人愉快的效果。[140]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奥斯伯特·兰开斯特（Osbert Lancaster）所说的"文明农舍"[141]增多起来，因为舆论制造人开始竞相效法夏洛特·威尔逊太太回到乡村"古朴生活"去的做法。汽车使这种出走变得很容易，但出走是受到盲目接受南方隐喻的激励而造成的。

虽然退隐美丽如画的农村已成为时尚，但大规模人群从城市出走的情况当然还是没有的。这种出走主要是一个感情问题。描写那些通常可以在乡村找到的民族特性、传统和古代生活及风俗的书籍变得非常畅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有几家出版商开始出版这些题材的系列丛书。大出版商中朗文出版公司于1929年率先推出题为"英国遗产"的丛书，由专门描写英国幽默、民歌和舞蹈、公学、教区教堂、野生动植物等等的各卷组成。这套丛书载有斯坦利·鲍德温写的导言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写的颂扬推荐词。次年，巴茨福德出版公司开始出版名为"英国生活"、由关于乡村、旧式英格兰家庭生活、酒店、农村和农舍的各卷组成的丛书。在随后一些年，其他出版商也加入其中。在这些努力中，值得一提的有英国广

播公司在1933年和1934年初萧条的低谷时制作的、以所谓“民族特点”为题材的、由二十三辑广播讲话组成的丛书。这些讲话的目的是要使英国广播公司的广大听众再度相信，20世纪的事件仅仅是表面上令人迷惑，甚至似乎不需要国家目标或行为方面的剧烈变化。古老的英格兰仍旧存在，而且许多东西必须重新加以发现和确认。

对民族传统的新兴趣，由1930年指定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为桂冠诗人而被正式认可。梅斯菲尔德是一个严肃诗人，也是一个通俗诗人，他通常以过去题材作诗并论及这样那样的英格兰“象征物”。他几乎沉湎于历史，并通过它来描述民族特点。他后来回忆说：“国家的过去是诗人的牧场。”他的作品是来自相当理想化的历史性草原的搜集物的集锦，工业革命仅被描绘为草原中外来的病害。[142]

罗伊·刘易斯和安格斯·莫德在他们1949年对英国中产阶级的调查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明显存在着“回到土地去”的盲目倾向。这种倾向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对土地的主业农业的实际影响极小。他们看到，其主要的表现不是对农业的影响，而是“购买关于农耕和乡村的书”[143]。此时存在一个虚构与非虚构的乡村题材书籍的广大市场，出版商们急于满足市场的需求，他们的书单每个季度都在增加愈来愈多的书目。每一块宁静的乡村土地都受到充满爱恋的描写。巴茨福德出版公司因为拥有出版带有精美插图的、关于农村风光和古老乡村生活图书的实力，而成为一家重要出版商。报纸和周刊上出现了题为“乡村随笔”的特写，几乎纯粹表现农村的“典型”英格兰景色的插图册更是定期出现。描写田园风光的出版物浪潮如此高涨，致使艾弗·布朗(Ivor Brown)1935年在描写乡村英格兰时抗议道：“对英格兰农村的赞美是如此不惜感情，说得已经够多的了，进一步描写关于摆满玫瑰的门栏和长满常青藤的农舍的狂热文章确实已不再需要。”[144]然而，这种题材的作品还是持续不断地涌现出来。 <74>

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数量继续增加。这些作品总是近乎把乡村生活

浪漫化，就像这些小说的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他们] 在反抗工业主义时…… 充满怀旧情绪，踯躅于过去”。他们热衷描写的不是当代的乡村，而是受童年时代记忆粉饰的过去，这使它具有“现实生活中从未存在过的稳定性和永恒性”。[145]

在无线电广播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乡村时尚：从 30 年代集中描写一位科茨沃德园丁的大型通俗系列节目“我们的比尔”，到关于乡村美景、传统、古老的生活习俗及日常生活的数不清的话题，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反映并加强了这种兴趣。[146] 不仅如此，英国广播公司作为在里斯勋爵（Lord Reith）领导下自我确定的指导和提高公众见识之角色的一部分，积极促进对乡村英格兰的颂扬。《听众》（*Listener*）杂志在其第一卷中骄傲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乡村及其利益在广播公司的教育工作中得到特别的关注。”[147] 为什么呢？一位 1937 年的领导人提供了一种回答：热爱乡村是“我们民族生活中一切最好、最正确东西的核心”[148]。

《听众》熟悉它的读者。1941 年期间，当时城市正面临被破坏的危险，首家舆论调查机构“大众观察”询问住在全国各地的人：“对你来说，不列颠意味着什么？”人们或许以为他们会表示对受威胁城市的爱恋之情，不是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列颠”让人想到的首先是概念化的乡村风景或者特定的、熟悉的乡村地方的图景。那些想到城市生活的人仅仅以此作为“真正”乡村不列颠的反衬。[149] 这一点在 20 世纪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1946 年，一位作家反问道：“对普通英国人来说，英格兰意味着什么呢？”他答道：“对这个岛国的普通人来说，普通的东西却恰好总是珍贵的——古老的传统、古老的教堂、蜿蜒的道路、路边的酒店、枝叶茂密的林地、绿油油的草原都是很宝贵的。”[150] 所有这一切都被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勒（Geoffrey Gorer）于 1955 年加以确认，他分析了对公众态度进行的最大型调查之一的结果，并得出结论说：“虽然英格兰绝大部分都城市化了，但似乎大部分英国人仍把他们的国家想象为乡村。”[151]

<75>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种新型的通俗文学——“探寻英格兰”的书

籍应运而生，风行起来。这些书中，最成功的一本是莫顿（H. V. Morton）1927 年的同名著作，该书最初问世时是一批登在《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的文章，此书 1936 年以前出了二十三版。莫顿和他的许多后继者到乡村去探寻英格兰。一大批作家步莫顿的后尘，就像阿瑟·布赖恩特（Arthur Bryant）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上所说的那样，附和并加强了莫顿所作的评论。[152] 布赖恩特在英国广播公司 1933—1934 年关于民族特性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中定下这样一个调子：英格兰的特性是很久很久以前由"几乎每个英格兰人的共同祖先……约曼农奠定的"。这种特性的价值尺度（精神的和道德的）受到工业主义的损害，但并未被消灭。

> 今天我们多半都是城市居民，然而我们中很少有人的老祖先不是乡下人，即或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我们下意识的自我还是寻踪回复到他们的本能和生活方式。我们犹如被一个隔着两三代人的地道同他们隔绝开来，陷进工业革命的黑暗之中，但在地道之外就是我们的发祥地绿色田野的阳光。[153]

有名的新闻记者菲利普·吉布斯（Philip Gibbs）在 1937 年逊位危机①发生时强调说：

> 英格兰不能仅仅根据叫做伦敦的巨大怪异蚁堆或迎合群众心理的最低共同水准的小报来判断。还有英格兰的乡村，那里旧式农家院落和小村庄的生活仍按传统的方式延续下来。还有大教堂的城市，那里时间停滞不前，人们的心灵平静。在古老的集市城镇，年轻的农场主赶着牛羊进城赶集，他们还属于哈代时期

---

① 1936 年英王爱德华八世决定与离过两次婚的美国人恩内斯特·辛普森夫人结婚，遭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人的反对。爱德华八世于 1936 年 12 月 11 日宣布退位，从而在英国政坛引起一场危机。——译注

的英格兰，他们的思想还在围着犁沟转。他们的血液依然如旧，他们的性格并未因现代社会的烦躁和“神经质”而大为改变。[154]

英格兰是什么？几部乡村题材通俗著作的作者达顿（F. J. H. Darton），曾在20世纪末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了找到一个答案，他求助于历史。他强调说，英格兰的过去“对其将来来说是比现在许多混乱的喊叫要好的指南”。“当我怀疑在英格兰的这种混乱中是否还有什么中心生活时，我回到了乡村……还有一个你们仍然不能抹杀的英格兰。它有一切新东西，但它千真万确总是老样子。”情不自禁的达顿，通过过去的世代来勾画英格兰农村，一切都包含在现在的农村之中。“正是这种地方把握住了时间，使其停滞不前，就此止步，不再前进了。”[155]

<76>

《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伦敦）主笔爱德华·尚克斯1938年承认说：“不记住她［英格兰］过去的一切，我就无法想象［英格兰］……英格兰的山山水水满是幽灵。”“在英格兰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以致我们所有英格兰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陌生人，不得不再回到我们的家乡，并学习我们祖上的传统。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被既英勇有礼貌而又友好的幽灵包围住了。”[156]如克里斯托弗·赫西（Christopher Hussey）所说：“虽然在过去一百年里我们被迫在城里生活，但我们仍然是一个乡村国家。”[157]这种话已成为陈词滥调。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一种托利党“乡村”观点的表述，这从两党都支持那种感情的流露上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如前面所说，像E. M. 福斯特那样的进步人士也转而动情地歌颂古老的乡村英格兰和民族的特性。在30年代，福斯特以乡村英格兰生活的长久连续性及其所受到的破坏威胁为题材，写了两部露天历史剧。在第一部中他告诫观众说：

房屋，房屋，房屋！你们从那里来而且必须回到那里去。房屋和别墅、旅馆、餐厅和套间、干道、旁道、油泵和路标塔，这些东西就是英格兰吗？这些就是人的最后胜利吗？或是还有另外一

个英格兰，其寿命将超过这些东西的、绿色的、永恒的英格兰？[158]

甚至在商业广告上也一再强调这一点。沃辛顿啤酒酿造公司于1936年和1939年之间在杂志上刊登了题为"这样的英格兰……"的系列广告，在乡村景色的画面下，沃辛顿突出其啤酒酿造传统的乡村特色，并把它形容为英格兰遗产的一部分。

> [如像这些广告的首批广告之一所说]城里人向往乡下事物……向往那古老的草地、静悄悄的河谷和持久的安宁。在那里他们会觉得更接近于民族的心灵，更接近于纯洁善良事物的源泉……沃辛顿按悠久的英格兰传统酿造，散发着乡村气息，像英格兰特点本身一样友好、清澈晶莹，在其石头和钢的峡谷中向他们走来。

在乡下，昔日旧景继续随处可见。另一幅广告指出：

> 在这个英格兰，很容易避到某块历史的小天地，在丰富多彩、迄今仍活灵活现的过去的有益于健康的静谧气氛中沐浴片刻。这个民族或许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多地把传统和习俗注进日常生活之中。[159]

在这三年的系列广告中，关于民族特性的各种老生常谈——把它形容为乡村的、传统的或者缓慢而深沉的——都搬了出来。沃辛顿企图把它的啤酒与该公司撰稿人所理解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民族自我形象等同起来。 <77>

到乡村去即可重新获得一个可以带领你度过现在动荡不定的英格兰。1940年的危机鲜明地造成了这种印象，它激发了民族的历史意识和对农业生活的关心。莫顿于1942年满意地看到，战争恢复了17世纪乡村自给自足的气氛，恢复了英国民众的根基。"我们在没有意识到此点的情况下，开发了已开始干枯的满足的泉源。"[160]新闻记者亨利·沃伦（C.

Henry Warren）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亲切地描述了他的东盎格利亚农村的生活——一个社区的故事，乡村的持续重要性，对过去及自然界的真实事物的接近。沃伦强调说："这就是英格兰，虽然它 90% 的居民住在城镇；因为在这里生活的首要条件不是获取，而是服务——服务于养育我们并是我们的最终归宿之处的土地。人们在这里创造性地工作着。"战事吃紧的时候，沃伦的农村图景化成一种梦境，但它是"在企图使我们失去洞察力的恐怖已成为过去的时候，仍在我们清醒的眼前保持着的一种梦。因为我们的长生鸟①的力量，将从英格兰拉克菲尔茨的灰烬中重新崛起。"[161]

纳粹德国被描绘成是一个发狂的工业社会[162]，而英格兰则被看成是一个正好相反的社会：米尼弗太太（*Mrs. Miniver*）和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人道的、旧式的及本质上还是乡村的世界。所以战争被看成是新世界对旧世界的一场考验。甚至像雷克斯·沃纳（Rex Warner）这样一个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格兰自鸣得意、懒散不公平而感到愤怒的年轻知识分子也承认，强烈地崇拜机器的不人道显然是更坏的选择。在他的讽喻性小说《机场》（*The Aerodrome*，1941）中，英格兰是一个农村，它沉浸在传统的不公正和无效率之中，而纳粹主义则是以新建的空军基地为代表的。最后，空军及其"新秩序"被粉碎了。在沃纳小说发表的那一年，亨利·沃伦同样声称："英格兰的实力仍然在其田野和农村之中，尽管机械化军队的整个重心正滚滚压将过来，企图粉碎它们，但最终获得胜利的却将是它们。"[163]在 1941 年那些令人忧郁的日子里，阿瑟·布赖恩特在他办的周刊栏目中也以同样的精神提供了希望：敌人"不久即将崩溃。因为一个长期在猛烈节奏中生活过来的国家缺乏能源储备，这种储备只能来自平静安宁的生存。"[164]这样，可怕的活力将经历自己的毁灭，而英格兰的平静则证明是有力量的。

---

① 古埃及传说中在阿拉伯沙漠中生活了五六个世纪的鸟，在火堆中自焚后，从灰烬中以新的活力再生，常被用作永生和复活的象征。——译注

✦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格兰，牧歌式的美梦多半尚未消散。它继续包容在古老的大学之中。约翰·维泽（John Vaizey）把他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所在的剑桥学院回忆为一个“有其乡绅等级、年轻乡绅和农民的理想化乡下农村，乡村英格兰的［一种］田园风景”[165]。对更多的公众来说，像《弓箭手》（*The Archers*）这样极为通俗的农村系列广播节目，表达了类似的、更孚众望的美景。[166]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新近考察国家状况，发现未发生变化的事物之一是“城市居民对土地的基本迷恋”[167]。罗纳德·布莱思（Ronald Blythe）在他的书《阿肯菲尔德》（*Akenfield*）中被吸引去研究“全国的农村崇拜”，他指出： <78>

> 在英国，城里人羡慕村民的稳定性，他们总是把城市生活看成为一种仅仅是暂时的需要。总有一天他将在绿地上找到一所农舍及“真正的价值观”。为了帮助这个国家崇尚乡村生活的近乎宗教的热情及抚慰许多人因未按农村方式生活而感觉到的犯罪心理，战后的新城镇曾试图把城市和农村交融为一体，但整个来说，结果是令人沮丧的。[168]

“乡村随笔”继续在报章上展示其魅力，《乡村生活》（*Country Life*）和《田野床头书》（*The Field Bedside Books*）非常畅销，而适合于现代化的乡间小屋和农舍价格越来越高。安格斯·威尔逊发现，“英国私人赞助人为现代建筑所作的事比多数国家都少”，他把这种现象追溯到传统的持久声望、上层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及“出售古老乡间房屋的诱惑力”。[169]一位文学评论家在1969年说：“阅读英国某些近期诗歌的外国人或许可以想象到，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耕犁后面或在捕捉鳟鱼中度过的，城镇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陌生的。”[170]就像哲学家斯图亚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1972年注意到的：“田园风情的美梦、梦想以前的手工技艺、梦想传统的

安宁，这在英国家家户户和公园随处都可见到。”[171] 特别是村庄继续起着中产阶级的英国梦的焦点的作用。戴维·怀特（David White）1974 年回忆说：“在英国人脑子中的某些角落，永远都是半真半假的无线电广播中的农村。”他接着指出：“不管正确与否，村庄代表了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也可能是一种休息地，一个死者灵魂的安息处。丘吉尔葬礼的一个重要特别情节，是把他的遗体从伦敦移送到布莱登的教堂墓地。”[172] 同年，实际上是战后最严酷的一次大选那一周期间，人们可以发现《每日电讯杂志》（*Daily Telegraph Magazine*）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以《英格兰村庄：完美的小天地？》（“The English Village：The Perfect Microcosm”）为题的重要报道。该文章说，“作为一种生活制度，这可能是无比优越的”[173]。不久以前，马丁·格林（Martin Green）赞许地说，多年以来，英国乡村与其 <79> 说是农业社区，不如说是退休隐居之所，在那里，“一种中产阶级的田园美景”[174] 可以在生活中加以实现。

60 年代末，一位名记者保罗·詹宁斯（Paul Jennings）把村庄的“复兴”描写为英国人民的一种精神归宿，一种脱离 19 世纪帝国和工业意识的回归。当代的村庄是由传统的乡下人、持季度车票及从城里扩散出来的“难民”混杂而形成的。他赞许地指出：“推动他们的是对英格兰形成的一种种族本能的记忆，不管这种记忆是多么模糊，每次到乡下的周末旅行都会使它再现出来。”这里是回到祖籍的英国人。用詹宁斯的话来说，他们加入的农村生活是一片安宁的绿洲，一个对付现代世界压力的堡垒。村庄是许多代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所能创造出的东西的灿烂花朵，仍然还有许多生活在村庄的人与一些事物限定在一起，并希望在变化的狂飙消停一些时，他们能不受干扰，并能听清自己讲话。[175] 如马丁·格林 1977 年所说，20 世纪越来越多的英国人“选择了农村的价值观”[176]。

崇拜效率、机器主宰一切和实利主义似乎是工业社会的一部分，“农村价值观”可以被理解为不同于以上东西的另一种选择。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在 1949 年的一部剧《夏日的梦》（*Summer Day's Dream*）中直

接表现了这样一种选择，这部剧概括了这一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阶级对事物的看法。普里斯特利展现了二十五年之后被一场核战争毁灭的英格兰。劫后余生的居民愉快地回到了一种简朴的、慢节奏的农业和手工业生活。美国和俄国瓜分了世界，两国为了物质进步而相互竞争。剧情围绕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对英格兰这一穷乡僻壤的访问而展开。虽然他们负有建立生产合成产品国际工厂的使命，但他们发现村庄的生活奇怪地令人满足，因而陷进迷惘之中，尽管他们不能留下来，但还是放弃了使其现代化的计划。[177]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73 年批判性地指出："我们回到了简·奥斯汀的这样一种观点，即生活在乡村的人都是好的，生活在城里的人都是坏的；制造业者都是坏的；简单朴素比发展要好。"[178] 尽管如此，中上层阶级是否放弃过这种观点尚属疑问。现代英国文化史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便是，这种对国家和良好社会看法的弹性和持久力。

这样一来，英格兰乡村也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和文化力量。丰富的历史渊源和前几个世纪赋予英格兰乡村的自然美，对这个国家来说并非纯粹的福音。就像一个广大的海外帝国的存在一样，它也助长英国舆论退回到一个需求较少的世界中去。就像早期经济成就所创造的固定工业资本一样，由国家的风光和建筑物所体现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化资本，也会有助于英国回复到它的过去，并赋予它一种实质上是旧式的自我形象。 <80>

第五章 <81>

错误之路吗？

近几个世纪中，英国经历了一种变化意义上的发展过程……它以一种商业方式而显得威严堂皇；它看来是要以富豪财阀统治的天堂为其结果……但是，任何企图表明这个影响着英国的变化进程就是英国的人们，都不得不面对并回答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所有富有表达天赋、被举世认为特别有英国味并为许多英国人代言的英国伟人，不是无意识地与此趋势相抵触，就是（更经常地）强烈反对它。

——切斯特顿

对读者来说，现在看来应当显得很清楚的是：那种乡村般恬静的传统民族生活方式的幻想，已渗透英国生活，而且，对英国经济发展的任何理解，都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然而，其余事实也不能被否定；这种幻觉并不可靠。工业主义当然早已在英国诞生了；不存在否认这个事实的愿望。但是，工业主义诞生的正统性却可以否定：工业主义和工业精神不可以看成是真正英国的，而且在实际上反被认为是对保存“英国国粹”的一种深远威胁。在等同于田园幻觉（“绿色而舒适的英国”）的英国国粹与工业主义（“黑色的邪恶工厂”）之间，逐渐浮现出一种文化上的两极对立。田园幻觉被认为危在旦夕，正在一点一点地受到工业发展的侵蚀。机器的权势正在侵入并扼杀乡村。

第一节　对工业化的重新评价

19 世纪中期，塞缪尔·斯迈尔斯尚可将工业和农业的革命描绘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随后，这种观点逐渐变得偏颇：

> [他宣称]英国在成为商业国之前，与大陆国家相比，不值一提……直到大约 18 世纪中期，一批心灵手巧、有创造力、但彼此并无明显联系的人们在王国各地出现，极大而成功地推动了一切工业部门，获得了财富与繁荣的硕果。[1]

<82>

19 世纪末期，这种论调再也不能呼唤出它曾激发起的热情了。人们认为新工业制度在道义和精神上越来越不值得支持。如萧伯纳（Bernard Shaw）于 1912 年注意到，晚年的狄更斯向敏感的读者新异地表示："令人恐惧的不是我们的混乱（如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所认为的），而是我们的秩序。"[2]

曾创立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秩序的工业革命时代，已经成熟到可以对其重新进行评价之时。要解脱工业主义魔力，就要对机器时代的起源重新作出历史解释。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对工业和农业革命所作的学术性和通俗性的描述，不仅对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抱有敌意，也对技术进步的价值和追求经济增长本身提出质疑，交织着社会价值准则的彻底变更。经过此般描述，那些从长远看或许是英国对人类历史所作的最有决定意义贡献的东西，却在英国人心目中树立起一种令人吃惊的消极形象。

这种重新评价始于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他是牛津大学教师，罗斯金的门徒。他认为以往的一个世纪受到虚伪的生活哲学的摧残，这种哲学的中心是叫做“政治经济学”的一套“理智迷信”，使得一切思考都屈从于增加物质生产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增加生产曾是必要的：因为旧英国的民众穷困无法构成良好社会的基础。然而，他认为现在该是从迷恋生产转而注重分配，注重甚至有更大重要性的生活质量的时候了。1880 年，他在布拉德福德机械学院指出：

> 问题不仅在于分配财富，也正在于正确运用财富……高工资本身不是目的，没有人是为了工人能迷于声色之乐而追求高工资。我们要求高工资，是为了改善物质条件，减少对未来的忧虑和不安，以使工人能过上一种更纯洁和更有价值的生活……我们希望工人有高工资，仅是为了使他们可能从产生出卑劣的实利主义和计较每一分钱的状况中解脱出来。[3]

在另一场合，汤因比煞费苦心地表明，英国激进社会主义者“完全有别于”

<83> 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极憎恶他们的唯物主义理想”。[4]

在他此番话的背后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出了错？他对工业革命时代的描述是阴沉忧郁的：这个时代是“像一个国家所经历过的任何灾难和可怕时期一样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它释放出贪婪的冲动，其结果是：

> 财富的巨大增长紧伴着贫穷的巨大增长；大规模生产作为自由竞争的产物，导致阶级分离异化和大批生产者堕落。

某些人得益，更多人受难。劳动人民经常忍受实际工资下降之苦，而更常见的是他们被迫永远离开土地，在工厂制度下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自有大规模生产以来，那些突然的商业活动”所造成的不安定，“使劳动人民

身受周期性的贫穷苦难”。工业化对精神生活的影响“可怕”得出奇。用卡莱尔的话来说：“现金交易关系”取代了“昔日的温柔人情”。在汤因比看来，工业革命的历史证明，“自由竞争可能生产出财富，却生产不出幸福”。[5] 他作为一名激进分子也承认这种经历是走向更自由更民主社会的一步，或许是必要的。他仅为付出的代价而痛惜，并把这个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时期谴责为一个可耻的插曲。

在汤因比之后，工业革命又被看成是遍布在绿色而舒适的土地上折磨其居民的黑色的邪恶工厂——这就是当时对工业的不满和社会批评的高涨所强化的形象。农业革命也同样被看成是圈地的蔓延，它旨在断绝阶级的联系，摧毁乡村社会，铲除都铎王朝时代留下的农民所有权，迫使大量农业人口离开土地进入新工厂。一位自由党议员，加斯克尔（Charles Milnes Gaskell），在一篇有助于复兴对旧英国的斗士威廉·科贝特的兴趣的文章中，对科贝特在反对这两个革命方面究竟是否不对表示怀疑：

> [科贝特以来]六十年的斗争和渴望，使我们更接近于我们认为是光明的东西。但我们追寻的不是一团鬼火，不是在荒原上闪烁即逝的流星。尽管我们生活中有种种奢华，但四面八方的冷淡前景告诉我们：我们自吹自擂的改进的价值是多么微小，文明的掩饰是多么浅薄。[6]

托利党人也继承了汤因比对工业化的偏见，在工业化中看到了生活质量和民族特性的一齐衰落。汤因比的学生之一，帝国主义论者米尔纳（Alfred Milner）认为，工业革命粉碎了旧的社会制度，留下了一份“混乱”遗产。米尔纳感到遗憾的是，工业革命对许许多多普通英国人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人被从土地上驱走，被驱进备受残害的工厂城镇，他们在此失去肌体力量和道德价值观念。米尔纳呼吁进行有力的国家干预，以清除失去导向的工业主义造成的民族退化。[7] <84>

米尔纳的密友吉卜林与历史学家弗莱彻（C. R. L. Fletcher）于1911

年合著了一本英国历史教学用书，反映了新权势集团对工业革命的蔑视。此书只是简略地提到了工业化，因为它是英国在国内外所取得的政治胜利的传统历史。他们写到工业革命时抱怨说：首先，工业革命减少了乡村人口，而乡村是英国民族特性形成与发展之地；其次，工业革命损害了农业，将国家的安全置于外国农场主和船队的手中。[8] 一种“人为”的城市生活方式，朝不保夕地依赖于海上交通线——就是这些年月中杰出的保守人士所描绘的工业化遗产，补充了汤因比起草的控诉状。

切斯特顿是爱德华时代一位读者众多的学者，他将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熔于一炉，把国家生活的这一转变看得更为黑暗。他所著的《英国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或许是他的全部著述中读者最多的一本”[9]，他在书中描绘了一幅 1832 年议会改革（它迎来了寡头资本主义）所开始的民族衰落景象。现代化的寡头们在无依无靠的老百姓身上进行农业和工业两个革命的“实验”，将老百姓从土地驱进工厂。在此描绘中，国民生活在 19 世纪降到最低点，而 19 世纪又是抬高地价的地主和干劲十足的工厂主的全盛时期。[10] 切斯特顿在更早时就勾勒出了这幅景象：

> 普通英国人被愚弄欺诈，失去原有财产。那些人就是如此，而且总是以进步的名义这么干……他们夺走他的五朔节花柱①和他的古朴乡村生活，代之以向他们许诺在水晶宫②开始的和平与商业的黄金时代……[富人]强迫[穷人]进入工厂并沦为现代工资奴隶，一直使穷人确信这就是通向财富与文明的唯一道路。[11]

---

① 五朔节花柱是用鲜花和彩带装饰的柱子，五朔节时人们环绕着它跳舞，欢庆节日。——译注

② 英国为 1851 年的伦敦国际博览会而特意用玻璃和钢架建筑起来的展览馆，当时蔚为奇观，不久后被焚毁。——译注

<85>

切斯特顿的朋友希莱尔·贝洛克，划出了“我们的社会规范恶化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少数人获取了土地，其后是工业资本主义“作为前一阶段的结果并以它为基础”而成长起来，最后是“一小撮人控制集中化了的世界金融财政”。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更邪恶：“第一个阶段虽然邪恶，但仍是民族的和有人性的。它给我们造成了大地主和穷困的、但仍是健康正常的英国农民”；第二阶段更少抵消它的邪恶；第三阶段则完全没有抵消邪恶。它们共同构成“堕入地狱的三大步”。[12] 无论他们为弥补农民所有权所取得的进展多么小，切斯特顿和贝洛克（远比专业史学家更得人心地）助长了以阴暗的笔调来描述从都铎王朝到工厂铁路诞生时英国经济中的发明创造。

汤因比的最重要继承者，是一对政治上激进的史学家夫妇：哈孟德（J. L. Hammond）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哈孟德（Barbara Hammond）。他俩的著作虽然完全是历史专业书籍，但仍很畅销。1911 年出版的《乡村劳工》（*The Village Labourer*）一书至 60 年代已再版十一次。1917 年出版的《城镇劳工》（*The Town Labourer*）一书也有同样纪录。其他著作虽也是严肃的历史书籍，但仍颇有销路。[13] 哈孟德夫妇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在公众心目中塑造了工业革命时代的形象。这对夫妇的影响痕迹，在教科书、通俗论文、政治演说和著作，以及后来的电台广播谈话和再以后的电视节目中都可以找到。由汤因比创始，为哈孟德夫妇完成的，正是对工业革命时代的新颖然而黑暗的描绘。

哈孟德夫妇控诉 19 世纪中日益增大的不平等、对生产的拜物迷信、将财富奉为成功标准和拒不制止不顾后果的变革步伐。财富本身，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对这对夫妇来说都几乎毫无意义。如汤因比 [并像 20 世纪初最激进的历史学家托尼（R. H. Tawney，1880—1962）] 一样，哈孟德夫妇也受教于牛津大学，追求的文化观念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物质贫乏技术落后的前工业社会。逃脱了圈地的艾克斯霍姆岛上农民们的简朴生活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哈孟德夫妇。他们指出：“这里的人们在金钱方面非

常贫穷，但在生活方式上非常幸福。"[14] 他们后来强调说："某种生活体系中的穷人，可能比另一生活体系中不那么贫穷的人更加幸福。"[15]

对哈孟德夫妇来说，一种使物质生产成为生活中心的制度，天生地就是对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幸福和文明的颠覆破坏。他俩的《城镇劳工》一书，以麦考莱关于人类新近对"物质的支配"的赞叹开篇，仅仅只是为了追究其责。他们宣称，解放者已变成了新奴隶主："工业革命曾使社会从对自然力的原始依附中解脱出来，但又接着使社会成为自己的阶下囚。"最大限度生产的"偏执狂"，使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堕落了；例如新兴工业城市是"找不到美好、幸福、闲暇、学识、宗教和文明观念及习俗影响的地方，是一个光秃秃的荒凉之地，没有色彩，没有曲调或笑声，男女老少就在这种地方劳动和食宿。"工业革命中的英国"为了创造出一种生产体系而未能创造出一个社会"。[16] 实际上，他俩后来的一部著作《现代工业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Industry*）的暂定书名原是《生产的咒语》（*The Spell of Production*）。[17]

<86>

生产，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利润，利润是一切活动的检验标准——可悲的是，在工业时期"一切都成了利润的牺牲品"，财富"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而被崇拜，其结果就是狄更斯的噩梦：

> 因此，[哈孟德夫妇如此抨击说]英国追求利润并得到利润。一切都变成利润。城市有了可图利的秽物，可图利的烟雾，可图利的贫民窟，可图利的混乱，可图利的无知，可图利的绝望。迈达斯①的咒语降于这个社会：降于它的一切生活和普遍思想，降于它从农业时代转变到工业时代所采取的决定性的和浮躁的步骤上。[18]

① 迈达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人，托名为弗里吉亚王，贪恋财富，得神赐有点手成金妙术，手触之物皆化为黄金，后几乎为此饿死，最后向神祈祷，恢复原状。——译注

生产和利润的种种新可能性已“横扫……英国人民……使之失去平衡”。“不顾后果”和“浮躁”的经济跃进，既是社会瓦解的原因又是其后果；哈孟德夫妇认为，如果“工业力量以慢一些的步伐前进”，那么英国“本来会好得多”。他俩的结论是，工业革命“造成了混乱，人们仍在寻求安定，仍在寻求使之归属于高尚目的”。[19]

哈孟德夫妇的思想与文学、社会、政治中的其他思潮汇合，共同在20世纪中滋长了中产阶级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邪恶的“罪恶感”（如罗伊·刘易斯和安格斯·莫德于1949年所引证的[20]），也滋长了怀旧情绪，怀念更简朴和更明显令人满意的旧时光。为表明这种“罪恶感”和怀旧情绪的效用，我们必须看看20世纪40年代两本最畅销的英国史书。这两本书在政治上都不激进。史学家和保守党政治家阿瑟·布赖恩特所著的《英国人的传奇：1840—1940》（*English Saga, 1840—1940*）是书籍协会所选中的书，它在1940年末至1948年再版了十五次，至1967年再版二十次，发行量在二十五万册以上。约翰·斯夸尔（John Squire）爵士认为此书是“一部关于工业革命及其弊端的简史”[21]。它把英国当时的困境追溯至19世纪早期英国采取无节制的发展目标之时。其结果是英国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它依赖进口食品，人口密集易受空袭，为阶级和利润争夺所分裂，最糟的是几乎“失去灵魂”和目标意识。经过布赖恩特此书的描绘，工业化前的英国作为一个稳定安全、精神满足的社会而光辉灿烂。 <87>

特里维廉①所著的《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于1942年在美国出版，1944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更受欢迎更有影响，至1960年已售出四十万册。[22]它是特里维廉四十余年来关于英国社会的思考之集大成者，书中主题思想在他以前的著作中已显示出来。他对工业革命时期的描绘，在最主要的方面重复了哈孟德夫妇的观点：工业革命时代粉碎了乡

① 又译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英国自由主义学派史学家，代表作《英国史》。——译注

村社会，失去了更自然的生活方式和乡村美景，这是金钱所无法弥补的损失。《英国社会史》是为消逝了的农业国度而作的一曲挽歌。普卢姆（J. H. Plumb）注意到特里维廉的著作中“有一种为正在消逝的世界——一个有庄园宅第、乡村消遣和自由宽容的绅士所统治的世界——而深感遗憾的情绪，特里维廉知道，加速发展的工业革命正在摧毁这个世界。”[23]

1851 年的人口调查表明，半数人口已在城镇，而特里维廉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约翰牛已不再是农夫了；当他完全城市化或城郊化时，除了在《笨拙》周刊的漫画中以外，他还会是约翰牛吗？”至 20 世纪，他发现这一变化过程已大体完成了，他于 1931 年警告说：“现代英国人的衣食比祖辈要好多了，但在精神方面，在一切使他们同美好世界联结的方面，他们都完全处于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饥饿之中。”

特里维廉还在《英国社会史》中说：“农业不仅只是诸产业之一，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人类及其精神价值观中独一无二，不可取代。”代之而起的城市生活是“人类精神的死亡之笼……是人类个性逐渐标准化的一个进程阶段”。[24] 特里维廉著作中所欢呼的英国历史上的伟大成就，基本上是英国昔日的成就，而且大多是精神和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成就。令人忧伤的精神失落，伴之以绝望的怀旧情绪，贯穿于他对现代岁月的描述中。早在 1926 年，特里维廉曾对其兄弟说：“我不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所理解的正好是我所不喜欢的。”到 1939 年，在写《英国社会史》时，他以超然姿态注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他在给其兄弟的信中说：<88> “这个受威胁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的世界在许多年前就死了[25]。我仅是唯一的幸存者。”然而，就是这位 18 世纪的幸存者，于他所在的 20 世纪写出了最畅销的英国史著。

在哈孟德夫妇、布赖恩特和特里维廉的影响下，学者们向后看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就如雅克塔和克里斯托弗·霍克斯（Jacquetta and Christopher Hawkes）于 1947 年寻找“英国特性”时回顾“18 世纪那个可爱而静谧的时光……那时还远未出现工业的烟尘和喧嚣，英国还是根深

蒂固和令人满意的乡村社会”。后来发生了什么呢？“越来越快地，无情地……盲目地……工业革命结束掉18世纪乡村秩序……工人们像群蜂一样密集在煤铁和其他地下有矿物的地区……最后以我们自身在大都市中失落而告终。”[26]

第二节　美国幽灵

这样，工业革命不仅被重新评价，而且被重新确认为是非英国特性的事件。工业价值观念——对机器、效率和物质财富的崇拜——从未征服过英国特性的内在核心。J. B. 普里斯特利（在概括一种悠久传统时）赞许地指出：

> 大多数英国人仍有一种本能情感，即人是第一位的，机器应远在其后。确实，我们是第一个拥有机器的民族，部分是因为我们享有对机器的发明创造——而且迄今仍享有——但是，为机器服务的思想对英国人的心灵造成了一些损害。当然，工资、劳动时间和条件是极糟的，还有某种东西，即一种本能的怨恨，最后构成了这个黑暗苦难的深渊。而且，我们迄今仍处在这种苦难之中。[27]

如果工业主义不符合英国人的精神，那又符合什么呢？19 世纪下半叶，似乎出现了一个答案。英国作家们开始将与工业主义相关联的生活方式同新兴的美国联系起来。就是以此种方法，英国社会的新兴成分（北方工业中产阶级）所感到忧虑的那些特性传到大西洋彼岸，美国人却可以平安无事得多地予以轻蔑和排斥。1840 年，穆勒问道："美国人民作为一个总体，在其优缺点方面"是否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的中产阶级那样的浮夸东西"。[28] 马修·阿诺德虽同意这一提问，但几乎没有看到美国人的缺点

之外更多的东西，他于1865年抱怨说："太多地同美国人待在一起，就像同一个有自己的各种坏习惯和脾性的人生活在一起。"他在若干年后又注意到，美国"如我们自己，远离野蛮人[贵族]而近于平民"——换言之，一个无拘束地在英国中产阶级后面亦步亦趋的巨人。[29]"美国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对技术和财富的偶像崇拜，从这种观点看，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轻蔑，能够有助于从英国文化中驱除这些偶像崇拜的鬼怪精灵。 <89>

此后，来自政治领域各方面对工业精神的批判，被当成是对美国的警告。阿诺德宣称这个国家因沉迷于赚钱，对文化发展不利。[30]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将这个国家描述为一块人造荒野，"一个发臭的垃圾堆"[31]。甚至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这位热心于进步的鼓吹者和自由职业者，也认为美国专心于物质进步而付出了精神代价，并因而与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争辩说：

> 美国人专注于他们的活动，并为他们那无限制的野心所刺激……比起生活在成功可能性小得多的国家的居民来，是更不幸福的人……大体上，我认为前者的生活乐趣要多于成功的美国人，而且前者的孩子们也继承了更大的享乐能力。无论今后美国取得的巨大进步可能有多么伟大，我坚持认为，现在和未来很长时间内，若干代美国人在本质上会成为牺牲品。[32]

至20世纪初始时，这种情绪已成为知识界舆论中的老生常谈。一位下一代的阿诺德式的自由党人洛斯·迪金森（G. Lowes Dickinson），1901年在美国讲学时，写信（有人感到是几乎无意识地）给工艺美术运动的一位领袖阿什比（C. R. Ashbee）说：

> 这个国家有两件事使我印象深刻：一是世界的未来在于美国；二是美国在本质上是野蛮粗俗的国家……是没有闲暇、风度、道德、美感或宗教信仰的国家……一个其理想仅是活动，而

不考虑其活动质量的国家，一个坚持认为竞争与冲突是唯一值得为之生活的国家。[33]

拥有广泛读者的左派知识分子乔德（G. E. M. Joad，1891—1953）虽从未去过美国，但这一事实并未限制他于1926年在他那本受欢迎的《巴比特·沃伦》（*Babbitt Warren*）一书中概括这一文化批评传统，此书描绘了一个在机器奴役下，在工作与金钱中发狂的国家。两年后，他为一位美国听众重弹此调。在解释为什么“英国人不喜欢美国”时，他强调了“美国对规模、速度、机构和金钱的崇拜”。对于现代事物中的非人性趋向，美国只给予最小的抵制，把它的灵魂出卖给了工业主义。这一交易也威胁着欧洲，因为无论它怎样被误解为一条通往人类满足于文明的道路，它的确带来了力量。他悲观地作出结论：美国就是未来，最终将使欧洲文明湮灭在实利主义的大潮之中。[34]

<90>

第三节　经济增长的陷阱

尽管英国经济学家们普遍被认为是“实利主义者”，但就连他们也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具有那种不信任物质进步的普遍文化气氛。就像主要的历史学家们一样，19 世纪后期的英国经济学家们也主要受教于剑桥和牛津大学，也趋向于对现实世界的工商业采取一种高傲和“文明”的观念，与整个世界的工商业污染保持一定的距离，或希望教育这个世界的参与者怀抱一种更广阔的生活观念。[35] 英国经济思想的主要传统中有一个起源于穆勒并不断出现的主题 [如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所述]：“蔑视个人铺张和财富，它们表现为低下的优越感或单纯的实用价值，迷恋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36]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紧随穆勒，表示对工业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不满。凯恩斯后来提到，马歇尔“仅仅是通过伦理学，才首次接触到经济学”。马歇尔希望在国家的实业上层人物中鼓励普及一种更高尚的动机，即他所称的“经济中的骑士品质”，这一提法使人想起罗斯金。这样赚钱就成了良好完成困难任务时附带获取的满足。[37] 马歇尔的学生埃奇沃思（F. Y. Edgeworth）以崇敬之情回忆他说：“马歇尔重视物质环境的改善，主要是因为这一改善有可能使许多人过上一种高尚生活。”他展望一种社会秩序的逐渐发展，会“极大地超越眼前现实”，其中会“使对物质的占有从属于人类幸福”。马歇尔献身于经济动机的提高升华，并使经济动机从属于提高生活质量（在这方面他与他的古典派前人不同），这清楚地表现在他临

终前的一段话中："[他承认]如果我能再生活一次，我将献身于心理学。经济学同理想的联系太少了。但如果我谈理想太多，商人们就不会读我的书。"[38]他的著作以穆勒的思想为基础，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自由职业者们的注意力从积累与生产问题，转到分配与消费问题。

以马歇尔为标志，经济学家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实际的人类需要与满足问题上。这一技术上的重新定向，很自然地来自马歇尔的如下信念：在"财富、健康、教育和道德方面"，英国已有充分发展，足以实行对企业施加限制的种种政策。对这个国家来说，再也没有必要"使几乎其他一切考虑都服从于增加工业生产总量的需要"了。有可能使社会逐渐转变到"共同利益压倒个人的任性"。[39]

<91>

在马歇尔之后，霍布森(J. A. Hobson，1858—1940)，其影响如果说不上在经济学界之内也是在其外，寻求的是将经济学变成对"经济主义"——物质富裕与社会幸福的等同物——的抨击。[40]他追随罗斯金(并写了一部赞扬的书)，主张"一个事物的真正'价值'，既不是为它付出的代价，也不是该事物给其消费者所带来的眼前满足数量，而是在于正确使用它所能产生的内在贡献"。具有"满足有益的人类需求"的能力的那些货物，才是"财富"，"迎合人的某种卑劣或有害愿望"的那些货物则不是财富，而是祸害，"如果它们有益，也只是有益于死亡而非生命"。[41]对他而言，相对经济衰落的警告是离题之事：真正的急切问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霍布森在回答这个爱德华时代工业的卡桑德拉①时说："英国不再是世界工厂了，这是真的，而指望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反倒是愚蠢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其他目的，而不是让英国工厂主和地主在令人厌恶的行业中雇用大量的人以便剥削外国民族。"[42]

穆勒派敌视"渴求(财富)的社会"以及轻视实业家的传统，在20世纪英国经济学中仍然很强大。甚至连凯恩斯(他本人在股票市场上为自己

① 卡桑德拉(Cassandras)，预卜凶吉的特洛伊公主。——译注

和国王学院赚了大量钱财）也参与其中。由于他的剑桥大学和布鲁姆斯伯里背景，他也对渴求财富有一种过分的厌恶。凯恩斯被认为挽救了资本主义，然而就像他的传记作者所指出的，他“并非是特别偏爱谋利动机；他在谋利追求中发现了某种令人不满的东西，希望抑制谋利追求并发展出一种经济体系”。[43] 20 年代，共产主义对他具有吸引力的一面并不是它宣称的高效率（他厌恶这点），而是对“迷恋金钱”的批判，他也把“迷恋金钱”看成是“我们时代的道德问题”。凯恩斯旨在使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地运转的种种努力，有一个最高目标，即以更高尚、更令人满意的价值观念来取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照他来看这是自相矛盾的，富裕的推进几乎是必然的，其真正的好处是它否认将占有财富与物质作为生活的主要目标。“我们将有能力敢于按其真正价值评估金钱动机。对金钱的迷恋，作为一种占有……将按其本来面目，被看成是有些让人厌恶的病态，一种半犯罪半病理的，需要人们以发抖的双手送给精神病专家处理的病患。”[44] *<92>*

在穆勒的传统中，他幻想有一个几乎不需要利润或投资的稳定可靠的未来社会。他写道：只要有适当管理，“我们就能获得一个半静止社会的条件，在这里，变化与进步将只是来自技术、爱好、人口与机构的变动。”[45] 1976 年，一位修正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的著述“把英国有经济素养的人们纳入了这样一种思想轨道，即认为努力工作、有效的工业组织、在生产和有利可图的工作中雇用大批劳动力，大都只有次要意义”。[46]

出生于加拿大的经济学家哈利·约翰逊（Harry Johnson）认为，凯恩斯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中所包含的社会价值观念，在英国学术界中，尤其是在牛津和剑桥大学中，具有典型代表性。他说，这样一种集中于学院里的生活方式，在精神的“封建制度”中保留下来，促成了对工人阶级的一种家长式和静态的态度。当权者们（如校务委员会委员们对学校雇员）的主要社会义务容易被认为是保障就业。“社会问题”基本上就是为群众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这种学术环境以同样的方式形成了凯恩斯与其他英国经济学家所感到的那种对商人的轻蔑：

校务委员会委员们将商人们视为比自己低劣的阶级是很自然的事，他们训练过商业行政管理人员，而且通常都是将其放在学术能力与表现的低等位置上。商业行政管理人员被认为是这样的人：应当为他们找出一些受尊敬却又是非学术性政府部门的就业职位，但他们不应当因他们的二流活动的成功而受到过分的奖赏鼓励。这般学究们同样会很自然地认为，商业与政治的现实世界所陷入的混乱，产生于低劣智识的缺陷，或换言之，由于缺乏类似于校务委员会与校务董事会那样一种集体决策制度。[47]

尽管他们彼此间存在广泛的经常有争论的分歧，像马歇尔与凯恩斯这样的局内人和像霍布森与托尼这样的局外者[48]，全都受到自穆勒以来的传统的影响，轻视增加生产和追求物质利益。与凯恩斯同辈的另一位经济学家罗伊·格伦迪（Roy Glenday）甚至更公开地显得超然脱俗，他身兼多职，在30和40年代任英国工业联合会经济顾问，可还是对现代“实利主义”抱有偏见。事实上，相当令人吃惊的是，格伦迪作为工业家们的一位顾问，竟然不赞赏工业主义对民族特性的影响。1934年，他警告说，出现了“一种新影响——城镇生活的自我意识或同机器的密切接触，或许已经扼杀了男人和女人身上人类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的一切感觉；现代机器能如潮涌般地生产出没完没了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使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可这些男女们看来却心满意足。”

<93>

像凯恩斯和托尼一样，格伦迪也渴望一个更恬静的未来：

我们置身于一个运动速率注定要衰减的世界中……这一衰减对那些习惯于在所谓进步之路上高速飞转的人来说，会有一阵子看来似乎是一个灾难。但人们不会长久如此看待的。当人们恰当地认识到速度与生活并不是一回事时，就会使自己适应新生活。[49]

当格伦迪和其他人看到30年代来临的“稳定状况”却屈从了战后的“富裕社会”，一批英国经济学家又求助于这种批判传统。一位财政部官员于1960年还企图指出西方新近增长的兴趣中隐藏着危险。他警告说，经济进步是破坏性的：

> 文明的最终结果是需要有一稳定环境的慢速增长……在容许或强使经济变化猛烈进行的环境中，松散无拘的经济动机只会毁灭这个稳定环境……提到一个其经济进步使统计学家感到高兴的社会，你就会提出一个其早期良好的生活质量正在衰败而且没有新文明出现的社会。有可能从这种邪恶中出现（经济进步的）好处，但经济学家不能问心无愧地佯装知道还有更多的好处。[50]

次年，国家煤矿局的首席顾问舒马赫（E. F. Schumacher）开始批评经济增长，这种批评在他那本畅销书《小就是美》（*Small Is Beautiful*, 1973）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印度（印度的精神价值观念吸引着他）的一次讲学中声称，“经济进步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才是健康的；生活的混乱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才是可容许的；追求生产效率也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才是良好的。”[51]

与此同时，在伦敦经济学院，米申（E. J. Mishan）在一篇考察他的福利经济学专业的限度的专门论文中，吹响了他反对经济增长的第一声号角：

> 幸福所最终依赖的那些事物，如友谊、诚信、美感等等，都不在它的范围之内……因此，现代技术的辉煌成就，更加快速的旅行，整日的虚假娱乐，年年度度充斥于世的世俗杂志和滑头玩意，都必然地依赖对效率的崇拜，对进步的专心追求和对物质成就的渴望，都可能对人类幸福是不多不少的一声丧钟。课上那刻板而又典雅的福利经济学永远不会揭示这点。[52]

60年代，米申对上述那位财政部官员焦虑地称之为“使人盲目崇拜 <94>

的那种工业总产量的进步”，继续发起全面批判。[53] 在《经济增长的代价》(*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1967）一书中，他将福利经济学的语言与阿诺德和罗斯金依赖的英国道德家们的语言结合起来了。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狂热”，已经削弱了对实利主义的传统控制，而这种控制对人类幸福至为重要。“增长狂热”加剧了资本主义养成的不满足和贪婪的倾向，使广告业制造更多的人为需求的努力合理化，以反复宣传“足够并非满足”的说教去腐化平民大众，使一切舒适而令人满足的生活方式都屈从于无休止地增加的交通与工业的需要。两年后他出版了一本更受欢迎的书，并在书中显得甚至更加慷慨激昂：

> 数代人之间，集中于城市、教区和乡村的丰富地方生活，就像遮蔽这些地方的森林和树篱一样，被变革之风连根拔起吹走了。今天，不复再有安全之地可以躲避那种追求更高效率、更加激动、更加新奇的令人绝望的普遍喧闹，这种喧闹驱使我们拼命向前，去竞争，去积累，去革新，最后不可避免地去毁灭。技术进步的每一步……都有效地将我们对其他人的依靠转变为对机器的依靠，而且由此必然进一步限制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同情的直接交流。因此，在无休止地追求进步之中，人们甚至被进一步驱散，而且反倒是为了他们得到的所有服务与经验，去直接依赖技术的种种创造。[54]

米申因而呼唤那富有人情味和宁静惬意的古老田园式英国的生活方式，而它却在迅速的技术与商业变革重击之下土崩瓦解了。经济增长看来是带有危险的陷阱，威胁着这个民族最深层处的价值观念。它正在变成特洛伊木马，要小心谨慎地予以检查而不是去拥抱它。米申就是以如此怀疑之心和抵触之情，去总结关于工业主义和经济增长的一个世纪之久的英国传统。

3

第三篇 <95>

向实际行为演化

引　言 <96>

我们知道，思想是有后果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业家的后代接受了这样一种幻觉：绿色而舒适的英格兰受到异己的工业主义的入侵，在这样的时候，这种幻觉就不得不影响到实际行为。20世纪的政治和商业，都带有一种分裂了的资产阶级意识所打上的烙印。这个曾是工业革命之母的国家，现在却对工业革命的后果感到困惑。那个培育出工业主义的阶级，看来也极希望否认这种渊源关系。其结果是两个自相矛盾的事物，一个在政治领域，一个在实业界领域。

过去一个世纪中的政治史，与欧洲大陆的政治史形成对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温和稳健的历史，源于亚当·乌拉姆（Adam Ulam）所说的所有阶级都“渗透了工业价值观”[1]。依照这种说法，所有主要政党都衷心地接受了工业社会的基本框架，只是在其安排细节上发生冲突。政界中不允许对这个社会有真正重大的批评。保守党和工党都趋向于“专家治国”而非意识形态。

20世纪20年代时，在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斯坦利·鲍德温和拉姆齐·麦克唐纳诸位首相领导之下，一种工业主义的或专家治国论的政治共识被认为已经建立起来。业已证明，这些首相都相信工业进步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现存社会问题。博纳·劳和鲍德温这两位首相本身就是商人。伯纳德·巴克尔（Bernard Barker）认为，对麦克唐纳来说，社会改革不依靠阶级斗争，而是依靠“效率、计划、组织、科学，依靠对经济变化的理解和对更多财富的自觉追求”[2]。

政治上温和稳健，是这样；但是对经济增长有意识地追求又如何呢？这在20世纪英国政治中不是很明显，因为政治也充满着另一套价值观念，与工业价值观念相对立。英国绅士的价值观念和关于绅士的虚构说法，如在更广泛的文化中一样，也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中“驯化”工业主义，将工业资本主义分成“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两副面孔。其结果，一方面是纯粹的反工业主义（比如说与德国相比）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则是政治领袖直到最近几年对全心全意追求经济扩张也缺乏赞助之心。政治反映了对工业社会的普遍矛盾心理，而在实践上则有助于抑制工业的发展，而不是刺激工业的发展。

<97> 在实业中，工业价值观念和反工业价值观念也混合在一起。英国也有世界上资格最老的工业家阶级，然而与国外大多数同样阶级相比，他们较少受到尊重，也较少表现出自信和阶级的骄傲。实业本身就像政治那样，也受到一般的中上层阶级文化模式的影响。实业家们日渐躲开作为工业企业家的角色而追求更受社会嘉奖的绅士角色（如有可能，还是作为地主的角色）。其结果是工业活力衰退，这就是英国中产阶级绅士化最引人注目和独一无二的后果。在20世纪英国的实业与管理的气氛和活动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精英阶级自我矛盾冲突的情景。

第六章 <98>

形象与政治

撰写一切人民的历史，应当少考虑他们的政府为动因的诸种事件，多考虑以政府为标志的那些事情的趋向。

——约翰·罗斯金:《威尼斯的石头》(1853)

第一节　保守党：托利主义反对工业资本主义

许多年前（1936年时），G. M. 扬便注意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自我矛盾，他说："在一个赚钱的时代中，总的来说，舆论却对出身要比对金钱更为恭敬。"而且，"在一个流动性很大、进步很快的社会中，那个代表僵滞、传统和旧事物的社会阶层，却享有最大的尊敬"。[1] 这种尊敬及其中潜在的紧张压力，构成了英国保守主义的特性。保守主义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的重建，是一种双向过程。托利党将其基础从土地占有者转向一切形式的财产占有者，从而为接纳新的中产阶级留下余地。用 A. J. P. 泰勒的话来说：到1918年，托利党已"赶上了现代世界"[2]。不过，这只是部分地赶上。托利主义的许多价值观念和看法，与工业的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并存于这个重组的党内。该党继续乞灵于这个国家的乡村精神。保守主义迷恋于乡村般的英国，如同把一个想象着的英国变成现实。富于南方隐喻的保守党人，倾向于以怀疑和厌恶的态度去看待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些主要特征——它的丑恶（或至少是混乱不堪），它的"实利主义"和它的不稳定性。该党的两位史学家，林赛（T. F. Lindsay）和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近来指出："自由市场的思想，及其对个人消费至上的强调，是与托利主义所主张的一切完全对立的。而对托利党来说，显然是应当使经济力量本身迁就适应已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3] 尽管托利主义消退了，保守主义也改头换面了，但其旧价值观及信念却未被埋葬，只不过变得隐蔽了。一位学者说：保守党"不得不与中产阶级握手言和，尽

管托利主义不会停止它反对崇拜谋取利润的斗争。利润第一主义、实利主义和投机活动全都遭到它的攻击。"[4]20世纪的演说家和著作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这些旧观念，无疑，这经常只是给政治花招披上原则的伪装，或只是给这个党披上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外衣，否则它会显得太赤裸裸地是一个商人的党。不过，它们的意义和影响就大为振振有词和合理化了。对要求助和认同的形象的选择，非常能说明演员和观众的价值观。在20世纪保守党人对昔日规范的呼唤中，人们已经注意到："可以看出托利党传统的持久影响，它不是对正在出现的工业社会进行后卫战斗，而是利用前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去使工业化进程变得温情脉脉或予以拦阻。"[5]奈杰尔·哈里斯（Nigel Harris）在他对保守党工业政策的研究中指出："由于内外的挑战唤起日趋增长的焦虑，就像自由派商人跑到保守党那里一样，似乎可说是'加入贵族'，所以，其他人也接受了为一个逝去了的社会所作的贵族式辩护。"[6]

保守主义认可工业革命的谨慎条件，在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的失败中体现得很清楚，张伯伦在20世纪初年未能以一项关税改革纲领夺取对保守党的控制。他提出了一种推动经济改革的、积极的、城市的和工业的保守主义版本。他先于其他主要政治家认识到，英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而又更困难的经济时代。为了防止国家的衰落，他号召把复兴经济当做政治的主要目标。他的号召却遭拒绝。一位历史学家总结说：

> 张伯伦所要求的正是爱德华时代的董事会应成为工业的掌舵人并仿效(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中的艾伯特·萨姆森……他要求的牺牲过于巨大了。实际上，他要求他们抛弃19世纪自由派主要理性传统的那种高枕无忧的安适生活，而这，无论是根据穆勒或科布登，或格林，或莫利，或斯宾塞，或霍布森，甚或是莫里斯那样的社会主义版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供一种

各种力量的最终调和，其中包含的焦虑越来越少，提供一种和谐与宁静，结束紧张狂热的冲突。[7]

张伯伦的十字军远征，不仅太“紧张狂热”，而且也显得太纯经济味了。罗伯特·塞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轻蔑地评论张伯伦派说：“他们看待政治的整个方式……在我看来完全是利欲熏心的和实利主义的，虽还不算是腐败的，但已走在通向腐败的大路上了。”[8] 以另一位塞西尔，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为代表的地主保守主义，击退了张伯伦和关税改革的挑战。贝尔福步其叔叔沙利斯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之后尘，领导着一个有贵族傲慢态度的新资产阶级政党。1891 年，他颇有特色地把他的继任者描绘为“不同寻常的爱尔兰首席大臣，一位成功的制造业主，并胜任制造业之外的一些事情。”[9]

<100>

保守党的领导权传给了一位制造业主，传给了一个在气质和观念上都非常不同于张伯伦的人。斯坦利·鲍德温（1867—1947）继承了伍斯特郡一座兴旺的钢铁厂，但他并未为工业生活所吸引。他出于“一种责任感”，继续经营该厂，但在买下一座带有小地产的乡村房屋后，他使自己在公众心目中成为了“农夫”（尽管农作之事都留给了佃户们和他的妻子）。[10] 在演说中，他一再提到这种自我形象和一种相应的国家形象。这位自称的“土地之子”在他那或许是为人引用得最多的演说中讲道：“在我看来，英国即乡村，乡村即英国。”[11]

鲍德温的母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乡村题材情节剧作家，吉卜林的近亲。鲍德温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种文化传统，这一传统要比他父亲的工业主义对他更有影响。鲍德温认为自己是一个想当小说家而未实现的人，对文人的喜爱更甚于对实业家的喜爱。他的儿子将他描述为“一位在商界人士中无所作为、不计较成功的商人”。[12] 从政之后，鲍德温的文学爱好在对公众演说中找到了用武之地。1930 年，一位持批评态度的观察家承认：“他作为一位代表公众舆论的首相，在当代英国政治家中几乎没有竞

争对手。”[13]他的演说集《论英国》(*On England*)曾多次再版，其中包括简装本。玛丽·韦伯(Mary Webb)的乡村小说《珍贵的毒物》(*Precious Bane*)经他一推荐，顿成极为畅销之书。《泰晤士报》在他退休之时总结说:“他阐明了英国的本质精神。”[14]鲍德温给这个国家的信息，正如他1933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极力主张的那样:“让我们坚持我们的本来面目吧。”英国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是乡村田园风光和对传统的尊崇:“乡村代表着永恒的价值观念和永恒的传统，我们绝不要让自己脱离它们。”[15]

鲍德温将国家与乡村等同联系起来，而他在一篇抒情散文中描绘的乡村，实际是数世纪中毫无变化的地方。英国最典型的“声音和景色是什么呢”?

> ……是乡村铁铺里锤子击打在铁砧上的叮当之声，是清晨的蛙鸣，是长柄镰刀在磨刀石上的磨砺声，是犁田的农夫远远地从山坡走过来的景色，英国开天辟地以来所见的景色就是土地，而且有可能是英帝国灭亡之后很久和一切工厂停止运转后仍会见到的景色，是无数个世纪中永恒的英国景色……正是这些事物构成了英国。[16]

<101>

鲍德温的朋友戴维森(J. C. C. Davidson)曾说起鲍德温煞费苦心地对他的雇员所说的话:“他们现在虽然在工厂里工作，但他们都来自土地，而土地正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之地。”[17]在威斯敏斯特的那些困难日子里，他声称，他一想到还存在的古老乡村生活，便会精神爽快，而且希望最终退隐乡居。关于他那可爱的田园般的伍斯特郡，他是如此宣布他的信心:

> 无论英国会发生什么，无论她的乡村会出现什么腐败污秽，无论会有什么庞大的建筑，也无论在她的道路上会有什么令人憎恶的嘈杂之音，至少在英国的这个角落里，春天里的果树花朵总

是盛开怒放，而且在这个地方，无论什么都是可爱的，好消息将会出现，并繁荣昌盛与世共存。[18]

如此这般的现实主义与一整套其他“托利”观念并行不悖。莫里斯·考林（Maurice Cowling）在鲍德温和他的同僚们身上看到：“这些保守党领袖在本来面目上有许多本能的东西与工党的某些思想有基本相同之处。有对百万富翁压榨的同样厌憎之情，有对显耀财富的同样讨厌，同样关心体面举止、德行并相信……富人负有慈悲对待穷人的责任。”[19]

鲍德温尤其受到政治意图中绅士观念的指导。保尔·艾迪生（Paul Addison）指出，在他的演说中，他“并未把提高生活水平或解决大量失业当做政治家们在国内的首要问题，而是把防止议会和英国特性免遭极端主义侵害放在首位”。[20] 他处理急切的劳资关系问题，至少在短期内是成功的，其办法是承认社会主义者对现代工业的非人性趋向的许多批评，将他父亲那座缓慢运行的家长式工厂作为一幅可爱的彩画，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理想推将出来。尽管他有进步的名声，这一名声来源于对劳工所受苦难的同情，但就像罗伯特·罗兹·詹姆斯（Robert Rhodes James）所观察到的：“实际上，鲍德温的观点是反动的，他总是寻求回到更温和的工业与人类关系的时代。”[21] 一位下议院议员提出一项限制公会对工党的补助的议案，鲍德温在要求他在下院的追随者否决此案时，求助于他那旧式家庭企业的精神：

它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从小就认识了这儿的所有人；在这儿我能够与他们不仅谈工厂的麻烦，也谈他们家中的烦恼和他们的妻子。正是在这儿，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曾经工作过，也正是在这儿，他们的子孙会自动进厂工作。这也是一个无人被解雇过的地方。[22]

<102>

现代工业有抛弃他童年时代那个舒适境界的趋向，鲍德温对此趋向

毫无同情。他在此趋向中发现了社会冲突之源。他认为1939年的现代工业的特点是："在狂热活动后又将大量工人抛入失业与绝望之中的周期变化。"重新确立一种人道的工作速度和安全措施，是经济中两大优先重点；追求效率不仅变得较为次要，而且也有可能有悖于这些需要。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一直反思这种工业制度：

> 运行变化更快了，人们难以使自己适应机器的要求。速度和单调乏味成为现代工人生活的两个方面，不仅需要雇主和雇工进行调查，也需要心理学家进行调查，因为这些工人有知或无知地处于我们四周随处可见的大量动乱的底层。

他认为自己要充当一位代表，代表"加速发展被视为文明的宣言之前那遥远的时代"[23]。

鲍德温向过去的时代寻求理想的工业观念。1927年，他被出版商公会接纳为荣誉会员时，他称赞该公会"诚实的工匠技艺"和"为他人服务"的古老理想观念，强调了在现代经济环境中已不时兴的这种理想观念。他对出版商们说道：

> 我们必须非常感谢你们，当"上帝之音便是永恒之语"作为一种深刻真理响彻人们头脑的时候，你们选择了自己的格言……如果这个公会是在今天成立，试想此时生活在我们之中的某些伟人可能会提出的格言，你们可能会把"奋勇向前"当做你们的格言，或者会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肥水不流外人田"或"没人为你吹牛就自吹自擂吧"当做你们的格言[笑声]。感谢上帝，幸亏你们的格言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并将代代继承下去。[24]

恰好，鲍德温当时最喜爱的一本英国小说，是威尼弗雷德·霍特比（Winifred Holtby）所著的《南区》（*South Riding*，1936年出版，1938年拍

成电影)，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手头拮据然而诚实的乡下地主如何挫败了投机者们企图在一处新房地产上发不义之财的计划。鲍德温大概算是一位制铁商，却在内心中认为自己和自己的保守主义正高举托利传统的火炬，坚持着古老英国的价值观念，反对非人性的和机械的商业主义的侵蚀。他认为商业主义扎根于“实利主义危险——我们时代的最大危险”[25]之中。

<103> 在此任务中，鲍德温的亲密朋友和同事爱德华·伍德(Edward Wood)，后来的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1881—1959)也参与其中。作为一个大地主，哈利法克斯子爵在20年代任农业大臣时表达了他的愿望：要将农业政策的目标从追求效率本身，转变为“在土地上保持土地所能供养的最多人口”。他几乎没有考虑采用机械，机械只会加快减少农村人口。他担心的是“工业城市中聚集的庞大数量的人口，这些城市的原型，那个一百多年前就为科贝特所憎恨和哀叹的‘大瘤子——人满为患的城市’(伦敦)，仍在今日的伦敦威胁着这个民族和民族特性”。[26]哈利法克斯的第一位也是赞美他的传记作者承认，他那关于乡村社会的观点是浪漫主义的。1941年，阿兰·坎贝尔·约翰逊(Alan Campbell Johnson)作了如下评论：

> 尽管他致力于同化新的社会趋势，但他仍给人留下了不理解现代技术文明的印象，他几乎是害怕此种文明，这或许是对他暗自同情甘地的一个解释。他公开赞扬一种有种种补助金的快乐英国的幻想，它作为一种理想和一个象征，正是甘地的手摇纺车的英国翻版。[27]

如同鲍德温那样，哈利法克斯也把保守主义看成是一种反实利主义的信条，喜欢提醒他的听众与读者注意：

> 真正的文明肯定不限于单纯物质要求的满足。每个房间里的自来水、无线电、电话、成群的汽车——所有这些公认的人类

进步标志，却在实际上并未对这个民族的精神道德发展起任何促进作用……它们可能正好起了反作用，危害人民的品质，剥夺人民的个性。[28]

莫里斯·考林曾说，对哈利法克斯来说：

“保守主义”是一种灵活变通的，甚至是漏洞百出的容器，由各种各样的塞西尔们和斯坦利们所建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即由（虽不是保守党的）格雷倾入许多辉格党的思想。就他们来说，正派体面、理想主义和土地占有者的美德，都被当做包扎伤口的绷带提供给工业社会。哈利法克斯贡献的是一种同“绅士”的责任与本能的观念相联系的[半宗教的]声调和态度。[29]

这样一种乡绅的政治幻想，由各种各样的保守党政治家和宣传家广为扩散。《保守党思想》（*Conservative Mind*）一书，由“一位拿扫帚的绅士”[新闻记者哈罗德·贝格比（Harold Begbie）]所著，是1924年广为流传的一本书。此书发扬光大了一种独特的托利传统概念，并将其与鲍德温、哈利法克斯和其他的政治盟友联系在一起，从而支持了鲍德温的兴起。贝格比描绘了一种活生生的托利主义，而它又是多年来由地主绅士们，由“创造出英国乡村无可比拟的美景”并赋予民族特性以最令人赞美之品质的人们所坚持下来。他宣称：“在我们这黑暗的动乱的工业生存状态中存留的光辉之物，主要是由于它们的传统而闪耀光芒。”

贝格比认为这种传统的真正声音，是由像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这样父亲般的、反工业主义的和反实利主义的地主绅士们所发出的。真正的英国保守主义一直在奋起反抗自由党人所引进的“经济混乱”，反抗由19世纪早期出现的错误方向。他断言：“我们在自己的民族生活中所继承的全部混乱，都是从工业革命时代遗留给我们的。”唯有同 *<104>*

古老英国保持联系的土地占有者们，方可将这些混乱清除出去。[30]

这种“传统”，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许多保守党人所呼唤。一位年轻政治家休·塞伦（Hugh Sellon）于1932年回忆说，英国最可贵的习俗惯例就是“我们所继承的英国的美景”，因为它培育出民族稳定性，而这正是喧嚣骚动的现代最为需要的东西。他解释说：“如果英国人在政治方面，比邻国人更能保持平稳和明智，大概是来自于如下事实：英国人从出生伊始所看到的就是和平景象和庄重的均衡协调，这在别处都不如在英国这般完善。”塞伦在一本为重新思考国家政策的倡议提出指导方针的书中评论说：“如果英国从未变成一个巨大的工业国家，可能反倒会更好一些。”他认为，正在消失的乡下人是“抵制错误的经济学扩散的民族卫士”，所以他把农村复兴当成他所倡议的新保守主义的一个关键点。[31]

在30年代，其他保守党人，其中最突出的是尤斯塔斯·珀西勋爵（Lord Eustace Percy，1887—1958），也发出了维护和复兴农村的呼吁。珀西在20年代曾任教育大臣，享有“思想大臣”的美誉，他把国家政府与知识界联系起来。[32]他深信土地社会优于躁动不安和实利主义的都市社会，并在书中和广播谈话中极力鼓吹“强化我们祖国的高度教养”。应当帮助人们向往土地，而且，一旦如此，又应鼓励他们“以……工匠的技艺取代‘进步’意识”。[33]珀西把1929年后的经济风暴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经济学家们惯常所称的‘稳定状况’的开始”。此前三百年的轻率扩张乃是反常变态之举，因而不得不宣告结束。珀西对此并非十分不快，他将此看成是创造（或重新创造）一种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的机遇。这个“活着只是为了张大胃口”的国家，已受害于使之衰竭的消化病症。然而，这种失调症还仅仅是威胁其性命本身的“恶性贫血”的一个先兆症状而已。这个国家唯有“回归到一种更简朴和更奋发的生活方式”才能挽救自己，<105>“它必须努力工作去获取财富，但它必须是一种使生活显得高尚有尊严的财富，是可以享受而非仅仅只是消费的财富”。

珀西预言，英国将会重新恢复“在经商发财之前一直主宰社会的准

则”。这样的社会，举例说，就像是“出现英印富翁之前的17世纪英国”。他赞成自给自足观念，因为它既是“一种在社会效益方面不亚于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经济活动”，又是“一种比崇拜工业效率更为高贵的道德理想”。他认为英国特别适合于这样的新经济时代，而且，由于美国的位置更利于去追求“她那虽然是更乐观自信但肯定是更不高尚的”无限制发展试验[34]，英国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除了法国）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珀西所编的专题论文集《保守主义与未来》（*Conservatism and the Future*）的一位撰稿人论证说：“在向外国贷款或在出口制造业中，都没有我国人民特有的特色。”[35]一大群有托利趋向的作者们响应了此种观点。珀西坚定地认为：“大不列颠已在扩张的雄心和精力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也同样能在审慎的巩固工作方面走在世界前列。”[36]

甚至那位与党内鲍德温－哈利法克斯派最不和的保守党人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也依然按照英国的“南方隐喻”进行许多思考。鲍德温的财富来自工业，然而，他却以一种乡村方式去看待这个国家，丘吉尔则是生来如此。丘吉尔出生在布伦尼姆，深浸于上层阶级的传统中。他思想中的英国特殊形象及其过去，比其他任何主要政治家，甚至比鲍德温都要多。在丘吉尔的思想与行动背后，有一种特定的英国历史观念。作为马尔博罗（Marlborough）的毫无愧色的后裔，丘吉尔在他的史书中强调英国的军事胜利和帝国扩张——即以“大不列颠”对抗鲍德温的“小英格兰”主张。然而，与鲍德温一样，丘吉尔关于民族历史的观念是陈旧的和怀旧的，而且工业革命及其所产生的全部政治与社会变化在他的这种观念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丘吉尔所认为的英国，就像鲍德温所认为的英国那样，不是现代伦敦、曼彻斯特或伯明翰的英国，而是地主乡绅、约翰牛农夫和坚毅的约曼农的英国。在丘吉尔所著的《英语民族史略》（*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一书中，他像布赖恩特一样深深地着迷于阐释英国的传统。这使他成为一个处于围困中的民族的光辉象征，但是却模糊了他对当前现实的眼光。J. H. 普卢姆评论说：

附加在谢菲尔德的钢铁厂或曼彻斯特那乱七八糟的郊区上的加冕典礼般的壮观虚饰，从未使他觉得古怪，对他来说一切正常。这个岛国的人民或许会受到未来的威胁而严阵以待，但只要他们聚集在他们的君主和议会周围，就可能蔑视世界。[37]

<106>

20世纪的乡绅保守主义，如丘吉尔的情况所表明，既有纯粹的托利派贡献者，也有辉格－自由派贡献者。维多利亚时代的辉格主义总是以两副态度对待城市工业社会的进步，而这个工业社会又难以容纳于英国的乡村美景中。伦敦郡议会的自由党主席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于1891年坦白地说：

在我的头脑中，没有把对伦敦的看法与骄傲联系起来的念头。伦敦的可怕形象总是让我担心，使我沮丧的是如下一个巨大而令人惊骇的事实，数百万人似乎是偶然出现，聚集在这条高贵之河①两岸，各自在自己的巢穴工作，彼此不关心或不了解，互不留心在意，一点也不知道其余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对无以数计的成千上万人伤残死亡毫不在乎。六十年前，一位伟大的英国人科贝特，就已将伦敦呼之为大瘤子。如果当时它就是一个大瘤子，现在又如何呢？它还是一个肿瘤，一种象皮病，它把乡村地区半数的人连骨头带血地都吸进它那狼吞虎咽塞饱了的肚皮里。[38]

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是另一位自由党地主和头面人物，1905—1906年曾任外交大臣，他甚至是以更毛骨悚然的心情去看待现代世界中“丑陋可怕的城市”和“令人可怖的竞争”。1912年，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如果上帝也有他这种看法，“那么这些巨大的工业国家将会

---

① noble stream，指泰晤士河。——译注

在灾难中毁灭，因为它们已经使国家变得可怕，并使生活变得难以为继”。他一弃官离职，就立刻吐露说：“我深信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应该消失。我认为我总是下意识地知道这点，但我是按自己看到的那样去看待事物的，而且三十年来，一谈到进步，就好像是维多利亚工业时代的放大，就好像是导致产生电话、电影、大城市和《每日邮报》的任何东西都是好的。”[39]

辉格党脱离并蔑视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这个社会的态度，并不只限于有贵族家庭背景的那些人。如我们前面所述，像特里维廉这样的自由党人，对地主乡绅和强健农夫的前工业社会的英国，甚至抱有更多的怀旧之情。有许多人，像最后一位自由党首相阿斯奎斯（H. H. Asquith）那样，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但又拒绝认可支撑他们的那种生活。阿斯奎斯是一位约克郡毛纺织厂经理之子，可是随着他从牛津大学巴立奥学院毕业并通过律师界晋升到统治集团后，他就清清爽爽地脱离他的原有出身。到了他上台掌权之时，他就傲慢地把反对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一位打破托利贵族继承领导传统的铁商）称为“镀金的商贩”。[40] C. F. G. 马斯特曼讲了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故事，这个故事贴切地表明了这种矛盾：内阁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将食物和军需品运往英国可获取大量的投机利润。阿斯奎斯说“可恶”，

<107>

> 一位大臣立即抗议，声明说这原本是经商的正常之事，如果他们的人不这么做，别人也会同样干。他宣称这些人如不把这些物资运往英国而是选择运往中立国或盟国，会获取同样多或更多的利润。他说：“我并不认为这种交易有什么可耻的。”阿斯奎斯先生颇有特色地耸了耸肩说：“我没有说可耻，我说可恶。”[41]

极而言之，对城市的工业主义的不满和对古老乡村英国的怀旧，都能培养出法西斯主义式的政治情感。在爱德华·格雷爵士那里还仅仅只是过分挑剔的东西，在别人那里就会变成邪恶之事。1922 年，“一位英国侨民”

哀叹英国实力的衰落时责怪为“血液中毒”。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犹太人已接管了英国，一种世界性的都市生活正在窒息着真正的民族。另一位极端分子洛登·霍尔（Rawdon Hoare）在帝国别处待了十四年之后回国，发现1934年的英国颓废堕落了。和平主义与享乐主义盛行，而且正在全力以赴地美国化。在土地投机者、经常是犹太人的操纵下，无限制的城市扩张正在摧毁乡村。这些作者们指望着乡村中的传统因素，将其视为这个民族的心脏还在跳动的象征。“一位英国侨民”指出，体面地隐居在家园的是真正的英国人，他们无论身居华厦或寒舍，都以某种方式设法保存自己并保留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当然，还保留了他们的悲伤。斯特普尔顿爵士（Sir R. G. Stapledon）是一位首屈一指的农学家，他主张复兴乡村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从遗传学来看，乡村血统要比城镇血统更为健康，是更为纯净的英国血统。布莱迪索勋爵（Lord Bledisoe）是一些农业组织的领导人，他在给另一部呼吁重新在乡村定居的论著写的前言中论证说：“与大地母亲的联系，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剂最强有力的解毒药。”[42]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谴责了从“快乐的英国”到“血汗工厂及贫民窟”的转变过程——“可爱的绿色乡村变成了证券经纪人的游乐场”。[43] 莫斯利还把“强壮的乡村血统”和“英国农夫”与“长发的知识分子”那种堕落的都市形象做了比较。这样一种“冷酷无情”的、种族主义的乡村神话变体，长年累月地反复出现，尤其是在鲍威尔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演说之中表现得最突出。一位传记作家将鲍威尔描绘为“有冷静的逻辑思想家的名声”的政客。从1964年起，他以一系列浪漫的演说，使那些凡夫俗子般的政客们大为震惊，这些演说把对有色人移民的敌意和要求英国人民回归到民族文化本体的呼吁混合在一起，而这种民族文化本体存在于英帝国扩张和工业化之前，他还呼吁英国人民要认识到他们“又一次”与中世纪的“古老英国血肉相连”。[44] 鲍威尔的演说可不是“开玩笑”，而是利用了那个已渐渐渗透中上层阶级文化的英国神话。他的这些演说充满对田园诗般和历史悠久的英国的种种美景美德的呼唤，

<108>

也几乎充满了对奥斯汀、吉卜林、豪斯曼、曼斯菲尔德及其他许多作家的拙劣模仿；而且与较先的托利政治家斯坦利·鲍德温的演说如同姊妹篇。例如，在一次演说中，鲍威尔吁请他的及他的听众们那些早已故去的先辈们讲叙英国：

> 他们会说什么呢？他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英语语言对我们说话，这语言原本用来叙述真理，却已转作如同春愁的鸣声缠绕着听者。他们会向我们讲述在那奇妙不可思议的土地上，气候宜人，风调雨顺，一年四季无可挑剔；他们在原野上建起他们的楼宇，他们的乡居，他们的教堂，也是在这里，桃李花开，落英缤纷，洒向他们和我们；他们一定还会向我们讲叙英国的河流、山川和海岸。[45]

虽然鲍威尔可能只是随声附和鲍德温，但效果不一样。部分原因是文化正在发生变化；20 和 30 年代的重要东西到 60 年代却开始显得古怪（我们随后将详论这点）。部分原因在于如此追求辞藻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显得花哨：鲍威尔的思想是激扬的、咄咄逼人的和急进狂热的，与乡村神话通常的温和提法大相径庭。其语言太令人熟悉了，但用法显得任性和危险。20 世纪英国政治的主流常常是沉浸于乡村神话中，只不过是变了花样，采用了种种调和、巩固并维持现状的政策。

乡村神话及其相关的“乡绅”思想情感，在统治管理上打下自己的烙印，但不是以莫斯利或鲍威尔那样的极端形式，而是通过受人敬重的中间派形式，赋予经济政策以一种特定模式。“乡村英国”的理想有助于压制竞争和革新。回避冲突、防止变化无常、十分轻视实利主义，全都变成了政府见解和行动的宗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对国民经济发挥的作用正具有广泛的重要意义，而恰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种视工业为没法不要的邪恶，视革新和竞争为冒险和不那么体面之事的心理，早已渗透了政府和政治。

鲍德温的保守党和各界全国政府，尽管它们有商业成分，但在许多方面为20世纪40年代中的受控经济铺平了道路。实际上，鲍德温已被称为“我们的集体主义者首相中的第一位”[46]。据称，鲍德温时的保守党“大力破坏着（如不是摧毁的话）自由资本主义结构”[47]。鲍德温政府倾向于加强市场调节控制，这部分是由于工党政治竞争的推动，但也来源于感情上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疏远。在作为维持现状（以及保守党本身）的屏障这一限度之内，工商业得到保守主义的支持。工商业作为一种能动力量带来变化、搅乱社会秩序和传统社会准则，保守主义是不会予以支持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建立，既得到了几乎所有上层舆论的欣然赞同，也是以下情况的一个较早表示：

<109>

> 这儿是一个伟大的新领域，拥有无限潜力，从一开始就应排除私营企业和竞争。其理由完全是家长式的。据说，竞争会导致娱乐价值观、陈腐和轻浮的节目占据主要地位。只有在消费者要求时竞争才会导致这些节目充斥，这一事实看来并未被当做一回事。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极少数人决定，支配广播性质的价值观念应当适合顺应他们自己，唯有他们才知道什么东西对其余公众是“有益的”，其余公众只能喜欢它或是勉强容忍它。[48]

1935年，鲍德温宣称自由放任主义如“奴隶贸易”那样死亡了。[49]政府一方面割断与资本主义污秽形象的联系，一方面鼓励一个广泛的工业运动，这个运动趋向一个有组织的市场分配和固定价格与产量。这一发展十分适合许多托利党人士的思想。阿瑟·布赖恩特满意地指出：“工业正在回到古代中世纪的实际合作与相互协议的做法上去，取代了19世纪的极端抗衡竞争。”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正是党内青年激进派的一个领袖时，也表示了赞同，认为要振兴“社会的有机观念，这种观念是中世纪思想的杰出贡献”，并以此取代“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50]

至1939年，英国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已是与国家合作的非竞争性

私人企业。政府已作出一些努力去恢复秩序化的经济，这正是旧托利党人曾为之反对早期工业时代咄咄逼人的个人主义冲击和为之徒劳捍卫过的经济。政府对付工业困难的牢固模式已经建立起来。如此取得了稳定，但也付出了代价，如林赛和哈林顿所说："政府支持现有的工业结构，甚至到了给予补贴的程度，政府反对变革和革新的种种力量，虽然这些变革和革新的后果对某些陈旧工业和地区来说是冷酷无情的，但对于稳步提高生活水平的趋势来说却是主要因素。"[51] <1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模式在保守党对待工业的态度中继续保持下来。农业又一次受到吹捧赞美，但并不是简单地当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是当做发扬光大民族精神所需的土壤来赞颂。甚至像巴特勒（R. A. Butler）和昆廷·霍格（Quintin Hogg）这样并非乡村地主的保守党人，也对乡村神话顶礼膜拜。1948年保守党大会上，巴特勒颇有典型意义地吟诵说："在挽救农业时，我们挽救着比我们自己的经济更多的东西。我们正在挽救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色就是仁慈、自由，尤其是智慧。这些就是乡村男女同胞的优秀品质。他们本能地赞成保守党政策，他们对我们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52] 此前一年，自称为城里人的昆廷·霍格，在他那本广为流行的小册子《为保守主义声辩》（*The Case for Conservatism*）中，把乡村生活描绘成对保守党价值观和国民福利都是很重要的："保守党认为农业不仅是一种产业，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对社会的福利至关重要，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是这样……保守党认为——而且迄今为止科学已经证明——一个纯粹的城市社会会趋向于灭亡。"霍格认为，激励保守党政策的乡村传统价值观念之一，就是对谋利动机的限制；在工业和在农业中一样，"良好的家政"都意味着要利用谋利动机，但不让谋利动机成为主宰，"因为谋利动机如果成了主宰，我们就将践踏我们得自旧时代的遗产"。单纯谋利的经济，相当于美国的"干旱与暴政成灾地区的农业"，是历史悠久的乡村英国经历的对立物。[5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保守党领导集团远离工业，与工业界领袖的直接

接触简直少得令人惊讶。这种情况在丘吉尔和艾登（Eden）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两人出身土地贵族还情有可原，但在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如巴特勒和麦克米伦身上竟然也同样明显。[54]虽然保守党议员中位数颇多的一个少数以经商开始他们的生涯，但在他们之中却看不到有特色的“商业”观念，尤其看不到“工业”观念。[55]相反，通常的情况是，保守党头面人物鄙视暴发富商的粗俗举止和生活作风。[56]保守党领导集团以扩大保守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距离，作为对工党1945年大选获胜的回答。欣琴布鲁克勋爵（Lord Hinchingbrooke）代表1943年由三十六名议员组成的托利改革委员会，就已经宣布：

>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个人主义”的商人、金融家和投机者们对国家造成了损害，真正的保守党人对此深感惊恐。这些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任意横行，并无声无息地溜进了保守主义的信徒中，以他们的选票损害保守党，通过对议会施加影响而玷污责任制政府，损害人民的品质。没有什么比他们卷起铺盖走开更好了。[57]

<111>

欣琴布鲁克的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有影响力。1946年，奥布里·琼斯（Aubrey Jones）认为，保守党不应当让自己同工业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19世纪在英国兴起的工业体制……是自由主义的产物，曾遭到当时保守主义的正确反对……保守党人……希望清除工业革命的恶果，他们对此恶果并无特别责任。”[58]同样，昆廷·霍格在《为保守主义声辩》一书中，声称他的党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的最悠久传统，它将资本主义批判为“为了不义之财而进行邪恶而贪婪的抢夺，在抢夺中，富人更富，穷人更穷”。[59]

这些观点得到了最高层次上的响应。艾登在1947年保守党大会上宣称：“我们不是狂放无羁和残忍无情的资本主义政党，而且从来都不是。”麦克米伦早在1936年就坚持认为，“托利主义总是一种父亲般的社会主义

形式。”[60] 但是，该党的辩护士们告诫说，它的社会主义从未陷入实利主义的泥坑。1949 年保守党准备迎接下次大选的正式宣言《英国的正确道路》（*The Right Road for British*）宣布：

> 保守主义宣布，纯粹的实利主义哲学无法解答生活之谜，科学发明创造①和经济进步必须服从人类精神的需要……人是一种精神造物，他冒险追求永恒的命运，而科学、政治和经济是好是坏，全都取决于它们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在此永恒之途上的个人灵魂。[61]

① 原文如此。——译注

第二节　教士：经济增长与道德社会

保守党这个声明中强调灵性的调子，应当使我们想起中上层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宗教。它既不完全等同于保守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既代表着又影响着广大舆论。在此方面，英国国教尤为如此。英国国教尽管人数减少了，但仍是一种形成公众言行和政策的强大力量，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是这样。而且，尽管其内部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差异，仍几乎可以说是在国教的左、右两翼中有一种共同的贵族绅士价值观和态度。

20世纪最著名的保守主义教士，无疑当推威廉·拉尔夫·英奇（William Ralph Inge，1860—1954）。他是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作为一名宗教学者和神学家，就已小有名气。1919年，<112> 他出版了《坦率陈言书》（*Outspoken Essays*），顿时声誉鹊起。该书在三个月内再版五次，三年后又出版了第二卷，两本书最后总共售出近七万册。此书收集的是发表在诸如《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和《希伯特杂志》（*Hibbert Journal*）等期刊上的文章，对于这样一本文集来说，七万册这样一个发行数字是颇为可观的。尽管《坦率陈言书》中有一些神学文章，但对普通读者有吸引力的是英奇敢于大胆设计世俗和热门的问题，如爱国主义、出生率，以及英国种族的前途等。颂扬性评论刚一出现，新闻报道便蜂拥而上，这位已被《每日邮报》戏称为“阴郁教长”的英奇先生，就被推上了作为两次大战期间英国公众的圣人的生涯。英奇定期为《旗帜晚报》撰稿，该报拥有五十万

份的发行量。他还不时为一些其他报刊撰稿，就像约翰·雷蒙德（John Raymond）所说，他变成了“鲍德温时代的一位独特人物”[62]。

尽管他的名声犹如坎特伯雷大主教所描绘的具有“思想上的独创性并有时有些怪癖”[63]，但英奇在许多方面仍然完全是自由职业阶级的普通一员——有狂热的爱国主义，怀疑左翼知识分子，为公学感到骄傲，并且还是板球爱好者。作为20和30年代的中产阶级的指导者，英奇经常蔑视，甚至怒斥工商业生活。早在1906年，他就谈到了“工业竞争的庸俗性”。[64]在他喜爱的格言中有一句就是华兹华斯所说的：“在赚取与消费之中，我们浪费了自己的力量。”他宣布说，现代生活的不满之源在于“对敛聚的强烈爱好”。对于他称之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东西，他越是猛烈抨击，买《旗帜晚报》的人就越多，为的是及时看到他的最新世俗布道。这位教长以简单化的语言重复维多利亚时代那些伟大的文学批评家——阿诺德、罗斯金及其他人——的责难之词。但是，正是他对他们的庸俗化，表明了一种对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抱经济信仰的普遍解脱。英奇总结这种19世纪的信仰，为的是对它大加嘲讽，嘲讽这样一种“神话”，即“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依靠增加财富与人口，增多生活用品以及妇女衣饰的小配件”。他在30年代末还坚持认为：“经济至上，属于19世纪；它创造了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精髓，在此一百多年的西方文明中打下它的烙印。经济主义就像在对其他器官的生理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研究胃的科学。”[65]

这一嘲讽绝对算不上是激进的，因为英奇在劳工运动中发现了经济主义罪恶在当时的主要表现，它以贪婪的实利主义威胁人类价值观念。他喜欢将旧式的资本家与新异的社会主义者等量齐观，认为两者都是非自然的工业体系在道义上的危险产物。1926年的大罢工使他深为惊恐，他将这次大罢工完全归因于反社会的和不爱国的小团体主义，而它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诅咒”。[66]

<113>

大萧条①使英奇更感忧虑，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否定那个使英国跃上财富与力量之巅的时代——19世纪。他在30年代末期宣称："这个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场的整个插曲与英国人民的精神品性格格不入。"[67]在另外一个场合，英奇还把19世纪描绘为仅仅只是以高贵的理想主义之乡著称于世的一个国家的历史中的一个"插曲"而已，而"这个国家是莎士比亚与弥尔顿、华兹华斯与雪莱、丁尼生与勃朗宁的国家"。[68]

工业革命已使英格兰偏离了它的真实本质，它可以指望日后恢复本样。"我们的小岛国有过获取粗俗的物质胜利的时日，以后我们应当把注意力转向更高尚的东西。"[69]英奇很高兴地接受了流行的暗淡经济预测。他的这一接受远远超过了现实主义，表露出对实利主义明显失败的满足之情。英奇用一种"更高尚"的民族的世界作用的前景，去抚慰他的经济悲观主义所困扰的一切读者。他说："在智识与精神上，我们（能够）为人类的真正财富作出巨大贡献。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得到外国的同情与赞颂，要远远超出我们大肆炫耀的繁荣所带来的妒忌与甚至更多的厌恶。"[70]

英奇在圣保罗教堂的继任人马修斯（W. R. Matthews），延续了英奇对"经济主义"的谩骂抨击。在英国广播公司于1934年举办的一次称为"英国往何处去"的专题讨论会中，马修斯警告说，不要让当时的萧条把政治转向实利主义。"一个国家，远远超出一个经济单位……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一个董事会，而且在保留某些比物质财富更珍贵的东西方面"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品性"。"英国人民独具的天资"已表现在这个国家的自由政治制度中，保持它们，而不是经济复苏本身，才应当是国家的当务之急。[71]

那些公开表露他们的基督教徒品性又拥有广泛读者的世俗人，与英奇这样执笔著述的教士并驾齐驱。一家中产阶级口味的报纸《伦敦插图新闻》（*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为这些观点提供了一个每周论坛（在一

① Great Depression，指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译注

个叫做“我们的笔记本”的栏目中），该论坛从1906年至1936年发布了G. K. 切斯特顿的观点，从1936年起则发布了历史学家阿瑟·布赖恩特的观点。在现代英国文化中，切斯特顿是一位更大的人物，但布赖恩特也发 <114> 挥了一种重要作用。我们已谈到过他了，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将民族特性追溯到乡村，并撰写了“工业革命及其弊害”的历史。布赖恩特也参与了保守党事务，在阿什里奇的保守党“政治学院”任教，而且还为斯坦利·鲍德温撰写讲演稿。从1936年至70年代，他经常向广大听众详述一种基督教的、保守的和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哲学。他颇有特色地哀诉说：“在使人超脱于野兽之上的精神价值观念中，我们的时代及先于我们的那个时代都已经可悲地破产了。”自私、渴望占有、崇拜效率，以及物质进步——这些就是逐步起着支配作用的价值观。[72] 他宣称，“卢德派①是正确的”：机器虽使这个世界变得富裕起来，但也剥夺了工人的生计。总的来看，工业革命“迄今来说对人是弊大于利”。在人类的基本需要方面，18世纪的乡舍可能更好一些。[73]

布赖恩特希望回归到传统的民族价值观念中去，这种价值观念以生活的“质量”而非“数量”为中心。他在他的首批专栏文章之一中反省说，“在过去，英国自夸的一点就是我们教导各民族怎样去生活。17世纪，我们自称是伟大的人民，这种自称几乎完全是基于对生活质量的某种理想的民族热情”。在随后两个世纪中，英国的精力却转向一味追求财富与力量。“现在，兜了一圈又回到原样，追求财富与力量似乎不再吸引我们了……很可能的是，以后五十年会目睹回归到我们传统的英国作用：宣扬并实践生活质量，并再次教导各民族怎样生活。”[7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布赖恩特加入了要求社会改革的日益高涨的呼声，他期盼着

---

① 19世纪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工厂主的英国自发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据传由叫卢德的工人首先发起。——译注

> 有这样一个世界，男人们和女人们制造物品主要是为了使用而非为了利润——即全力创造科茨沃德地方的谷仓和中世纪教堂的那个世界，与现代和技术相对应的世界，而不是那个制造出贫民窟、偷工减料建造的房屋以及排队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曼彻斯特自由放任主义和俗丽便宜货的世界。[75]

英奇和布赖恩特的反工业的托利圣公会教义，为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世俗知识分子共有，其中包括刘易斯（C. S. Lewis）和查尔斯·威廉斯（Charles Williams）。这些人中最突出的是艾略特（T. S. Eliot），他在30 <115> 年代从像《荒原》（*The Waste Land*）这样的诗歌中含蓄的社会批评，转到散文中的公开批评。他吸收其他圣公会教徒论著中的思想，警告说：

> 建立在私人利益原则之上的社会组织，犹如公开破坏一样，既导致以无羁无绊的工业主义造成的人性畸变，又导致自然资源的耗竭……我们的许多物质进步将使后人们可能不得不为之付出高昂代价。[76]

如果工业资本主义，至少不为圣公会右翼所欢迎，那么它甚至更不为圣公会左翼欢迎了。教会圈子中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无疑当推托尼，在攻击"经济主义"方面，他把英奇远远抛在后面。就像许许多多的教会保守党人一样，托尼也受教于一所著名公学（拉格比公学）和牛津大学巴立奥学院。工业革命时期，他的祖辈们曾在啤酒业、银行业和工程机械业中享有盛誉，但对这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来说，这些祖辈们可能从未存在过。艾什顿（T. S. Ashton）回忆说，由于巧遇，托尼银行公司的记录文件被交给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但要引起这位孙子的一丝兴趣，却证明是不可能的事"。[77] 托尼于1920年还坚持认为，"尊崇经济活动和工业以及被叫做商业的东西"，是"物神崇拜"：

就像一位疑病症患者，是如此专注于他自己的消化过程，以致在他开始生活之前就先走向坟墓，工业化社会在为获取财富而狂热地迷恋着获取财富的手段之时，却忽视了它这样做的价值所在的目标本身。

纠缠于经济问题，既是狭隘和短暂的，又是可憎和烦人的。它对后人将显得又可怜又可鄙，就像17世纪纠缠于宗教争吵在今天看起来这样；实际上，既然它所关切的目标并不那么重要，它也就越缺少理性。[78]

托尼以轻蔑眼光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英国在世界上经济地位下降所表示的关切：

当一位内阁大臣宣称说，这个国家的伟大取决于它的出口量，以致出口较少的法国和几乎没有出口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都被完全当做劣等文明予以怜悯，这是……把一小部分生活同整个生活混淆起来……当新闻界吵吵嚷嚷地说，要使这个岛国变成阿卡迪亚，所需要的一种东西就是生产力，更多的生产力，这是……把手段与目标混淆起来。[79]

这种实利主义混乱吓坏了托尼，他寻求通过写作、教学和政治去"扭转"现代经济的有害倾向，并建立"一种约束经济胃口的规范"。[80]他不仅在工党内（他对工党有巨大影响力）坚持自己的使命，也在英国国教会内这样做。托尼是一位国教徒，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国教会内的学术舆论具有极大影响力［大主教坦普尔（Archbishop Temple）的观点也非常直接地受到他的影响］。[81]托尼依赖于一种英国国教会社会批判的积极传统。[82]国教会的领导集团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跟随他们所由出身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的普遍思想运动，不断地加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几乎所有的主教、教长和牧师们，都受教于最出名的公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

<116>

学，他们很自然地对工商业界抱有厌恶和非难的态度。在这个圈子中谋生的实际需要，使这种倾向在他们中间泛滥起来，并经常把这种倾向强加给他们的许多同伴。教士的社会态度变得更为同情社会主义——实际上，最激进的教会领袖也趋向于成为最上层阶级。这种道德的和反实利主义的激进主义，是一种更广泛的脱离工业资本主义及其价值的社会态度中的一部分，许多像英奇教长这样的非激进派教士也持有这种社会态度。

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国教会内的一些社会批判集团兴盛起来。它们经常攻击工业主义本身。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政治、经济与公民品德各教派联合大会”（COPEC），它是由坦普尔及其教会中的盟友于1924年组织建立的。它的世俗成员主要来自自由职业者和社会服务自愿人员。它在随后很短几年中的报告，依据其主要成员托尼所构造的历史框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规范的批判。对中世纪、行会以及理想化早期乡村时代的娱乐消遣的怀旧之情，深深渗透了这个组织。[83]

更激进的（或者反动的）集团仍很活跃，如康拉德·诺埃尔（Conrad Noel）的“天主教十字军”（它把一种共产主义与中世纪精神、盎格鲁－天主教教义结合在一起）、“上帝王国联盟”以及“全国行会同盟”，后者把世俗的社会主义者和教会中的行会社会主义者汇合在一起。[84]“全国行会同盟”成立后，它的许多国教会活动分子重又出现在“基督徒集团”中，这是20和30年代的一个松散组织，致力于创造一种新鲜的基督教社会哲学。尽管在当时，尤其是1929年后，大量失业显然是主要社会问题，但“基督徒集团”仍然觉得生产问题对它几乎没有吸引力。它的成员的兴趣集中于另外一个方向：创造一个生产问题将不再起支配作用的社会。该集团的思想核心是行会思想，是农民对分配财产和自给自足的理想以及对“国际金融”的仇恨。其会议和集团的刊物中，被瞄准攻击的是工业主义的种种精神危险、流行的消费形式以及后来所称的“富裕社会”。该集团的领袖之一，威德林顿（P. E. T. Widdrington）攻击娱乐业是一种危险势力，并对大多数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深感遗憾。[85]“基督徒集团”中的许多人走得

<117>

更远：首届工党政府的副检察长亨利·斯莱赛爵士（Sir Henry Slesser）痛斥技术进步本身，并论证说，基督教的本质就在于将兴趣从物质方面转移到精神方面。[86]

1941年，大主教坦普尔为讨论战后重建问题召开了马尔文宗教会议，"基督徒集团"在大会上获得了最大的承认。它的思想支配了这次会议，并据此形成了大会的报告。这年，"基督徒集团"的知识分子出版了一本书，发出了新的全国性"神召"：由于英国曾领导全世界进入工业主义，它现在能够向全世界昭示出路以赎罪。它可以完成这一新使命，因为它从未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工业主义；它的乡村灵魂，就像作曲家瓦格纳的日耳曼英雄，正在等待着一个醒悟到其毁灭的国家的重新召唤。这些人指出，撤退能标志一个国家的新开端：结束城市统治，复兴英国乡村。[87]这样的观点也反映在马尔文宗教会议上，这次大会的报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一种孤立的邪恶"，而是由资本家的工业主义所造成的广泛弊病与失调的一种症状。它解释说，现存的工业秩序

> 连同我们社会特有的渴求财富的倾向，趋于不顾后果和亵渎圣物般地对待自然资源。它已导致了农业社会的衰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群氓"问题，这些群氓意识不到精神和社会状况仅仅只是生产机械的一个原子，并且很容易产生自动响应巧妙宣传的暴民心理。

这份报告强调说，宗教信仰的衰落，最明显地表现在东南部城市的心理中，报告还哀叹新的技术阶级的"机械思维"。报告结尾是怀旧地回顾古老的英格兰，那时候宗教强盛，而工业尚未诞生。这次会议呼吁复兴农业，以便人们回归土地。它宣称，这种回归能够复兴"真正的社会，这种社会在乡村中才是可能的，因为它在庞大的城市中是不可能存在的"。[88]

马尔文大会标志着这种思想达到高潮。两本包括马尔文大会会议记录汇编的小册子共售出一百多万份。在这次大会的影响下，坦普尔所写的 <118>

《基督教与社会秩序》(*Christianity and Social Order*)又售出了十四万多册，将马尔文大会上表达的许多思想扩散到更大范围。虽然在此之后反工业的情感在教会内部开始衰退，但在总体上，积极的情感仍无法将其搁置一旁取而代之。教会依然是乡村浪漫主义的积蓄之地，依然是对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感到不安的主要场所。[89]

第三节 劳工:“快乐英格兰”的梦幻

乡绅传统在左翼方面的影响当然比在右翼方面要弱些，但绝不是没有。而且，它那变弱的色彩得到有关“乡下人”文化传统的影响和乡村神话的人民面孔的补偿。正如鲍德温和哈利法克斯（还有教士们）曾求助于威廉·科贝特的精神和英国乡村的古老传统那样，激进派也是如此。J. H. 普卢姆指出英国激进主义中这种向后看的乡村思潮，声称若“不理解威廉·科贝特”，就无人“能理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甚至是今天的工党在英国的发展”。他说，自从科贝特的时代以来，“关于一个天堂般的英国的梦想，一直缠住英国激进主义，这个天堂般的英国是长者的、营养良好的农夫的、虽不识字但感到满足的手工匠和有同情心又让人分享利润的地主们的英国。”[90] 从 19 世纪后期以来，形形色色的工党思想家 [如莫里斯、卡彭特（Carpenter）、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以及后来的托尼与科尔（G. D. H. Cole）] 和政治家们（如拉姆齐·麦克唐纳以及像乔治·兰斯伯里那样的伦敦佬），都乞灵于对科贝特的怀念和对“快乐英格兰”[91] 的联想回忆。

托利主义对左翼也有影响。如西里尔·乔德在 1946 年所说，“像我这样的其他许多英国人那样，我既有托利情趣又有激进观点，而且我的情趣与我的观点经常冲突。”[92] 一个富有弹性的英国社会持续地吸收着激进冲动。如弗朗西斯·霍普（Francis Hope）于 1966 年注意到的，英国激进分子的经历，常常像一个科幻故事：“一个人走进英国社会，就会发现它不

是一艘太空飞船而是一个胃；一个人指望被驱逐，却被消化掉了。”[93] 这些激进分子像乔德那样，经常发现自己羡慕“地主风格”。这种羡慕不时地自我表现出来，例如G. D. H. 科尔在20年代又一次漫步走过乡村中一块大地产时，爆发出一阵“对英国贵族的称颂”，令他的学生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大吃一惊；拉姆齐·麦克唐纳也向伦敦伯里侯爵夫人吐露了对她的阶层的敬重；哈罗德·拉斯基宣称他宁愿接受像沙夫茨伯里伯爵那样一个贵族的统治，而不愿受制于R. 科布登，“宁愿受英国绅士统治而不愿受制于科克镇的格拉德格兰兹和邦德比①这样的人”；布雷斯福德（H. N. Brailsford）欣喜若狂地赞颂那些进行政治批评的乡村绅士；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承认，基尔维特（Kilvert）的日记所描绘的维多利亚中期田园生活那种舒适惬意的特洛普式（Trollopian）的图景，吸引了他自己，因为“这种生活该体现了多少社会责任啊”。[94]

<119>

英国社会主义的早期先知者——莫里斯、卡彭特、布拉奇福德——以痛斥工业主义和商业主义来加入对“快乐英格兰”的理想化。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描绘了一个未来的田园诗般的英格兰，在这里，人们从机器的奴役下解脱出来，自由地以自己的双手和自己的速度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机器仍然存在，但是在幕后，实际看不见，它自动地工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不再是必要的或渴望的了。他的一位乌托邦居民解释说：“这不是一个发明创造的时代。上一个时代已为我们发明创造了一切，现在我们满足于使用那些我们觉得顺手的发明创造，把我们不需要的那些放在一旁。”[95]

莫里斯在他的社会主义鼓动中，喜欢对诸如煤炭工业这样的英国经济力量的基础支柱提出盘问：这样有损健康和令人不愉快的工作真正是必要的吗？他告诉一位矿工说：

①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艰难时世》中公开标榜实利主义和市侩哲学的人物。——译注

对我而言，如果没有煤我们也能过，如果真的无需像虫子和鼹鼠那样在地下打洞，我将很高兴；如果我们希望过上好日子又不想生产那些各种各样的单纯的机械，这些机械主要是成倍加深我们自己的奴役和悲惨，而且破坏半壁河山美景与艺术去使商人和厂主发财致富，我虽没有把握，但我们可以没有煤也能过。在古代，人们没有煤照样过了，而且我相信要比我们今日过得快乐得多，他们生产出更好的艺术、诗歌和完全不亚于我们今天的良好宗教和哲学。[96]

罗伯特·布拉奇福德的《快乐英格兰》(*Merrie England*, 1874)一书，被 G. D. H. 科尔称为"社会主义大众宣传中迄今写出的最有效的杰作"，此书在几年中就在大不列颠售出一百万册之多，广泛地宣扬了莫里斯的反工业情绪。布拉奇福德在书中认为社会主义与乡村生活是一致的。他把农业称作健康的民族生活的根基，而且他对工厂制度毫不讳言："这东西是邪恶的，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它的方法、它的动机、它的效果，统统都是邪恶的。没有一个动机贪婪的民族是健全的民族。"布拉奇福德引用罗斯金的话说，英国不得不在人的质量与生产的数量之巨之间作出抉择。人的真实需要是少而简单的，因此无需工厂蔓延大地就可满足。但还有时间去予以扭转：

曼彻斯特学派会告诉你，这个国家的命运就是变成"世界工厂"。我说这不是真实的；如果竟是真实的话，那将是令人悲哀的事情。认为这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工厂"的想法，是一种比社会主义者怀抱的一切最疯狂的梦想还要疯狂的梦想。要是这个国家竟真的成为"世界工厂"，那么这个国家同时就会成为世界上已知的最可怕和最悲惨的国家。[97]

<120>

甚至在没有浪漫色彩的费边社成员中，追求物质富裕也被认为是声名狼

藉的。大多数费边社成员不仅是社会事业改良者，而且也是道德家，他们企望造成一种更高级、或许也是更简单的生活方式。甚至对1886年的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对节俭与城市生活的呼唤”[98]。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在1915年的日记中谈到，“感动我的那个理想”是在“一种摆脱了一切人类欲求的抽象存在的思想”中发现的。韦伯夫人的期望是：人使他的物质渴求服从于他本性中的理智与精神，从而得到发展。[99]

就是以这种方式，一种深刻的保守推动力被输入了20世纪英国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中：堵住经济欲望，使其力量净化升华到更高境界的追求。特里维廉是爱德华时代知识界激进分子的一位代表人物，如他在1901年所说：“现代经济的自然过程在总体上是趋恶避善，但是，在迟疑畏缩的徒劳悔恨中不存在解救生路[不过后来他要屈从的正是这种悔恨]；生活在于将现代世界所具备的巨大力量，从纯粹的经济目的转向部分的理想目的。”否则，“这个世界就将变得更黑暗、更丑恶、更喧闹、更没意思”。[100]一个“进步”政党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将经济力量转向道德和精神的目标。

这样一种纲领不仅成为托尼这样的工党知识分子的事业，而且政治家们为了不同目的也纷纷求助于它。这些政治家的世界观多半是卡莱尔、狄更斯、尤其是罗斯金造就的，而不是马克思或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造就的。[101]特别是工党的第一位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经常重弹反经济主义的论调。作为现代工党的最主要的缔造者，麦克唐纳在对“经济拜物迷信”的抨击并共同编织乡村神话方面，与他自己的对手斯坦利·鲍德温一争高低。如鲍德温把自己家族中的威尔士背景包罗在“英格兰神话”中一样，麦克唐纳也把他的故乡苏格兰与英格兰联系在一起。[102]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两位重要政治家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他也认识到这点；鲍德温对麦克唐纳来说，是“有教养的自由派保守党人中的一个良好典范”，而麦克唐纳也得到了鲍德温的类似称赞。如一位

朋友所注意到的，麦克唐纳对“有序的、古老的和等级制的事物有强烈持久的生动感受和深深的热爱”。玛格丽特·科尔（Margaret Cole）尖酸地描述了对这位首相的一次访问：“他明显地对契克斯[①]感到高兴……他的首要角色是大地产继承人，他对乡村深为敏感。”在麦克唐纳的谈话中，洛西茅斯抵得上鲍德温的布德利，简朴的渔夫抵得上农场主和农工的角色。麦克唐纳也像鲍德温那样，喜欢把威斯敏斯特那个人为世界与乡村的真实世界对照比较；议会辩论时他坐在前排座位上，如他所说，他“经常在想象中回忆几天前我刚走过的绿茵茵的道路”。他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老式的、好沉思的乡下人，是“土地的真正儿子”，是老英格兰传统方式的真正儿子。作为一个举着红旗的政党的领袖，他花了许多时间去讲诸如此类的事：“我已去过西部荫蔽的山谷和小溪，去迎接春天。”1929 年春天他有过一次穿越科茨沃德丘陵的政治旅行，这次旅行使他向残留在那儿的古老英格兰的优越性表示了崇敬：他在灰色石头般的乡村中看到了“以往悠久岁月中的英格兰，工业革命使经济力量支配人民生活之前的英格兰，工业还是手工工匠操作时的英格兰，这些手工工匠之所以能造出精美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献身于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他把这种情景与“今日乱哄哄的和枯燥无意义的生活”进行了比较。[103]

1927 年，麦克唐纳在党内反对独立工党为立即支持一种全国“最低生活工资”而开展的运动时警告说：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影响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它给予我们以错误的价值观念……它本身就是如此粗俗的实利主义，让经济资源在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而且就在我们寻找反对它的补救办法时，将我们导入歧途”。独立工党的好斗分子没有向他们周围社会的实利主义价值观发出挑战，而是全盘接受它们。麦克唐纳认为他们的纲领如果不是反社会主义的，那在根底里也是非社会主义的，因为它依靠的基础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假定：社会行动的目标是物质的丰

---

① Chequers，英国首相乡间官邸，在伦敦西北面。——译注

<121>

富，而不是生活质量的改善。第二年，麦克唐纳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 穷人是如此痛苦地去努力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富人则担忧他们会失去拥有的东西。而且无人能停下来喘口气。人们必须不断敛聚，无论他是有一千英镑还是有一百万镑。人们必须对工资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对提供公共补助则要求越多越好，以免个人努力落空。这种强烈要求没完没了，永无满足之日，因而也就没有止境。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更新交替，但最新的一代人仍然在追求，在担忧。我强调的正是这种担忧——对物质占有的不安全性的担忧如黑云压城——在纯粹的物质水平上为了本质上完全是短暂不定的某些东西而争斗——占有欲的悲剧性压力摧毁了存在于生活中的一切价值。
>
>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政治必须总是服从社会主义的生活理想。[104]

<122>

戴维·马昆德（David Marquand）指出，麦克唐纳的这一面在工党内外都证实是一种政治资产。他特别提到，许多工党的支持者们

> 既为对19世纪后期工业社会的丑恶与实利主义的反感所激动，也同样为憎恨贫穷与非正义所激励。这部分地是因为麦克唐纳反反复复地谈论英国社会主义的这一内容，这一内容产生了20年代中期的独立工党艺术行会并且退回到了沃尔特·克兰和威廉·莫里斯那里，正因为如此，麦克唐纳能够以一种狭隘的政治家本来难于做到的方式，抓住了工党运动中的想象力。

与此同时（马昆德继续说道），这种乡村的、非政治性的和山谷荒野彷徨者的形象，帮助麦克唐纳比任何其他工党政治家，都要更成功地吸引了工党之外的中产阶级公众。[105]

社会主义者们也有复兴英国乡村生活那样的托利梦想（托尼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是“被从土地上驱走的农夫”[106]）。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些工党政治家追随他们的领袖，也以鲍德温式的语言呼唤科贝特、莫里斯和布拉奇福德的精神。首届工党政府的农业大臣诺埃尔·巴克斯顿（Noel Buxton）痛斥“工厂的压迫气氛”及其“现代机器般的工作”。他的想象力从这严酷的景象“解脱而出，奔向了英国乡村中的绿荫小道和潺潺小溪，奔向了半隐半现于大树荫蔽下的山谷农舍，奔向了蓝天和飘浮的白云”。这些古老的地方虽然已悲剧性地在19世纪变得旷无人迹，却仍在向人们召唤。他宣布说：“这些就是我希望看到的住满我们民族的精华人物、溢出牛奶和蜂蜜的地方。”他发现一个有希望的迹象是，所有党派都正在认识到，“对乡村的忽视招致了对民族生活源泉的忽视”。[107]

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是工党副领袖，他一辈子都主宰伦敦，他通过平生的经历认识到：农耕是对付国内失业的解决办法。然而，对他来说重新定居农村还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事情，而且还触及他内心最深处的一些情感。他在1934年写道：“关于恢复和重建乡村英格兰的这项工作，我极渴望看到一个开端。我能看到乡村公共草地上再次竖起五朔节花柱，看到男孩和女孩、小伙子和少女们全都笑逐颜开欢庆五朔节。”[108] <123>

虽然工党中的工会方面不那么日益受到这种意象及其相关价值观念的影响，但也没有完全避开。事实上，（职工大会）总委员会如苏珊·豪森（Susan Howson）和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所表示的那样，倾向于支持工业革新与合理化的规范目标，而不是“缩回到浪漫主义的反对技术的据点之中”。[109] 也就在麦克唐纳反对独立工党的“实利主义”那年，他在该运动的工业方面的对手本·特纳（Ben Turner），在职工大会上所作的主席演说中，诉说了他对一个更悠闲从容的社会的“梦想”。他告诫与会代表们：“我们不应当制造崇拜工作和更多工作的迷信，而是应当看准全体人的福祉以及一种比眼前获取要更文雅、更少精神磨难的生活。”[110] 此前一年，新兴的工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访问了美国。贝

文一方面寻求改善国内工业的主意，一方面又像一位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访问者那样作出反应，他的传记作者注意到“他认为美国文明是拙劣粗糙的、过分喧闹的、自吹自擂的和实利主义的”。他在笔记本中写道，底特律使他想起了“上个世纪的兰开夏…… 没有文化，麻木不仁，华而不实，吵吵闹闹。除了谈钱、谈大规模生产、谈他们指手画脚指挥劳动的方式外，就无人对你再谈什么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地方”。[111] 乡村形象的吸引力也渗透到工人阶级的工会理事会。当职工大会总书记维克·费瑟（Vic Feather）在 1974 年被封为终身贵族，并选择了在报刊上把自己装扮为年高望重的乡下人、一个荣登高雅之堂的庄稼汉时，竟无人对此感到奇怪。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随后的经济危机，把诸如特纳和贝文对“迷信”工作和生产率的蔑视态度搁置起来，但是，社会主义者对“物质价值观念”的困惑不安，并经常带有乡村风尚，却绝没有消失。它仍然得到著作家和政论家如像布赖恩特和英奇这样的托利派的左翼对手们最为生动和持续的表述。在他们当中，小说家、剧作家、随笔作家 J. B. 普里斯特利最为突出，他终生同劳工运动连在一起，经常为《新国务活动家》（*New Statesman*）这样的报刊撰稿，并由于他的激进主义，1941 年实际上被丘吉尔从英国广播公司赶走。从 30 年代起，他越来越敌视竞相生产和消费更多物品的趋势，他认为这种趋势是现代社会固有的东西。尽管他和布赖恩特在实际中是对立者，但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抱怨却一模一样：并不是资本主义使人民大众变得贫穷，而是资本主义使得他们变得不幸，资本主义是建立在错误的道德与心理原则上的。他以一种左翼姿态，号召攻击英奇所称的“经济主义”与“消费主义”和布赖恩特所痛斥的“实利主义”。1937 年，普里斯特利提醒他的读者们说：“我们无法通过小玩意儿去求得恩惠。我们穿着玻璃丝裤子就如穿着毛呢裤子一样不舒适。在塑料房子里，盘子可能不会打破，但心灵却可以破碎。甚至淋浴十次的人仍可发现生活是腐臭、无聊又无益的。”[112] 他在随后四十年的著作与广播谈话中，不断重复这种评论的各种各样的翻版。

<124>

普里斯特利在1934年以他的《英国游记》(*English Journey*)从写小说转而冒险投机于社会批评，1940年又通过广播谈话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从一开始，普里斯特利就在《英国游记》中加入了谴责19世纪的大合唱："它曾发现一块绿色而愉快的田园，却只留下了荒芜的破砖烂瓦。"然而，他又接着表达了对20世纪英国更新近发展的憎恶。在某些明显的方面，1933年的英国有所改善，变得"更干净、更整洁、更健康"，而且也更民主。不过它又是"千篇一律"和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直大规模成批生产的工作，价格在削减。你几乎可以把伍尔沃斯当做它的象征"。[113] 独特的民族品性在美国化的冲击下衰落消失。

抨击"富裕社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里斯特利的著作中的思想主线。他既向《新国务活动家》投稿，也向发行量很大的报刊投稿，而且在1955年创造了一个贬义词：Admass(广告推销体系)：

> Admass是我给下面这样一个完整体系取的名字，这个体系包括不断提高生产率，加上通货膨胀，加上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加上高压的广告宣传与推销，加上交通拥挤，加上文化民主和创造木头脑袋木头人……大多数美国人(并非全部，他们中也有一些不错的反叛者)在最近三十年中一直都变成了Admass人；英国人，或许还有大多数西欧人仅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才变成Admass人。比起失业、没有前途、看着妻子儿女越来越饿，生活在Admass中是要好一些。但这就是为它所能说的全部好话，其余的一切全都是欺骗。你认为一切都向你开放，而事实上一切都在越来越紧压你、封闭你。最后，你不得不半迷糊半醉态地一直忍受着。[114]

比较而言，普里斯特利认为19世纪的日子越往后倒退就越好。他回想起在布拉德福德的童年，那时的生活还未受到物质救世幻觉的破坏，他认为那是令人满意的时光。那时候的人们很少受到主张占有更多产品的强

大影响，因而也就很少为了钱而焦虑发愁：

> 我父亲从未有过很多钱，但那时候他并不考虑钱而是考虑其他更美好的事情……或许在现在的人看来［他的生活方式］显得令人可笑的老模老样、狭隘、不方便，一句话来说是太受限制了。但是，如果说重要的东西是精神状态，而不是物品、财产、地位、抱负和花费金钱，那么，那就是健全有益的生活。[115]

<125>

普里斯特利尖刻地、无所顾忌地表达在工党主要政治家身上可以观察到的那些情感。例如，贝文对美国的反应，后来由普里斯特利进一步发挥，就得到了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e Attlee）的附和。艾德礼在一次战时访问中颇不以为然地指出，美国的联盟在目标上太过于实利主义了。[116]

甚至战后出口运动的设计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1889—1952）在庄重地主张提高生产水平的同时，也不忘提出节俭消费的更坚定更衷心的劝诫。这个国家，当它理解到道德价值标准高于物质满足时，就能够学会在没有后者的情况下也能过。作为一个出身于古老绅士家庭的乡村地主，克里普斯是典型的托利社会主义者，指望英国国教会而不是任何政党去提供他所说的“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道德动力”。[117]

1947年，他在一次全国广播演讲中强调说：

> 填平美元缺口的战斗，并不仅仅只是为了物质东西的战斗……我们每个人都在内心深处认识到：我们生活中有比我们现在可能短缺的单纯的物质东西更伟大的价值观念。对自己家族的热爱、我们同志的友情、我们对家园与乡村的依恋、我们对国家福祉的热诚，这一切每日每时都在向我们证实，我们的力量和幸福主要在于精神。[118]

50年代经济压力的减轻，结束了克里普斯所表现的提高生产的热情。英国社会主义中两个正在形成的意识形态派别一致认为，随着大量失业的结束，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修正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虽然也抨击左翼方面的“清教主义”，但也争辩说，经济增长计划

> 应当逐渐为“社会政策”所压倒……而且我们现在不应该主要以工党政府在经济上的记录来判断它的表现……战前（社会主义的）大部分经济方针的理由……正在逐步失去它们的依据；而且我们能日益将我们的精力转入更有成效和更理想的东西，去实现更早的和更重要的社会主义抱负。[119]

在工党的另一翼，比万派人士一面继续坚持克里普斯对获取与消费的责难，一面也厌恶经济。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ot）是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1897—1960）的追随者，他强调说比万自己“对现代工业文明中许多最为壮观的发展持极度的批判态度，他对那些忘记或从未读过威廉·莫里斯著作的社会主义者极少顾及的方面也有不满”。罗多（J. E. Rodo）是影响比万最深的人（只有马克思可能例外），他在把美国作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榜样谈论时说： <126>

> 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若把它的文明概念局限于积聚丰富的物质财富，把正义局限于在其成员中公平分配，那么它将绝不会使它的巨大城市在本质上有别于蚁冢的堆砌。[120]

比万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基本抱怨，就如普里斯特利、布赖恩特和英奇那样，不是物质的，而是道义方面的。事实上，他在1852年评论说：“如果人的命运仅仅只是积聚生产资料，那么，先前的制度没有可以同它相比的。”但是，他又接着说：

> 它未能履行那一必须据以判断一切社会制度的职责。它未能为男女个人提供像样的家和规范化的价值准则……缺乏价值观的重点，因为除了银行账款结余数目的庸俗目的外，就没有着意追求的目的……效率就是它最后的公断人——仿佛爱情、笑声、礼拜、饮食、美满家庭深情的宁静、朋友的温情、新的美好之处的展示，以及有地方根源的世俗之争等，都将屈从于这样一种考验。[121]

因此，这种效率与人类价值观的截然对立，轻而易举地为许多保守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姑且不说许多非党派的教士了）所采纳。这种对立所代表的态度，实际上已深深扎根于中上层阶级的思想中。1959 年，当哈罗德·麦克米伦并非独有地以美国方式大胆告诉选民“他们从来没有过得这么好”时，他因为这种对实利主义的粗俗呼吁而受到有教养知识界舆论各方面的蔑视。[122] 政治领域渗透了绅士阶级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与情感。结果，政治精英们，就像他们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的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们一样，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既想往又害怕。

第七章 <127>

工业家的绅士化

我认为，崇拜物质价值观念正是我们时代的致命疾病，如果我们不根除这种崇拜，它将不可避免地摧毁我们的整个社会，甚至不留下任何让我们讨论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定地提醒自己牢记：物质效率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塞缪尔·考陶尔德（Samuel Courtauld）

1942 年在曼彻斯特工程师俱乐部的演说

一种本质上是乡村的、传统的英国形象，以及对实利主义及其相伴的经济变化的怀疑，都对实业产生了实际影响。在他们的心目中，现代的、工业化的英国是一个“黑暗与邪恶的工厂”，作为英国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它既无吸引力，又完全没有正统性。社会声望与道德认可要通过利用在工业中取得的财富去寻求，旨在逃避这种财富。这种英格兰神话使人才和精力脱离工业转向其他方面，并赋予现存工业一种特别的“绅士”色调，阻碍人们全心全意地追求经济增长。

在一个半世纪中，工业家是英国社会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部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地位从来没有完全的把握。有教养的公众对工商业心怀猜疑，这必然会歪曲实业界的自我形象与目标。工业家们对他们的精神环境所作的反应，有时是离开产业界去追求进入更受欢迎的上流阶层，有时是努力使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应上流阶层的准则。这些准则极少受到挑战，只有那些具有强烈的反潮流意识并自称为“粗犷的个人主义者”才会去挑战。通常，19 世纪中英格兰工商界领袖们已使自己迁就适应了一种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混合了前工业社会贵族的与宗教的价值观念和自由职业阶级与官僚阶层更新近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阻止他们去追求扩张、生产率和利润。

第一节　金融与工业

<128>

从一开始就必须记住一个重要区别。19世纪的阶级发展造就了两个而不是一个新的实业集团，它们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命运：一个以商业和金融为基础，集中在伦敦；另一个以制造业为基础，集中在北部地区。[1] 虽然这两个阶层在20世纪中逐渐地与旧地主上流阶层融合了，但是，金融商业集团明显地更富裕、更有势力，而且有更高贵悠久的门第出身，像不断发展的自由职业者阶层那样，更容易为旧上流阶层所接受。尤其是有悠久传统的伦敦商业区，因为靠近英格兰上层阶级的中心地区，逐渐与贵族和绅士建立了密切联系，享有规避工业的优越社会地位。[2]

金融业与工业之间的这种区别，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转变未能产生一次社会价值观革命，更容易为人理解。如鲁宾斯坦（W. D. Rubinstein）所指出，承认这种区别的中心地位，就是“制造一种根本决裂，这一决裂使工业革命无疑处于次要地位，而使介于旧社会与更强大和顽强的新社会之间的连贯性居于社会的首要地位。”[3] 这个富起来的新上流阶层，甚至在工业化的19世纪中，也要比以往认为的更为“传统主义、更有英国味、并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更为保守”。新的财富并不像历史学家们曾假想的那样很可能与工业联系在一起；因此，工业化的新文化也是范围有限的。在社会结构领域中就如在价值观领域中一样，工业革命的冲击力在英国被压抑了。工业家有些受孤立地被遗弃，成了一次反对“上层英国人”规范的流产叛乱的遗产继承人，而这种规范拒绝认真考虑物质生

产过程。

英国资本主义上层中的这种分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20世纪的伦敦商业区远离英国工业的需求。这种疏远可以追溯至18世纪，那时，现代英国社会模式中的许多东西正在固定成型。1878年，格拉斯哥城市银行在伦敦商业区倒闭了，肯尼迪（W. P. Kennedy）论证说，这一年是英国银行业与工业关系中的一个分水岭："整个银行业体系处于这样一个关键之处，要么不得不改组以便顶住不断扩大的工业所带来的更大风险，要么从与工业的长期关系中退缩回来。银行业退缩了。1878年后，银行业再也 <129> 不愿卷入对工业的长期性资助"。资本市场变得"极大地疏远了大多数国内工业项目，对它们不予重视"。结果，工业发展受阻，形成相互利益衰落的恶性循环，并且延续至20世纪。长期性投资不足，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难于提高又反过来使长期性投资更加缺乏吸引力，如此循环，呈螺旋式下降趋势。尤其是新兴的汽车工业和电气设备工业这两个"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产业，受到的损害特别大。[4]

为什么英国银行家们要躲开工业？国内工业可能不如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所提供的其他机遇有利可图。不过，看来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原因。1878年的那个金融分水岭类似于更广泛的文化分水岭：诚如肯尼迪对资本市场所作的如下评论："为了确保早期工业化所需的稳定而成功创造出的制度，却明显地不那么适宜于解决随后进一步发展的种种问题。"[5] 稳定是实现了，现在需要的是彻底检查这些制度（和价值观念），以便积极扶助进一步的发展。相反，稳定却仍然是压倒一切的目的。面对安全与最大发展之间的抉择，金融业（就像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体系）选择了安全。这种不敢发展与工业的关系的退缩做法，由于工业界与金融界之间已经存在的分离，以及同时在金融界和自由职业阶级中深深扎根的反工业情感，变得更为可能了。

资本主义上层的这两个不平等集团的存在，对经济还有另外一些不那么直接但绝非不重要的作用。它助长了一种倾斜的职业招募模式，这种模

式就像同样倾斜于自由职业招募那样，趋向于声望更高的实业活动，并削弱了教育对工业需求的注意力。资本家上层中的这种分裂，使那些从事工业管理的人在心理上的地位更加失去保护，因为他们不仅要遭受工党政治家和宣传家的反资本主义攻击，还要屈居于绅士味的自由职业者、文官、地主甚至金融家的那种恩典态度之下。[6]

第二节 “工业是瘟神”

1971 年，安东尼·桑普森评论说：“对管理者进行鼓励的问题，不可
<130> 能脱离他们周围的社会气氛。”[7] 这种社会气氛对英国经济企业和实业界精英来说却是冷淡无情的。科尔曼（D. C. Coleman）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抱怨说：“实业家在英国历史上还不仅是不招人喜欢的人物之一，他根本就没被当回事。”[8] 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富有历史意义的时候，那时像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和塞缪尔·斯迈尔斯这样的人在工业中发现了一种道义作用，并在工业进步过程中找到了可以谱写一种新史诗剧的材料，那种冷淡气氛似乎要发生变化了。但就在这时，这个时刻却消逝了，所发现的道义作用黯然失色了，倾听这些意见的人们转身离去了。商业，尤其是工业，被推到英国社会和文化所关注的边缘之外，受到批判和鄙视。《英国人物传记辞典》中实业家条目在比例上要比任何其他重要职业者都少，甚至讣告栏目对他们也很吝啬。[9]

我们已经看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政界和政府是如何不情愿地对待工业。爱德华时代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两位首相，阿瑟·贝尔福和赫伯特·阿斯奎斯，在其 [对待工业的] 纡尊降贵的态度中，难得有什么不同之处。贝尔福的一位传记作者对贝尔福不同情工业家的态度深感吃惊；谈到阿斯奎斯，也大致如此。[10] 这样的态度在政府高级官员中十分普遍。这些高级官员中的一个典型人物是杰出的殖民事务行政官员弗雷德里克·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1858—1945）。他父亲是一位穷教士，家庭人口

多。1875年，卢加德正在公学读书时，他姐夫的商行提供给他一份工作。他也考虑早点弃学去接受这份工作，但是，他痛苦地知道，如果他接受这份工作，就将放弃投考印度文官的一切机会。他在给同父异母妹妹的信中写出了他的困境：

> 如果我接受这份工作，就必须放弃印度文官，要是我通过考试，印度文官职业除了完全是绅士职业之外还是非常好的事。试想我会是什么样吧，我无法去设想在糖厂里当一名助手会有如此之好。当然啦，"绅士在什么地方都是绅士"，但是，卢加德家的人一直都在教会和军队中供职，不是女王陛下的仆人就是上帝的仆人，去当商贩，要是有，也没有几个。[11]

卢加德决定去投考印度文官。他在考试中名落孙山，其后，他转而投身军队。

这种恶感持久不衰，亚历山大·科伯恩（Alexander Cockburn）以一件轶事作了说明：

> 1939年，我熟识的一位英国商人被经济战备事务部派往安卡拉，其任务是去购买某些有战略价值的土耳其商品，以防为德国人获取。政府给了他很多现金，他也抱定决心干好工作。但他发现，驻安卡拉英国大使处处妨碍他的爱国工作。这位大使就是那位不幸雇用了一名德国间谍当贴身男仆的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Sir Hughe Knatchbull-Hugessen）。这位商人极力向他解释自己活动的战略重要性。这位大使全然不理会他，他不耐烦地大喊："先生，别对我谈商业和金融了，我对这些都左耳进右耳出。"[12]

<131>

知识界经常批评像这位休爵士的人，但在这种事上却在心底里和他一

致。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外交官，也是一位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有密切关系的成员，当他私下吐露说，他深信“列斯特城葡萄商人的智力实在是低于正常水平”时，这表明，在精神环境与社会环境中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13] 如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几年前所指出：20 世纪大多数英国文人都有的“一种普遍的傲慢”，就是认为“赚钱、工业、商业、利润或效率这样的职业都是卑贱的生活，神志正常和有知识的人不应从事这种职业；而且在实际上，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都不值得小说家去注意”。安南注意到这种傲慢在英国要比在别处更多地超出知识界而“贯穿整个舆论界”，在此，工商业生活被贬低。他评论说：在英国，而不是在别国，“生活开始慢慢地模仿艺术。英国人开始以小说中的典型假想去支配他们的民族生活”。“知识界的宣传”变成了“国家公认的信条”。[14]

一位商业史学家指出了美国人对待亨利·福特的态度和英国人对待福特的英国对手威廉·莫里斯的态度之间那种颇有启迪性的比较。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77—1963）是英国莫里斯汽车公司的创建者，该公司是英国莱兰汽车公司的前身。尼尔·麦肯德里克（Neil McKendrick）认为：“福特是一位民众的英雄，既有名望又遭争议。莫里斯只得到模模糊糊的和不热情的承认。”他发现，两位英国的威廉·莫里斯的身后不同名声甚至更有启发性：“尽管这位威廉·莫里斯留下了一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小汽车，但在最有教养的男女心目中，他却在那位维多利亚时代同名同姓者面前完全黯然失色。”[15] 如此的轻蔑，在那些年的知识界舆论中可谓司空见惯。1969 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一位评论家可以这样声称：“比起其他所有西方国家中的全部政党和公众舆论媒介来，英国的广播电台、报刊以及三个政党中的两个要更加厌恶、贬斥和蔑视私营企业和商人。”同一时期，一位行政长官吐露出那种极少见诸文字的感觉，他向一位商业作家抱怨，在所有对工业发展的公开鼓励的背后，却认为“工业是瘟神”。这并不令人惊讶。1974 年对英国各大公司董 <132>

事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75% 的人认为电视“对实业和私营企业”抱有偏见，88% 的人认为大学也是同样对其怀有偏见。尽管商业不景气，却没有多少人认为是新问题[16]，事实上，它也不是新鲜问题。现在应当澄清的是，工商业生活缺乏吸引力反映了绅士规范的优势，这种在 19 世纪中形成的规范，部分产生于土地贵族，部分产生于自由职业和文官职业的兴起。

第三节　教育与工业的形象

在英国的教育史上，工业的不可靠地位是很突出的。如我们所知，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精英教育制度，反映并传播了反工业的偏见。从1902年教育法令建立新的公办文法学校以来，维多利亚晚期公学的绅士模式，就（在一种低水平上）被奉为这些文法学校的榜样。同样，老牌大学也被奉为20世纪国家举办的高等教育的一种颇有影响力的典范。1903年，一位自然科学教师抱怨说：牛津大学“一直总是炫耀般地使自己避开工商业”[17]。在市民大学中，逐渐形成了与工业的牢固联系，但是如迈克尔·桑德森（Michael Sanderson）所说，只是带有不光彩的名声。[18]

技术教育发展缓慢。渴望成为真正绅士的制造业者们认识到，工程技术职业不适合于这种目标。所以，他们不为儿子们寻求这种职业。埃里克·阿什比爵士（Sir Eric Ashby）注意到：“人所公认的是，为有益的实际应用而去研习科学可能只适合于劳动阶级，管理者们对研习科学不感兴趣，除非是将其当做他们闲暇时的一种惬意消遣。”[19]因此，工程技术留给了熟练工人的子弟。由社会阶级造成的这种学科的分离，表明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英国对技术研究的真实评价。商会的发言人和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地区）旅行的政客们，都对“英国工业的伟大”和“世界工厂”等顶礼膜拜，但这却丝毫也没有抵消他们期盼自己的孩子逃离工业界的希望。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进入工业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有所增加，但这主要是出于无奈而非选择，因为海外文官和传统职业无法满足数

量日益增多的毕业生。总的来说，较好的学生找到了更有绅士味的工作，而且，那些抛弃父业的工程师和工业家的儿子们在数量上超过了那些进入工业的毕业生。总的说来，大学如早先那样仍然是脱离工业而不是进入工业的道路。尽管如此，像欧内斯特·巴克爵士（Sir Ernest Barker）这样的大学教师还是为那些犹犹豫豫地出现的有关工业需要的学习课程而哀叹。1931 年，巴克担心大学会堕落到“甚至为商界”培养新人的“便当”学院的地步。在他心目中，尤其是老牌大学有责任去为其他人捍卫“纯学术的堡垒”。[20] 当体现在某个具体工业家身上的这种“要求”在实际上冲击了大学时，学术界的反应是很尖锐的，这最突出地反映在那位牛津的汽车制造业主威廉·莫里斯的例子中。“我多么痛恨这个人！”这就是 C. S. 刘易斯对这位牛津大学最大捐助者之一所作的轻蔑评论。[21] <133>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政府对在大学里发展技术课程有了直接兴趣。不过，正像一位副校长在 1958 年所抱怨的那样：“粗俗的工程师、十足的技术专家（所用形容词本身正好是其态度的表现）之所以能够在大学里被容忍，仅因为国家和工业愿意赞助他们而已。他们只能被容忍，但不能被接纳。”[22]20 世纪 60 年代，政府的注意力转到了 19 世纪建立起来的技术学院。社会偏见曾长期阻碍这些学院的发展。这些学院起初只是被“提升”为高级技术学院，尔后才又被“提升”为真正的大学。在它们之后，大批默默无闻的专科学校和技工学校才被升格和合并为“新的工业院校”。要说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尚为时太早；教育的转变需要数十年才能对社会产生充分影响。然而，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观念是很难轻易清除的。[23]

改革和扩大教育的预期效果受到传统观念的侵害。新大学的第一次浪潮——由苏塞克斯大学率先建立的小规模精英式的大学——结果却证明这些新大学的现代性和它们对牛津、剑桥大学传统的继承都同样突出。如 A. J. P. 泰勒（一名曼彻斯特的男生）抗议说：“它们全都坚持这样的信条，即大学教育是逃避生活之路，而不是为迎接生活做准备。”一位作家指出，它们的奠基人宁可要旅游点而不要汽轮机。就在政治家们扯着嗓

门呼唤技术专家时，这些6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新大学却把大多数资源用于艺术与社会科学。在七名创办大学的副校长中，仅一人符合斯诺（C. P. Snow）提出的标准：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略知一二。他们的潜在追随者显然也具有这种偏向：至1967—1968年，出现了理科职位未满员的情况，尽管当时这些大学挤满了申请这些职业的人。[24]

<134>

有一个新大学的确强调“与工业的紧密关系”，这就是沃里克大学，也是唯一置身于工业领域的新大学。它的管理学和工程技术专业发展很快，商业公司捐资设立教学职位，一所杰出的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在英格兰中部由梦想变为现实。然后这个梦想却在1970年破灭了，它是在一个反商业的、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与商人的压力之间破灭的。沃里克大学的这场冲突，包括了静坐抗议、公布档案、撤换行政人员与改变政策，以特有的英国色彩奏出了国际性学生造反的主旋律。学生和教职人员中的激进分子，谴责商业在沃里克以及可能也在别处败坏了更高尚的民族价值观念，以这一谴责打动有教养公众的敏感的心弦。沃里克的造反者们警告说（听起来就像J. B. 普里斯特利所说的那样），“要清醒地认识到”：

> 英格兰中部的汽车和航空工业为英国的未来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这是一个害热病的、挥霍的、功名意识的世界，它的繁荣在分期付款购货和追求地位意识的消费者的变化无常上随波逐流；它是一个鲁莽无礼、不讲道德和野心勃勃的世界，一个靠报销单据生活、推销大肆泛滥、内装仿建的16世纪式火炉的鸡尾酒吧，以及对有节奏的白日工作的精细管理技巧的世界；它是一个吞并者和接管者的世界，星期日商业副刊中不得再生的世界，不受拘束的贪婪之神的世界。[25]

如果这些有声望的新大学与工业保持距离，那么从原来的技术学院演变成的大学又怎么样了呢？甚至在这些新大学中，“实用性”研究、明显的职业倾向，以及与工业的密切联系，全都与低下地位相连。随着这些大学

地位的升高,它们的重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高等技术学院在变为大学时,也变得更加关心它们的体面,并且用一位学识渊博的批评者的话来说,“背叛了自己的技术学院传统,接受了老牌大学的传统”。[26]

甚至60和70年代的新教育哲学,也带有许多反对经济进取心和技术革新的传统偏见。约翰·雷(John Rae)于1977年说:“英国教育中所谓改革全都有一种令人熟悉的光环”,使人联想起它们所沿袭下来的对工商业的偏见中,有许多维多利亚晚期公学的正统观念。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学中,从事工商业的人被认为是地位低下者,是顺乎于这样一种意图:英 <135> 帝国需要大批自信的和完全是传统式的行政人员,而经济似乎要自己好自为之。这种情况在一个世纪后才完全改变过来。因为英帝国消失了,英国经济落后了,改革课程并摧毁“它那超凡脱俗之偏见”的必要性出现了——接着又被错过了。[27]

到了70年代中期,看来似乎还没有什么变化。《新国务活动家》的教育记者仍可看到,工程师地位低下“还是我国工业问题的核心问题”。这一意见得到了一位读者的呼应,这位读者是一位有着五十年工作经历的工程师,他投稿写出了某些个人回忆:

> 几年前,我的一位工程师朋友要由他那当银行经理的父亲带去参加午餐聚会,午餐聚会在他父亲所属的俱乐部举行。事前,我的朋友就对该俱乐部的排斥性有深刻印象。他父亲说:“我不知道他们[俱乐部成员]会怎样看待一个工程师。”我再补充一句,我的这位朋友是在一家有名的工程公司的设计室里担任负责工作。他告诉我说:“我明白了,不去了。”
>
> 一位熟人谈到其未来的岳父时说,他是一个“掏水沟……”的人。实际上,他是那个城市的市政工程师。

对比之下,在欧洲大陆国家,一位工程师经常就被称为“工程师”,就像医生被叫做“医生”一样。一位管理科学顾问评论说,“像英国那样离奇地把

科学分裂为‘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认为一个“纯净”，一个“肮脏”，在欧洲大陆国家中是找不到的。[28]

大学毕业生的态度变化是缓慢的。6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费迪南德·茨威格（Ferdynand Zweig）评论说：“工业……未能吸引牛津大学学生的想象力。”1970年就大学生对待工业的态度所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这种态度是一种既无知又厌恶的混合物，这也是一种可以预见的态度。1975年，英国一家全国性大公司匿名向《观察家报》（*Observer*）透露说，在大学招募工作人员的口试中，“几乎无人表示有在制造业中谋取职位的任何兴趣”。甚至地理位置也有助于维持工业的这种低下地位，在英国，人们最不喜爱居住的地方正是大多数工业区。罗伊·刘易斯与罗斯玛丽·斯图尔特在50年代后期所发现的那种模式看来仍是真实的：他们与许多毕业生面谈后得出结论说，那些进入工业的毕业生主要是出于下面三个理由之一：“家庭传统、金钱，或是因为未能得到他们想要的那种工作，它是去教书以外的唯一选择。”如一位年轻人告诉他们：“我的第一志愿选择是外交部，第二志愿选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志愿选择是英国广播公司，<136> 第四志愿选择是《泰晤士报》；然后除了教书或商业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而我又受不了给小孩上课的事儿，那就只有去经商了。”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以虚构手法写了一部真人真事小说——《冰川时代》（*The Ice Age*），小说主人公从60年代早期的大学（剑桥）里形成了对工业界的明显轻蔑：

> 必须说，安东尼·基廷斯从来就没有在工业中谋职的念头。他是个反叛者，但还没有到如此程度：英国民族的某些部分受局限之深，以致他们很难接近某些思想。尽管大公司一直都急切地想吸引任何专业的毕业生，尽管全国报刊上满是迷人的劝诱，尽管学院的广告栏里也贴满了这些劝诱广告，安东尼·基廷斯是自由职业阶级的孩子，并且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作为一个时代错误培养出来，他对这些劝诱甚至一眼都不看：他天天走过广告栏，天

天翻阅报纸，却是如此冷淡无反应，就好像这些劝诱都是用土耳其文或匈牙利文写成的，他一点也看不懂。他自认为比那些东西要优越：那种广告的对象是那些惹人厌烦和拼命干活的人，而不是像他安东尼·基廷斯这样有眼光的人。[29]

在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工业都能比较容易招募到高质量的管理者和技术专家。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社会主义者在1976年试图解释为什么在德国有更大比例的优良毕业生进入工业，他们认为工业的地位“十分重要”。“那些认为工业不是绅士所适宜的职业（旧说法），或者也不适宜知识分子（新说法）的思想观念，似乎从未在德国存在过。在德国，无论是赚钱还是生产物质产品，在文化上都不被认为是可疑的活动。”[30]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专家治国论者，结合着技术和管理的培训和作用，在整个工业及政府中都发挥了强大影响。工程师、经理和文官并未形成彼此隔绝的社会集团，而是有着相似的背景和观念。战败和被占领的痛苦经历，推动着不断修正关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认识，因而，那种本来可能加之于工商业的污名像在德国那样，仅限于一小群不满的知识分子。[31]这种情况甚至以更突出的形式发生在日本。20世纪的日本经历了社会价值观的戏剧性变更，由于武士阶级对商人的轻蔑消失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实业家以实业家身份结合进上层权力结构，它的这种一体化结合甚至比在德国或法国更为彻底。工程师要克服的传统敌意或许更少些，因为工匠技艺早就理所当然地受人敬重了，不过，技术专长还从未像在当代日本那样受到高度重视。在英国，提出技术教育的能力超过了求学的要求，然而在日本，求学工程技术专业的竞争，比医学以外的其他任何专业的竞争都更为激烈。[32]在法国、德国和日本，战争中的失败看来是激励了工业的恢复与发展，而在胜利的英国，却缺乏把工业形象当做民族事业的激励。所以，由于诸多原因，在20世纪，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从事工业在英国是较少受到敬重的职业。[33]

<137>

第四节　工业家，有抱负的绅士

工业在英国未能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像19世纪在其他国家那样，又造成了英国工业如失血一样流失了人才。利兹的马歇尔家族便是闻名的例子。这个家族开办了一家很有声望的公司，但在创业者的子孙们接受了更类似于吃租息的生存绅士的角色后便衰落了。[34] 这种情况也制约了那些依然留在或涉足工业的人们的观念。实业家使自己的目标及自我形象去适应舆论气候。1955年，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经济事务官员深感吃惊的是：

> 有一种对工业的社会效益和利润的合法性的怀疑，实业界领袖自己就经常受到抑制工业自卑心理的折磨……极而言之，一些工业家看来几乎是为从事他们自己的职业感到羞愧，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抑制迫不得已的邪恶，或者如果是家传企业的话，便看成是抑制继承下来的中看不中用的负担。[35]

在出版物中，英国实业家对自己的实业成就一直缄默不语。尽管其成功经历颇为动人，但写自传的人仍寥寥无几。尼尔·麦肯德里克把这种令历史学家灰心丧气的贫乏，归咎于成功的实业家晚年时的这种愿望：冲淡他们与谋利的工商业的联系。[36] 实业家不仅倾向于自我贬低并对自己的经济角色感到歉意，还竭力仿效那个公认的榜样：绅士。19世纪在商人与工业家的社会史上，最突出的发展是实业家阶级的绅士化。沃尔特·巴奇霍特（Walter Bagehot）称作“英国商业的粗俗结构……其生活秘密”[37] 的

东西，已逐渐消失并变得优雅讲究起来了。一个人在英国实业界的地位越高，其绅士风范色彩也就越浓厚。沃索恩是《星期日电讯报》(*Telegraph*)这家知名报纸的副主编，他认为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原始冲动已被驯服："在英国资本主义的整个粗陋狂暴的岁月中，这种经济组织类型明显具有的非人性或非人格特点，始终未被完全允许去取代人类关系中的绅士传统或贵人高尚行为的家长式观念。"[38] 被认为是一位地主或像一位地主，要比被当做格拉德格兰兹和邦德比这种信奉实利主义和市侩哲学的人，远受青睐。 <138>

传播这些绅士规范的主要力量，正是那个首先助长工商业生活消极观念的同一个制度：维多利亚时代发展起来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公学。甚至就在公学引导它们最好的学生远离工业时，公学教育模式的蔓延，确保了日益增多的高级工业管理人员仍是公学教育的产物。对自由职业和官吏职业的偏爱得到反复强调，可是这些职业的增长速度远不足以接纳日益增多的公学学生。因而，所有的名牌公学实际上把越来越多的学生输送进实业界：马尔巴勒公学在 1846 年只输送了 6% 的学生，1906 年却输送了 23%；麦钱特·泰勒斯公学输送的学生在 1851 年只有 6%，1891 年上升到 42%；克利弗顿公学在 1867 年有 9%，1907 年则有 25%。[39] 这种趋势在 20 世纪继续发展，看来，更多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自愿选择。[40]1951 年，一次抽样调查表明，英国各大公用公司中约有 58% 的董事曾受教于公学。夏洛特·埃里克森（Charlotte Ericson）对英国钢铁业的领袖们进行的研究表明，受教于公学的领袖人物在比例上逐步增多。同样，在 20 世纪早期，牛津和剑桥大学也要先于地方大学备受那些少数上大学的钢铁业领袖人物的垂青。这些上大学的领袖人物中，大多数攻读的是艺术而不是自然科学。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有权势的工业家是那些从事工业者的子孙。所以尽管这些培养未来钢铁业领袖的院校有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但并不标志着工业职业对自由职业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子弟的吸引力有所增强。埃里克森总结说，与其说它是厂商方面一种有意识的招募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反

映了很高程度的家庭出身控制以及这些家庭的如下态度，即宁可选择有利于社会地位的教育，也不愿选择从事工业的专门教育。”[41] 通过比较，埃里克森在诺丁汉的针织业中发现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模式，只有少数几位内衣经销商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经营规模小得多，处于更偏僻的环境，从未像那些钢铁业者富有，或指望以发财致富去获取较高地位。钢铁业的那种模式，也出现在其他主要工业中。随着时间推移，生意越大，其领袖人物也就越有可能在公学或老牌大学受过教育。[42] 在 20 世纪，越来越多的 <139> 大公司高级职位掌握在具有绅士风范的人手中；这种人自己又立下了一种为下级管理者竭力仿效的模式。

D. C. 科尔曼认为，在工业界内部，绅士观念——受过教育的非专业者的观念——日益增大的影响，又招致另一种观念——“实务主义者”观念。表面上，后一种观念反对前一种观念，但在许多方面却正是补充了它。那些未受过上等教育的人，就（并非一定合乎逻辑地）去贬低教育或正规工作培训的价值，“实务主义”就是这种人的防卫观念，而他们同时又渴望进入绅士阶层。[43] 因此，这种“实务主义迷信”并非本来就是一种替代观念，而是尚未变为绅士的管理者的一种过渡性观念。正因如此，它并没有向绅士规范日益增强的霸权发出挑战，而是在实际上加强了绅士规范在经济方面的阻碍作用。

这两种孪生的迷信：受过教育的非专业者与实务主义者的两种观念，加强了对以科学为基础的革新创造的抵制。双方对任何理论性知识都有一种内在的不信任。科尔曼评论说：“经济学、管理技术、工业心理学都经常受到严重怀疑，因为它们企图使‘实务主义’和绅士派头的非专业者共同长期进行的活动职业化。”此外，这对孪生的迷信还助长了认为稳定与秩序具有最高价值的倾向。随着“实务主义者”变为成功的经理，比起直接获取最大利润或创新活动来，他们更有志于社会地位野心的眼前满足以及发挥某种社会作用。他们发现，他们生活中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自己及后辈的行为举止要像有闲的地主绅士，而不是像自己曾经当过的成功创新

者。因此，他们的态度更接近于与他们在会议桌前平起平坐的绅士们，并且已经被反复灌输了“一种模糊而又固执的信念：某些东西在实际上比利润更重要”。[44]

绅士观念促成管理者缺乏对自己职业的信奉。1931 年，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e Siegfried）就已经注意到“做好一件工作”是要受到抗拒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位绅士是从不太努力奋斗的，它不被当回事。”[45] 这就是他工作中的努力奋斗，要超出它就可能要花费大量精力。迈克尔·尚克斯在 1962 年评论说：在这个工业化世界里，到处都未把工商业看成是能获取美好事物（政治、拥有土地、文化、在伦敦商业区的地位）的手段。[46] 管理活动不仅只被认为是人的现实生活旅程上的一个小小驿站，而且还被认为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一个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罗伊·刘易斯和罗斯玛丽·斯图尔特比较了 50 年代美国、德国和英国的管理者，吃惊地发现英国管理者是多么 <140>

> 缺乏公众舆论的支持，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工作要么仅仅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要么是取得必要钱财去过上他们的真实生活、他们的私人生活的一种很令人厌恶的手段而已。他们的生活遵循的是文明而严肃的礼仪及其所表达的那种被认为是真正重要的价值观念。[47]

他们已被如此训导了数十年之久，所以有此反应也就不足为奇。甚至勤奋的政治家，也会因为他们不是工作的奴隶而受赞扬。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阿瑟·布赖恩特利用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写给一家报纸关于鸟类观察的一封信，用真正的英国国粹精神给他涂脂抹粉。布赖恩特热心地说，张伯伦先生“在一封短信中所说的，要比一个人长期高度有益的政治生涯中的全部言行，都能更多地抓住他的同胞们的心灵”。毕竟，张伯伦不是政治中的单纯实务者。布赖恩特论证说：“我们可能已变成一个实务者民族，但是，我们是不情愿的实务者。我们不喜欢或不敬重一个

人，仅仅是因为他一身黑灰色打扮，成天坐在办公桌边。对于张伯伦先生，我们喜爱的和颂扬的，正是他离开办公桌所作的事情。”[48]

这样的态度，继续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管理教育中，这一教育在英国采取了有特色的绅士形式。牛津与剑桥大学的教学传统不是教人如何去做某种工作，而是如何去做某种人，在一位顾问看来，这种人喜爱的管理教育是“以牺牲工作本身为代价，而追求社会角色的文化移入”。这类院校，从坐落在典型的乡村地产上的亨利学院开始，在新起来的年轻行政管理人员身上罩上了一层田园诗意和乡绅般的虚饰。一位这类院校的校长私下反映说：“我们在此是真正地处于文明化的实业中。”甚至这些院校中最新最严肃和最“美国式”的——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商业学院也未能完全逃脱这一传统的影响。在伦敦，校址的选择和房屋的建筑都是富有含意的：在伦敦商学院建成十年之后，阿拉斯泰尔·曼特尔（Alastair Mantel）于1977年评论说：

> 伦敦商学院中几乎最重要的人仍是约翰·纳什（John Nash），他是该校华丽校舍的创建者。你绕道后面进入这个最靠近喧哗吵闹的伦敦市区的地方，走进一个平凡单调的凸状现代贝壳。向东几步路（或者象征性的在六至十周或一至两年以后），你在那旧建筑凹状正面的帕拉迪奥式建筑壮丽景色的辉映下，仿佛在它的摇曳中出现在摄政公园了。据说，“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国王！”这种感觉还不止是象征性的；如果你凑巧在受轻视的工业中供职，或更糟糕的是你如果未上过任何大学，且莫说牛津和剑桥大学了，那么，通过这建筑就是向圆轴状的英国社会正中心稍微挤近了一点。这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过程，这对英国实业家来说，是非同小可的脱胎换骨之事，是从工商业这个社会的外围充分地重新进入社会的事情。[49]

<141>

绅士观念在工业界内部创造了一种地位等级制。银行家看不起工业

经理，工业经理又如法炮制去看不起技术人员和推销人员。推销是不符合上流阶层本性的事，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认为，上流阶层的本性培养出“一种不肯充分考虑顾客需要的态度；顾客必须购买的不是他所希望的东西，而是你非卖不可的东西”。毕竟，在对实利主义的大众胃口的迎合甚至刺激之中，是有某些令人反感的东西。[50]

然而，比起推销来，生产本身更是英国工业中的灰姑娘。在所有工业部门中，生产在20世纪是待遇最差的，而且也最不可能使人升到高级管理职位上。在德国、瑞典和日本，工厂技术人员在管理阶层中也有更充分得多的代表权。在英国，像法律和会计这样的培训专业，能使人比工程技术更有利于得到职位升迁。[51] 曼特尔注意到这种不平衡：“这就好像工业的主要任务是洗涤钞票，生产却是对此主要任务令人厌烦的压抑而不是相反。”[52] 如安东尼·班布里奇（Anthony Bambridge）在1975年所说：那些进入生产工作的有才干者表现出“过分急于离开生产工作”。他引用英国商业管理学院关于工业中的毕业生的报告，这份报告发现有17%的毕业生在进入商业学院之前曾受雇于生产部门，但只有6%的毕业生重返生产部门工作。[53] 这种行为是对英国工业内部盛行的声望与奖励规范的一种合情合理的个人反应。

有一种可以评价生产的方法：看它是否与效用问题分开，并只当做一个纯技术问题来看待。在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商业价值观念就从未被允许去侵扰对技术尽善尽美的专注追求。该公司的主席在1969年回答安东尼·桑普森关于利润的提问时说：“如果你说我们在这儿是为了赚取利润，那我们就绝不会制造飞机发动机了，我们在多年前就该发财了。”[54] 在这种特殊的“纯粹工程技术”的精神气质中，产生了绅士对市场的鄙弃，而且对生产的厌烦正统化了。其代价就是1971年的最终破产。

✦ ✦ ✦

外国的经济成就唤起了英国绅士化管理者一种心理上的矛盾反应：羡慕这种成就的本身却又讨厌这种成就产生的生活方式。<142> 在20和30年代，鲍德温首相就要实业界听众和广大公众确信：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为了赞同显然更成功的外国规范而抛弃传统的规范。外国人，无论是德国人、俄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没有像英国人那样握有打开美好生活之门的钥匙。这种论调一年到头重复不已。1958年,《听众》杂志在一篇题为《英国生活方式》（“The British Way of Life”）的社论中概括说：

> 有人想要在这儿铲除过去留下的东西，把一切都牺牲给九头怪物：推销术。有时，会让人感到关于美国生活方式谈得太多了，在那里，从一份学术杂志到教堂的宗教仪式都推推搡搡，唯恐错过了推销。真理肯定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成就都需要赞美。[55]

尤其是美国人（以及最近的日本人）被许多工业领袖（如他们普遍长期地受到教育界舆论熏陶的那样）认为是思想狭隘的人民，他们沉迷于生活的经济方面，为他们的物质成就付出了个人生活质量的代价。甚至在最大的公司中，国际竞争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复杂严峻（或许特别是在其经理人员受过此种教育的公司中），老于世故的经理们仍不情愿去仿效他们的海外竞争者的方式，却把这些竞争者看成是他们所珍爱的生活方式的威胁。看来，要是放任自流，外国方式将会颠覆“英国方式”。

塞缪尔·考陶尔德（1876—1947）从1921年至1946年是维多利亚家族丝织品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在他任职时已成为世界上人造丝的主要生产厂家，他担忧美国日益增长的影响。他在1972年坦白地说：“我极讨厌所谓的‘欧洲美国化’。我怀疑美国生活观念——就像它完全是实利主义那样——在这种持久扩张的刺激结束之时，是否最终能够在什么地方产生出一个既心满意足又运转自如的民族。”考陶尔德赞颂美国的技术成就却鄙视他所认为的美国生活方式，包括美国的商业在内。他不喜欢英国有任何这种美国式的东西。[56] 考陶尔德是印象派绘画收藏家和文学人士的

朋友，代表了新型的绅士工业家。他的观点逐渐得到其他工业领袖的呼应，直至他们形成了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思维形式。

由于使工业现代化的必要性变得日渐明朗，外国模式的榜样与这种思维方式冲突起来。英国第三大公司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副董事长彼特·孟席斯（Peter Menzies）在60年代后期告诉格雷厄姆·特纳（Graham Turner）说，英国企业“仿效美国模式”是错误的；他认为，英国人需要有意识地保护他们较少实利主义的生活方式。他解释说：“美国人深陷于激烈竞争，而西欧人则想有一种更广泛的生活，他们并不只想有钱可花。在此意义上，我们处于某种困境中：我们想保持我们的私人生活，却又同时想要在激烈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一位主管经理说，甚至精力最旺盛的英国人也“不会为公司作出全部的贡献。我认为我把我75%的干事时间拿出来就足够了”。同样，英国莱兰汽车公司首脑斯托克斯勋爵（Lord Stokes）告诉特纳说，他想采取“折中办法”：采用某些有价值的美国管理技术，但又不引进美国实业风格中许多不吸引人的东西。[57] 在70年代，日本取代美国成为经济成功的楷模，英国实业界的反应依然如旧。对于激烈竞争、过高评价物质东西，以及对私人生活所受威胁的种种担心再次表现出来。[58] 如一位常任秘书在60年代所说：“我们想获取美国社会之树的果实，却又不打算去接受这棵树的根系。”[59] 从对美国的这种态度，可以理解对日本和德国的态度都是同样的。甚至有一位商业报界人士，一方面力图使他的读者认识到“工业是我们民族繁荣昌盛的主要力量”，一方面却又在其著作的前言中这样否认说：“我不认为仿效美国、德国或日本那样的社会是任何一种成就。我们已有的社会被美国评论家们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社会。”[60]

<143>

与外国模式相比，英国的实业传统被认为是建立在“人性”、“荣誉”和“工匠技艺”的价值观上。回顾到1911年，《工程师》（*Engineer*）杂志曾反对过美国科学管理的思想，它评论说：“降低劳动成本有正当合理的和不正当合理的方法……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泰勒制是非人道的。”[61] 我

们已经了解斯坦利·鲍德温，他在关于工业的表态中，经常缅怀过去更融洽的人际关系（他的古老家族企业即是一个典型，“在那里无人被解雇”）和“诚实的工匠技艺”的时代。成立于1920年的工业行政管理学院，从一开始就宣扬一种“高于”美国的管理概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有影响的管理学书籍之一，就论证服务要取代谋利动机，谋利作为一个主要的工业目的“变得日益遥远和陈旧”[62]。同样，在对工业生活的理想化描绘中，<144> 家庭和军事般的类似物得到青睐。劳工管理研究所主席在1943年的一次演讲中，就以海军用语“快乐之船”为主题。该所刊物报道他说：

> 旧工业观念以工业赚取的钱财数量为基础，而他则建议道，适当的观念是它能产生多少幸福；幸福产生于它的人际关系的效率、安全感的培养和全体成员的自我尊重。[63]

工业的目的越来越不被认为主要是有效率地生产出产品；工业有了凌驾其上的社会义务。正如塞缪尔·考陶尔德所说：“每天晚上离开工厂大门的工人的质量，甚至比工厂交给顾客的产品质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64]

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深重之时，另一位这种类型的作家呼吁要紧紧依靠特别有人情味和讲道义的英国实业传统。奥布里·里斯（J. Aubrey Reese）[《食品杂货业年鉴》（*The Grocer's Year Book*）主编]坚持认为，当前的世界危机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地注意人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物质价值观念。在这方面，英国能够发挥一种独特的有益作用，只要她坚持住她的传统：

> 在世界似乎失去其方向感之时，忠实于古老传统的英国，可以作出她的明确贡献……在诸如这样的时刻……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维护的一件事情就是传统荣誉，这种传统荣誉数世纪来一直是英国人在商业与国际关系中的标记……破坏这一标记就是丧失某种比市场更重要的东西，虽然市场无疑是非要不可的；

> 失去在我们帝国发展成长起来的、随着我国贸易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东西，就是失去我们贸易王冠上最精美的无价之宝。无论强调的是环境或困难，都绝不能放弃先辈们建立的传统，就是这一传统才使我们变得伟大。可能要做某些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但这绝不是文明曙光。[65]

这一传统的核心是荣誉，而不是进取心。其他作家则强调了英国商业传统的另一面：专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经济史学家伊夫雷姆·利普森（Ephraim Lipson）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比较了50年代的英国与美国，美国的标准化使他大为反感，他极力主张英国制造业者要牢牢保持他们传统的质量策略与工匠技艺，不要沉迷于降低成本，哪怕需要为此作出牺牲也在所不惜。[66]

20世纪的英国实业家逐渐接受了一位商学院教授所称的“结合了实业与人性”的一种双重导向。[67]乔治·舒斯特爵士（Sir George Schuster）<145>是威斯敏斯特银行及其他几家企业的董事，他满怀希望地问道：“我们这个店老板和赚钱佬的民族，能否向世界表明怎样既把赚钱放在价值准则的次要地位上，又不停止良好地履行赚钱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也是至关重要的职责呢？”[68]

第五节　一种绅士经济

这些对上流风雅的渴望，赋予英国实业界行为一种特定色调。但它的后果在整个实业界却不尽相同。金融业没有像工业那样受到阻碍。如我们所知，金融业的社会环境与贵族的传统社会相去不远。金融业在 19 世纪中期就已非常富有并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权势地位，当时文化上的反动还正在聚积能量。它是“干净的”，因为远离了生产的实际过程。它汲取财富是靠与居住环境时髦的上流阶级的人士打交道，而不是靠与物和工人阶级、中下层阶级打交道，这些阶级的居住地可能是肮脏的、丑陋的、当然不会是时髦的。金融业生活很容易与绅士理想观念相协调，能够招募到最佳人才，能够振作其精神力量而无需加以辩解，或者能够削弱集体自卑感。金融界也没有流失人才，像巴林家族（the Barings）、巴克利家族（the Barclays）、史密斯家族（the Smiths）及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等数代人以来一直很活跃，变得与旧贵族难分彼此。这种理想化观念强加于经济进取心上的阻碍作用，甚至对伦敦商业区的那些人来说（例如，其结果是高度重视业余活动）也会被他们握有的巨大政治权势所抵消。伦敦商业区通过与上层集团的结合，可以比工业更有效地呼吁政府去支持和偏袒自己的礼仪。此外，伦敦商业区不依靠国内经济的繁荣。它与国外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比它与国内经济的联系更密切，而且可以在英国工业衰萎时借助国外经济得以繁荣。简言之，伦敦商业区提供了一条（比工业较为容易的）成为绅士并发财致富的道路。由于有这些优越之处，金融业在

工业艰难挣扎时仍可繁荣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工业中要取得绅士地位就要困难一些，通常要求在较大程度上超脱其经济角色。绅士化工业家，如果不是实际上的，也变成了心理上的食租者。他们的实业行为反映了这一演变。一个接一个的工业以不利于未来发展的战略结构变化，表现出绅士化模式。在航运业中，1875—1914 年间通过合并和精英协议降低了内部竞争程度。同时，经营管理的特点也变化了。斯特米（S. G. Sturmey）指出，这两个变化的领域是相互关联的： <146>

> 船主与自己的竞争对手联合起来的可能性，依赖于更换旧式船主，代之以精于谈判、对航线上的轮船挂有自己的名字不那么自满自得的人。减少竞争的一个结果是，船主们要比先辈更加远离船舶和海风盐味。与这些变化恰好同时发生的是，船主变成了社会上交际更多的重要人物，变成了土地购买者和爵位受封者。说来可能有些夸张，在五十年中，船主们从满胡子盐花的人变成官廷朝臣，实有变化与这种说法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航运业的这些新结构和观念证明，在 20 世纪的世界市场上，越来越缺少竞争力；在世界船舶总吨位中，联合王国在 1900 年占 45% 以上，到 1960 年降到仅占 16% 左右，而且此后的份额更有大幅下降。[69] 这一衰落有众多原因，其中有一些纯系外部原因。不过，航运业的急转直下表明，内部结构和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在钢铁业中，伯恩（D. L. Burn）注意到，有许多厂商在他们正在被德国和美国竞争对手超过时，却盛行着“为了社会和政治的目的而挥霍其资源的习惯”，旨在建立和保持厂主的新社会地位。[70] 在新兴的石油工业中，有一位典型的企业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向绅士的迅速转变。他就是马库斯·塞缪尔（Marcus Samuel，1853—1927），一个出生在伦敦东区的犹太人。他在 19 世纪后期创建了世界主要石油公司之一：壳牌石油公司。他的企业使他有可能押宝于获取社会上流地位；1895 年，他买下了一大块

乡村地产，1902 年，他又当上伦敦市长。塞缪尔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倾注在他的地产和大量礼仪性的公共职责上。其结果是把壳牌石油公司的控制权丢失给一位荷兰竞争对手亨利·德特丁（Henry Deterding）。当控制了荷兰皇家石油公司的德特丁首次建议合并时，他愿意只占少量控制权。而塞缪尔太忙于应付他的市长和肯特郡乡绅的双重礼仪角色，未及时采取任何行动。几年后，壳牌石油公司失去原动力，又削弱了塞缪尔的地位，他被迫同意以 60∶40 的比例与荷兰控股进行合并。[71] 这两人构成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对比。他的传记作家评论说，对塞缪尔而言，“赚钱只是一件很少要考虑的事情，仅仅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他的目的是受到 <147> 抬举，正是通过公职，他和他的家族能够取得承认；更有甚者，他是为了享受公职而享受公职”。另一方面，德特丁“一门心思地扎进”对荷兰皇家石油公司的经营，以求获取最大利润；塞缪尔有其他的兴趣，其中许多都优先于壳牌石油公司。塞缪尔梦想的早期目的是什么呢？是“儿子们能上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子孙后代的富裕；他的家庭有一座乡村宅第；马、花园、垂钓、舒适地观看板球、下属和仆人的忠诚、熟人的敬重、有机会慷慨施舍并且大方好客”。于是，如他的传记作者所总结的，在实业中，塞缪尔依然是一个“业余者”，而德特丁却是“职业者”，这并不奇怪。[72]

塞缪尔的职业模式不断得到仿效：朝气蓬勃和未磨出棱角的粗俗人取得了实业（或自由职业）的成功后，就以此换取骑士地位（或者如果他有足够分量，就像塞缪尔那样换取一个贵族封号），换取乡村地产，并且很快就专注于他的新地位的种种繁文缛节，与此同时，他的实业色彩消退，就好像飞鸟尽、良弓藏。

有时，成功的工业家完全离开实业；有时，他们留在实业中，不过却把实业更多地看做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是一种经济机遇。这种模式在家传企业的历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英国，家传企业让位于更多的非个人化组织的过程是缓慢的。[73] 1953 年，弗洛伦斯（P. Sargent Florence）评论说，对于世袭经理来讲，“由于家族地位牢固，大规模扩张的金钱刺激……可

能是虚弱无力的。取而代之的目的经常是求得稳定和传统的生活规范，有大量闲暇、较长的周末度假以便用于体育运动和其他的绅士追求，而不是力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74] 这种工业家，倾向于对他的作用采取一种松散自在的“社会”态度。塔顿·布林顿爵士（Sir Tatton Brinton）在 60 年代不情愿太关心利润或扩张，并非是不典型的：“我们在这里尽可能愉快地去制造地毯，赚取一点利润而又不放弃向工人提供一种良好的文明生活。在我们的单子上，人是第一位的。我总是富裕的，我可不想挣一张百万英镑的票子。”甚至在家族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时（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放不下大架子的观念仍不肯轻易退让。当威廉·卡尔爵士（Sir William Carr）1968 年成功地保住了他掌管的《世界新闻》组织（他的家族拥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投票股份），未让伯格曼出版公司接管时，他就求助于这种观念。伯格曼公司的出价要高出当时市价许多，但是，威廉爵士告诉与会 <148> 人士说：“许多股东们从本世纪初之前就拥有了公司股票，他们并无怨言。《世界新闻》雇用了八千人，并且还要养活两万或更多的职工家属……当你们从生活中获取了更多其他东西时，现钞、钱，又算得了什么。”他说，如果他选择的办法行得通，他就将“有特权继续留任该公司董事长，一个我祖父和父亲的职位”。[75] 诸如此类的事在英国工业中并不罕见。这种态度限制了经济的运行，甚至在组织上已经“现代化”的公司中也是如此。德里克·钱农（Derek Channon）违背他对结构解释的偏爱，在 70 年代早期发现：英国公司即使采用了美国的多层组织形式，也极少能实现其“全部的潜力”。钱农只好以高级管理层“缺乏愿望”来解释这种差距。[76]

文化规范抵制了精悍的企业家所发出的挑战。虽然有些热心者以阿诺德·温斯托克（Arnold Weinstock）（安东尼·桑普森在 1971 年把他称作“合理化的冷酷象征”）这样的人为榜样，却也没有随之出现仿效他的热潮。温斯托克从 60 年代的无名小卒跃升为不景气的通用电气公司主管经理，然后至 70 年代时就把该公司变为英国第九大公司和最有效率的公司。在董事会议室以及别处，对他那广为宣扬的崛起产生的反应，由一句广为

报道的评论表明出来："英国所需要的，就是用温斯托克这样的人，去建设一个他们自己将无地自容的世界。"[77]

高级管理中的主要模式仍是绅士俱乐部。声名显赫并在贝尔格拉夫广场占有三座大楼的董事协会把这种模式推向顶点。该协会在1971年拥有四万三千名成员，包括约二百名上院和下院议员。它以一种传统的绅士风度，捍卫着"自由"企业，远离较为世俗的经营管理作用。它的董事长曾解释说："董事是一种贵族，他们应是有才华者，应有实业之外的兴趣……你可以说我们是一个老家伙的天罗地网。"[78]

随着英国公司历史的撰写及其发现被公之于世，这种模式日益突出。D. C. 科尔曼发现，这种俱乐部理想观念，就像家族理想观念那样，贯穿于塞缪尔·考陶尔德的公司历史中。他引用约翰·汉伯里-威廉斯爵士（Sir John Hanbury-Williams）1952年的私下评论，此人是考陶尔德的董事长继任者、公学毕业生、外交官的儿子：

> 长期以来，董事会中没有重大变化……执行董事们的管理和指导，总的来看是成功的。在董事会会议室中一直有一种绅士俱乐部气氛，而且我相信多年来这种气氛已经扩散到我们企业的各部门，这么说一点也不假。事实上，它是整个公司友好亲善的一个部分，我们必须珍惜。[79]

<149>

这种气氛培养出小心翼翼的政策。在考陶尔德与汉伯里-威廉斯的领导下，该公司在爱德华时代的快速发展，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为近乎不景气的巩固发展所取代。如考陶尔德1930年告诉股东们的那样，公司"总是代表调和、一致和有序的发展"。[80]

甚至富有创造革新精神的公司，也经常保持这种俱乐部理想观念的特点。里德（W. J. Reader）发现，这样一种模式也深入到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精悍的先驱者的心理结构中。至爱德华时代，布鲁纳（Brunner）和蒙德（Mond）的经理部门的社团生活，渐渐集中到称作威灵顿俱乐部的地方，

有着严格的入会条件：

> 有研究生身份的技术人员——实际指化学家——或许可以经选举被批准，其他人都不能，工程师和商人尤其不能……
>
> 它的整个结构都依靠阶级差别。大学人士和自由职业人士（工程师绝不自动包括在内）都是绅士，其余人都不是，除非他们取得已有绅士资格者同意的身份。

这个俱乐部及其气氛有助于布鲁纳、蒙德去招募科学家。它是首批寻求把科学家的工作纳入上层阶级行为模式之中的英国公司之一。里德总结说，布鲁纳和蒙德管理中的社会结构，“再次造成英国中产阶级在‘自由职业’与‘商业’之间的分裂”。1936 年成立巨大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之后，这个俱乐部继续存在，而且实际上在 30 年代空前地繁荣起来。里德描述说，“这个威灵顿世界是一个绅士俱乐部的世界，其背景条件是爱德华时代光辉余照中的富足，学费高昂的学校和老牌大学，总是存在却从未粗鲁暴露出来的、严格划分的职业效能”。[81] 然而，在这种环境中，这一划分还是严格的吗？从创建之初，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就完全控制了英国化学工业。但就像大多数其他英国公司一样，在财政进取心、推销热情与技巧，甚至在它特别引以自豪的科研方面，它都比不上其竞争对手德国的法本化学公司和美国的杜邦公司。[82] 它有着对英国市场的实际垄断、政府的孤立以及该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但它的发展仍在其生命的半个世纪中落在它的国际竞争对手之后，而“威灵顿俱乐部精神”却延续下来了。推销仍是 <150> 该公司的致命弱点。G. 特纳在 1969 年指出：

> 自然，就在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人把自己看成是上流社会中的重要人物时，却不一定把自己看成是实业界的精英人物。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一位分公司董事长说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有意图的大学。”另一位高级经理说：“我们与文官中的行

政官员非常相似。”

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董事长彼得·孟席斯承认，困难之处在于：难于使他的年轻科学家们“对诸如销售塑料拉链之类他们可能认为是粗俗的事情”产生兴趣。[83]

绅士观念甚至对完全是国际性石油业界中的英国部分也打下烙印。马库斯·塞缪尔的遗产：“从来也不肯定他是否只关心利润或是公职”，在安东尼·桑普森所称的“英国石油工业的矛盾心理”中不断重演。[84]70年代，由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与壳牌石油公司合并而成的两国巨型企业仍存在不同管理气氛。桑普森对此深感惊讶，他在与以埃克森石油公司为首的美国大石油公司高级经理们交谈后，又访问了这家英荷合伙公司在伦敦的总部：“第六大街的人不喜欢谈论外交，而壳牌石油公司的人则不喜欢谈论像利润这样肮脏的任何东西，壳牌石油公司的人似乎喜欢培养几乎是与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相对立的风格。”壳牌石油公司的财政协调人告诉格雷厄姆·特纳说“我们从不贪婪”，并回忆起战后他四处游说该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利润时，他被告知“要把调子放低一点”。壳牌石油公司的历史表明，一家公司当然不需要去谈论赚取利润或扩大发展，但的确揭示了英国工业家特有的一种风格和自我形象，这些工业家总是拒不接受“资本家”的角色。桑普森观察到，大部分都是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生的壳牌石油公司的经理们，“是如何不把石油当做一种有利可图的液体，而是当做公共职责的一部分来谈论的。如一个反叛者告诉我说：‘我希望他们停止谈论它，就好像它是一种血腥信仰。任何人都会认为它是一个教会。’”[85]

一个教会，或许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国家的一个部门；随着国家发展，以及绅士的现代原型逐渐出现在官僚机构中，工业家日益把文官的模式当做他们的行为榜样。在此过程中，主动权并不一定在工业人士一边。内特尔(J. P. Nettl) 1965年观察到，英国实业家已拒绝把粗鲁的个人企业家当做一种形象，却又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榜样。结果，白厅就迫使实业界领

袖们去遵奉它自己的理想类型：文官。[86] 这在国有化工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87]，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整个大商业和工业中，出现了一种以白厅的文化支配为基础的观念和行为的一致性。大公司及其代表如工业联合会的标准态度，变成对政府的一个默许："英国工业自行国有化"，伦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在60年代末期就是这样抱怨的。[88] 仿效伴随默许而来：大公司不仅采纳了文官的观念，还接受了文官办事的程序和方式。这些程序是被发展出来管理现存社会和经济，却不能用来创造新财富。当这些经过文化熏陶的实业界被召唤来扮演创业者时，其结果用内特尔的话来说，不是"精神分裂症"就是"字谜游戏"，名义规范和实际规范对不上号。 <151>

保守，是绅士工业家和仿效文官的工业家的自然习惯，那里盛行的条例和控制（来自政府和自己内部）取代了创新，那里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维持现状，确保均等公平，保障稳定，以及为非实业活动留下心理空间。它是这样一种环境：对于竞争、进取心、革新、发明和推销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其破坏性与消耗时间的后果令人担忧。[89]

这种保守的管理文化压抑发展。尽管其他国家改造了它们的经济生活，英国的变化却比较缓慢。对安全和稳定的关注，减少了创新和竞争。《工程师》杂志在1901年的一篇社论中颇具匠心地警告说，"要反对仓促地接受表面的改进"。而在六十五年之后，一位有名的美国管理顾问似乎注意到，"管理着公司的人们中有如此之多的熟练的现状维持者"。[90]

发生了的变化经常是后卫战斗，目的首先是防卫性的。[91] 保守主义，既意味着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工业逐渐衰落，也意味着未能全心全意地发展新工业。[92] 甚至为此而批评别人的那些工业家，也会转弯抹角地这么做。斯塔福特郡有名的制铁业者、议员埃比尼泽·帕克斯（Ebenezer Parkes）1903年吐露说："我有一种怀疑：我们在这个国家或许没有足够勇气……去涤荡陈旧衰竭的东西。"但是，他本人刚开办的一座新工厂，其动力装置就是在新地点上拼凑起来的一架旧式发动机。[93]

最重要的是，保守主义意味着未能设计出新的和更有效的组织结

<152> 构。[94] 英国厂商在国际竞争压力下的独特变化就是合并，但却不是像美国的合并那样去当做取得新发展可能性的跳板。英国的合并经常被看成是它们内部的解决方法。合并起始于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许多合并都是“令人绝望和半心半意的联盟，明显动机更多的是维持现状，而不是向市场勇猛进击”。[95]1902年两家管道制造公司（A. J. 斯图尔特 & 孟席斯公司和劳埃德公司）的合并就很典型，内部变化程度很小，明显用意就是“杜绝竞争”。[96] 如此限定性的举动，并未像在美国那样受到公众舆论、政府或法院冷目看待；要说有什么看法的话，那是极为相反的。实业界与政府勾结起来共同扑灭竞争。1937年上院在《索恩诉汽车贸易协会》（*Thorne v. The Motor Trade Association*）一案中作出的判决，认可了限制（竞争）主义倾向。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批发商与零售商协会把降价者列入黑名单并拒绝向他们提供货物是完全合法的。许多法官，可能是大多数法官都赞同大法官霍尔丹（Chancellor Haldane）的观点：竞争经常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如果不受控制，可能就会把制造业者赶出实业，或者降低工资并因而引起劳工动乱”。[97] 因此，法官们就鼓励英国实业家进一步大大增加限制性措施。1937年，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写道：

> 一群生产者今天可以消灭一切竞争对手，其办法是邪恶的压价销售、严格约束的合同、排外的交易协议、维持转手价格、延期回扣和商业抵制；他们于是就能通过操纵价格和限制产量去剥削大众；他们不仅在他们的合法权利内一直会太平无事，而且他们还能在法庭上借口考虑公众福祉成功地为他们的策略进行辩护。[98]

这种行为并不仅仅只是把一己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大多数大实业家以及他们的组织，如英国工业联合会，都把限制（竞争）做法看成是一种人道保障，可以在更高工资水平上保证工人阶级的经常就业；可供选择的办法不是实行控制就是出现混乱。罗伊·刘易斯和罗斯玛丽·斯图尔

特描述30年代的这些工业家时说："他们很担心'自由放任的自我调节和无意识特性'，如同五十年前的小实业家们把自由放任当做自己的光明一样。"[99]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合理化"运动的支持者经常公开宣称要致力于效率，但是，作为目的，安全稳定还是远比提高效率更重要。控制产量与价值的计划和瓜分市场的安排，使得改进工作效率的半心半意的努力大为失色。[100]

<153> 限制竞争的做法（串通投标、分割市场等）作为对付经济萧条的保护主义措施在30年代盛行起来，在萧条结束后很久依然存在。在5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工业家仍不情愿放弃这些保险办法。一家大公司的董事说："只要所有这些君子协定仍在发挥作用，就不会有对工厂效率的重大刺激。"[101] 虽然政府的关注从保护生产转向了扩大生产，并且开始反对这些做法，但是它的行动却迟疑不决。第一项立法，1948年"垄断与限制性行为法令"，并未认定竞争是必不可少的好事，而仅仅是认为阻碍竞争可能不利于公众利益，应予调查。根据该法令设立的委员会进行了若干调查，但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结果。大多数工党和保守党政治家对竞争及反竞争都抱有双重态度。如我们所见，这两个党都害怕全面自由经济的幽灵。不过，舆论正在缓慢变化。1956年成立了"限制性行为法庭"，这是对竞争的一个更强有力的鼓励。设立该法庭的法令，把作证的重负从政府身上移到了相关企业身上；限制性行为破天荒第一次被认为是有害的，除非能够表明它们是有益的。随后十年中，该法庭开始打破价格垄断的局面。由于1964—1974年的威尔逊与希斯两届政府的努力，要求摆脱限制行为的舆论运动看来最终取胜了：1965年的"垄断与合并法令"赋予政府极大权力去拖延甚至预防任何拟议中的重大合并，而且，希斯作为一个信誓旦旦的经济自由派上台执政，他最骄傲的国内成就就是完成了废除转卖价格的垄断。不过，这些对竞争来说是福音的胜利，却是表面的和短命的，因为就是这两届政府又实行了强有力的反措施。虽然有一小批合并案在实际上被提交给"垄断委员会"，工党政府却越来越多地卷进支持甚至是补助工业

中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的基本理由是要建立足够大的全国经济单位去抵抗外国大公司。1970—1974 年的保守党政府天花乱坠地讲了一通关于竞争与自由企业的话后，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在 70 年代的整个英国工业中，旨在减轻市场压力的安排和重新组合仍继续大行其道。[102]

这些安排和重组伴随有一种“现代化”的花言巧语，但在实际上，它们等于就是限制性行为，这首先是为保持现状而弄出来的。[103] 大量的政府资助实际上是用来挽救“跛鸭”，就是说，通过补助来防止那些庞大的、政治意义重大的公司落到已迫在眼前的破产地步。同样，这个悄悄进行的合并浪潮，也几乎难以明确证明对整个经济有什么好处。在整个 20 世纪，英国工业家的首要愿望，或许甚至是日益增强的愿望就是求稳。帕尔（R. E. Pahl）和温克尔（J. T. Winkler）察觉到了这点（虽然他们把它当成是一种颇为新近的发展），70 年代初，在“维多利亚时代企业的圣殿阿尔伯特大厦”举行的一次董事协会年会上：

<154>

> 爱德华·希斯鼓吹他的通过竞争取得扩张与发展的哲学。人们对他不冷不热。维克·费瑟讲了一通关于如何实现劳工安定的前景。人们向他喝彩。在这里聚会的实业家领袖们知道他们自己需要的是：秩序。[104]

资本家对安定的向往，得到了工会的呼应，它们在这些特殊的英国环境中已经演化出一种同样保守和防卫性的观念。历史学家切克兰德（S. G. Checkland）对日本商业史学家们解释说，由此在 20 世纪中，

> 在英国，以畏缩无为的连续性为基础的实业精神遇上了一种极为重视安定的劳工观念，并且能以一种思想意识上的一致性来支持它，其必然结果是不愿意重新改造英国工业的结构和布局模式。双方共同以几乎无望的努力去在实际上维持工业在几代人前形成时的旧样子。[105]

在19世纪，阻碍英国经济发展的诸种内部制约中很突出的是这样一种工业行为模式：它怀疑变革，不愿革新，仅在维持现状时才干劲十足。很大程度上，这种行为模式源自于中产阶级在文化上被吸收进半贵族式的精英阶层，既培育出“英国生活方式”的乡村式的和怀旧的神话，也使兴趣与精力偏离财富的创造。



第四篇

工业主义与英国价值观

第八章 <157>

总的看法与评价

海因德曼先生，它是一个很难推动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办的国家，是一个大家能指望的只是失望多于成功的国家。

——迪斯累利（Disraeli）致海因德曼

（H. M. Hyndman）（1881 年）

现在，我们要越来越多地问自己：以危险的高速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所谓进步，是否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国际公司的时代：商业恐龙大步跨过一块又一块大陆。这又是超级油轮、超级市场、超音速飞行的时代，对许多人来说，唯一不是超级的东西就是生活本身。

——《福克斯通导报》

（*Folkestone Herald*，1971 年 7 月 31 日）

第一节　对工业革命的文化驯服

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时，英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的故乡、物质进步的象征。它也是明显胜利的资产阶级的故乡。像卡莱尔和马克思这样的观察家都共同指出，工业家是新的贵族，是正在引进全新的秩序和新文化的人物。不过，他们都误入歧途。从他们作出自己的断言以来，英国社会与心理上的潮流却开始转到了一个不同方向。

至20世纪70年代，下降的资本投资水平唤醒了赤裸裸的“非工业化”幽灵——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超过了服务行业“生产”的一切相应增长。[1] 无论这个幽灵是否具有实际意义，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时期英国公认的经济危机，是以一个世纪的心理和理性的非工业化为先导。正在形成中的工业主义文化（无论是好是坏，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看来已是要成为未来的潮流），将不可阻挡地涤荡扫除旧英国的特色，但是，工业主义本身就被改造了。随着工业中的革命而产生出的新价值观的冲击，在19世纪后期被遏制住了。工业主义内含的社会与理性的革命被柔化减弱，甚或是流产夭折了。相反，产生了一种妥协，使新的集团、新的利益和新的需要去适应一种维持传统形式乃至许多价值准则的社会与文化的母体。变革中潜在的破坏力被控制住，并被引导去支持一种新旧混合的新社会秩序。对工业主义文化革命的遏制，正是现代英国历史上的成败关键所在。

<158>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人所缔造的新社会，依靠的是对早期英国人行为中较为粗野的特性进行驯化；18世纪英国社会中不安分的平头百姓，

咄咄逼人又渴求财富的资本家，以及乔治时代享乐主义的贵族，如果不是消失了，那也是变成了受危害的英国人。他们的后代更为拘谨，更为文明，这些后人现在在社会等级中有了稳固安全的地位，或者如贵族身上发生的情况那样，已顺从社会变化并重新巩固了他们在现状中的地位。至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英国社会已经承受住了变革风暴，但代价是放弃了革新能力并断言这或许就是早期英国狂放不羁和粗糙严厉的另一副面孔。

尤其是一批民族精英在19世纪晚期得以形成巩固，凭借他们的权势与威望，在英国现代的成就与失败中都起了关键作用。他们以合理的效率与人性，管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他们一方面主持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平等与安全的扩大，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住了国内政治与社会的稳定。他们还要对国家经济地位在世界上不断衰退受损负责。这一新的上流集团（文官、自由职业者、金融界、土地财产拥有者）的价值标准，经过公学和老牌大学共同的教育熏陶，并反映在他们恩宠的书面文化中，他们的价值标准通过他们的声望超出本身范围渗进大部分英国社会。这些价值标准几乎没有去支持经济发展的动力，反而更多地阻碍它。他们把对技术的早期热情变得声名狼藉，突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邪恶，把注意力优先转向“生活质量”问题，而不是对生产和发展的数量的关切，并且贬斥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安定和欲求。这些贬斥与另外一套社会价值观的发展齐头并进，体现在民族的新幻想中。

英国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集体自我形象，越来越不是世界工场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工场的形象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来自一种相反形象、古老的和几乎不受干扰的“绿色而快乐的国家”形象。帝国主义最伟大的诗人宣称“我们的英格兰是花园”；另一位帝国主义者、桂冠诗人，把 <159> 处于帝国主义狂热高潮时的英格兰，当做“古代安宁常在的地方”来庆贺；一位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用以激励他的读者的目的是：照着工业革命前的样子和“北欧绿茵茵的花园”重新铸造英国。昔日与乡村（据认为是不可分离的两者）被罩上了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光环。这些规范与形象

扶持了一种非常迷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适合维持现状而不适合革新，适合舒服安逸而不适合奋斗争取，适合文明的享受而不适合创造财富。

贵族的权力早就寿终正寝了，可是英国的政治思想仍然长久地带有贵族政治的烙印。政治家、文官、教士、自由职业者和政论家，都煞费苦心地去造就现代英国的政治舆论和政策，都活跃于一种与工业界志趣不合的舆论环境中。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表现出对绅士情趣和规范的惊人爱好，使之成为英国统治风格中的基本部分。要求发展经济的政治号召与大多数政治家和文官实际信奉的生活风格及价值观念的本质背道而驰。

工业家本身也未能免受这种反工业文化的影响；像其他人那样，他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所受影响也就越深。新的英国上层社会向工业家开放，如果他们接受其规范的话。除去极少数几个例外，工业家都愿意这样做，尽管接受它的规范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他们原先的自我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功能。工业家使自己在不同程度上仿效文官、自由职业者和有闲地主，找到了为英国社会上层所接纳的途径。由此也就创造出了有名的“权势阶层”及其舆论。社会的整体性与稳定得到了保证，代价却是工业精神的衰落。

第二节　后工业主义还是非工业主义

英国社会与文化史的独特模式有利也有弊。然而，利与弊，是哪一个占上风呢？得失相较，这种模式对英国是幸事还是不幸？而且，这种文化史竖起的通往未来的路标，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呢？

由此而形成的文化道路，受到英国内外许多人的称赞。在其为绅士理想观念的重要性而提出的论点中，D. C. 科尔曼费心用力地指出了他未予批评的这种文化的影响：

> 如果以某种未必可能的魔法，[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实业家]把自己变成专心致志和总是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家，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社会呢？公学培养出“第一流行政官员”的代价之一是工业发展的某种落后，如果这是真实的，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一代价是不值得付出的呢？[2]

<160>

其他人士，左翼和右翼的都有，认为所得到的肯定要比这一代价更值得。《泰晤士报》在1971年为这些人代言，当时它沉思了对“财富本身”缺乏热情这一问题，而后又发现这是好事。它总结说：

> 英国的秘密希望实际上就是，比起其他社会来，对金钱的迷恋在我们社会的影响要少。或许仍有更多的英国人愿意为理想主义的理性全力以赴，而不是为获利而全力以赴。[3]

英国人的才能体现在生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上，这一点早在1907年就由世界主义小说家F. M. 福特提了出来。他说：“英吉利民族的一个特殊领域，就是发展出一种生活方式的规范……英国人的这个领域就是去解决人们怎样才可能生活在一起的问题。”[4] 大约在此同时，外国访问者（特别是美国人）开始注意到英国人愉快和轻松自在的生活质量。爱德华时代的“效率专家”阿瑟·沙德维尔（Arthur Shadwell）报告说：“一天，一位美国绅士对我说，‘我们在这里忙忙乱乱、开车奔波、用心谋划，而英国人却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拿我来说，就很羡慕他们’。”[5]《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驻伦敦记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就是这位无名美国人的直系后裔，他在一封告别“情书”中评论说：“有一个比英镑、通货膨胀和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的现实，那就是生活，而英国人擅长此道。”[6] 有些人的赞颂甚至走得更远，把英国人看成是新的“后工业社会”形式的开路先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英国广播公司接受采访时，告诉他的东道主说：

> 你们的真正问题是，你们是伟大的工业化国家的先行者，因而事情也是首先在这里发生。你们已经经历过对与工业生活有更从容关系的关注，其他国家的人民为此一直讨论了五十年或更长时间。[7]

伯纳特·诺西特（Bernard Nossiter）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70年代驻伦敦记者，对他来说，“不列颠人……看来是后工业时代的首批公民，他们正在选取的是悠闲，而不是大规模上市的货物”，他衷心地赞同他们的选择。[8]

然而，其他人则提出了忧郁得多的意见，把乡村绅士的价值观描绘成不知不觉地滑进堕落之中。唐纳德·霍恩以一位侨居国外者的激动心情表达出这种意见：

仁慈、宽容和热爱秩序变成了势利、糊涂和热爱过去。不费力的悠闲自在变成了不做任何努力去做好任何事情的悠闲自在。绅士般的直觉智慧变成了缺乏决断的无能。做事体面意味着没有尖锐的意见冲突，没有不一致的新信念，因为这些可能打扰某人。公平观念变成认为竞争是不公平的信条：它可能有益于某个新人，却可能有害于某个旧人。[9]

<161>

此种观点由纳菲尔德勋爵（Lord Nuffield）于 1959 年予以简洁表述，当时他称英国是一个“半退休的国家”[10]。其他人也有这样的感觉：民族活力、适应能力或意志的失败。最有口才和最早的一位是 C. P. 斯诺，他也在 1959 年对英国统治集团中他的伙伴成员发出警告说：

一个历史的神话，与其说常使我喜欢，不如说更使我悲哀。这个神话是好是坏无关紧要，它对我来说已足够紧迫。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最后半个世纪。像我们一样，他们也曾交过难以置信的好运。他们像我们一样碰巧发财致富。也像我们一样，他们有极出色的政治技巧。他们之中许多人是意志坚强者、现实主义者和爱国者。他们正像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历史的潮流开始不利于他们。他们中有许多人绞尽脑汁想维持下去。这本来会意味着要打破他们被僵固于其中的模式。但是，他们热爱这一模式，就像我们热爱我们的模式一样。他们从未下定打破这一模式的决心。[11]

近二十年之后，在马克思主义者汤姆·奈恩看来，斯诺的威尼斯人比喻再贴切不过了。他于 1977 年抱怨说：

测算英国的前途，上院是比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更好的标准尺寸。在关于新开端的没完没了的夸夸其谈之下，主要的梦

想是威尼斯式的黄昏暮景：一个金黄色的稳定国家中，庄严的艺术与温和的政治共同维护着英国事物的精粹。真实的推动力并不是真要“赶上”更伟大者和发展中的外部世界，而是要莫名其妙和不顾一切地抱残守缺，捍卫本部落的习惯和久经风雨的遗迹。[12]

16世纪的威尼斯当然没有类似于北海油田的东西；若没有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予以利用，同样的意外横财对其他民族也不会有持久的效果。17世纪的西班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历史例证。历史学家埃利奥特（J. H. Elliot），将西班牙衰落的责任归因于它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

缺乏深远的眼光，对于不再能可靠地指导未来前途的昔日往事，缺乏与之决裂的性格力量……欧洲的面貌正在比以往更迅速地变化之时，这个曾是主要强国的国家却表明它缺乏求生存的基本要素：变革意志。[13]

<162> 当英国最好的当代作家、从前以描写个人关系而知名的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70年代危机的激励下去探求民族精神的状况时，幻想以一种文学形式出现了。她越来越多关注的是她眼中看到的消极的和退却主义的社会价值观[14]，她的小说《冰川时代》描绘了身心衰竭的英国上层。她回到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派传统，在她的一团乱麻中寻求复兴的源泉，并且不怕招致嘲笑，呼唤约翰·弥尔顿及其梦想：“一个高贵而强大的国家，像一个苏醒的巨人自己挺立起来。”《冰川时代》概括了对“英国状况”的一种观点。

也有人认为英国“后工业主义”的快乐幻想是海市蜃楼；认为生活质量不能轻易地与数量对立起来，或者轻易地分离构成它们的要素。[15]此外，最近对公众舆论的研究表明，正如鲁道夫·克莱因（Rudolf Klein）遗憾地所说的那样：“利他主义看来好像主要只是经济繁荣的一种作用。”[16]一

个无增长的社会，不可能看起来会是一个更人道、更宽容甚或是更舒适的社会。有人回忆起爱德华·希斯在1973年发出的警告：

> 取代扩张的，并不是如某些人偶然所想的那样，是一个由缓慢平静地驶过绿草地的大车，将安静的商业城镇连接起来的英格兰。这一替代选择是贫民窟、危险的道路、陈旧的工厂、人满为患的学校、受局限的生活。[17]

第三节 “现代化”是非英国的吗？

提到爱德华·希斯，就是提出这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可以改变或正在改变的问题。由于欧洲大陆的经济迅速发展，英国观察者心中产生了对国家衰落的焦虑，“驯化进步”的绅士舆论在60年代初期开始感受到压力。这些焦虑把现代化问题带进了政治领域。从1964年起，这个新问题在每次大选中，至少在口头上，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特别是1979年大选，围绕着国家经济衰落问题展开了斗争。在一次历史性的政权交接中（其轮廓在1970年首次可以看清），工党代表着传统、现状和“求稳第一”，反之，保守党特别是它的领袖则呼吁彻底变革。玛格丽特·撒切尔宣布：“我是一个改革者，而且正在改革。”[18] 保守党的获胜给了英国一位以决心倒转19世纪模式而闻名的领袖。撒切尔夫人的确像她的反对者所抨击的那样，<163> 寻求“倒拨时钟”，旨在重新引进市场的纪律与刺激来恢复19世纪的经济动力。

如果本书的论点正确，撒切尔夫人的十字军式的改革运动的结果可能取决于：像降低边际税率和紧缩银根这样的措施，在改变多年形成的文化观念上，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功。[19] 英国经济“重新发展”中最不易克服的困难，可能倒是文化观念的持久抵制。《新社会》（*New Society*）刊物近来对英国人看待金钱与工作的态度所进行的调查，揭示出一个“在物质意义上明显缺乏雄心”的国家：

> 几乎无人真心想发财。大多数英国人既不要求也不指望得

到大量金钱。即使他们可以得到，绝大多数英国人看来也不打算为此而去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的大多数问卷回答者都认为我们应当根据我们过愉快生活的需要去工作……看来很清楚，今日英国更偏爱经济的稳定，而不是经济的迅速发展。[20]

实际上，70年代的英国（同别处一样），有一种针对60年代呼吁现代化与发展的反动。爱德华·希斯在痛苦地将讲求效率的福音书强加给保守党后，却在将它强加给这个民族时遭到更痛苦的失败。敏锐的工党大臣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评论希斯在60年代与"传统右派"打交道中的困难时说，"他正提出的政策在我看来，仅对年轻人和冲劲十足的实业家有吸引力"——却没有开出政治上获胜的药方。[21] 1967年，两位记者说，"技术恐惧症"在托利党中根深蒂固：

无论现任领袖可能渴望什么［他们警告说］……党内传统主义者几乎不考虑实业效率的学说，而且很厌恶发明多数这些概念的美国人。当福音教派的马普尔斯先生试图说服虔诚的各阶层相信他们的利害关系与技术和实业效率相关时，他在托利党中显得是多么孤单！他的命运又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啊！受到欢迎的东西是安格斯·莫德所说的："对托利党人而言，简单地像专家治国论者那样去谈话，将使他们无处安身！"[22]

然而，希斯努力向前，寻求打破党内外对现代化的心理抵抗。1969年12月，他把英国描述为"一个卢德派的天堂……一个致力于防止进步、维护现状的社会"。他把1970年保守党的惊人胜利当做改造英国的一项委任令宣布："我们重新执政，要改变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别无他途。"希斯越来越认为，他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心理上的：他的同胞们目光短浅，"偏爱舒适胜过喜爱进步"。[23] 而且，政府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目光短浅趋势呢？这绝不能说是已经很清楚的事。希斯很快就被诽谤为"激进分子"和"分 <164>

裂派"[24]，他那些富有创见的计划大多数被抛弃了、架空了或被证明无效，甚至在他的政府因 1973—1974 年与矿工的冲突下台之前就是如此。

在希斯的十字军改革运动实验之后，1974 年 2 月，公众又发现工党的运动更有吸引力，尽管工党的纲领保证实行国有化和再分配，但这个运动在精神上显然是保守的。工党领导集团在 1964 年曾许诺要在"新技术革命的烈火中"重铸英国，他们从这种许诺转变到十年后保证结束"分裂状况"，驯服这个"无情的和爱出风头的社会"，以及有一个"安宁的生活"。[25]

哈罗德·威尔逊，尤其是他那柔情的继任者詹姆斯·卡拉汉执政时，遵奉大选中定下的调子，把寻求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放在首位，减轻变革压力对社会组织和经济现状的冲击。60 年代的现代化说教，曾使人想起约瑟夫·张伯伦与劳合·乔治，这时已渐渐被搁置一旁，而斯坦利·鲍德温的精灵又开始在唐宁街①游荡。威尔逊和卡拉汉与希斯不同，他们都有农场，常在那里照相，表现为鲍德温式的乡村人士。对他俩来说，这些农场（没有一个是正经的农场企业）维持了与卡拉汉夫人所称的"我们中的农夫"的联系。[26]

许多知识分子和政论家，都把 1974 年保守党两次选举失败，看成是否定"（经济）增长狂热"。工党议员克利斯托弗·普赖斯（Christopher Price）就主张"工党现在要"从这种迷失方向的热忱中"收起缰绳"。该党的"祖传美德"曾在艾德礼和克里普斯的简朴时代提供了一种"道义权威"。[27] 在 60 年代，如普赖斯所说，无论什么党，"信息都是一样的：'甩掉旧的，穿上新的'。新城市、新高楼、新式超音速飞机、新公路。如果打破几个暖房窗户让协和式飞机穿过，如果拆掉好房子去修路和重新开辟利用，那就太糟糕了。'不可能同时抓住两只兔子……'，现在它全都突然不一样了"。新颖之物已变得乏味无趣，而"庞然硕大"——普赖斯回忆道："已为一些社会主义者唠唠叨叨地反对了一个世纪之久"——已经变得陈

① 英国政府所在地。——译注

旧不堪。普赖斯为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提出了一个“非经济的”议事日程。其目的就是保护现存的“英国社会与环境结构”，保护英国“令人愉快、友好和欢乐”的特性及乡村。他承认：“所有这些听起来可能显得消极。”那样也好。“劳动总是被用来开创事物。我怀疑在未来，劳动的作用将更多地与停止它们 [开创事物] 联系在一起。”[28] <165>

1974 年后，知识界舆论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到“进步”幻想的破灭。拉姆齐·麦克唐纳的传记作者戴维·马昆德发现，麦克唐纳的反实利主义颇有新意地贴切，他在 1977 年评论说：“十年或十五年前，麦克唐纳警告说对物质繁荣的追求可能会牺牲生活质量，而社会主义者在争取选票的斗争中可能会忽视他们的非物质目标，这一警告可被当做一种感伤的愚民政策不予考虑。而今天，不考虑这一警告就不那么容易了。”[29]

一种新文化现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形成：明确地、有组织地反对技术与物质进步的结果。这种反对当然是整个工业化世界发展中的一部分。在工业化世界中，反对（经济）增长和反对技术进步的运动在左翼大学生中扎下了根，并且变成了公众生活中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力量。在英国，这种普遍运动采取了更大众化和更民族主义化的形式。批评发展进步的各种批评家，趋向于认为他们的使命与英国爱国主义不可分离——把英国传统生活从不受欢迎的变革中拯救出来。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初期开始的形形色色的新的或复活的事业，从环境保护主义到历史文物保护，再到争取纯净啤酒的运动，共同组成了一个非党派的“保护英国文化运动”[30]。如马昆德所说（他作为批评左翼的闻名人士越发更有威力）：“这个关于前途命运的争论就是：小的反对大的、共同性反对无序性、心灵的平静反对增长的速率、绿色植物反对高楼大厦、威廉·莫里斯反对西德尼·韦伯和亨利·福特。”[31]

或许，这种抵抗精神的主要文学体现者是太受欢迎的桂冠诗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他拥有比以往任何一位桂冠诗人都更为广泛的读者。他把他的前辈约翰·曼斯菲尔德和阿尔弗雷德·奥斯汀的田园

诗般的怀旧病，扩大到了对都市郊区的怀旧。现在，都市郊区变成了“古老英国”的组成部分。他的作品轻蔑新事物，唤醒人们保全熟悉的旧事物。对于他那托利党人式的“渴望不可动摇的里程碑的质朴”，公众报以热情回应。[32] 这种渴望既感动了右翼也感动了左翼：《新国务活动家》1973 年欢呼贝杰曼对城市再发展的谴责，并在头版社论中宣布说：

> 终于，有了一位桂冠诗人表达出这个民族的感情。本周，约翰·贝杰曼爵士评论说，破坏人们居住、喜爱和习惯的环境，就等于赤裸裸的抢劫。这种破坏正在窃走人们的财产，完全等于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抢劫更坏。你可以买下一座房屋陈设的代用品，但是一条熟悉的狭窄街道，联通它那不引人注目的小教堂、树木和街角小店都是无可取代的。[33]

<166>

同样，社会主义剧作家和批评家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上撰文赞同他说：“贝杰曼是一个幸存的证据，毕竟是的的确确的英国人。他屹立在铁门，准备堵住洪水。”[34]

把“英国人”同“堵住变革洪流”连在一起，早由那位拥有广泛读者的右翼人士 J. B. 普里斯特利变得为人熟知。他到 70 年代时已成为颇受欢迎的民族特性的权威。他十分喜爱抨击主张现代化的人，他在 1970 年争辩说，他们未能理解现代世界就是“对英国气质的异化”，而他自己早在 1949 年就暗示过了。英国人没有轻易地沉湎于现代化的独特活动，这是很自然的好事。他宣布说：“我们本能地反对工业和推销术的高压，想要某种比巨大的激烈物质竞争更好的东西。”三年之后，他又极力主张说，这个国家的前途有赖于抵制“为变革而变革”。[35]

最终，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将会发现她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不在于减少货币供应，或削减政府开支，甚至也不在于同车间工会代表的战斗，而是在于改变这种精神思想的框架。80 年代的英国历史可能较少会依靠传统的政治斗争，而更多地取决于中产阶级两副面孔间的文化竞争。

附　录

英国的停滞：经济解释的局限性

对英国的停滞所作的经济解释，起始于古典派的供给要素：资本、劳工和自然资源。不过，这些要素本身几乎说明不了什么。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期的英国，曾自夸有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资本资源，各种资源明显地足够支撑持久的迅速增长。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仔细地研究了1851年至1950年这一时期后总结说："以任何一种合理的考察标准来衡量，英国的资本供应都是足够的。"他感到，要解释为什么国内投资没有更多一些，就有必要揭示为什么它没有更多的吸引力。[1]英国劳动力的规模和富裕收入，并不是对（经济）增长的明显障碍。既没有劳力的短缺也没有劳力的过剩去阻碍工业投资。[2]煤、铁和其他矿物等主要工业资源的供应，对维持有力的扩张可谓绰绰有余。[3]正如金德尔伯格的结论所示，如何运用资源、劳力和资本，才是至关重要的。

需求，是另一个古典派经济要素，它所提出的解释同样不充足。海外需求没有呆滞不前，完全相反，世界经济发展仅为30年代的大萧条所打断过，它一直为英国工业提供不断增多的机遇，而这些机遇总的来说都被错过了。失去帝国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依照这一观点来

看，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卓越经济成就，就是由它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和强权来支撑的。“国旗至何处，贸易至何处”，19 世纪的一句口号就是这么说的。不过，研究过去数十年中这个问题的学者们已经共同认为，总的来说，帝国并不是至关重要的经济资产。[4]

如果并不缺乏物质条件，那么，有没有社会的或心理的因素妨碍保持经济领先地位呢？或者是否至少可以说，正在出现的问题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人的因素呢？[5] 两种在别的方面完全不同的思想学派共同否认这点。

<168> 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 1968 年坚持认为，正确理解的话，英国经济停滞不前并不包括“非理性的事”。“毛病”不在于气质、观念，或实业家或工人的能力，而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灭亡性质。明确地说，这种制度是如何自我毁灭的呢？它的推动力依赖于不可靠的原动力——私有利润：

> 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无论如何都是以它的 19 世纪的样板为例）中，实业家只在以个别厂商标准来衡量是合理的范围之内，才是有活力的，个别厂商要求利润最大化和损耗最小化，或者可能的话，仅要求维持住它认为满意的长期利润率。但是，由于个别厂商的合理性不足，要取得整个经济的最佳效益，甚或是个别厂商的最佳效益，这都可能行不通。[6]

假定这种变化机制就像霍布斯鲍姆认为的这样，英国作为一个工业强国的早期兴起也完全证明这种说法是行不通的。最早的工业化，自然创造了市场与生产的特定模式，它不会继续是最适合保持经济增长的模式。不过，要转换成一种新模式，就要扫除掉仍有大利可图的旧投资，并冒险进行最初成本甚至更大的新投资。“只要以旧方式仍可赚取令人满意的利润，只要进行现代化的决策不得不产生于由个别厂商汇合而成的决定，照此去做的刺激力就是虚弱无能的。”[7] 因此，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英国在其他发达国家发展时死守现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许多这一类的推理看似有理，但在实际上并未排除社会和心理因素的重要意义。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具有天生的脆弱性，就近乎于教条了。把英国经济行为的解释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普遍性质上，就使得阐释各国经历中非常实际的不同之处变得异常困难。如果英国的停滞不前起源于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内在缺陷，那么这些内在缺陷的普遍性就很令人奇怪：它们在英国很容易找到，而在别国却不容易发现。看来更可能的是，我们正在处理的现象，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是 19 世纪末期 20 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独具的诸种因素所造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一个同样否定非经济解释必要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常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新学派。该派明显表现出一种甚至更强烈的教条主义趋向和把抽象概念普遍化的倾向。一群谈论英国 1900 年前经济表现问题的计量经济学家们总结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问题。[8] 工商业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麦克罗斯基（D. N. McCloskey）概括说：“实际上几乎没有史学家描绘的英国衰退的凄凉景象。”相反，麦克罗斯基揭示出“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在其资源增长与有效利用现有技术所允许范围内迅速增长的”[9] 经济景象。麦克罗斯基和他的同事们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的模式构造方法，在他们看到的一切地方都出色地发现了合理行为。像霍布斯鲍姆一样，麦克罗斯基（从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认为，实业家、发明家、工人和消费者都被紧缚于依据不可改变的法则运行的经济制度中。如果英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缓慢下来，或者如果经济的相对地位急剧下降，就可以用普遍的市场趋势予以解释。而克利俄（历史）计量学家实际上对一切单纯的“定性”证据都反应冷淡，几乎不屑一顾。

<169>

历史计量方法适用于研究这个问题吗？许多经济史学家都表示怀疑。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注意到：“新经济史学家”一次会议的成果，专门讨论此问题的《成熟经济论文集》（*Essays on a Mature Economy*），倾向于证明“计量经济学方法虽说不错，只是在使用它回答计量经济学问题时太过吹毛求疵。”而一个国家经济的普遍运行却不是一个

计量经济学问题。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两个弊端在此表现得很突出。第一，波拉德警告说，在这种方法中，“正是定义决定着结论”。例如，很容易假定认为，“竞争将迫使企业家去采取他们愿意接受的最佳方案，然后又在经过漫长的争论和计算之后得出结论说（在这些前提下），人们已证明企业家的确采取了最佳决策”。第二，它太容易去依靠那些不恰当的资料或无法作出结论的资料。波拉德发现麦克罗斯基对这一争论的特殊贡献就是：那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过的钢与煤的生产率（“假定价格与基数不同”）是和美国一样高，实际上还高于美国的“证据”，就是犯了这种错误。[10] 像麦克罗斯基和他的同事们一样精于计量经济学的其他历史学家们，开始怀疑他们的研究成果，认为是太“容易局限于有争论的假定和不明确的估算”。[11]

<170> 决定以一种纯粹经济因素的自我封闭模式去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就把许多社会生活推到迷蒙不清的外围。它排斥了通史学者最感兴趣的许多东西。不遵守“合理性”假定的行为、追求最大利润和最大值工资的行为，都被统统归入诸如“市场不完善”等无所不包的范畴。当这模糊不清的范畴被曝光考察时，却证明它是一条回到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世界的小路。“市场不完善”经常归结为社会与政治的结构或行为模式，虽然它们在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是不“合理的”，但却是真实的。例如，有效分配资源，可能受制于各种类似的不完善（如一位英国社会学家所指出）：“熟练工人不愿迁居，政府立法反对不熟悉的活动，社区要求保护它们的环境免受破坏之害，管理机构无法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商人只预见他的经验所能允许预见的那些需求和技术发展。”[12]

英国经济衰落原因的问题，超出了经济学家独自能够理解的范围。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总结说：“仅用单纯的经济学假设诸如工资率、变化的贸易条件或自然资源的恶化等，无法解释有关的问题。”[13] 同样，作为一位经济学家，迈克尔·福雷斯（Michael Fores）提醒一批实业家和文官听众说：“作用于增长的变量因数很多，并非仅仅与经济资源的

数量和工业技术有关。”[14]但是，对于超经济解释的需要，不应当看成是对无知的容许。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是一位社会史和经济史学者，他提醒商业史学家说：

> 历史分析包括不同层次的精确性和不精确性，一旦我们比目前普遍已知的要更多地了解到我们许多统计系列中可观的误差（它们常常极容易形成反常的形式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误差的范围可能有多大），我们对于评价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因素等公认更困难的问题，或许就可以少些困扰了。[15]

注 释

前言

[1] "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al Historian," in *From Parnassus: Essays in Honor of Jacques Barzun,* ed. Dora B. Weiner and William R. Keylor (New York, 1976), 223.

[2] See J. A. V. Chapple, *Documentary and Imaginative Literature, 1880–1920* (London, 1970),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1973), and Noel Annan, "The Possesse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3*, no. 1 (5 February 1976), 22. See also Mark Girouard, *Sweetness and Light: The "Queen Anne" Movement, 1860–1900* (Oxford, 1977); Walter Arnstein, "The Survival of the Victorian Aristocracy," in *The Rich, the Well Born, and the Powerful,* ed. F. C. Jaher (New York, 1973), 203–257; T. F. Lindsay and Michael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918–1970* (New York, 1974), and Tom Nairn, *The Left Against Europe?* (Harmondsworth, 1973). William B. Gwyn surveys a variety of cultural explanations for British economic retardation in "Perceptions of British Decline," in a forthcoming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Britain's economic state, edited by himself.

[3]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1961), 47.

[4] Frank Field ("Literature, Society and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ians," *History 64* [1979], 55) has recently observed and deplored this aversion. Major British historians of premodern times, like Christopher Hill and Keith Thomas, have been more open-minded, with a consequent gain of vitality to their field.

第一章 英国现代文化两面观

[1] "Obsolescence—and Dr. Arnold," Sunday *Telegraph,* 26 January 1975.

[2] "Europe: Some Are More Equal," *Listener 96* (14 October 1976), 460.

[3] *Industry and Empir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50* (London, 1968), 157.

[4] The shortcomings of exclusively economic explanations of British retardation are discussed in

the Appendix.

[5] See two "classics," W.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1955), ch. 2; and W. W. Rost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1960), chs. 1–2.

[6] See David C. McClelland, *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1961), and David C. McClelland and David G. Winter, *Motivating Economic Achievement* (New York, 1969); Everett E. Hagen,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ow Economic Growth Begins* (Homewood, Ill., 1962); Alex Inkeles and David Smith, *Becoming Modern* (Cambridge, Mass., 1974).

[7]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1968).

[8] See, in addition to Myrdal, Ronald Segal, *The Anguish of India* (Harmondsworth, 1965), and V. W. Naipaul, *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77).

[9] See, for example, Norman Macrae, "The Risen Sun" [survey], *Economist,* 27 May 1967 and 3 June 1967, and Brian Beedham, "No One Quite Like Them" [survey], *Economist,* 31 March 1973; see also Cyril Black et al.,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 A Comparative Study* (London, 1976). "It is surprising," Derek Aldcroft noted in reviewing this book (*History 62* [1977], 92), "how frequently economists and economic historians obsessed with the growth records of countries take [social and political] matters for granted." Ronald Dore, in his book *British Factory—Japanese Factory* (London, 1973), has shown how Japanese enterprises using similar technology, and often even similar patterns of production as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can provide quite different social situations.

[10] Recent studies hav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managerial attitudes and policies for workplace behavior. See Peter Steams, *Paths to Authority: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Industrial Labor Force in France, 1820–1848* (Champaign, Ill., 1979) and Michael B. Miller, *The B0n Marché: Bourgeois Culture and the Department Store, 1869–1920* (Princeton, 1980).

[11] Lincoln Allison, "The English Cultural Movement," *New Society 43* (16 February 1978), 358.

[12] See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New York, 1964), and its important connection as well as extension in Thomas Bender, *Towards an Urban Vision: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Lexington, Ky., 1975). See also the perceptive essay by Howard P. Segal, "Leo Marx's 'Middle Landscape': a Critique, a Revision, and an Appreciation,"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5* (1977), 137–149.

[13] See Allan Nevins and Frank Ernest Hill, *Ford: Expansion and Challenge, 1915–1933* (New York, 1957), 500–506, and Keith Smart, *The Legend of Henry Ford* (New York, 1948), 261–265.

[14] See Talcott Parsons, "Democrac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Pre-Nazi Germany," in hi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1954), 104–123; Ra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New York, 1967);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1): George Moss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1964). Such stable nations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were not unaffected by such tensions. On America, see, in addition to Leo Marx, T. L. Hartshorne, *The Distorted Image* (Cleveland, 1968). On France, see Stanley Hoffman et al., *In Search of France* (Cambridge, Mass., 1963).

[15] A stimulating essay on the subject is Stanley Rothma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in Britain," in *Studies in British Politics,* ed. Richard Rose (London, 1966), 6. Peter Berger's concept of "contamination" between cognitive systems in contact is suggestive of what happened, to some degree, to modern values in the embrace of English tradition. See his *The Sacred Canopy* (New York, 1967), part II.

[16] "Is Beckerman among the Sociologists?" *New Statesman* (18 April 1975), 501.

[17]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no. 23 (January-February, 1964), 31.

[18] Contribution to symposium, "Who's Left, What's Right?" *Encounter,* March 1977, 29.

[19] This was first noted and examined by Thorstein Veblen in his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15).

[20] Martin Kitch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Montreal, 1978), 126–127, offers some informed generalizations, and Fritz Stern,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k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New York, 1977), is a brilliant case study.

[21] In David Spring, ed., *European Landed Elit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Md., 1977), 51–52.

[22] See Helmut Böhme, "Big-Business Pressure Groups and Bismarck's Turn to Protectionism, 1873–1879," *Historical Journal 10* (1967), 218–236.

[23] Fritz Stern ("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al Historian," in *From Parnassus,* 219) observes free enterprise giving way to "a new kind of cartelized capitalism, at times in collusion with the government." Kitchin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27–128) describes the "industrial feudalism" of Krupp and other big industrialists. Charles Medalen,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 in Germany: The Hibernia Affair," *Past and Present,* no. 78 (February, 1978), 82–112, is interesting on the Prussian approach to industry.

[24] *The Break-up of Britain* (London, 1977), 32. Similar limits were also, in Nairn's argument, thus imposed upon working-class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most notable criticism of Andersen's initial interpretation, that by E. P. Thompson in 1965, is (to this reader) unfair and unconvincing. See E. P.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New York, 1965), 311–362, and Anderson's reply,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35 (January-February, 1966), 2–42.

[25] *The Swordbearers* (London, 1963), 181.

第二章　维多利亚朝的社会：适应与吸收

[1] C. P. Snow, *The Masters* (New York, 1951), 349.

[2] Quoted in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New York, 1961), 136.

[3] See W. L. Guttsman,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 (London, 1963); Walter Arnstein, "The Survival of the Victorian Aristocracy," in *The Rich, the Well Born, and the Powerful,* ed. F. C. Jaher (New York, 1973), 203–257, and F. M. L. Thompson, "Britain," in *European Landed*

Elit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David Spring (Baltimore, Md., 1977), 22–44.

[4] *Economist,* 29 June 1850 and 16 July 1879; quoted in F. M. L. Thompson, "Britain," 29.

[5]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London, 1969), 435. Richard Helmstadter has described the parallel absorption of Nonconformity in *The Conscience of the Victorian State*, ed. Peter Marsh (Syracuse, N. Y., 1979), 162–164.

[6] "Economic Functions of English Landowner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Explorations in Enterprise*, ed. H. G. J. Aitken (Cambridge, Mass., 1965), 339.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re were not many individual cases of development-minded aristocrats, and even peers very interested in industrial enterprise. See *Land and Industry: The Landed E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J. T. Ward and R. G. Wilson (Newton Abbot, Devon, 1971), and Michael W. McCahill, "Peers, Patronag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0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6,* no. 1 (Fall, 1976), 84–107. Ward and Wilson, in particular, stress the keen interest of the landed proprietors in new sources of income, and their importanc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Yet one can accept the economic vitality of the landed elite and still argue for their long-run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If the landed families had consistently held themselves aloof from the new economic currents, they would have been swept aside. Instead, they were economically aggressive enough to preserve their predominance without abandoning their distinctive set of values and style of life, to which the new businessmen and industrialists came to aspire.

[7] The appeal of the gentlemanly ideal was well-nigh irresistible. Even the most well-known ideologist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Samuel Smiles, sought to appropriate it. In the final chapter of *Self-Help* (entitled "The True Gentleman"), he took the gentleman as his standard, seeking to strip him only of his outward, class-bound associations. Gentility, for Smiles, was the ultimate crown to be worn by those who had helped themselves.

[8] Cited by Alan Brien, Sunday *Times* (London), 1 August 1971.

[9] See W. G. Rimmer, *Marshalls of Leeds* (Cambridge, 1960), 276–303. Mark Girouard (*The Victorian Country House* [Oxford, 1971]) has shown how this social fusion shaped mid- and late-nineteenth-century country house architecture. William Thomas (*The Philosophic Radicals* [Oxford, 1979], 449) has noted how "the rage for titles and pedigrees, for heraldic pomp and castellated architecture" overtook even some radical politicians: "One of the most sustained attempts to create a medieval setting which would reinforce his social pretensions was the rebuilding, or rather smothering in gothic additions, of Bayons Manor, by Charles Tennyson, radical M. P. for Southwark."

[10] Thompson, "Britain," 30.

[11] *Social Leaders and Public Persons: A Study of County Government in Cheshire since 1888* (Oxford, 1963), 36.

[12] Quoted in John Morley, *Life of Richard Cobden* (London, 1881), *II,* 481–482. This attitude became more entrenched with time. Friedrich Engels (who in 1850 had announced the triumph of the bourgeoisie) observed in 1892, with a mixture of bewilderment and contempt, that

"the English bourgeoisie are, up to the present day, so deeply penetrated by a sense of their inferiority that they keep up at their expense and that of the nation, an ornamental caste of drones to represent the nation worthily at all state functions; and they considered themselves highly honoured, whenever one of themselves is found worthy of admission into this selected and privileged body, manufactured, after all, by themselve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New York, 1935], 26).

[13] See Brian Heeney, *A Different Kind of Gentleman: Parish Clergy as Professional Men in Early and Mid-Victorian England* (Hamden, Conn., 1976).

[14] W. J. Reader, *Professional Men* (New York, 1966), 211 and passim.

[15] *England: Her People, Polity and Pursuits* (London, 1885), 355–356.

[16]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256.

[17] For an American contrast, see Burton Bledstein, *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 (New York, 1976).

[18] Magali Sarfatti Larson,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 1977), concludes (103) that "the English case shows with clarity that the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of the professional model are subordinate to broader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Using Philip Elliot's distinc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London, 1972]) between "status professionalism" and "occupational professionalism," we can see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form was less complete in Britain than, for example, in America. The most valuable discussion of the English nineteenth-century professional outlook is in Reader, *Professional Men;* see also Sheldon Rothblatt, *The Revolution of the Dons* (London, 1968), 90–92; G. Kitson Clark. *The Making of Victorian England* (Cambridge, Mass., 1962), 258–274; W. L. Burn, *The Age of Equipoise* (London, 1964), 253–267.

[19] W. D. Rubinstein, "Wealth, Elites and Class Structure in Britain," *Past and Present,* no. 76 (August, 1977), 122n.

[20]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ontinent* [1868], ed. R. H. Super (Ann Arbor, Mich., 1964), 308–309.

[21] For a detailed substantiation of this claim, see J. R. de S. Honey, *Tom Brown's Univer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ctorian Public School* (London, 1977), ch. 4.

[22] *Parl. Papers 1864 20, Report of H. M.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are into the Revenues and management of certain Colleges and Schools and the Studies pursued and instruction given therein* [hereafter called *Public Schools Commission] 1,* 56. As the novelist and translator Rex Warner, himself a schoolmaster, observed in a brief popular account, the Clarendon report "is evidence of the complete acceptance of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as the best possible means of education for those who were to be leaders of the country in peace or war." (Rex Warner, *English Public Schools* [London, 1945], 30).

[23] Quoted in T. W. Bamford, *The Rise of the Public Schools* (London, 1967), 15.

[24] See J. H. Plumb, "The New World of Childhoo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 67 (May, 1975), 64—95, and Bamford, *Rise of the Public Schools,* 87, 97.

[25] Bamford, *Rise of the Public Schools,* 88.

[26] Quoted in Martin J. Wiene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Graham Wallas* (Oxford, 1971), 6.

[27] *Public Schools Commission 2,* 42. J. R. de S. Honey concluded (*Tom Brown's Universe,* 128), "The position of the classics, public schools and in English education in general, was if anything more powerful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n it had been at the beginning."

[28] *Part. Papers 1868 28, Report of the Schools Inquiry Commission 1,* 17—18.

[29] See Bamford, *Rise of the Public Schools,* 105.

[30] *Education and School (1884),* quoted in Reader, *Professional Men,* 108.

[31] F. W. Farrar, "Public School Education," *Fortnightly Review 3* (new series) (March, 1868), 239—240.

[32] Thomas Hughes, *Tom Brown's School Days* [1857] (New York, 1968), 46, 276—277. The dean of Lincoln, addressing Wellington College on its fiftieth anniversary, typically described the school as a place where the young might "learn to put honour before gain, duty before pleasure, the public good before private advantage" (*Wellington College Year Book,* 1909, quoted in David Ward, "The Public Schools and Industry in Britain After 187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 no. 3 [July, 1967], 49).

[33] Hughes, *Tom Brown,* 54.

[34] Quoted in Ward, "Public Schools and Industry," 38.

[35] *Schools Inquiry Commission 1,* 18. See E. C. Mack, *Public Schools and British Opinion, 1780—1860* (New York, 1938), 391.

[36] See, for example, Rupert Wilkinson and T. J. H. Bishop, *Winchester and the Public School Elite* (London, 1967), passim.

[37] Sir John Otter, *Nathaniel Woodard: A Memoir of His Life* (London, 1925), 240. Woodard, a High Church clergyman, was the son of a country gentleman of modest means. See Honey's account of Woodard's and others' efforts to provide public schools for a wider se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es (*Tom Brown's Universe,* ch. 2).

[38] See Honey, ibid., 286.

[39] See Bamford, *Rise of the Public Schools,* 16. When cities threatened to encroach, as at Eton and Harrow, expensive defensive measures were taken: Both schools, in effect, sealed off their buildings with a green belt. Harrow's land purchases between 1885 and 1898 were described at the time as a necessary preservative of the invaluable "beauty and dignity" of the school's "rural" setting, upon which "the romantic affection which gathers round an ancient public school" would soon erode (C. Colbeck, quoted in E. W. Henson and G. T. Warner, *Harrow School* [London, 1898], 155).

[40] See W. H. G. Armytage, *Four Hundred Years of English Education* (London, 1970), 232.

[41] Foreign imitations of the public schools, developing in different societies, mov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Wilkinson and Bishop, for example, found that comparing their subject, Winchester,

with the most fashionable boarding schools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brought out all the more clearly "how often the public schoolboy's outlook on careers resisted the pull of private money-making": "Although the founders of Groton and St. Paul's tried sincerely to emulate the public school way,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the major American boarding schools have sent less than one percent of their boys into government since 1900"—a vastly lower proportion than that at Winchester (Wilkinson and Bishop, *Winchester and the Public School Elite,* 72).

[42] Bernard Darwin, *The English Public School* (London, 1929), 28.

[43] Roy Lewis and Angus Maude,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es (London, 1949), 22, 232.

[44] See Brian Simon, "Introduction," in *The Victorian Public School,* ed. Brian Simon and Ian Bradley (London, 1975), 16—17.

[45] Chuter Ede, in Parliament, 4 February 1943; quoted in Bamford, *Rise of the Public Schools,* 260.

[46] One effect was, in Bamford's view, to delay "lower-class (elementary school) aspirations... for a generation and more. With those aspirations went any hope of a massiv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 that the scientists and industrialists had been urging for half a century" (*Rise of the Public Schools,* 261).

[47] *Parl. Papers 1868 15,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an Scientific Instruction,* 402. In that very year a proposal that the Cambridge colleges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mporary professorship of experimental physics and a laboratory (that eventually became, with outside money, the Cavendish Laboratory) was foundering before fierce opposition. "A Prussian is a Prussian," said Dr. Phelps, the master of Sidney Sussex, "and an Englishman is an Englishman, and God forbid it should be otherwise" (quoted in Armytage, *Four Hundred Years,* 167).

[48] See Michael Sanderson, *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1850—1970* (London, 1972), 48—50; and Rothblatt, *Revolution of the Dons,* 86—87.

[49] Elliot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52) has summarized this development in Britain: "The ideology of liberal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 and gentlemanly professionalism was elaborated in opposition to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ism and commercialism. This is one reason why it drew so heavily on the older tradition of gentlemanly leisure and the established professions. It incorporated such values as personal service, a dislike of competition, advertising and profit, a belief in the principle of payment in order to work rather than working for pay and i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motive of service."

[50] Thomas Hughes, *Tom Brawn at Oxford* [1861] (London, 1869), 100—101, 305, 395. See Rothblatt, *Revolution of the Dons,* 244—246, 256—257, 267—273; Sanderson, *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51—52.

[51] *Revolution of the Dons,* 256—257.

[52] Ibid., 273.

[53] Oliver Macdonagh, *Early Victorian Government* (London, 1977), 212. Macdonagh noted an

"irony" about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civil service: "that the radical ideals of open competi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fittest by examination contests should have been interlinked with the reactionary ideal of education as an experience and an exercise rather than the acquisition of particular skills or knowledge, or being graded according to intellectual attainment." Newman's *Idea of a University,* published almost contemporaneously with the 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 proved as influential as the latter in shap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new governing class. The result of the battle launched by Trevelyan and the other educ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ers was, à la 1832, "to enlarge and rebuild, not to destroy or even weaken the exclusive elite" (Macdonagh, *Early Victorian Government,* 212—213).

[54] See the statistics on recruitment and later occupations of Oxford and Cambridge undergraduates in Sanderson, *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37, 53—54, and Rothblatt, *Revolution of the Dons,* 272—273.

[55] See Chapter 7.

[56] See David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1969), 343—348, and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London, 1969), 423—424.

第三章　价值观的一种逆反

[1] *Victorian People* (Chicago, 1955), 16.

[2] *Economist,* 4 January 1851.

[3] *Henry Mayhew's 1851* (London, 1851), 160.

[4] *Lives of the Engineers* [1861—1862] (London, 1904), I, xxiii.

[5] Quoted in David Thomson, *Eng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rmondsworth, 1950), 32.

[6] Quoted in Nikolaus Pevsner, *Some Architectural Writ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72), 115, 133, 154. This is not to dismiss great differences within the Gothic revival—for examp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thic of Pugin and that of Ruskin. Pevsner is an excellent guide on this subject.

[7] The best account of this reaction remains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1958).

[8] Sir *Thomas More: or, Colloquies on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Society, 2,* quoted in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1959), 25.

[9] "Southey's Colloquies on Society," *Edinburgh Review 50* (1829—1830), 528—565.

[10] *Victorian Engineering* [1970] (Harmondsworth, 1974), 162—163.

[11] Nikolaus Pevsner perceived this mid-Victorian shift in art. See *The Englishness of English Art* (London, 1956), 188—189.

[12] *Victorians and the Machine* (Cambridge, Mass., 1968), 91.

[13] *Sweetness and Light: The "Queen Anne" Movement, 1860—1900* (Oxford, 1977). 3.

[14] See Noel Annan, *Leslie Stephen: His Thought and Character in Relation to His Age* (London,

1951); Melvin Richter, *The Politics of Conscience: T. H. Green and His Age* (Cambridge, Mass., 1964); and Martin J. Wiene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Graham Wallas* (Oxford, 1971). Noel Annan has explored this from the angle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The Intellectual Aristocracy," in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 ed. J. H. Plumb (London, 1955), 243–287.

[15] *Doctor Thorne* [1858] (London, 1934), 11–12.

[16] *The Way We Live Now* [1875] (New York, 1974), 383.

[17] *The Victorian Age in Literature* (New York, 1903), 37.

[18] Letter to Gustave D'Eichthal, 8 October 1929, in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62), *12*, 35.

[19] "The Negro Question," *Fraser's Magazine 41* (January, 1850), 27.

[20]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 (New York, 1961), 748–751.

[21] *Letters*, ed. Madeline House, Graham Story, and Kathleen Tillotson (Oxford, 1974), *3*, 481.

[22] Letter to Charles Eliot Norton, 19 June 1870 in *Works of John Ruskin*, ed. E. T. Cook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 (London, 1905), *37*, 7.

[23] This interpretation was begun by G. B. Shaw in several prefaces to new editions of Dickens's novels (his 1912 introduction to *Hard Times* is reprinted in *The Dickens Critics,* ed. G. H. Ford and Lavriat Lane, Jr. [New York, 1961], 125–135). A more recent example is Grahame Smith, *Dickens, Money, and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8).

[24] The most succinct exposition of this view is Michael Goldberg's "From Bentham to Carlyle: Dicke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3* (1972), 61–76.

[25] *Dombey and Son* (Hannondsworth, 1970), 50, 354.

[26] Quoted in Angus Wilson, *The World of Charles Dickens* (London, 1970), 229.

[27] *Little Dorrit* (New York, 1911), *1,* 195.

[28] Robin Gilmour, "Dickens and the Self-Help Idea," in *The Victorians and Social Protest*, ed. J. Butt and I. F. Clarke (Newton Abbot, 1973), 99.

[29] *Our Mutual Friend* (London, 1865), *1*, 15.

[30] *The World of Charles Dickens,* 291.

[31]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Friendship's Garland* (New York, 1886), 243. See also Arnold's essay, "My Countrymen" (1866), in the same volume, 317–357.

[32] Ibid., 264. By contrast, see Arnold's benign remarks on the public schools, quoted in W. F. Connell,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Influence of Matthew Arnold* (London, 1950), 244–245.

[33] *Mixed Essays,* 379. Lionel Trilling understood this when he entitled the first of two chapters on Arnold's social thought "The Failure of the Middle Class." Trilling, *Matthew Arnold* [1939] (New York, 1955), 203.

[34]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Friendship's Garland,* 178, 343, 344, 340, 16.

[35] Henry Sidgwick, "The Prophet of Culture," *Macmillan's Magazine 16* (August, 1867), 271–280.

[36]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Friendship's Garland,* 16.

[37] "The Two Paths," in *Works, 16,* 348–349. Gillian Naylor (*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1971], 23) has drawn an illuminating contrast between the "American" outlook toward nature, exemplified by Ralph Waldo Emerson, and Ruskin's "English" stance. In 1847, Emerson spoke in Manchester, full of praise for the industry, thoroughness, and skill of English mechanics. A decade later, Ruskin spoke to a similar audience in Manchester, but admonished rather than praised them. "Emerson [Naylor observed], whose reverence for nature was as profound as that of Ruskin, saw within it organic principles that could be emulated by both art and industry, and in so doing he was blazing the trail that led to Sullivan, Frank Lloyd Wright and Buckminster Fuller. Ruskin, too, urged his followers to turn to nature for both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stimulus, but for them the field and the factory could have nothing in common, and the lessons they learned from nature bore little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of industry."

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in England followed in Ruskin's steps. C. R. Ashbee, the movement's leading figure, described (in *Craftmanship in Competitive Industry* [London, 1908], 11) the prevalent view within the movement that "the proper place for the Arts and Crafts is in the country... away from the complex, artificial and often destructive influences of machinery and the great town." This was not mere talk; the Guild of Handicraft, the chief Arts and Crafts body, moved in 1902 from London to Chipping Campden. Ruskin's successors, following his path away from the machine, ended in a cul-de-sac. The guild's move defied economic sense and went against the trend of related movements in Scandinavia, Germany, and America, but the emotional appeal of the historic rustic setting won out. The guild declined in its remote locale, and dissolved in 1914, a victim of following its beliefs to their logical conclusion.

Design leadership passed to others—America, Germany, France, Scandinavia—more hospitable to industry. Even when a fusion was deliberately sought, Ruskinite prejudices doomed it: The unsuccessful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dustry, founded in 1888 with some fanfare and support from Establishment cultural figures, was a case in point. The association lasted a mere three years, and accomplished nothing beyond holding three congresses, in which "art" was richly represented but "industry" hardly at all. These congresses were dominated by figures from the art world. Some aristocratic patrons and politicians were drawn in, but no significant number of manufacturers, the very people to whom the founders of the association were supposedly reaching out. In truth, little sustained effort was made to link up with them: The sole evidence for such an effort was a letter in the *Times* (London) before the first congress calling for manufacturers to come forward. The conception of the association was essentially de haut en bas: to elevate the standards of benighted industrialists by exposing them to the best thinking of artists and designers. Its leaders consequently waited for their "students" to apply, and waited, not very surprisingly, in vain. A scholar who studied William Martin Conway, the moving force behind the association, could find "no evidence of his having ventured into the precincts of a single factory" (Peter Stansky, "Art, Industry, and the Aspirations of William Martin Conway," *Victorian Studies 19*, no. 4 [June, 1976], 484).

[38] *Works, 17,* 38–40, 105, 264, 281, 388; *16,* 344.

[39] *Works*, *34*, 314–315; *17*, 112.

[40] *Works, 5*, 382.

[41] *Works, 17*, 56.

[42] *Victorian Essays* (London, 1962), 125.

[43] E. T. Cook, *Life of John Ruskin* (London, 1911), 2, 542.

[44] See Humphrey House, *The Dickens World* (London, 1941), 9–10.

第四章 “英国生活方式”吗？

[1] Donald Horne, *God is an Englishman* (Sydney, Australia, 1969), 22–23.

[2] As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London, 1963], 355–361) has noted how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ortance of the northern industrial cities began to recede. A fervent and not untypical literary disparagement of the "northern way of life" is made by George Gissing in his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1903] New York, 1961), 163: "The vigorous rac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rent only found its opportunity when the age of machinery began; its civilization, long delayed, differs in obvious respects from that of older England... The rude man of the north is... just emerged from barbarism, an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would show less smooth a front [than the man of the south]. By great misfortune, he has fallen under the harshest lordship the modern world has known—that of scientific industrialism, and all his vigorous qualities are subdued to a scheme of life based upon the harsh, the ugly, the sordid."

[3] *God is an Englishman,* 38.

[4] "The English Dream," *Spectator 206* (1 March 1961), 334. For another description of the same cultural form, see John Holloway, "The Myth of England," *Listener 81* (15 May 1969), 670–673.

[5] "Transatlantic Letter to England," *Encounter,* January 1976, 7.

[6] *Lives of the Engineers 2*, 30.

[7] *Public Schools Year Book,* 1889, quoted by Sheldon Rothblatt, *The Revolution of the Dons* (London, 1968), 51.

[8] Anthony Sampson, *Anatomy of Britain* (New York, 1962), 638.

[9] *Victorian Cities,* 381, 391–392. Briggs observed that the author of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the *Athenaeum* on places about to be visited by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made almost no men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 most enjoyed writing about Exeter, Norwich, or York, but when he came to Bradford he concentrated on the Civil War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about Birmingham said little of anything after Dr. Priestley. "Fortunately for him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did not hold a meeting in Crewe" (*Victorian Cities,* 392).

[10] G. W. Kitchin, *Winchester* (London, 1890), 217–218.

[11] Quoted in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381.

[12] *The Story of Our English Towns* (London, 1897), 34. Ditchfield's antiquarian titles ran to several dozen.

[13] William Watson, preface to Alfred Austin, *English Lyrics* (London, 1896), xiv.

[14] *Haunts of Ancient Peace* [1902] (London, 1908), 18—19.

[15] *Old Country Life* (London, 1890), 235.

[16] "How I Became a Socialist" (1894), in *William Morris: Selected Writings and Designs,* ed. Asa Briggs (Hannondsworth, 1962), 36; "First Lines from the Prologue to *The Earthly Paradise,*" in Briggs, quoted *William Morris,* 68.

[17] "Early England" (1886), in *The Unpublished Lectures of William Morris*, ed. Eugene Le Mire (Detroit, Mich., 1969), 158; "Art and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1881), in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10—1915), *22*, 172.

[18] *Industry and Empir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50* (London, 1968), 142.

[19] *Our English Villages: Their Story and Their Antiquities* (London, 1889), 4.

[20] The political theorist Giovanni Botero was typical, declaring in 1588 that "although the country do abound in plenty of all good things, yet there is not a city in it [London excepted] that deserves to be called great" (G. Botero, *The Reason of State and the Greatness of Cities,* ed. P. J. and D. P. Waley [London, 1956], 235).

[21] The most recent account of the growth of London's rote as an aristocratic social center is in Mark Girouard, *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New Haven, Conn., 1978), 5—9. See also Penelope Corfield's account of Norwich as a provincial center of gentry life in *Crisis and Order in English Towns,* ed. Peter Clark and Paul Slack (London, 1972), 287—294. On the rise of an urban mercantile elite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ose growth was to be abort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gentrification), see Nicholas Rogers, "Money, Land and Lineage: The Big Bourgeoisie of Hanoverian London," *Social History 4* (1979), 437—454.

[22] F. M. L. Thompson has described the decline of the landed interest in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3), chs. 10—12.

[2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1973), 248. Several very interesting essays on this subject are to be found in *Victorian Writers and the City,* ed. Jean-Paul Hulin and Pierre Coustillas (Lille, France, 1979), which appeared too late for me to use here.

[24] See David Cannadine, "From 'Feudal' Lords to Figureheads: Urban Landownership and Aristocratic Influ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Towns," in *Urban History Yearbook, 1978*, (Leicester, England) 23—35.

[25] This integration has been discussed from a variety of angles: See Christopher 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ish Economy and Society, 1530—1780* (London, 1967);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Mass., 1966), 3—39;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Girouard (*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7—10) touches o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al "urbanization" of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26] This subject has of course a vast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relevant are Kenneth Barkin, "A Case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Populism in Germany and America," in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 ed. Herbert J. Bass (Chicago, 1970), 373–404; Gordon Wright, *Rural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Peasant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anford, Calif., 1964); and Suzanne Berger, *Peasants Against Politics: Rural Organization in Brittany, 1911–1967* (Cambridge, Mass., 1972).

[27] See two masterful recent studies: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Calif., 1976); Jerome Blum, *The End of the Old Order in Rural Europe* (Princeton, NJ., 1978).

[28] This was apparent even in "practical" efforts for agricultural reform. These revolved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around schemes for the creation of smallholdings, despite the lack of grass-roots demand in England (such as certainly existed in Ireland) for such land redistribution. J. R. Fisher ("Public Opinion and Agriculture, 1875–1900,"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Hull, 1972) concluded that the economic case for smallholdings was weak, and that the policy was advocated and supported for social rather than economic reasons. The land, in various ways for various advocates, held out the hope of regenerating English society. "The pathetic delusion," as the sociologist O. R. McGregor has called it (introduction to Lord Ernle, *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6th ed. [London, 1961], cxxxvii), "that some sort of land settlement scheme contained the secret cure for the ills of industrial society had great survival value." Such survival owed much to the nature of its appeal: Harold Perkin had noted ("Land Reform and Class Conflict in Victorian Britain," in *The Victorians and Social Protest,* ed. J. Butt and T. F. Clarke [Newton Abbot, Devon, 1973], 177–217) that the land reform issue drew its greatest support from the new professional classes, for whom it was less an economic issue than a moral (and cultural, we might add) one. The issue drew on the early-nineteenth-century tradition of antilandlordism, but this source of feeling was gradually fading. A newer source lay in the rising wave of nostalgia and distaste for urban industrial society. In continental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arge numbers of politically organized rural smallholders ensured the issue a permanent place in politics and in the perennial jockeying between economic interests. In England the issue remained in the realm of symbol and myth.

[29] Christopher Hussey, *The Fairy Land of England* (London, 1924), 65.

[30] Ford Madox Ford [Hueffer],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London, 1906), 58.

[31] See Glen Cavaliero, *The Rural Tradition in the English Novel, 1900–1939* (Totowa, N. J., 1977): "The country... was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town" (9).

[32] Quoted on concluding page of Alfred Austin, *The Garden That I Love,* 2nd series [1894] (London, 1907). Perceptive contemporaries had noted this trend early on: See Leslie Stephen, "Country Books," *Cornhill 42* (1880), 662.

[33] *The Country* (London, 1913), 17; see also 36–39. Jerome Bump has reiterated that "most of the individuals in the 'rural' tradition [of writing] actually lived in the city at various times or imported the trappings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to the country; more importantly, they all

wrote for city readers" (*Victorian Studies 20* [Autumn, 1976], 97).

[34] *My England* (London, 1938), 62.

[35] See Malcolm Bradbury,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1971), 46.

[36] W. J. Keith, *Richard Jefferies* (Toronto, 1965), locates the appearance of "an appreciation of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as a popular taste" around 1880, as did J. A. V. Chapple in his survey of the period from 1880 to 1920. Robert Hamilton, writing on W. H. Hudson, placed it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as did E. D. Mackerness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journals of George Sturt. Elizabeth Haddow, in "The Novel of English Country Life, 1900—1930," a useful University of London Master's thesis (1957), cited the 1890s as the crucial decade. Cavaliero, in *The Rural Tradition in the English Novel* (London, 1977), took Hardy as his departure point. Leslie Stephen was noting this increased interest in 1880. Precise dating of such intangible cultural phenomena is rarely possible, but general agreement clearly locates this change in the late-Victorian years. Other evidence: *Country Life* magazine was started in the 1890s by a romantic and country-loving businessman, and quickly became a great success. In 1904, the urban, Liberal *Manchester Guardian* began a column entitled "Country Diary."

[37] *John Davidson: A Selection of His Poems,* ed. Maurice Lindsay (London, 1961), 7.

[38] One very explicit example is P. H. Ditchfield's *The Old English Country Squire* (London, 1912), vii.

[39] William Watson, preface to Austin, *English Lyrics,* xv. See also S. Baring-Gould, *An Old English Home and Its Dependencies* (London, 1898).

[40] Girouard, *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303. On the literary preoccupation with the country house, see Richard Gill, *Happy Rural Seat* (New Haven, Conn., 1972).

[41]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164; *England: A Nation,* ed. Lucien Oldershaw (London, 1904), 99; "Appeal to the Squires," *New Witness 2* (9 October 1913), 721; see George Sturt, *Change in the Village* (London, 1912).

[42]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Cambridge, Mass., 1950); Morton and Lucia White, *The Intellectual vs.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1962);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New York, 1964); Roderick 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Haven, Conn., 1967); Donald Fleming, "Roots of the New Conservation Movement,"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6* (1972), 7—91.

[43] *Victorian Cities,* 80.

[44] See, for example, the discussion by Walter Berns, "Thinking about the City," *Commentary 56,* no. 4 (October, 1973), 75.

[45] "Haymaking," in *Collected Poems* (London, 1920), 58.

[46]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50.

[47] J. Bruce Glasier, *William Morris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London, 1921), 152.

[48] *New Statesman 88* (27 September 1974), 428.

[49] Quoted in L. Lerner and J. Holmstrom, *Thomas Hardy and His Readers* (New York, 1968), 15.

[50] Randall Williams, *The Wessex Novels of Thomas Hardy* (London, 1924), 4.

[51] Quoted in Edmund Blunden; *Thomas Hardy* (London, 1941), 39; J. M. Barrie, "Thomas Hardy," *Contemporary Review 56* (1889), 57–66.

[52] "The Novels of Thomas Hardy," *Quarterly Review 199* (1904), 500–501.

[53] W. J. Keith, "Thomas Hardy and the Literary Pilgrims," *Nineteenth Century Fiction 24,* 1 (June, 1969), 80–92; Blunden, *Hardy* (London, 1941), 115–117; Lerner and Holmstrom, *Hardy and His Readers,* 22, 56, 163–164; Merryn Williams, *Thomas Hardy and Rural England* (London, 1972), xi-xiii; G. S. Cox, "The Hardy Industry," in *The Genius of Thomas Hardy,* ed. Margaret Drabble (London, 1976), 170–181.

[54] Interview in *Black and White,* 27 August 1892, quoted in Lerner and Holmstrom, *Hardy and His Readers,* 94.

[55] F. E. Hardy, *The Early Life of Thomas Hardy* (London, 1928), 25–26. See also Hardy's preface to the 1895 edition of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in *Thomas Hardy's Personal Writings,* ed. Harold Orel (Lawrence, Kans., 1966), 10–11.

[56] See Roy Morrel, *Thomas Hardy: The Will and the Way* (London, 1965), Irving Howe, *Thomas Hardy* (New York, 1967), and, from a different angle,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ch. 18.

[57] Hardy, *Early Life,* 270. See also ch. 51 of Hardy's *Tess of the D'Ubervilles.*

[58] *An Old English Home* (London, 1898), 204.

[59] Augustus Ralli, *Critiques* (London, 1927), 43–44.

[60]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2–193. I have drawn, in the text that follows, on Williams's discussion of Jefferies.

[61] *The Longest Journey* [1907] (London, 1947), 146.

[62] W. J. Keith, *The Rural Tradition* (Toronto, 1974), 132.

[63] Samuel J. Looker and Clifton Porteous, *Richard Jefferies: Man of the Fields* (London, 1965), 233.

[64] *Hodge and His Masters* [1880] (London, 1890), 276–277.

[65] Ibid., 132–134, 167–168, 373, 375, 382.

[66] Quoted in Looker and Porteous, *Jefferies,* 237.

[67] In one typical collection of about 300 patriotic poems (*The Call of the Homeland,* ed. R. P. Scott and K. T. Wallas [London, 1907]), not one poem mentions in any way the technical advanc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pride. When industry was (rarely) noted, it was as in the poem by Lord Hanmer entitled "England," which begins: "Arise up, England, from the smoky cloud that covers thee, the din of whirling wheels."

[68] *Lyrical Poems* (London, 1891), 148.

[69] *Haunts of Ancient Peace,* 18–19, 168.

[70] "Why England is Conservative," *English Lyrics,* 116. C. K. Stead, in *The New Poetic* (London, 1964), sees these lines as typical of 1890s and Edwardian poetry.

[71] See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120–126;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London,

1975), chs. 3 and 4.
[72] See J. A. Froude, *Oceana* (London, 1886), 8—11, 17, 386—388.
[73] Letter to H. Rider Haggard, 22 December 1902, *Rudyard Kipling to Rider Haggard: The Record of a Friendship,* ed. Morton Cohen (Cranbury, N. J., 1965), 50.
[74] Letter to C. E. Norton, 30 November 1902, quoted in C. E. Carrington, *The Life of Rudyard Kipling* (New York, 1956), 286.
[75] R. Thurston Hopkins, *Rudyard Kipling's World* (London, 1925), 11, 266. Hopkins also wrote *The Kipling Country* (London, 1924) and *Thomas Hardy's Dorset* (London, 1922).
[76] On this side of Kipling, see Roger Lancelyn Green, "The Countryman," in *Rudyard Kipling: The Man, The Work and His World,* ed. John Gross (London, 1972), 125.
[77] Rudyard Kipling, *Something of Myself* (New York, 1937), 182.
[78] *The Later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Henry Newbolt,* ed. Margaret Newbolt (London, 1942), 34.
[79]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69, 106, 214—215, 220.
[80] John Holloway,"The Myth of England," *Listener 81* (15 May 1969), 672.
[81] "Farmers in Arm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2*, no. 12 (19 June 1969), 37.
[82] *Collected Works,* ed. May Morris (London, 1911—1914), *16,* 3.
[83] James Bryce, *Impressions of South Africa* (London, 1897), 571.
[84] *In Peril of Change* (London, 1905), 7, 16, 34.
[85] G. K. Chesterto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36), 108—115.
[86] *England: A Nation,* 38.
[87] Ibid., 96, 99.
[88] Brougham Villiers [Frederick J. Shaw], *England and the New Era* (London, 1920), 231—232. For his political ideas, see idem. *The Opportunity of Liberalism* (London, 1904).
[89] Quoted in Anthony Lister, "George Sturt: A Study of His Development as a Writer and His Conception of Village Life,"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1961, 183.
[90] *The Bettesworth Book* (1902), quoted in Lister, "George Sturt," 72—73.
[91] *Howards End* [1910] (New York, 1962), 29, 323, 331, 268—269.
[92]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ed. Aldous Huxley (New York, 1932), 277, 287.
[93] Samuel Hynes, *Edwardian Occasions* (New York, 1972), 186.
[94] Robert H. Ross, *The Georgian Revolt: Rise and Fall of a Poetic Ideal,* (Carbondale, Ill., 1965), 12.
[95] Quoted in *Collected Poems of Rupert Brooke* [1918], ed. Edward Marsh (London, 22nd impression, 1936), C (Memoir by Marsh).
[96] Hugh Dalton's recollection of Brooke's remark to him, quoted in Timothy Rogers, *Rupert Brooke: A Reappraisal and Selection* (London l971), 25.
[97] Rupert Brooke, "The Old Vicarage, Grantchester," in *Collected Poems,* ed. Marsh, 94.
[98] *Poetry and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1940), 41—42. This interpretation is admittedly, not entirely fair to Brooke and some of his fellow poets, who saw themselves as rebels against the stilted, conventional verse of an older generation. To a degree, the Georgian image was created by Edward Marsh's "packaging" and a receptive public, although the raw material was

there, and amenable to such shaping. On this subject, see Christopher Hassell, *Rupert Brooke* (London, 1964); C. K. Stead, *The New Poetic* (London, 1964); Ross, *Georgian Revolt;* and Rogers, *Rupert Brooke.* Like Hardy and Morris, the Georgians were more complex than was their image in the public mind.

[99] E. C. Pulbrook,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London, 1915), 2.

[100] *The Old Country: A Book of Love and Praise of England,* ed. Ernest Rhys (London, 1917), V, 161. (Lucas's poem was originally written for a gramophone record.)

[101] "England of My Heart" [1914], in Rhys, *The Old Country,* 204.

[102] *Georgian Poetry, 1913–1915,* ed. Edward Marsh (London, 1915), 115–116.

[103] W. F. Law and I. Law, *The Book of the Beresford-Hopes* (London, 1925), 161.

[104] Igor Webb, "The Bradford Wool Exchange: Industrial Capitalism and the Popularity of Gothic," *Victorian Studies 20,* 1 (Autumn, 1976), 45–68.

[105] Paul Thompson, *William Butterfield* (London, 1971), 374.

[106] *Sweetness and Light: The " Queen Anne " Movement, 1860–1900* (Oxford, 1977), 5. *Sweetness and Light* is a crucial work on this subject, as is another of Girouard's works. *The Victorian Country House* (Oxford, 1971), and Andrew Saint, *Richard Norman Shaw* (New Haven, Conn., 1976). See also Robert Furneaux Jordan, *Victorian Architecture* (Harmondsworth, 1966), 180–191, 226–235, and Robert Macleod, *Style and Society: Architectural Ideology in Britain, 1835–1914* (London, 1971), 52–53.

[107] Girouard, *Sweetness and Light,* 13.

[108] *The Letters of William Morris to His Family and Friends*, ed. Philip Henderson (London, 1950), 265; quoted in Paul Thompson, *The Work of William Morris* (London, 1967), 55.

[109] "English Feeling," *Listener 98* (8 December 1977), 751.

[110] *The Victorian Country House,* 42, 46.

[111] Paul Thompson, *The Edwardians* (London, 1975), 39.

[112] See "C. P. A. Voysey," in Nikolaus Pevsner, *Studies in Art,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London, 1968), II, 140–151.

[113] Quoted in *Sweetness and Light,* 15.

[114] Walter Creese, *The Search for Environment* (New Haven, Conn., 1966), 169–171.

[115] Alan A. Jackson, *Semi-Detached London* (London, 1973), 136–138; *Leslie Bailey's BBC Scrapbooks, Volume 2: 1918–1939* (London, 1968), 51. Nostalgia affected even pub design: From the nineties, most pubs, particularly in the new suburbs, were no longer designed as flamboyant urban gin palaces but as rustic Old English inns (Robert Thorne, "Cut Glass to Half Timb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 1880–1930," Ph. D. diss. Leicester University, 1976).

[116] Quoted in Thompson, *Work of William Morris,* 57–58. Similarly, William Butterfield, one of the most active—and later, one of the most condemned—of restorers, became increasingly sensitive to the dangers of unnecessary alterations. In 1861, while rebuilding the chapel tower at Winchester College, he wrote that he intended "on principle [to] reuse as much of the old

work as possible in the reconstruction" (Thompson, *Butterfield*, 416).

[117] *Athenaeum,* 10 March 1877, quoted in *Morris*, ed. Briggs, 81–82.

[118] SPAB report and general meeting, 1889. An article against restoration in the *Globe* of March 14, 1889, was quoted with the observation that "such an article would not have appeared a few years ago." In 1886 the new secretary, Thackeray Turner, had informed the annual meeting that the piecemeal destruction of Lincoln's Inn, against which the society had protested without much hope, had been halted upon an unexpectedly enthusiastic response to that protest by the inhabitants (SPAB report and general meeting, 1886, 34).

[119] SPAB report and general meeting, 1920, 41. For a typical observation on the change in public opinion, see Percy Wyndham, SPAB report and general meeting, 1904, 74.

[120] J. W. Mackail, *Life of William Morris* (London, 1899) *1*, 354.

[121] *Works, 8*, 233–234; *36,* 239.

[122] SPAB report, 1879, 42.

[123] "English Architecture Thirty Years Hence" (1884), in Nickolaus Pevsner, *Some Architectural Writers of the Nineteeth Century* (Oxford, 1972), 309. Another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critic of the "nostalgia" of the SPAB was H. H. Statham; see his address, "What Are the Proper Limits of Conservatism in regard to Ancient Buildings?" in *Transaction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 1882* (London, 615–626).

[124] *Style and Society,* 52–53.

[125] SPAB report and general meeting, 1885.

[126] SPAB report, 1878, 36.

[127] Quoted in Thompson, *Work of William Morris,* 56, and in Pevsner, *Some Architectural Writers*, 289n.

[128] W. R. Lethaby, *Philip Webb and His Work* (London, 1935), 136.

[129] See, for some instances of opposition to Sir John Lubbock's National Monuments Preservation Bill in the 1870s and 1880s, Wayland Kennet, *Preservation* (London, 1972), 23–30.

[130] *Vanishing England* (London, 1910), 4.

[131] SPAB report and general meeting, 1890, 8.

[132] SPAB report and general meeting, 1878, 24.

[133] *Vanishing England,* 398, 28.

[134] SPAB report and general meeting, 1880, 7; SPAB report and general meeting, 1890, 8–9.

[135] SPAB report and general meeting, 1882, 24.

[136] SPAB report and general meeting, 1898, 66–67.

[137] *William Morris to Whistler* (London, 1911), 77, 76.

[138] "Mrs. Miniver," in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London, 1951), 306–307.

[139] See, for what are two of many examples. Henry Williamson, "Recipe for Country Life," *Listener 14* (24 December 1935), 1165, and William O'Neill, "Living in the Country" *Time and Tide 17* (4 January 1936), 18–19.

[140] Quoted in Edith Moore, *E. Nesbit* [1933] (London, 1967), 114.

[141] *Cartoon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London, 1975), 130–131.

[142] *So Long to Learn* (London, 1952), 117–118, 165–166; see also John Masefield, *St. George and the Dragon* (London, 1918), 7–11.

[143]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es* (London, 1949), 180. C. E. M. Joad similarly remarked at the end of the war: "There have never been so many books on 'Beautiful Britain' or so large a sale for them" (*The Untutored Towns-man's Invasion of the Country* [London, 1946], 221). "Country lift" began to be listed separately in the *Subject Index to Periodicals* in 1926.

[144] *The Heart of England* (London, 1935), 39.

[145] Haddow, "The Novel of English Country Life, 1900–1930," 327, 112.

[146] *Leslie Bailey's BBC Scrapbooks, Volume 2*, 113–123, gives a variety of evidence of this trend. The *Listener* reprinted many such talks, and listed others.

[147] "The Country Listens" (leader). *Listener 1* (3 April 1929), 424. During the thirties, the *Listener* carried a section called "Out of Doors," but no section on urban life or problems.

[148] "Eyes Upon England," *Listener 17* (7 April 1937), 638. This was a comment on a series of twelve talks broadcast on the Empire Programme entitled "This is England." This series, heavily weighted with rural subjects, sought to inform listeners in the empire of typical English life.

[149] Cited in H. D. Wilcock, *Britain and Her People* (London, 1951), 140–141.

[150] Frederick Cowle, *This is England* (London, 1946), 147; see, for similar remarks, Thomas Burke, *The English and Their Country* (London, 1943), 28; J. B. Priestley, in *The Beauty of Britain: A Pictorial Survey* (London, 1935).

[151] *Exploring English Character* (London, 1955), 43.

[152] Some examples are: Edmund Blunden et al., *The Legacy of England* (London, 1935); W. J. Blyton, *English Cavalcade* (London, 1937); Frederick Cowles, *Not Far From the Smoke* (London, 1935); Dorothy Hartley, *Here's England* (London, 1934).

[153] *The National Character* (London, 1934), 67, 23.

[154] *Ordeal in England* (London, 1937), 273.

[155] *From Surtees to Sassoon* (London, 1931), 209, 197, 204. See also his *English Fabric* (London, 1935), a search for national continuity in the rural England of Wessex. Parts of *English Fabric* appeared in the *Times* (London) and *Spectator.*

[156] *My England* (London, 1938), 47, 45–46.

[157] *The Fairy Land of England,* 5.

[158] "The Abinger Pageant" (1934), in *Abinger Harvest* [1936] (New York, 1964), 363. The second pageant was written and performed in 1938: See E. M. Forster, *England's Pleasant Land* (London, 1940).

[159]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hereafter called *ILN*] *188* (13 June 1936), 1077; *190* (13 February 1937), 273.

[160] *I Saw Two Englands* (London, 1942), 288–289.

[161] *England is a Village* (London, 1941), 250, ix. A work that makes a similar equation of the

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village is Francis Brett Young's *Portrait of a Village* (London, 1937).

[162] For some examples, see J. B. Priesdey, *Out of the People* (London, 1941), 21, 25; Arthur Bryant's "Notebook," in *ILN 198* (31 May 1941), 694; H. J. Massingham, *Chiltern Country* (London, 1940), 70, and Massingham, *Remembrance* (London, 1942), 127.

[163] *England is a Village*, ix.

[164] *ILN 198* (15 March 1941), 334.

[165] *My Cambridge*, ed. Ronald Hayman (London, 1977), 123.

[166]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still-running program. Sir William Haley,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BBC, has observed that "whatever practical success *The Archers* had in rural England was far exceeded by its urban appeal"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0 January 1978). Mary Evans views the program much as I do in "Down on Old Comfort Farm," *New Society*, 4 October 1979.

[167] *The New Anatomy of Britain* (London, 1971), 555.

[168] *Akenfield* (London, 1969), 15–16.

[169] *England* (London, 1971), 39 (Introduction by Angus Wilson, photographs by Edwin Smith).

[170] Anthony Thwaite, "Country Matters," *New Statesman* 77(27 June 1969), 914–915.

[171] "Suspect Sage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 no. 4 (21 September 1972), 12.

[172] "The Village Life," *New Society 29* (26 September 1974), 790.

[173] *Daily Telegraph Magazine*, 1 March 1974, 15.

[174] "An Austen-ized Village," *Atlantic*, July 1977, 80. A former urban radical now happily living in an ancient village described his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Statesman*: Peter Buckman, "Town and Country," *New Statesman 86* (23 November 1973), 772.

[175] *The Living Village* (London, 1968), 18–19, 244, 199.

[176] "An Austen-ized Village," 81.

[177] Priestley's play is reminiscent of the Kipling story "An Habitation Enforced," in which an American couple is captured by the spell of rural England; despite opposed political stances, writers such as Priestley and Kipling were joined by a remarkably similar vision of England. Again and again, a rural national image was associated with a relaxed harmony with nature, the secret of the easy-going English way of life. Mary Webb's best-selling rustic novel of the twenties. *Precious Bane*, lauded by Prime Minister Baldwin, was structured around a contrast between two chief characters—Prudenc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Gideon, who, obsessed by the desire for achievement and wealth, works compulsively to master nature and "cannot rest"; Gideon's way brings destruction.

[178] The *Guardian*, 26 November 1972, 9. At the same time, the journalist Francis Hope, observing the nation's mind turning inward with economic decline, accurately predicted that "the next decade will see an enormous increase in cultural and social nationalism. Growth stock are: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the preservation of British architecture (cheaper than tearing it down), the National Trust, the Georgian Group, remote cottages, porridge, tweed," and so on ("Funny Foreigners, Poor Us," *New Statesman 86* [19 October 1973], 557).

第五章　错误之路吗？

[1] *Lives of the Engineers, 1,* xvii.

[2] Introduction to Dickens, *Hard Times* (London, 1912).

[3] "Wages and the Natural Law," in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ngland* [1884] (London, 1923), 190.

[4] "Are Radicals Socialists?" in ibid., 237.

[5] *Lectures,* 64, 73, 205—206.

[6] "William Cobbett," *Nineteenth Century* 19 (1886), 255—256.

[7] See Milner's "Reminiscence" (1894), in Toynbee, *Lectures,* ix-xxx, and A. M. Gollin, *Proconsul in Politics* (New York, 1964), 14—15.

[8] C. R. L. Fletcher and Rudyard Kipling, *A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11), 204—206, 235. For other Tory examples, see Samuel Hynes, *the Edwardian Turn of Mind* (Princeton, N. J., 1968), 24—26.

[9] Frank Swinnerton, *The Georgian Literary Scene* (London, 1935), 95.

[10] *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 (New York, 1917), chs. 11, 14, 16, and 17.

[11]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London, 1910), 91, 94.

[12] "Appeal to the Squires," *New Witness 2* (1913—1914), 722. See the similar view of English history of the land reform propagandist, Montague Fordham: *Mother Earth* (London, 1908), 119—120, and *The Rebuilding of Rural England* (London, 1924), 6—22.

[13] See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R. M. Hartwell's introduction to the 1966 edition of the Hammonds' *Rise of Modern Industry. The Village Labourer* and *The Town Labourer* were reprinted in paperback in Britain in 1966.

[14] Quoted by R. H. Tawney, "J. L. Hammond,"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6* (1960), 293.

[15] Preface to second edition of *The Town Labourer* (London, 1928), vi.

[16] *Town Labourer,* 1—2, 31; *The Skilled Labourer* [1919] (New York, 1970), 6; *Rise of Modern Industry* (New York, 1926), 232, 217.

[17] Peter Clarke, *Liberals and Social Democrats* (Cambridge, 1978), 243. Clarke (243—252) gives an illuminating account of the Hammonds' work in the context of its time.

[18] *Town Labourer,* v, 327; *Rise of Modern Industry,* 232. See also *Town Labourer,* 16, and *Skilled Labourer,* 6.

[19] *Rise of Modern Industry,* 212, 232, 244, 240, 250. See the similar work of the Hammonds' chief colleague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at period, Gilbert Slater, principal of Ruskin College, Oxford. Slater's text. *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and,* painted a bleak picture of the state of England in the years after 1815, which he portrayed as the culmination of a century and more of "gross materialism" and an inhumane scramble for wealth. Slater's reserved attitude towar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ntrasted strikingly with the enthusiasm of his later American

editor, who saw is a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responsible for the greatness of Engl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and* [1912] (New York, 1916), 1–59, and, in that volume, James T. Shotwell, "Prefatory Note," vi). The Hammond tradition has been carried on in recent years by an active body of socialist historians; the most notable individual being E. P. Thompson and the purest collective expression th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Brian Harrison (*New Statesman 98* [26 October 1979], 635) described the first seven issues of the journal: "The emphasis is entirely upon the sufferings industrialization brought to the workers as producers rather than on the benefits it brought them as consumers; and those sufferings are described with all too little comparative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s prevailing in earlier centuries."

[20]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es* (London, 1949), 80, 84: "By the 'forties the bill had grown very long; two wars, the wreck of the League, sabotage of the one Socialist state, unemployment, depressed areas, a desolated countryside and a heritage of ugly towns, the stunting of art and culture, the awful revelations of the Hammonds, the unsolved problems of the Empire."

[21] *ILN 197* (28 December 1940), 844.

[22] Henry Winkler,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in *Som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ians,* ed. S. William Halperin (Chicago, 1961), 54.

[23] In *Churchill Revised,* ed. A. J. P. Taylor (New York, 1969), 168. Trevelyan's chief concerns are sympathetically examined in Joseph M. Hernon, Jr., "The Last Whig Historian and Consensus History: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1, no.* 1 (February 1976), 66–97.

[24] *English Social History* (London, 1942), 527–528, 554, 578; *Youth Hostels Association Handbook,* 4th ed., 1931, remarks by Trevelyan.

[25] Quoted in Hernon, "The Last Whig Historian," 83, 89.

[26] "Land and People," in *The Character of England,* ed. Ernest Barker (London, 1947), 26–28. Such disavowal of industrialism eventually reached the level of cliché. A popular book on industrial archeology, published in 1975, offers one instance out of many: The jacket describes the machines dealt with inside the volume as "the heartless iron monsters whose speed and efficiency eroded the gentler, more picturesque life of pre-industrial Britain and put in its place a society riven with inequalities and divisions which lie at the back of our political life to this day" (jacket for Anthony Burton, *Remains of a Revolution* [London, 1975]). Such an image must have been deeply engrained on the jacket writer's mind, for Burton's text says nothing like this. This vision was lodged in the back of the minds of policymakers as well as the public. In that same year, for instance, John Pinder,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 Institute, traced the nation's economic difficulties to the social strains consequent upon the fact that "we industrialized brutally." "Brutally," one wants to ask, comp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oviet Russia? (Pinder quoted in *Newsweek,* 27 October 1975, 89).

[27] "Falling Backward Down an Escalator," *New Statesman 80* (25 December 1970), 860.

[28]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Boston, 1868), *2,* 65.

[29] *Letters,* ed. G. W. E. Russell (London, 1895), *1,* 287; *Five Uncollected Essays of Matthew*

Arnold, ed. Kenneth Allott (Liverpool, 1953), 6.

[30] One example is in a letter of 1867, quoted in J. L. Garvin,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London, 1932) *1*, 91.

[31] *News from Nowhere* [1890], James Redmond (London, 1970), 84. See the similar identification of America with "the cult of size and heedless development" by G. K. Chesterton a half century later, in *ILN 188* (11 April 1936), 616.

[32] Letter, 18 May 1886, quoted in B. J. Hendrick, *Life of Andrew Carnegie* (London, 1933), 240—241. Another Americanophil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W. T. Stead, concluded his largely appreciative tract entitle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London, 1902], 164) with a similar admission that its materialistic ethos was after all rather unappealing.

[33] Quoted in E. M. Forster, *Goldworthy Lowes Dickinson* [1934] (London, 1973), 107.

[34] "Does England Dislike America?" *The Forum* (New York) *80* (July-December, 1928), 692—698. Another example of this sort of criticism was O. N. Pisgah [pseud.], "Impressions of America," *The Forum 77* (January-June, 1927), 586—594. See George H. Knoles, *The Jazz Age Revisited: British Criticism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1920s* (Stanford, Calif., 1955), and, for a broader perspective, *America through British Eyes*, ed. Allan Nevins (New York, 1948), and Richard L. Rapson, "The British Traveller in America, 1860—1935,"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66.

[35] See the section titled "Education and the image of industry" in Chapter 7 for illustr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is.

[36] *Economics and Policy: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1969), 32.

[37] See Winch, *Economics and Policy*, 35.

[38] Quoted in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1925], ed. A. C. Pigou (New York, 1956), 71, 376, 37.

[39]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 (London, 1920), 85, 751—752.

[40] See his *Work and Wealth—A Human Valuation* (London, 1914).

[41]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eretic* (London, 1938), 39—40.

[42] Quoted in Donald Read, *Edwardian England, 1901—1915;* (London, 1972), 130. Hobson'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industrial spirit was also reflected in his nostalgia for the rural society of earlier times. In 1908 (in a preface to Montague Fordham's *Mother Earth*), he warned that "while this persistent migration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town has doubtless been attended by an increase of national wealth and of certain sorts of comforts and luxury, the price paid in health, character and the more enduring sources of happiness has been incalculably great."

[43] Roy 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1951), 333.

[44] *Essays in Persuasion* [1932] (New York, 1963), 297—311, 369—373.

[45]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quoted in Walter Eltis, "The Failure of the Keynesian Conventional Wisdom," in *Lloyds Bank Review*, no. 122 (October, 1976), 14.

[46] Ibid., 16.

[47] "How Good was Keynes' Cambridge?" *Encounter*, August, 1976, 91. For support, see the

admission of the Cambridge economist Robin Marris (note 29 to Chapter 7).

[48] On Tawney, see chapter 6.

[49]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rogress* (London, 1934), 201, 209–210. Glenday, it must be noted, did not represent orthodox economic opinion. The *Economist 119* (November, 1934, Book Supplement, 5–6. attacked his "philosophy of economic negation," and reviewer for the *Economic Journal 45* ([September, 1935], 534–544) complained that his reliance upon personal assumptions and prejudices yielded a "reactionary" outlook.

[50] D. M. Bensusan-Butt, *On Economic Growth* (Oxford, 1960), 213.

[51] *Roots of Economic Growth* (Calcutta, 1961), 7.

[52] "A Survey of Welfare Economics, 1939–1959," *Economic Journal 70* (June, 1960), 256.

[53] Bensusan-Butt, *On Economic Growth,* 214.

[54] *Growth: The Price We Pay* (London, 1969), 154–155.

第三篇　引言

[1]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1960] (New York, 1964), 140. In this way he accounted for the failure of Marxism to plant roots in Britain. Much the same argument has been used to explain the inability of extreme right-wing movements to make headway. See also David Coate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 (Cambridge, 1975), 139 and passim.

[2] *Ramsay Macdonald's Political Writings,* ed. Bernard Barker (New York, 1972), 44 (introduction).

第六章　形象与政治

[1] *Victorian England: Portrait of an Age* [1936] (London, 1960), 85.

[2] *English History, 1918–1945* (Oxford, 1965), 172.

[3] T. F. Lindsay and Michael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918–1970* (New York, 1974), 4.

[4] Harvey Glickman, "The Toryness of British Conservatism,"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 no. 1 (November, 1961), 136.

[5] Lindsay and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0. This anticapitalist and even antiindustrial "country gentleman" strain in British Conservatism has frequently drawn praise from radicals and socialists. See, for example, Herbert Read, *The Innocent Eye* [1940] (New York, 1947), 136.

[6] *Competition and the Corporate Society: British Conservatives, the State and Industry, 1945–1964* (London, 1972), 66. See also L. P. Carpenter, "Corporatism in Britain 1930–194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I* (1976). 3–25.

[7] Richard Shannon, *The Crisis of Imperialism, 18656–1915* (London, 1974), 358.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London, 1977], 46) has also seen this episode as a neglected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British history, "a forsaken ruling class strategy which prefigured a very different state-form in the 20th century."

[8] Quoted in Peter Fraser, *Joseph Chamberlain* (London; 1966), 226.

[9] Quoted in Kenneth Young, *Balfour* (London, 1963), 126.

[10] Keith Middlemas and John Barnes, *Baldwin* (London, 1969), 8–12, 19.

[11] *On England* (London, 1926), 6; see Stanley Baldwin, *This Torch of Freedom* (London, 1935), 125.

[12] A. W. Baldwin, *My Father* (London, 1956), 69.

[13] Wickham Steed, *The Real Stanley Baldwin* (London, 1930), 147.

[14] The *Times, Lord Baldwin: A Memoir* (London, 1937), 21.

[15] "Our National Character" (1933), in *This Torch of Freedom,* 14; "The Love of Country Things" (1931), ibid., 120.

[16] *On England,* 6–7. Ruralism did not *have* to be tranquilizing; Baldwin's rival, Lloyd George, was attached to an ideal of rural life, and filled his speeches with rural imagery. Yet his countryside was, like himself, dynamic and forceful, a wellspring of energy. As the *Times* (London). had observed: "When Lloyd George spoke of mountains and torrents, Baldwin spoke of meadows and streams." It was Baldwin's version that by their time had become orthodox, condemning Lloyd George's to the category of "the fictitious sublimity of Ossian" (The *Times, Baldwin: A Memoir,* 21).

[17] *Memoirs of a Conservative: J. C. C. Davidson's Memoirs and Papers, 1910–1937*, ed. Robert Rhodes James (London, 1969), 105.

[18] *This Torch of Freedom,* 126.

[19] *The Impact of Labour, 1920–1924* (Cambridge, 1971), 427.

[20] *The Road to 1945: British Politic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75), 27.

[21] *Churchill: A Study in Failure* (London, 1970), 190.

[22] "Peace and Industry II," in *On England,* 42.

[23] *An Interpreter of England* (London, 1939), 63–64, 74.

[24] Worshipful Company of Stationers, *Happenings of Interest at Stationers' Hall* (London, 1927), 11–12.

[25] From a 1930 speech quoted in The *Times, Baldwin: A Memoir,* 20.

[26] Foreword to Sidney Rogerson, *The Old Enchantment* (London, 1938), xii-xiii.

[27] *Viscount Halifax* (New York, 1941), 130–131.

[28] Foreword to Rogerson, *The Old Enchantment,* xiii.

[29] *The Impact of Hitler: British Politics and British Policy, 1933–1940* (Cambridge, 1975), 271–272.

[30] Begbie's book went through several editions, including a popularly priced one in 1925; quotations are from pp.37–38; see particularly the chapters on Baldwin and Halifax.

[31] *Whither England?* (London, 1932), 139–140. The book has an admiring preface by the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Walter Elliot.

[32] Cowling, *Impact of Hitler*, 52.

[33] "Cultivating Our Own Home Garden," *Listener 6* (23 December 1931), 1090–1091, and *Democracy on Trial* (London, 1931), 154. See also L. S. Amery, *The Forward View* (London 1935), for another Tory call for policies of rural revival coupled with economic reorganization in the interests of stability.

[34] *Democracy on Trial,* 18, 24–27; *Government in Transition* (London, 1934), 41; "The Case for Group Settlement," *Listener 13* (20 February 1935), 339.

[35] W. S. Morrison, MP, "Economics," in *Conservatism and the Future*, ed. Lord Eustace Percy (London, 1935), 59.

[36] *Democracy on Trial*, 27.

[37] *Churchill Revised*, ed. A. J. P. Taylor (New York, 1969), 155.

[38] Quoted in Ebenezer Howard,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London, 1902), 42.

[39] Quoted in Paul Johnson, *The Offshore Islanders* (New York, 1972), 367n., and Keith Robbins, *Sir Edward Grey* (London, 1971), 372.

[40] Quoted in Robert Rhodes James, *The British Revolution* (London, 1976), 265.

[41] *England After War* (London, 1922), 143.

[42] "An Overseas Englishman," in *England* (London, 1922), 8–9; Rawdon Hoare, *This Our Country* (London, 1935), throughout; Sir R. G. Stapledon, *The Land Now and To-morrow* (London, 1935), 231; S. L. Bensusan, *The Town vs. the Countryside* (London, 1923), 6 (foreword by Lord Bledisoe). For Edwardian forerunners, see W. M. Flinders Petrie, *Janus in Modern Life* (London, 1907), and Elliot E. Mill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Oxford, 1905).

[43] Quoted by Michael Wharton, "A Few Lost Causes," in *The Baldwin Age,* ed. John Raymond (London, 1960), 88.

[44] *Freedom and Reality* (London, 1969), 338; see Douglas Schoen, *Enoch Powell and the Powellites* (London, 1977), 11.

[45] *Freedom and Reality,* 339. Tom Nairn has interesting observations on Powell's English nationalism in *The Break-Up of Britian,* ch. 6.

[46] Lindsay and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52.

[47] Ibid.

[48] Ibid., 85.

[49] See Cowling, *Impact of Hitler,* 52.

[50] Quoted in Lindsay and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15.

[51] Ibid., 118.

[52] Quoted in Peter Self and Herbert J. Storing, *The State and the Farmer* (London, 1962), 197.

[53] Quoted in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ed. R. J. White (London, 1950), 203–205.

[54] Stephen Blank,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Britain: The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in Politics, 1945–65* (Lexington, Mass., 1973), 125.

[55] S. E. Finer et al., *Backbench Opinion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New York, 1961), 83–85.

[56] For one example of many, see Lord Butler's remarks reported in *New Statesman 91* (20 February 1976), 225.

[57] Quoted in Addison, *The Road to 1945,* 232–233.

[58] *The Pendulum of Politics* (London, 1946), 161, 166.

[59] *The Case for Conservativism* (Harmondsworth, 1947), 51–52.

[60] Quoted in Samuel Beer, *British Politics in the Collectivist Age* (New York, 1967), 271.

[61]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Central Office, *The Right Road for Britain* (London, 1949), 65.

[62] *The Baldwin Age*, ed. John Raymond (London, 1960), 10.

[63] Quoted in Adam Fox, *Dean Inge* (London, 1960), 202.

[64] *All Saint's Sermons* (London, 1907), 51.

[65] *Lay Thoughts of a Dean* (London, 1926), 195; *Outspoken Essays* (London, 1919), 23, 24; *The Fall of the Idols* (London, 1940), 140.

[66] *Outspoken Essays,* 23, and *The Fall of the Idols,* 155; *England* (London, 1926), xi.

[67] *The Fall of the Idols*, 150. Inge pointed to the generally accepted "ugliness and ruthlessness" of early Victorian society as witness to "the blunder of sacrificing the higher values to the increase of wealth and population."

[68] *Our Present Discontents* (London, 1938), 205.

[69] Ibid.

[70] *The Fall of the Idols*, 11.

[71] "Whither Britain III," *Listener 11* (24 January 1934), 142.

[72] *ILN 192* (12 March 1938), 422.

[73] *ILN 204* (29 April 1944), 474.

[74] *ILN 189* (21 November 1936), 900.

[75] *ILN 205* (12 August 1944), 170.

[76]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London, 1939), 61–62.

[77] "Richard Henry Tawney, 1880–1962,"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8* (London, 1962), 461.

[78] *The Acquisitive Society* [1920] (New York, 1948), 184.

[79] Ibid., 45–46. Tawney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One can understand the intemperate outburst of G. R. Elton, in a letter to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hat Tawney's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ne of the books which everyone [in universities] read," recalled the economic historian W. H. B. Court [*Scarcity and Choice in History* (London, 1970), 187]) "has some claims to being one of the most harmful books written in the years between the wars. At least one generation, and that a crucial one, was given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everything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ness and success of their country derived from sinful selfishness and money-grubbing wickednes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76* [11 February 1977] 156).

[80]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 (New York, 1946), 19.

[81] E. R. Norman, *Church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770–1970: An Historical Study* (Oxford, 1976), 228, 305, 317.

[82] In pointing out the unfortunate role of the Reformation in setting economic appetites loose, for example, Tawney was only the most important among many Anglicans developing this theme. Archdeacon William Cunningham of Ely had in 1913 given a lecture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titled "Calvinism and Capital," in which he attacked Political Economy, claimed that all "the human activities with which Economics deals lie within the sphere of Christianity," and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the Reformation that had "rejected the authority by which Christian morals had been enforced at active centers of economic life" (*Christianity and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1914], 1, 58). See also *Competition: A Study in Human Motive,* a symposium published in London in 1917 by a clerical group led by William Temple.

[83] In COPEC's discussions on its report on leisure, the games and pastimes recommended to the working classes reflected a romanticized passion for folk culture. E. R. Norman (*Church and Society,* 296–297) summed up: "The working classes, who not unreasonably wanted leisure in order to play football or to drink in the pub, were seen by Miss Dashwood as given instead to the performance of medieval Mystery plays; by Miss Shepherd, as introduced to "community music"; by the Revd. A. B. Bateman, as attaining to "the joy of creation, the sphere of art and handicrafts"; by Lord Aberdeen, as well as by almost everybody else, as enjoying folk-dancing; by Miss Cropper, as devotees of drama. When it came to the cinema, the new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 there was a call for censorship."

[84] For a sympathetic account of Noel's strange career, see Reg Groves, *Conrad Noel and the Thaxted Movement* (London, 1967). See also Norman, *Church and Society,* 247–9 and passim, and John Oliver, *The Church and Social Order: Social Thought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1918–1939* (London, 1968), 20 and passim. On both leagues, see Norman, Oliver, and Maurice B. Reckitt, *As It Happened* (London, 1941).

[85] *Christendom*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Christendom Group), September, 1931, 210.

[86] Oliver, *Church and Social Order,* 132–133.

[87] Maurice B. Reckitt and J. V. Langmead Casserley, *The Vocation of England* (London, 1941). This book summed up the views of the summer 1940 meeting of the Church Union School of Sociology, an offshoot of the Christendom Group.

[88] *Malvern, 1941: The Life of the Church and Order of Society* (London, 1941), 3, 9, 12. See Angus Calder's evaluation of Malvern in *The People's War* (London, 1969), 483–487.

[89] A recent example was the controversial appointment in 1977 of the Right Reverend Hugh Montefiore as bishop of Birmingham, the engineering capital of Britain. The new bishop, noted the *Guardian,* "believes that fewer cars would make the country a better place"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23 October 1977).

[90] "Farmers in Arm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2,* no. 12 (19 June 1969), 36–37.

[91] In addition to the discussion below, see Martin J. Wiener, "The Changing Image of William Cobbett,"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3,* no. 2 (May, 1974), 135–154.

[92] *The Untutored Townsman's Invasion of the Country* (London, 1946), 215.

[93] "The Intellectual Left," in *The Left,* ed. Gerald Kaufman (London, 1966), 113.

[94] Hugh Gaitskell, "At Oxford in the Twenties," in *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ed. Asa Briggs and John Saville (London, 1960), 12; Edith, marchioness of Londonderry, *Retrospect* (London, 1938), 225 and passim; Harold Laski, *The Dangers of Being a Gentleman,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39), 29; H. N. Brailsford's essay in *The English Spirit*, ed. Anthony Weymouth (London, 1940); Richard Hoggart, *Speaking to Each Other II: About Literature* (London, 1970), 170. Brailsford's ideal radical was an "aristocrat," like Shelley, Byron, and his friend, Wilfred Blunt: "If their birth in a long line of squires meant anything, it meant that England lived in them as she lived in the oaks of their estates... My memory went back to a house built in the depths of an oak forest. These was more in that house and round it of the enduring changeless England than I have ever met elsewhere... It had stood there untouched and unchanged since Charles II was restored to his throne. No touch of modernity spoiled the wainscoted walls... The old man to whom this changeless fragment of England belonged came of a long line of squires, a family so conservative that it had refused to change its religion at the reformation. Through many centuries they had never given the smallest sign of originality or even of unconventionality, until like a changeling from another world Wilfred Blunt appeared." To Brailsford, he wa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a fierce anti-imperialist and a true representative of the "old English character" (*The English Spirit,* 51–52, 54).

[95] *News from Nowhere* [1890], ed. James Redmond (London, 1970), 146. Wilfred Scawen Blunt's "Satan Absolved" is an intriguing turn-of-the-century poem that bridges Romanticism and science fiction. Blunt was a friend and admirer of Morris, a writer, traveler, and publicist, and a country gentleman. This long poem is a violent denunciation of industry for raping the earth, "destroying happiness in the name of progress" ("Satan Absolved: A Victorian Mystery" [1899], in *Poetical Works of Wilfred Seamen Blunt* [London, 1914], 2, 254–291).

[96] Quoted in J. Bruce Glasier, *William Morris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London, 1921), 81–82.

[97] *Merrie England* (London, 1894), 21, 35; see also G. D. H. Cole,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3,* part 1 (London, 1956), 166.

[98] Quoted in Willard Wolfe, *From Radicalism to Socialism* (New Haven, Conn., 1975), 212. In Fabian discussion that year Webb argued again that the "keynote" of socialism was "extreme social asceticism."

[99] *Beatrice Webb's Diaries, 1912–1924,* ed. Margaret Cole (London, 1952), 50. See also Gertrude Himmelfarb, "Process, Purpose and Ego,"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75* (25 June 1976), 789–790.

[100] "Past and Future," in *The Heart of the Empire,* ed. C. F. G. Masterman (London, 1901), 407.

[101] See W. T. Stead's survey of labour MPs in the *Review of Reviews,* June, 1906.

[102] Letter from Macdonald to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4 June 1923, quoted i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76* (4 March 1977), 231.

[103] Mary Agnes Hamilton, *Remembering My Good Friends* (London, 1934), 128; Margaret Cole, *Growing Up into Revolution* (London, 1949), 138; Macdonald, *At Home and Abroad* (London, 1936), 80—81, 94, 104 (Most of the essays on England and Scotland in this volume were written befor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ee also Macdonald's earlier collection of addresses and essays. *Wanderings and Excursions* (London, 1924).

[104] Quoted in David, *Ramsay Macdonald* (London, 1977), 459—460. The compatibility of this side of Macdonald's socialism with Tory anti-materialism can be seen in his complaints to Lady Londonderry about vulgar plutocrats and "the system in which money has made all things possible" (Edith, marchioness of Londonderry, *Retrospect* [London, 1938], 225).

[105] *Ramsay Macdonald*, 403.

[106] Quoted in Ross Terrill, *R. H. Tawney and His Times* (Cambridge, Mass., 1973), 71.

[107] 'The Last Item on the Agenda," *Countryman I* (April, 1927), 33—34.

[108] See Lansbury's 1923 letter to Buxton, quoted in Mosa Anderson, *Noel Buxton: A Life* (London, 1952), 120; George Lansbury, *My England* (London, 1934), 93.

[109] *The 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 1930—1939* (Cambridge, 1977), 159—160.

[110] *Report of Proceedings at the 60th Annu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London, 1928), 66.

[111]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I* (London, 1960), 358, 360.

[112] *Midnight on the Desert* (London, 1937), 236.

[113] *English Journey* (London, 1934), 400, 404, 405. See also Priestley's *Rain Upon Godshill* (London, 1939), 36, and his *Out of the People* (London, 1941), 52.

[114] J. B. Priestley and Jacquetta Hawkes, *Journey Down a Rainbow* (London, 1955), 51—52.

[115] *The Edwardians* (London, 1970), 108.

[116] *As It Happened* (New York, 1954), 174.

[117] 1942 speech, quoted in Paul Addison, *The Road to 1945,* 205.

[118] Quoted in Colin Cooke, *The Life of Richard Stafford Cripps* (London, 1957). 361.

[119]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1956), 517.

[120] Michael Foot, *Aneurin Bevan* (London, 1963), *I*, 193—194. Rodo's remark is from his book. *The Motives of Proteus* (1929), from which Bevan would often "recite favourite passages" (Foot, *Aneurin Bevan,* 192). Foot himself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s a "conservative rebel" (*Spectator,* 15 July 1972).

[121] *In Place of Fear* [1952] (New York, 1964), 66.

[122] To T. F. Lindsay and Michael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202—203), this episode highlighted a hostility to mass affluence among large sections of the "Establishment"; see also Donald Home, *God is an Englishman* (Sydney, Australia, 1969), 88—89, on the "contempt for the economic" underlying these reactions. Ironically, Macmillan himself was no simple admirer of material, progress. In his memoirs (*At the End of the Day, 1961—1963* [London, 1973], 521—522) he lamented how "the invention of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had destroyed our quiet... All this repose and quiet [of the horse-drawn England of his childhood] has been drowned by a ceaseless roar on earth and in the sky."

第七章　工业家的绅士化

[1] W. D. Rubinstein, "Wealth, Elite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Modern Britain," *Past and Present,* no. 76 (August. 1977), 99—126,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es: Wealth, Occupation and Geograph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s 2, *30* (1977), 602—623; see also J. P. Cornford, "The Parliamentary foundations of the Hotel Cecil," in *Ideas and Institutions of Victorian Britain,* ed. Robert Robson (London, 1967), 284—285.

[2] As testified to by the late Labour minister, Anthony Crosland: "In terms of personal wealth and profit [Brit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me a very poor second-best [in the nineteen-sixties] to the worlds of property and finance; and its influence and prestige (relative, for example, to that of the mercantile tradition of the City) are less than in any other advanced Western country" (Crosland, *Socialism Now* [London, 1974], 33).

[3]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es," 623.

[4] "Institutional Response to Economic Growth: Capital Markets in Britain to 1914," in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A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ed. Leslie Hannah (London, 1976), 151—183.

[5] Ibid., 159.

[6] This aloofness continued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aders of the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from the thirties on hoped to develop closer 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y and the financial community, but the financiers of the City refused to form an associ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FBI, or to participate in joint activities with the federation. "As late as 1966," Stephen Blank observed, "four years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provided industry with a new and far more authoritative platform from which to deal with government, industrial members were reported as being 'jealous of the enormous deference paid by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s to the bank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ity'"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Britain* [Lexington, Mass., 1973], 197; Blank quotes David Hayworth, whose comments appeared in the *Observer.).*

[7] *The Hew Anatomy of Britain* (New York, 1962), 597. The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ian, Thomas C. Cochran, similarly concluded that "the pervasive values, interests and attitudes of a society and the business structure resulting therefrom constitute causal forces that shape the nature of both executive action and the markets in which companies operate" ("The Business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9* (1974), 1465—1466); see his *Two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Business* (New York, 1977).

[8] *What Has Happened to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1972), 10.

[9] Neil McKendrick, introduction to R. J. Overy, *William Morris, Viscount Nuffield* (London, 1976), vii-viii, and Roy Lewis and Rosemary Stewart, *The Managers* [1958] (New York, 1961), 29; see also G. H. Copeman, *Leaders of British Industry* (London, 1955).

[10] Kenneth Young, *Balfour* (London, 1963), xviii and xx; see Chapter 6.

[11] Quoted in Margery Pesham, *Lugard I: The Years of Adventure* (London, 1956), 35.

[12] "Million Dollar Yegg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2*, no. 4 (20 March 1975), 21. 这位大使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巴立奥学院的毕业生。

[13] Quoted in Cowling, *The Impact of Hitler* (Cambridge, 1975), 413. As one of C. P. Snow's fictional characters put it, speaking for most, "I'm still convinced that successful business is devastatingly uninteresting" (*Strangers and Brothers* [London, 1951], 93).

[14] "The Possesse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3,* no. 1 (5 February 1976), 22. See C. P. Snow's well-known remarks on this in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1959), esp. 26; see also Graham Hough, "Crisis in Literary Education," in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 ed. J. H. Plumb (Harmondsworth, 1964), 96. Patrick Parrinder has brought out the consciousness of many Edwardian novelists of a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goal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and those of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lif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Political Reality: A Study in Edwardian Attitudes," *Clio 4* (1975), 5—25)

[15] In Overy, *William Morris,* xxxix.

[16]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68,* 617 (5 June 1969); quoted in Graham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London, 1969), 439; *New Society 28* (18 April 1974), 122. Typical of the kind of attitude the directors had in mind were the reviews by Ian Taylor in *New Society* that year of Richard Lynn's collection of case studies. *The Entrepreneur.* Taylor was contemptuously amazed that such "parasitism" could be presented as some kind of model, and took the "startlingly amoral collection" as a sign of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psychology (*New Society 28* (6 June 1974), 588—589).

[17] Quoted in Michael Sanderson, *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1850—1970* (London, 1972), 37.

[18] Sanderson concluded (ibid., 391) that "the increasing involve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with industry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universities ove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Yet this involvement was far more characteristic, as he demonstrates, of the civic universities of the North and the Midlands than of the much more prestigious older universities of Oxford and Cambridge, or even of London and the post-World War II universities. Moreover, the increasing involve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was a universal tren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real question is a relative one: Was this development more thorough or less thorough in Britain than elsewhere? Though the question has not been settled,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e latter.

[19] *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 (London, 1958), 51; see also W. J. Reader, *Professional Men* (New York, 1966), 70—71, 112—114, 131—145.

[20] Quoted in Sanderson, *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308.

[21] Quoted in Overy, *William Morris,* xi.

[22] Ashby, *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 66.

[23] On the persistence of an antiindustrial bias in British higher education, and for comparisons of the education of managers in Britain and managers in other industrial nations, see Derek

F. Channon, *Strategy and Structure of British Enterprise* (Boston, Mass., 1973); Anthony Bambridge, "Why Britain Can't Manage," *Observer,* 30 November 1975; Michael Crick, "Glittering Prizes," *New Statesman 92* (5 November 1976), 631; Richard Lynn,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wentieth Century 179* (1971—1972), 40—43; David Granick, *Managerial Comparisons of Four Developed Countries* (Cambridge, Mass., 1972); Chitoshi Yanaga, *Big Business in Japanese Politics* (New Haven, 1968); and Koya Azumi, *Higher Education and Business Recruitment in Japan* (New York, 1969).

[24] Sampson, *The New Anatomy of Britain,* 165—167; Michael Beloff, *The Plate-glass Universities* (London, 1968), 28; Peter Wilby, "The Outdated University Tradition," *New Statesman 91* (21 May 1976) 669—670; and Sanderson, *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368—372.

[25] *Warwick University Ltd.,* ed. E. P. Thompson (Harmondsworth, 1970), quoted in Sampson, *New Anatomy,* 184; see also Sanderson, *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371.

[26] Quoted in Sampson, *New Anatomy,* 170; see the *Economist's* complaint (25 February 1978, 75): "The great central technical institut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what are now admitted to be second-rate universities"; Sanderson, *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372—376, has a more optimistic view.

[27] "Our Obsolete Attitudes," *Encounter,* November, 1977, 14—15. This helps explain why, as the economists Robert Bacon and Walter Eltis observed (*Britain's Economic Problem: Too Few Producers* [London, 1976], 24), "successive governments have allowed large number of workers to move out of industry and into various service occupations, where they still consume and invest industrial products and produce none themselves; their needs have, therefore, been met at the expense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the export surplus of manufacturers, and investment in industry itself."

[28] Peter Wilby, "Engineering for Survival," *New Statesman 92* (3 December 1976), 782; "Snobbery and the Engineer" (letter). *New Statesman 92* (10 December 1976), 840; Alastair Ma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Manager* (London, 1977), 6—7.

[29] *The Student in the Age of Anxiety* (London, 1963), 36; the *Times* (London), 3 August 1970; quoted by Bambridge, in *Observer,* 30 November 1975; Lewis and Stewart, *The Managers,* 65; *The Ice Age* (London, 1977), 16. "The typical British manager in the 1960s and 1970s," summed up the economist Robin Marris ("Is Britain an Awful Warning to America?" *New Republic,* 17 September 1977, 28), "has been a self-made person inadequately prepared for the commercial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modern world." He acknowledged a certain responsibility on his part and on the part of his profession: "I cannot remember a single ex-pupil from my 25 years at Cambridge who has gone into industry."

[30] Ian Glover and Peter Lawrence, "Engineering the Miracle," *New Society 37* (30 September 1976), 711.

[31] "Not so very long ago," John Talbott has reflected ("The Old Ecole Ti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5 October 1979], 43), "the servants of the state administered economic policies

designed to protect the little man — the peasants, shopkeepers, and artisans, who were the backbone of the Third Republic. Toward businessmen they maintained an attitude of suspicion and disdain; they exalted the virtues of solidarity and stability over competition and profit; they insisted the state had interests distinct from those of private enterprise. Now those trained in the state's service shuttl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ministerial cabinets and corporate boardrooms. The larg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e nationalized industries, and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re all the preserve of the *grands corps*." See also John Ardagh, *The New France* (Harmondsworth, 1973), 36—45, and Theodore Zeidin's comments in passing in his review of Eugen Weber, *Peasant into Frenchmen,*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4 November 1977), 45. Zeidin himself provides evidence (in *France, 1848—1945* [Oxford, 1973], I, 87—101) of a gradual, partial, but noticeable shift betwee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attitudes of French middle-class guides to careers toward a less cautious and critical view of money making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although, true to his general approach, Zeidin plays down change in favor of continuity).

[32] For the traditional place of the businessman in Japan, see Charles Sheldon, *The Rise of the Merchant Class in Tolugawa Japan* (Locust Valley, N. Y., 1958), ch. 2, and for the twentieth-century transformation, see Chitoshi Yanaga, *Big Business in Japanese Politics,* 20—23, 29—35; Koya Azumi, *Higher Education and Business Recruitment in Japan,* 26; and Ronald Dore, *British Factory—Japanese Fac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3), 46—48.

[33] See Granick, *Managerial Comparisons,* 178, 370, and his earlier, more popular *The European Executive* (Garden City, N. Y., 1962) esp. chs. 7 and 18. Differing social images of industry leap out in Peter Lawrence's suggestive comparison of executive advertisements in Britain and Switzerland ("Executive headhunting," *New Society 44* [25 May 1978], 416—417). Lawrence concludes: "How can we explain the difference in Swiss executive adverts? Specific on content, qualifications, requirements,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vague, relatively speaking, about the standing of the company, status, considerations, and material rewards. Does any theory fit all or even most of these facts?... If industry is 'at home' in a country, in the broadest cultural sense, then it can be more easily described with reference to its own operations and requirements. It doesn't have to be 'located' in terms of a rewards and status map. Companies can be seen as places where things get made, and later sold, rather than as machines for having careers in. If as part of this being at home in a certain country, people will want to work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en less emphasis is needed on material rewards, or on underlining the success and prestige of particular companies seeking to attract executive talent... In a gentle way, the comparison suggests that, in Britain, working in industry needs some kind of rationalisation. The rewards and sacrifices must balance. When placed side by side the British adverts are an exercise in persuasion, the Swiss ones more a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This argument is continued in Michael Fores and Peter Lawrence, "Industrial Phobia," *New Society 46* (5 October 1978), 28—29.

[34] W. G. Rimmer, *Marshalls of Leeds* (Cambridge, 1960), concluded (298): "In the last analysis

Marshall and Co. declined owing to social barriers which could not be surmounted."

[35] Quoted in Ronald S. Edwards and Harry Townsend, *Business Enterprise* (London, 1958), 566—567.

[36] Introduction to Overy, *Morris,* xxxii-xxxiii.

[37] *Lombard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London, 1873), 11.

[38] Contribution to symposium, "Who's Left, What's Right?" *Encounter*, March, 1977, 29.

[39] Reader, *Professional Men,* 212—213.

[40] Copeman, *Leaders of British Industry,* 101.

[41] *British Industrialists: Steel and Hosiery, 1850—1950* (Cambridge, 1959), 33—35, 38, 115.

[42] D. C. Coleman, "Gentleman and Playe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s 2, *26* (1973), 109.

[43] In many trades there developed a mystique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What was needed, as one manufacturer in the tinplate trade put it, was "practical men who were in sympathy with their rolls and everything else. They could do a lot with their machinery if they were in sympathy with it" (W. E. Minchinton, "The Tinplate Maker and Technical Change,"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7* [1954—1955], 7; see also Stephen F. Cotgrove,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1958], 23—28). These manufacturers and their men had themselves done without technical education. Why change what had worked for so long? In their veneration of the practices of their predecessors, they departed crucially from the outlook of these predecessors, who had themselves readily broken with precedent, and made use of available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ract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industrial history was raised to the level of myth, turning past circumstances into an ideal, and in the process, distorting that past as well. To the Samuelson Commission in 1884, the great china firm, Wedgwood, confessed no use for a chemist, or indeed for any research, on the grounds that it would take time and be " a great nuisance." This was "a curious observation," Sanderson has pointed out, "from a firm whose founder had used Joseph Priestley for his chemical work"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17; the earlier importance of applied science can be seen in A. E. Musson and Eric Robins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 1969]).

[44] See the full argument of D. C. Coleman, "Gentlemen and Players," and the corroborating observations of Channon, *Strategy and Structure of British Enterprise,* 221.

[45] *England's Crisis* (London, 1931), 17. As an American manager based in London observed to Stephen Toulmin, "The British are the only managers I know who make a habit of boasting to you about how *little* work they do... Lots of British managers just want to get back to their place in the Cotswolds, to their daughters with their pony clubs, and all the rest" (Stephen Toulmin, "You Norman, Me Saxon," *Encounter*, September, 1978, 92).

[46] "The Comforts of Stagnation," in Arthur Koestler, ed., *Suicide of a Nation?* (London, 1963), 62.

[47] *The Managers,* 191. See a suggestive essay that makes some of the same points about the nineteenth-century business elite of Boston: F. C. Jaher, "The Boston Brahmins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ism in America,* ed. F. C. Jaher (New York, 1968), 188—262.

[48] *ILN 189* (29 August 1936), 340.

[49]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Manager,* 100—102.

[50] "The Danger of Being a Gentleman" (1932), in *The Danger of Being a Gentleman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39), 23. As an executive of a domestic appliance manufacturing firm complained to a business researcher around 1960: "There was a time when we sold to the better middle-classes... These days we have a new orientation. We practically sell to anyone who has the money to buy... Do you know what they buy? A stupid TV set. Here we spent thousands of pounds on medical research to show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the health of people to buy refrigerators. But do they take advantage of it?" (Quoted in Tibor Barna, *Investment and Growth Policies in British Industrial Firms* [Cambridge, 1962], 55n).

[51] Peter Wilby, "Engineering for Survival," and Ian Glover and Peter Lawrence, "Engineering the Miracle"; also see Dore, *British Factory—Japanese Factory,* 46—48, and Yanaga, *Big Business,* 20—23. Yet, the predominance of accountants in high places in British industry has not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phisticated methods of operations control. In this area, as in most other matters of organization, British firms have been reluctant to innovate (See Alfred Chandler in *Management Strategy,* ed. Hannah, 26).

[52]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Manager,* 56.

[53] "Why Britain Can't Manage," *Observer,* 30 November 1975.

[54] *New Anatomy of Britain,* 579. See also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301—302.

[55] *Listener 60* (July-December 1958), 552.

[56] D. C. Coleman, *Courtaulds: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I* (Oxford, 1969), 218.

[57]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217, 433.

[58] For example, a BBC series of documentaries on Japan in early 1974 focused heavily on such evils.

[59]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432.

[60] Ibid., 14—15.

[61] *Leader,* 19 May 1911; see L. Urwick and E. F. L. Brech, *The Making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II: Management in British Industry* (London, 1946), ch. 7.

[62] O. Sheldon,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London, 1923), quoted in John Child, *British Management Thought* (London, 1969), 73. Child emphasized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British management thought from the Edwardian era to the fifties and even the sixties (123).

[63] Quoted in ibid., 121.

[64] *Ideals and Industry* (London, 1949), 26. This tradition of Dickensian benevolence was attacked by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self-made) British industrialists, like W. H. Lever and William Morris, who saw themselves as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There could be no worse friend to labour," Lever (described as "Mr. Smiles' Disciple" by Charles Wilson) warned in 1909, "than the benevolent, philanthropic employer who carries his business on in a

loose, lax manner, showing 'kindness' to his employees; because, as certain as that man exists, because of his looseness and laxness, and because of his so-called kindness, benevolence, and lack of business principles, sooner or later he will be compelled to close." (Quoted in Charles Wilson, *The History of Unilever I* [London, 1954], 143.)

[65] *The English Tradition: The Heritage of the Venturers* (London, 1934).

[66] *Reflections o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959), 35–39.

[67] Quoted in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444.

[68] In *The Character of England*, ed. Ernest Barker (London, 1948), 207.

[69] *British Shipping and World Competition* (London, 1962), 395–396, 1.

[70]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Steelmaking, 1867–1939* (Cambridge, 1940), 301; see also pp. 296–305 on declining enterprise in the industry. Another example of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on prestigious public duties rather than on business was Archibald Kenrick and Sons Ltd.: See Roy Church, "Family and Failure: Archibald Kenrick and Sons Ltd, 1900–1950," in *Essays in British Business History,* ed. Barry Supple (Oxford, 1977), 113–114.

[71] Robert Henriques, *Marcus Samuel* (London, 1960), ch. 8.

[72] Ibid., 87, 333. It is instructive to compare Samuel's career with that of Gerson Bleichröder, one of the leading Jewish capitalists of Bismarck's Germany. Despite his political services to Bismarck, Bleichröder's social acceptance was much more problematical, although his economic energies (perhaps partly for that very reason) never flagged (see Fritz Stern,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New York, 1977]).

[73] Channon, *Strategy and Structure of British Enterprise, 75–77.*

[74] *The Logic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ndustry* (London, 1953), 303. The classic argument for the retarding effects of family control of firms is David Landes's, on France: See his "French Business and the Business Man: A Soci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in *Modern France,* ed. E. M. Earle (Princeton, N. J., 1951), 334–353. Landes's view has since been challenged, most interestingly in Michael B. Miller, *The Bon Marché: Bourgeois Culture and the Department Store, 1869–1920* (Princeton, N. J., 1980). See *Essays in British Business History,* ed. Supple, for examples of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family firms.

[75]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221–2 (Turner's emphasis).

[76] *The Strategy and Structure of British Enterprise,* 242. Outsiders, less prone to such sentiments, had disproportionate success in modern British business. Even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much of the output of the rapidly growing new industries was produced by American firms operating in Britain. Two of the four largest electrical machinery producers, for example, British Westinghouse and British Thomson-Houston, were American-owned, whilst a third, Siemens, was German-owned. Indeed, the remaining one, GEC, although under nominal British ownership, was controlled and managed by an immigrant from Germany (I. C. R. Byatt, "Electrical Produ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ndustry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1875–1914*, ed. D. H. Aldcroft [London, 1968], 238–273). By the end of the 1950s, the most efficient firms in Britain were predominantly enterprises that had been started by immigrants

as early as 1940, were controlled by minorities (Quakers or Jews, chiefly), or were branches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ibor Barna, *Investment and Growth Policies,* 57). American firms operating in Britain in the fifties and sixties consistently earned a higher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 than their British competitors. Their success in fact was roughly proportional to the degree of U. S. control. The American firms were on the whole more capital intensi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marketing, looked for higher academic and technical qualifications from managers, and planned more professionally. Underlying these differences was a difference in attitude — a "greater will to be efficient" among U. S. subsidiaries (John H. Dunning, *American Investment in Brit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ondon, 1958], 316; and Dunning, "U. S. Subsidiaries in Britain and their U. K. Competitors," *Business Ratios,* no. 1 [Autumn, 1966], 5 – 18). By the close of the seventies, a similar comparison could be made with German and Japanese subsidiaries in Britain.

[77] Sampson, *New Anatomy of Britain,* 607;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308 – 325; *Economist,* 21 May 1977, 83; Donald Home, *God is an Englishman* (Sydney, Australia, 1969), 205.

[78] Quoted in Sampson, *New Anatomy of Britain*, 609.

[79] "Gentlemen and Players," 100 – 101, 109.

[80] *Courtaulds, II,* 217. This outlook prevailed until new leadership (of a chemical engineer) in the sixties brought a radical shakeup, the end of much of the gentleman's club spirit, and the opening of a new era of expansion. See Arthur Knight, *Private Enterprise and Public Intervention: The Courtaulds Experience* (London, 1974). Knight was deputy chairman of Courtaulds.

[81]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A History, I. The Forerunners, 1870 – 1926* (Oxford, 1970), 218, and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A History, II. The First Quarter-Century, 1926 – 1952* (Oxford, 1975), 70, 72. See also *I*, 91 – 92, on the origins of the club in the beautifully symbolic, if accidental, preservation of a Tudor manor house within one of the largest chemical plants in the world.

[82] Ibid., *I*, 319; *II*, 34 – 37, 77, 80, 135.

[83] *Business in Britain,* 141, 139 – 159. Yet at ICI, as at Courtaulds, this atmosphere showed signs of dissipating from the sixties on, as new leadership brought a shakeup in structure and attitudes and a new surge of growth.

[84] *The Seven Sisters: The Great Oil Compani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New York, 1975), 44.

[85] Ibid., 11, 198,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111.

[86] "Consensus or Elite Domination: The Ca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Studies 13* (1965), 22 – 24. This brilliant essay has yet to be superseded.

[87]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171 – 201.

[88] Nettl, "Consensus or Elite Domination," 22 – 29; see Blank,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70, on the civil service ideal in industry; professor quoted in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99.

[89] See the argument for viewing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government along these lines in Keith Middlemas, *Politics i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xperience of the British System since 1911*

(London, 1979).

[90] 19 April 1901, quoted in A. L. Levine, *Industrial Retardation in Britain, 1880–1914* (New York, 1967), 59; quoted in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432. On the general conservatism of British management, see Richard E. Caves et al., *Britain's Economic Prospects* (London, 1968), 305.

[91]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432. D. C. Coleman ("Gentlemen and Players," 114) remarked on the prevalence of "an attitude to business relations which emphasized careful strategical moves and the making of deals and agreements which lessened the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92] Charles Kindleberger, *Economic Growth in France and Britain, 1851–1950* (Cambridge, Mass., 1964), 133. Despite his criticisms of "entrepreneurial" explanations of economic history, P. L. Payne (*British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4], 38) agreed that "there is no gainsaying the belated recognition of the growth and profit-potential of motor cars, some branches of chemical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the like."

[93] Burn, *Economic History of Steelmaking*, 296.

[94] Alfred Chandler and his students have pointed to a variety of ways in which British firm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ve lagged in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See Channon, *Strategy and Structure of British Enterprise,*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ed. Hannah. Chandler's key works are: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1962), and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1977). The influence of Chandler's approach on British scholars is evident in *Essays in British Business History,* ed. Supple.

[95] Peter Mathias, "Conflicts of Function in the Rise of Big Busines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in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Structures,* ed. Harold F. Williamson (Newark, Del., 1975), 41–43.

[96]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33, 35. Another representative firm was the hardware manufacturer, Archibald Kenrick & Sons: Its restrictionist response to a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environment has been examined by Roy Church in *Essays in British Business History,* ed. Supple, 102–123.

[97] Quoted in Leslie Hannah,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Econom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London, 1976), 46; see also Alan Harding,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Law* (Harmondsworth, 1966), 412.

[98] A. F. Lucas,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trol of Competition* (London, 1937). 352.

[99] *The Managers,* 54. See also Blank,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Britain*, on the concern for stability voiced repeatedly by the FBI.

[100] See M. W. Kirby, "The Control of Competition in the British Coal-Mining Industry in the Thirt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s 2, *26* (1973), esp. 283–284, and B. W. E. Alford, *Depression and Recovery?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918–1939* (London, 1972), 52–53. In the steel industry of the thirties, its most recent historian has reminded us, "there was no great demand for rationalization. What the steelmasters wanted was rigid price agreements

and a suffer tariff"; they received both of these (John Vaizey, *The History of British Steel* [London, 1974], 65). For a somewhat more optimistic view of the value of reorganization and amalgamation, see Hannah,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Economy,* 141, 158–162, 182–183; but even Hannah is very cautious, ending in "restrained agnosticism" (192).

[101] Quoted in Turner, *Business in Britain,* 65. See also Edwards and Townsend, *Business Enterprise,* 562–563.

[102] See Channon, *Strategy and Structure of British Enterprise*, 215–216, 232, and passim.

[103] See Hannah, *Rise of the Corporate Economy,* 177.

[104] "The Coming Corporatism," *New Society 30* (10 October 1974), 72.

[105] "The Entrepreneur and Social Order: Britain," *Business History 17* (1975), 186–187.

第八章　总的看法与评价

[1] See Frank Blackaby, ed., *De-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1978); see also Peter Jenkins, "A Nation on the Skids,"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8 October 1978, and [Paul Barker], "Europe's Merseyside," *New Society 46* (14 December 1978), 623.

[2] "Gentlemen and Playe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s 2, *26* (1973), 115.

[3] "What is the British Disease?" the *Times* (London), 29 April 1971.

[4]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London, 1907), 151.

[5] *Industrial Efficiency* (London, 1906), *II*, 459.

[6] "Leaving the Villag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 August 1973. See also Lewis's comparis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fe, in which England comes out, for all its faults, the home of "human values" ("Notes on the New York Skyline...," Atlantic, June, 1971, 58–62).

[7] Quoted in Krishan Kumar, "A Future in the Past?" *New Society 42* (24 November 1977), 418–419. See the reflections by Christopher Price, MP, provoked by Galbraith: "A Dunce as Prizewinner," *New Society 39* (3 March 1977), 452–453.

[8] *Britain—A Future That Works* (Boston, Mass., 1978), 100.

[9] *God is An Englishman,* (Sydney, Australia, 1969), 71.

[10] Quoted by R. R. James, *Ambitions and Realities: British Politics, 1964–1970* (London, 1972), 293.

[11]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1959), 42.

[12]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Venice," *New Society 42* (17 November 1977), 352.

[13]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1963), 378. This was a failure, he stressed elsewhere, of a society, and notof a handful of leaders: "Behind this inert government...lay a whole social system and psychological attitude which themselves blocked the way to radical reform"("The Decline of Spain" [1961], in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ed. Carlo Cipolla [London, 1970], 185). "Spanish Main Gold," as Peter Jenkins recently remarked, "was to Castille what North Sea oil may prove for Britain—the agent of de-industrialization" ("Going Down with

Great Britain," *Harper's,* December, 1979, 28).

[14] See the *Guardian,* 26 November 1973.

[15] See, for example, Wilfred Beckennan, *In Defense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1974).

[16] Review of James Alt,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cline* (Cambridge, 1979), in *New Society 50* (8 November 1979), 332.

[17] Preconference message to Conservative party workers, 28 September 1973, quoted in Sunday *Telegraph*, 30 September 1973.

[18] Quoted in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22 April 1979.

[19] See, for a similar argument during the election compaign, Peregrine Worsthorne, "Do British Want to Lose Their Chains?" Sunday *Telegraph,* 8 April 1979, 16.

[20] Tom Forester, "Do the British Sincerely Want to Be Rich?" *New Society 40* (28 April 1977), 158, 161.

[21] *The Diaries of a Cabinet Minister* (New York, 1976), *I*, 351.

[22] Glyn Jones and Michael Bames, *Britain on Borrowed Time* (Harmonds-worth, 1967), 268. Maude saw himself as keeper of the Tory conscience, and denounced preoccupation with economic growth as no part of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Echoing R. H. Tawney, he labeled it (in *The Consuming Society* [London, 1967]) a "fetish" producing "a sterile cycle of increasing production for increasing consumption of increasingly trivial things."

[23] Anthony Lewis, "The Radical of 10 Downing Stree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4 March 1971, *46*.

[24] See David Marquand, "Compromise Under Attack," *New Society 16,* (5 November 1970), 829, and Paul Johnson, "Ted Heath's Britain," *New Statesman 83* (18 February 1972), 196.

[25] See David Butler and Dennis Kavanagh,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February 1974* (London, 1974), 125–126, 162–163; David Butler and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70* (London, 1971), 169; and Robert Rhodes James, *Ambitions and Realities: British Politics, 1964–1970* (London, 1972), 220, 239. See the suggestive analysis of the key words and phrases used by the candidates by Shelley Pinto-Duschinsky, "A Matter of Words," *New Society 27* (7 March 1974), 570–571. Wilson continued this winning line in the October election: "What the people want," he affirmed, "what every family needs, is a bit of peace and quiet" (David Butler and Dennis Kavanagh,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October 1974* [London, 1975], 134).

[26] Quoted in *People* (New York), March, 1977, 32.

[27] "The Politics of Austerity," *New Statesman 87* (3 May 1974), 607–608. The decade of the forties was harked back to as a model by a number of left-wing writers. It now seemed an age of elevating austerity and common purpose, before prosperity opened the floodgates of selfishness and the frantic pursuit of artificial wants. Mervyn Jones, novelist and regular contributor to the *New Statesman,* greeted the year 1975 ("A New Year Salute," *New Statesman 89* [3 January 1975], 3–4) with a reassurance that prolonged zero growth was all for the best: "I never believed that human happiness can be measured in gross national product per capita."

He and others, he recalled, had spent the fifties deploring the pursuit of affluence; they were right then, and should hardly be despondent now that "the affluence show is closed down," at least "for the time being." "There have been," he went on, "only two periods in my lifetime that justified a positive pride in being a citizen of this country: the war, and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In Attlee's Britain, for all the shortage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felt deprived, who got nothing of value out of life, was surely less than it is now." (The irony of such nostalgia is inescapable if one looks at a cartoon in the 4 October 1944 issue of *Punch,* in which a scene of a queue of shoppers draws the [humorous] observation from a bystander, "I suppose in about thirty years' time people will insist on describing this as the good old days." [Precisely on the nose!]).

[28] "Labour After the Defeats," *New Statesman 92* (12 November 1976), 659—660.

[29] *Ramsay Macdonald* (London, 1977), 462.

[30] Lincoln Allison, "The English Cultural Movement," *New Society 43* (16 February 1978), 358—360. Allison offered a "culturist manifesto": "Join the organisations which oppose harmful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Do it thoughtfully but with determination. Protect your communities. Learn ancient skills. Renovate old houses. Defend quality, whether of beer or of landscape; the substitutes rarely satisfy. In doing so you will reward not merely yourself, but your society."

[31] "Farewell to Westminster," *New Statesman 93* (7 January 1977), 2.

[32] Anthony Hardey, *A State of England* (London, 1963), 129n.; see also Clive James, "Supplier of Poetry," *New Statesman 88* (22 November 1974), 745: "The urge to preserve supplied him with his most important creative impulse."

[33] *New Statesman 85* (23 February 1973), 253.

[34] Quoted in Allison, "English Cultural Movement," 360.

[35] *The Edwardians* (London, 1970), 289; *The English* (London, 1973), 242.

附录　英国的停滞：经济解释的局限性

[1] *Economic Growth in France and Britain, 1851—1950* (Cambridge, Mass., 1964), 67—68.

[2]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one side, and emigr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 occupations, on the other, maintained a rough equilibrium in the labor market. Compar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certainly displayed a labor surplus, but explanations built on comparison with the unique American situation are apt to collapse when confronted with conditions in other nations. On the basis of a comparison betwee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 J. Habbakuk suggested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19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64], 196—199) that there was a lesser incentive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to invest in labor-saving machinery because of lower wage rates. Such a suggestion has been repeated more recently by the social historian Paul Thompson (*The Edwardians: The Remaking of British Society*

[London, 1975], 186–187). This argument would lead us to expect even less investment in such technical improvements in Germany and in all other industrializing nations, whose wage rates were all (in varying degrees) below Britain's. Such an expectation would be contradicted by the evidence. This argument is also weakened, perhaps fatally, by the fact tha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a significant gap opened betwee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an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certain strategic industries, the level of wage costs was pressing harder than before upon British industrialists. Prices were falling, productivity increases were slowing down, yet money wage rates did not decline significantly. If wage rates exerted such influence upon technical investment,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hould have seen a striking upsurge in such investment in Britain, but it'did not (see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London, 1969], 426). R. A. Church ("Nineteenth Century Clock Technology in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itzer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s 2, *28* [1975], 616–630) found the Swiss, with similar craft traditions and probably lower (and certainly no higher) watchmakers' wage rates, leaving the British far behin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adoption of labor-saving devices. Church concluded that "comparisons between British or European and American technology hav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s and relative factor prices, but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must also be counted among the crucial variables which explain the varied patterns o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3] Although late Victorians worried about exhausting their coal reserves, for example, their fears were misplaced: During the succeeding century of use, proven reserves grew faster than production. Petroleum did not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until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even then Britain was in a better position, through its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than Germany, France, or Japan. The mere mention of Japan, a nation endowed with virtually non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necessary for industrialization, should cast doub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factor. Rather than being checked by the depletion or absence of resources, British industry, as Kindleberger argued, "failed to adapt to the resources made valuable by technical change"(*Economic Growth in France and Britain,* 35).

[4] See particularly L. H. Gann and Peter Duignan, *Burden of Empire* (New York, 1967), D. K. 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Ithaca, N. Y., 1973), Ian Drummond, *Imperial Economic Policy, 1917–1939* (London, 1974), and, more generally,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1970* (London, 1975).

[5] This line of inquiry was opened by the pioneers of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See David Landes, "Factor Costs and Demand: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Business History 7* (1965), 15–33, and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1969), 331–358; D. H. Aldcroft, "The Entrepreneur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87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s 2, *17* (1964–1965), 113–134; A. L. Levine, *Industrial Retardation in Britain, 1880–1914* (New York, 1967).

[6] *Industry and Empir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50* (London, 1968), 157.

[7] Ibid., 158.

[8] *Essays on a Mature Economy: Britain since 1840* (London, 1971), ed. Donald McCloskey; see also McCloskey, *Economic Maturity and Entrepreneurial Decline: British Iron and Steel, 1870–1913* (Cambridge, Mass., 1973), and Roderick Floud, *The British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50–1914* (Cambridge, 1976).

[9] "Did Victorian Britain Fail?"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s 2, *23* (1970), 459. Charles K. Hyde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British Iron Industry, 1700–1870* [Princeton, N. J., 1977]) makes the persuasive argument—but only for the period before 1870—that in all the major technological decisions, "the ironmasters were economically rational."

[1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s 2, *25* (1972), 590–592.

[11] W. P. Kennedy, "Foreign Investment, Trade and Growth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70–1913,"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73–1974), *11,* 416. Even a basically sympathetic economic historian, P. L. Payne (*British Entrepremurship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4], 50, conceded that "doubts remain." See Barry Supple's critical review of McCloskey's monograph in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8* (1974), 238–240, and S. B. Saul's of Floud's monograph in *Business History 20* (1978), 113–114. See also the general critique by the economist and historian Douglas North, "Discussion" (of Donald McCloskey's "Achievements of the Cliometric Schoo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77–81. The method of McCloskey's original argument has been criticized in N. F. R. Crafts, "Victorian Britain Did Fail,"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s 2, *32* (1979), 533–537.

[12] Peter Marris, *Loss and Change* (New York, 1974), 117.

[13]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London, 1969), 426.

[14] "Britain'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1870 Watershed," *Lloyds Bank Review 99* (January, 1971), 30. For a recent econometrical argument that the reasons for economic adaptability, crucial to growth, "appear to b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ather than purely economic," see Stanislaw Gomulka, "Britain's Slow Industrial Growth—Increasing Inefficiency vs. Low Rate of Technical Change," in *Slow Growth in Britai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ed. Wilfred Beckennan (Oxford, 1979), 166–193.

[15]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ndustry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1875–1914," *Business History 12* (1970), 65.

英国梦、美国梦、中国梦，梦与梦多有相似

英国病、美国病、中国病，病与病各有不同

一个别有深意的故事，任何关注“英国病”及英国工业未来何去何从的人，都会被作者的论据所打动。

—— Anthony Sampson

作者提供了一幅比此前所有文化史著作都要可靠的关于英国国民性的理想图示，令人钦佩。

—— Tom Nairn

一本重要的著作，值得那些认为英国的命运掌握在其自己手中的人阅读和沉思。

—— *The Economist*

理智的读者没人能抵挡住这本书的影响。

—— Lawrence Lafore

作者以一种宽广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提供了更多素材，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英国上层集团的心态。本书对理解英国价值观作出了重要贡献。

—— Peter Stansk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上架建议：历史·文化

ISBN 978-7-301-22857-9



定价：45.00元